文化生活译丛 Culture & Life



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思考与回忆

——俾斯麦回忆录（第一卷）

Otto von Bismarck

[德] 奥托·冯·俾斯麦 著

杨德友 同鸿印等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文化生活译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思考与回忆

——俾斯麦回忆录（第一卷）

Otto von Bismarck

[德] 奥托·冯·俾斯麦 著

杨德友 同鸿印等 译



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德) 俾斯麦著；杨德友，同鸿印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7-108-02351-2

Ⅰ.思… Ⅱ.①俾…②杨… Ⅲ.俾斯麦，O.(1815～1898)－回忆录 Ⅳ.K835.16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2595 号

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19世纪后半叶德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出身于容克世家，1862年任普鲁士首相后，主张以武力统一德意志，宣称“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只有通过铁和血才能达到目的”。在历经普丹、普奥和普法战争之后，于1871年成功统一了德意志，并出任帝国首相。1890年去职，潜心写作回忆录《思考与回忆》。

Bismarck

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J.G.Cotta's 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Stuttgart und Berlin 1924

根据苏联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莫斯科 1940 年俄译本和德国科塔图书公司

斯图加特和柏林 1924 年德文本新版并参照英译本翻译、校订

文化生活译丛

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
薇思瓦纳珊编
悠游小说林
（意）安贝托·艾柯著
诠释与过度诠释
（意）安贝托·艾柯等著
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
（美）萨义德著
米沃什词典
（波兰）米沃什著
印度三部曲
（英）V.S.奈保尔著
　幽黯国度
　印度：受伤的文明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门萨的娼妓——伍迪·艾伦幽默文集
（美）伍迪·艾伦著
小人物日记
（英）格罗史密斯兄弟著
文明与野蛮
（美）罗伯特·路威著
思想家（第二版）
（美）布莱恩·麦基编
我是说谎者
（意）费里尼著
英伦独语
（西班牙）桑塔耶纳著
“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
田晓菲编译
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
（英）斯特莱切著
英国风情
（美）亨利·詹姆斯著
法国掠影
（美）亨利·詹姆斯著

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
（德）俾斯麦著

待出
伏尔泰的椰子
（英）伊恩·布鲁玛著

献给子孙后代

为了理解过去
和有教益于未来

出版说明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年）是十九世纪普鲁士—德意志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在他当政时期，德意志从分裂割据的邦联转变成统一的帝国，从遭受强邻欺压的从属地位转变为跻身于欧洲强国之林。在这期间，俾斯麦起了重要的作用。恩格斯称他是“一个头脑十分实际和非常狡猾的人”。[①]列宁也说过：“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进步的事业。”[②]

一些资产阶级作家把德意志的统一完全归功于俾斯麦，颂扬他是“伟大年代的英雄”、“百年一遇的伟人”[③]，这自然是不科学的溢美之词。因为德意志的统一是由当时德意志内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发展所要求和决定的，不是由某个英雄、伟人的意志或行动所决定的。梅林说过，俾斯麦的历史性行动只是使君主和贵族地主懂得：“他们最聪明的行动是同资产阶级一道，以牺牲无产阶级为代价，订立契约。”[④]压制工人阶级和人民革命贯穿俾

---

①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88页。

②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86页。

③ 转引自梅林：《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载《梅林文集》狄茨出版社1965年柏林德文版第7卷第243页。

④ 梅林：《俾斯麦和历史的判决》，载《梅林文集》第7卷第278页。

斯麦的一生。而且上述这条通过封建贵族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而实现统一的道路，同样更多地是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而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意志或行动。

俾斯麦的《思考与回忆》曾被一些人赞颂为“天才智慧的无穷源泉”、“德意志民族可以从中满足它对于百年来的知识的渴求”。[①]在本书德文版出版者霍·科尔为德文版第一版所写的序言中，也可以看到这种不符合实际的赞颂之词。显然，这种对俾斯麦的回忆录的过分的评价同对俾斯麦的业绩的过分的赞美是有关系的。我们不能同意对这部书的这种不符合实际的评价，然而，俾斯麦的这部回忆录作为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和活动的记录，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德国史和俾斯麦的生平事业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因为在这部书中，除了个别地方外，整体说来，俾斯麦忠实地复述了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他个人的主观见解。当然，对于他的言论和行动，我们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和分析。

梅林在1898年11月写的《俾斯麦的回忆录》一文，对这部书作了中肯的评论，我们把这篇文章译出附入本书。因为当时俾斯麦的回忆录只出版了前两卷，所以梅林的评论没有涉及第三卷的内容。我们从第三卷中看到俾斯麦以相当的篇幅谈到了社会民主党、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等等。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叙述表明了他对“使他多么痛苦和烦恼的工人运动”的仇视态度。但是，他对于他同拉萨尔的暗中勾搭仍然缄口不谈。总的说来，梅林评论的精神是适用于全书的。

---

① 转引自本书第三卷附录：梅林的评论文章《俾斯麦的回忆录》。

阿·叶鲁萨里姆斯基为本书俄译本写的序论：《外交家俾斯麦》，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俾斯麦的外交活动，有参考价值，所以也译出附入书中。文章一再声称同俄国的良好关系、俄国的立场，对实现德意志统一的重要性，但是文章没有揭示俄国在实现德意志统一时期的中立，是由它同奥地利、法国存在着的矛盾所决定的。其实，长期以来沙皇俄国的对德政策的目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是“在德国建立鞭子的绝对统治”。①它有时支持奥地利，有时支持普鲁士，只是为了“使德国的分裂状态永久化和极端化”。②叶鲁萨里姆斯基的文章对沙俄政府的对外政策多少有些美化。

书后的注释译自俄译本。俄译本的注释比较详细，但是其中也有个别错误之处，例如把沙俄并吞比萨拉比亚说成是俄国收回比萨拉比亚③，请读者阅读时注意。德文版和英译本只有少量脚注，本书选译其中一部分（重复的注释省略），仍作脚注处理。

人名索引也译自俄译本，因俄译本的人名索引要比德文版的详细。俄译本还有大事索引和地名索引，本书略去。本书边码为俄译本页码，可供检索人名及全书内容参见之用。

德文原书共三卷，前两卷出版于1898年，第三卷出版于1922年。1924年出新版。中译本是由山西大学外语系《思考与回忆》翻译组翻译的，依据的是苏联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莫斯科1940年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新“神圣同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72页。

②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3页。

③ 见本书第二卷第28章注释7。

出版的俄译本，和德国科塔图书公司斯图加特和柏林 1924 年出版的德文新版，又参考了英国伦敦哈特尔和斯托赫顿公司出版的英译本。第一卷译自德文版，参照了俄译本和英译本，由杨德友翻译；第二、第三卷译自俄译本，参照了德文版和英译本，由（以姓氏笔画为序）弋成隆、王明华、白素蓉、同鸿印、巩象巽、吴长福、吴增和、陈怀义、陈志濂、陈贻谋、杨继舜、杨德友、张文郁、张安琪、林明榕、武树元、郑海石、姚应芳、梁立生、常文嫣、景瑞雪、薛高保等翻译。一至三卷译出后，由武树元、陈贻谋进行统校。全书最后由陆世澄依据德文版作了校订，并译出梅林的评论《俾斯麦的回忆录》供读者参考。

因为本书行文晦涩，尽管译者和校者作了努力，恐怕难免还有错误或疏漏之处，希望专家和读者指正。

1983 年 11 月

中译本再版前言

《思考与回忆》是“铁血宰相”俾斯麦为德国人写出的回忆录，是他的政治遗言，总结了他一生的经验教训，“写给儿孙后代，以了解过去，惕厉未来。”从1890年3月辞职到1898年逝世，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回忆录的写作，可见其态度的郑重与严肃。

自从问世以后（第一、第二卷于1898年出版，第三卷于1924年出版），本书一版再版，连同它的作者一起不断受到欧美乃至世界各国研究者的大力关注。中译本于1985年12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但译事却是在大约1973—1979年间完成的。当时出版社和译者没有签订翻译合约，也没有一个人问及报酬之事，大家只是凭借一股积极的精神，克服诸多困难完成翻译工作。现在，全部译者都已退休，平均退休时间十年以上，散居国内外。而巩象巽、陈贻谋、武树元、姚应芳、景瑞雪等五位译者，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本书的写作代表了德语语言风格和19世纪后半期欧洲政论的文风，及俾斯麦个人的写作风格。译者们在尽可能遵守汉语表达方式的前提下，尊重和再现了原作的风格。

东方出版社在文革中后期决定组织翻译此书，眼光独到；如

今三联书店又决定再版此书，亦可见出他们敏锐的、合乎时宜的判断力。而译者们又有机会看到他们在艰苦动荡的历史年代完成的辛苦劳作再次为新时代、为学术界、为广大读者服务，是感到十分欣慰的。在这里，译者们向三联书店表示由衷的谢意，并感谢德国友人贝雅塔·马磊斯克女士的热心帮助。

杨德友

2005 年 8 月 25 日

于太原，山西大学

德文版第一版序言

俾斯麦公爵在解除充满荣誉的公职——正如他一再说过的——摆脱了他一生所攀登的栅栏般的曲折道路之后不久，便开始起草他的《思考与回忆》。最初的建议是由科塔家族向他提出的，同时提出了出版的要求；早在1890年7月6日，公爵和科塔图书公司的代表之间便已达成了一个协议，根据协议，公爵如果撰写生平回忆录，则将出版权给予该家族。洛塔尔·布赫尔，这位通晓历史的外交家，在公爵解职后，除短暂间断外，在弗里德里希斯鲁厄或瓦尔辛，多年来都是公爵的雅客。他的功绩就在于坚定了公爵撰写回忆录和阐述他的政治思想的决心，并在日常谈话中促使公爵坚持业已开始的工作。布赫尔依据公爵口述所作的速记稿，成为初稿的基础。公爵在多年内又对初稿热心地加工，一再重新审阅分成章节和系统地排列的速记稿，并且亲自加以补充。为便于公爵工作，《思考与回忆》早在1893年便已印出作为稿本，稿本包含了公爵在初稿中所作的全部改动。然后，俾斯麦公爵又对这部新的稿本进行了二至三次加工，并加以细心的审订，在这中间他的几乎丝毫不爽的记忆给他极大的帮助。在最后这两年中，他还重新改写过整个的章节。

由于年迈力衰和对写作辛劳的某种畏惧，工作有时陷于停顿，但是大部分已告完成，从而构成了德意志民族的一份珍贵遗

产。从这一充沛的活泼的源泉中，我们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未来的世纪中还将会汲取教益，而我国全体人民，即使在久远的未来，也将像从古典著作家的著作中那样从俾斯麦留给他们的这一著作中得到启迪。

遵从奥托·冯·俾斯麦公爵本人的嘱托，出版者有义务依据原件订正常常是从有缺陷的出版物抄录下来的各种文件，改正由于缺乏正式文献造成的日期和姓氏拼法上的细小错误，在脚注中注明公爵在其政治演说中使用过的类似的说法，并附上文献资料。但是，正文从未加以改动和删减——面对这样的一位逝者，敬畏之情更应要求加倍慎重。

公爵的手注标以星花“＊”，出版者的注标以号码。

霍尔斯特·科尔

开姆尼茨，1898 年 10 月 17 日

新版序言

这个大八开新版本以1905年通俗版为依据，注释经过重新审订，在许多地方做了补充，在看来有助于理解政治和历史事件的地方加了新的注释。我重新编排了索引，从各方面加以补充和扩大；在正文下面没有注释的外语词句，不熟悉外语的读者可在索引中查到注释。

正如在通俗版中那样，在这一新版中，海默尔斯豪森（瓦尔德克）的阿·埃根布罗特博士教授曾给以友好的建议和协助，在此向他致以谢忱。

霍尔斯特·科尔

莱比锡，1912年10月15日

第一卷

目　录

出版说明 …… 1
中译本再版前言 …… 1

德文版第一版序言 …… 1
新版序言 …… 1

第一章　第一次联合省议会以前 …… 1

（一）少年时的宗教观和政治观　最初的德意志民族的印象（普拉斐）　与大学生协会的关系　汉巴赫庆典和法兰克福暴动对于俾斯麦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　少年时对于外交政策的想法　上诉审法院陪审员和政府法官无人提携在职务上晋升的困难　对外交生涯的向往　安西隆的外交家理想　普鲁士乡村贵族中缺乏适当的外交人才以及这种现象的原因　法语知识成为外交职业的保荐条件　当时普鲁士外交界和军队中的外国人　安西隆的劝告　当时普鲁士司法界的人物和制度　担任刑事法庭和市法院的陪审员　“我赞同我的同事泰佩尔霍夫的意见”　普腊托里乌斯先生的调解尝试　颁发审议离婚条例的必要　在普通案件处工作　转入行政部门　莱茵的行政机构、人员、事务　继续作为在波茨坦行政当局的检察官　对于当时官僚的发辫和假发的反感　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同现代的官

僚主义相比较而加以抨击的不公正　邦议院的今昔　以往的行政官员较为正直，今日的法官受到党派的政治影响　放弃官场生涯，回乡管理波美拉尼亚庄园　（二）俾斯麦所谓的“容克精神”　父亲和母亲　俾斯麦摆脱“他的等级的偏见”　旧普鲁士王权的无限权威不是他的最后信念　绝对专制主义的危险　在俾斯麦看来，贵族出身并不能弥补才干的不足，俾斯麦保护农业仅仅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　俾斯麦的君主政权的理想　不受限制的绝对专制主义不是治理德国臣民的适当方式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宫中的观察　和官僚们的冲突　俾斯麦反对俾斯麦　第一次联合省议会中的反对派　俾斯麦由于1847年5月17日的演说引起的和反对派的冲突　国王和普鲁士亲王妃的克制　在婚期旅行中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会见

第二章　1848年…… *18*

（一）3月18日和19日事件的最初印象　舍恩豪森农民驱逐坦格明德的代表　农民准备前往柏林　俾斯麦在波茨坦：和博德尔施文格、默仑多夫、普里特维茨谈话　俾斯麦拜会普鲁士亲王妃　拜会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　俾斯麦进入柏林皇宫的尝试被拒绝　俾斯麦上书国王，第一次对他表示同情　在柏林的大街上　和普里特维茨和默仑多夫谈论自主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在马格德堡俾斯麦遭到逮捕的威胁　俾斯麦同舍恩豪森农民代表团在波茨坦　国王对近卫军团军官们的讲话　俾斯麦致陆军中将冯·普里特维茨的信　从同警察总监冯·米努托利和冯·普里特维茨将军的谈话中获悉的关于3月运动的历史　博德尔施文格是撤军命令的倡议者　费利克斯·利希诺夫斯基公爵　（二）俾斯麦反对请愿书的声明　致马格德堡一家报纸的信　一篇报纸文章《来自阿尔特马克》　俾斯麦反对冯·芬克关于国王逊位和任命普鲁士亲王妃摄政的建议　会见正在从英国返回的普鲁士亲王　和亲王的第一次会见　在巴贝尔斯贝格拜会亲王　士兵之歌　同普鲁士亲王妃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亲王的最初关系　（三）弗里德里希·威

廉四世的“条顿”民族感情　弗里德里希四世不在促成联合的意义上利用德意志各邦君主反对革命而要求保护的需要　3月21日的巡行　威廉四世对革命取得的胜利会持久吗？　初访无忧宫　和国王的谈话　国王的法制观点　国王在他对待国民议会态度上可能的内心思想　宫廷党　列奥波德·冯·格尔拉赫和路德维希·冯·格尔拉赫　冯·劳赫将军　（四）探索新内阁　勃兰登堡伯爵接受首相职位　俾斯麦说服奥托·冯·曼托伊费尔加入勃兰登堡内阁　国民议会前的新的大臣们　保卫他们安全的措施　军队占领克尼普豪森伯爵的住处　对弗兰格尔态度的批评　国王迁移国民议会会址时的内心思想

第三章　埃尔富特、奥尔缪茨、德累斯顿 …… 49

（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潜在的德意志思想对1848年之后普鲁士政策的挫折负有责任　关于普鲁士的德意志使命和道义上占领的说法　王朝和街垒　法兰克福议会的自我欺骗　在普鲁士邦内王朝感情的强大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接受皇冠　俾斯麦现时和1849年对当时情势的判断　他当时的以党派评论为依据的观点　派别活动的今昔　三王同盟　有利于普鲁士的形势　普鲁士领导层对现实的力量对比关系的错觉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疑虑　（二）普鲁士军队在普法尔茨和巴登　俾斯麦对于普鲁士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的军事力量的信赖　当时动摇不定的普鲁士政策　冯·拉多维茨将军——国王的中世纪幻想的更衣室管理员　埃尔富特议会：勃兰登堡伯爵试图争取俾斯麦赞同埃尔富特政策　俾斯麦和加格恩　加格恩家族和奥尔斯瓦尔德家族　军政大臣施托克豪森嘱咐俾斯麦要安静　普鲁士的军事上的屈服及其原因　1850年12月3日俾斯麦的演说　演说的主导思想　1850年11月圣彼得堡对德国革命的比较平和的观点　冯·布德贝格男爵　（三）德累斯顿谈判成果甚少　施瓦尔岑贝格公爵和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在德累斯顿　当时普鲁士政策的基本错误

第四章　外交家 …… 69

被任命为驻邦联议会公使馆参赞　被任命为驻邦联议会公使　冯·罗霍夫先生的不满　在冯·波伊克将军处关于勋章性质的初次研究　巴黎和彼得堡的佩戴勋章的先生　爱好跳舞的法兰克福　威廉一世国王讨厌跳舞的大臣们　派到“高级外交学校”维也纳　1852 年 6 月5 日的介绍信　维也纳的接待　同奥地利签订共同关税的困难　克伦策的诽谤　俾斯麦厌弃在维也纳的职位和大臣职位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下大臣地位的艰难处境　俾斯麦拜会汉诺威国王乔治五世　乔治五世的孤独　一位普鲁士领事是奥地利的代理人？

第五章　周报党。克里木战争 …… 81

（一）贝特曼·霍尔维克集团和普鲁士亲王　卡尔·冯·德尔·哥尔茨伯爵　罗伯特·冯·德尔·哥尔茨伯爵是贝特曼—霍尔维克集团的总管　《普鲁士周报》　鲁道夫·冯·奥尔斯瓦尔德　俾斯麦拒绝加入《周报》党　在普鲁士亲王感觉中的奥尔缪茨　哥尔茨作为大臣候选人　曼托伊费尔不愿意同奥地利决裂　1854 年 4 月 20 日的普奥攻守同盟　俾斯麦向国王建议，通过在上西里西亚集结军队的办法利用俄国同西方国家的战争之机来提高普鲁士在欧洲的威望　奥法同盟压力下的德意志邦联　符腾堡国王威廉一世的解说　“亲爱的，这一切都很美妙，但是要我付的代价太高了”　（二）冯·格尔拉赫将军的书信摘录　内阁顾问冯·尼布尔的信　格尔拉赫书信又一些摘录　曼托伊费尔反对积极的反奥地利政策　内阁危机的通常过程　阿尔文斯累本作为大臣候选人　（三）《周报》党的双重角色　它的政治纲领以及对这一纲领的批评　伪造的备忘录　本生关于重新改制欧洲地图的备忘录　普鲁士亲王同俾斯麦会谈关于普鲁士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地位特别是对俄关系　什么是反对普鲁士对俄战争的理由？　电报和书信被盗　辛凯尔迪自露马脚　（四）俾斯麦致函格尔拉赫：普鲁士由于在巴黎会议大门之外听候召唤而贬黜了自己在欧洲的地位

第六章　无忧宫与科布伦茨 …… 108

在其夫人影响下的普鲁士亲王　奥古斯塔亲王妃（皇后）醉心于法国和英国的一切　她对俄国的一切都反感　冯·施莱尼茨先生　奥古斯塔亲王妃（皇后）早餐时的陈述及其影响　无忧宫与科布伦茨宫的敌意　伊丽莎白王后　奥古斯塔亲王妃（皇后）倾向于天主教教义　她在莱茵省的声望　她对教皇庇乌九世的崇敬　她与克莱斯特·雷措夫省长的意见分歧　无忧宫的参谋总部　古斯塔夫·冯·阿尔文斯累本作为科布伦茨宫中国家利益的代表者

第七章　来往于法兰克福和柏林之间 …… 115

（一）俾斯麦被召来“恐吓”曼托伊费尔　穆斯蒂埃侯爵按照西方国家的精神试图对俾斯麦施加影响　哥尔茨和普尔塔勒斯作为国王的合适的受托人反对曼托伊费尔　（二）曼托伊费尔在关于里诺·克韦尔问题上同《十字报》党发生冲突　格尔拉赫关于这一争论的信　曼托伊费尔的不满　阿尔布雷希特·冯·阿尔文斯累本扮演“稻草人”，俾斯麦扮演和平使者　俾斯麦使曼托伊费尔摆脱克韦尔和被利用来盗窃电报的代理人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关于一位大臣的地位的见解　（三）曼托伊费尔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有关上议院的组成人选的信　俾斯麦作为国王同下议院保守党谈判中的受托人　国王由于俾斯麦的延宕而愤怒　被软禁在夏洛滕堡的宫中　重又得宠　俾斯麦说服保守派改变意见　上议院还是贵族院？　俾斯麦主张贵族院的建议　（四）曼托伊费尔和宫廷党反对任命俾斯麦为大臣　俾斯麦与保守派的领袖们　作为外交电文起草人的俾斯麦　在普特布斯　起因甚小，后果甚大

第八章　访问巴黎 …… 134

（一）哈茨费尔特伯爵邀请俾斯麦去巴黎　国王情绪的转变　维多利亚女

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在巴黎　阿尔伯特亲王和维多利亚王储妃对俾斯麦抱有偏见　关于君主制的前途同王储妃的谈话　维多利亚女王的立场　凡尔赛晚宴；作为请帖分发人的俾斯麦　法兰西第二帝国宫廷人士的平民风尚　同皇帝拿破仑第三的初次会见　柏林宫廷不满意俾斯麦的巴黎之行　这种不满的表现　俾斯麦对于拿破仑第三的评论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接受这一评论　冯·卡尼茨将军论拿破仑第一　（二）正统主义概念　从俾斯麦和格尔拉赫关于正统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通信中得知

第九章　旅行·摄政 …… 175

（一）重新接近国王　提议俾斯麦任财政大臣　拿破仑考虑的普法接近以保证在和奥地利因意大利问题发生战争时普鲁士保持中立的思想　俾斯麦对拿破仑建议的回答　（二）赴丹麦和瑞典打猎　觐见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不愿意形成新的小邦国　在瑞典的颠顸，返回柏林，赴库尔兰打猎　国王最初的得病　中风　同普鲁士亲王的谈话　俾斯麦奉劝亲王不能以拒绝宪法来开始执政　亲王成为国王的代理人　反对亲王的阴谋　指定亲王为摄政　曼托伊费尔关于代理问题的经过的信　曼托伊费尔解职　（三）关于即将调离法兰克福的暗示　因为出任驻彼得堡公使同普鲁士亲王会谈　乌泽多姆和夫人　插曲：乌泽多姆在佛罗伦萨，1869 年的辞职请求　威廉国王给俾斯麦的信　分歧消弭　（四）同普鲁士亲王的会谈（继续）："新纪元"内阁是一个平庸的内阁　奥古斯塔亲王妃是新内阁的奠基人和保护人　施韦林伯爵强使摄政王签字　（五）作为奥地利的代理人和曼托伊费尔内阁中的受托人的银行家莱文斯泰因　外交部中的腐败现象

第十章　彼得堡 …… 199

（一）皇帝尼古拉一世在 1849 年和奥尔缪茨时期对奥地利的友好情谊　沙皇不信任自己的臣民　尼古拉对弗朗茨·约瑟夫的偏爱　当时的彼得堡的社会　再谈巴黎和彼得堡的佩戴勋章的先生　彼得堡大街所见　青年一代

的交际风格　他们在政治领域表现出来的反德情绪　作为俾斯麦的保护人和对手的哥尔查科夫　哥尔查科夫不满的原因　德国需要同俄国打仗吗？　（二）皇宫中的款待　无顾忌的幼小的女大公　宫廷仆役的傻吞行为　沙皇计量的脂油　俄国的坚持：从叶卡特林娜二世时期以来的岗位　（三）俾斯麦对柏林的决定丧失影响　摄政王对他的报告的准确性发生怀疑　作为俾斯麦在圣彼得堡的监视者的明斯特伯爵　俄国外交的政治上的对弈法　破坏通信秘密是君主的权利　奥地利的实践　向普鲁士驻维也纳或驻彼得堡公使寄发平信是向奥地利或俄国政府暗示不愉快消息的方式　图尔恩和塔克西斯邮政中的通信秘密　1852 年以前普鲁士驻维也纳使团滥用的习惯　奥地利对外交部不忠实官员的暴力行为　俄国使不满意的官员满意的办法　（四）访问莫斯科的回忆　同奥博连斯基公爵的通信　（五）得病和瓦尔茨大夫的医治　在诺海姆疗养所　感染肺炎在霍亨道夫长期因病卧床　一个濒临死亡的普鲁士人关于监护的想法

第十一章　过渡状态 …… 216

（一）建议摄政王任命俾斯麦为外交大臣　俾斯麦阐述他的纲领　冯·施莱尼茨的纲领　摄政王同意施莱尼茨的观点　（二）鲁·冯·奥尔斯瓦尔德　由于忠诚宣誓问题引起的内阁危机　罗昂 1861 年 6 月 27 日的信　俾斯麦的复信　他回柏林之行　罗昂 1861 年 7 月 24 日信中所述的危机过程　俾斯麦在巴登——巴登　威廉一世的加冕　同奥古斯塔王后谈论普鲁士的德意志政策　（三）关于内阁更迭的空头支票　作为内阁代理首相的霍亨洛埃·英格尔芬根　1862年 4 月俾斯麦奉召从彼得堡返回柏林　他被任命前往巴黎　俾斯麦致罗昂的信　罗昂致俾斯麦的信　俾斯麦的答复　同拿破仑第三的会谈，提议缔结普法同盟　奥地利向拿破仑第三的建议　法国南部之行，同罗昂的通信　9 月 18 日的召唤电报　觐见王储　在巴贝尔斯贝格的觐见　任命俾斯麦为国务大臣并临时主持内阁

第十二章　普鲁士政策的回顾…… 246

从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以来普鲁士对外政策和对德意志政策中缺乏独立性和能量　普鲁士政策的分立主义性质　波兰问题的决定性影响　赖兴巴赫协定及其意义　普鲁士历史上错过的种种机会　1805年充当调解者的错误　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充当俄国的属国的普鲁士　普鲁士通过它在克里木战争和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的态度而有施于俄国　柏林宫廷的依赖感的起因　在军备领域内普鲁士对比俄国和奥地利的优越之处　普鲁士在巴黎求告，想以大国身份参与签署条约　当时政策的错误　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在他的子孙手里的遗产　在绝对君主制下，谁应对国事负责？　立宪制国家中大臣的职责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时期，谁应对普鲁士的政策负责？　为什么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时期俾斯麦不能成为大臣？　没有议会的纯粹绝对专制主义对于有顺从的议会支持的绝对专制主义的优越性　意大利战争　在奥古斯塔亲王妃和冯·施莱尼茨先生占优势的统治时期的普鲁士政策的无计划性　反对俾斯麦指导对外政策的阴谋　铁与血　从尤特博克回柏林途中　国王畏缩不前　俾斯麦通过回忆普鲁士军官军刀上的绶带来鼓舞灰心丧气的国王　局势的严重性

第十三章　王朝与族 …… 261

各王朝及其对德意志民族问题的态度　普鲁士在邦联中的地位　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达成协议情况下实行二元政治的梦想由于施瓦尔岑贝格1850年12月7日的电报而破灭：俾斯麦观点的转折点　普鲁士是“名义上的”强国　德意志爱国主义需要对王朝的忠诚这种媒介　其他民族的民族感的力量　德意志各族的分立主义　韦尔芬人对王朝的忠诚　在俾斯麦看来，德意志民族感是更为强大的力量　德国的各王朝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有理？　俾斯麦同普鲁士分立主义的斗争　各王朝的无限制的国家主权是以牺牲民族及其统一为代价的一种革命的结果　各王朝的疆界不自然地分割德意志民族

第十四章　冲突内阁 …… 269

（一）卡尔·冯·博德尔施文格　伊岑普利茨伯爵　冯·雅戈夫　冯·泽尔霍夫　弗里德里希·楚·欧伦堡伯爵　冯·罗昂　冯·缪勒　楚尔·利佩伯爵　（二）国王给冯·芬克·奥尔本多夫谈论冲突发起人的信

第十五章　阿尔文斯累本协定…… 277

俄国宫廷在选择波兰化和实行绝对专制制度之间的斗争　俄国对波兰友好的意图　亚历山大二世谈对波兰的占领的不稳固　亚历山大建议俾斯麦接受俄国的职务　为德意志统一的努力而利用俄国的友谊　奥地利在波兰起义期间的立场　哥尔茨伯爵的信　普鲁士在波兰问题上的难处　拿破仑第三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　阿尔文斯累本军事协定的意义　哥尔查科夫对于波兰问题的态度　和欣茨佩特先生第一次会见

第十六章　但泽事件 …… 286

（一）俾斯麦和弗里德里希皇帝　颁布报刊法　王储在但泽的演说　他的抱怨书和国王的答复　俾斯麦劝阻国王对王储采取极端措施　《泰晤士报》泄漏消息　关于公布这一消息的首谋人的测猜　（二）在加施泰因同王储的谈话　王储的新抗议　国王和王储之间的紧张关系　俾斯麦同王储的讨论　王储的备忘录和国王为此而同俾斯麦的通信

第十七章　法兰克福各邦君主大会…… 300

（一）莱希贝格伯爵　俾斯麦怎样取得莱希贝格的信任　在二元政治的基础上实现全德意志统一的尝试　这样一种形态的可能的作用　这样的作用会确立奥地利的霸权吗？　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协调一致是反对英国和欧洲干涉丹麦问题的前提条件　俾斯麦和卡罗利伊之间讨论普奥关系　维也纳低估普鲁士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同威廉一世在性格上的差别　过高估

计冲突削弱普鲁士对外政策和军事指导能力的作用　相信奥地利的军事优势　（二）奥地利厌弃和平的二元政治　邀请参加法兰克福君主大会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加施泰因　国王对于邀请的最初印象　俾斯麦反对参加君主大会　萨克森国王约翰在巴登　普鲁士缺席对德意志中等邦国的影响　莱希贝格同普鲁士接近　（三）丹麦弗里德里希七世的逝世　二元政治的良好开端　军界势力威胁着同奥地利的合作　友好的二元政治尝试的顶点和转折点　两位君主及其大臣在舍恩布伦的会谈　威廉国王对于皇帝所提问题的回答　（四）莱希贝格的地位动摇了　关于奥地利将来加入关税同盟的谈判　俾斯麦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同意将来进行谈判的协议，但是反对关税统一　博德施尔文格、伊岑普利茨和德尔布吕克反对俾斯麦的政策　莱希贝格辞职，由门斯多尔夫伯爵接替　梯勒、阿贝肯、哥尔茨书信摘录　（五）奥地利友谊的不可靠和脆弱性

第十八章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 …… *317*

在慕尼黑的宫廷　王储路德维希　关于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性格特征　路德维希国王同俾斯麦通信摘录

注　释 …… *343*

第一章　第一次联合省议会[1]以前

1

(一)

作为我国国家教育的通常结果，我于1832年复活节前中学毕业时，成了一个泛神论者[2]；我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共和主义者，但是深信共和国是最为合乎理性的国家形式，同时还在思考，是什么原因使千百万人长期地服从于一个人，同时我又从长辈那里听到对统治者的许多尖刻的或不敬重的批评。加之，我从六岁至十二岁时曾在具有雅恩[3]传统的普拉曼体育预备学校受过教育，从中我又获得了德意志的一民族的印象。但是这些印象只停留在理论思考的阶段，还不足以根除生就的普鲁士一君主制的情感。我的历史同情心是在当局的一边。根据我对法律的幼稚理解，哈尔莫迪和阿里斯托吉顿像布鲁特一样，都是罪犯，而退尔则是一个叛逆和杀人犯。三十年战争[4]以前任何一个反抗皇帝的德意志诸侯都令我反感；但从大选帝侯[5]开始，我已倾向采取反对皇帝的观点，觉得七年战争[6]的酝酿是自然的事情。然而，我的德意志民族感情仍旧很强烈，以致在大学时代初期我便同以培育这种民族感情为宗旨的大学生协会[7]发生了联系。但是，在与其成员发生个人交往时，我不喜欢他们那种畏惧决斗、缺乏处世待人教养和

上流社会的礼节。通过进一步与他们接触，就更不能赞同他们那狂妄的政治见解了。这是由于他们缺乏教育、缺乏对现存的历史
2 地形成的生活条件的认识所致。对此，我在十七岁的时候比大多数平均年龄比我大的大学生有机会作过更多的观察，我所获得的印象是：他们的思想是空想与缺乏教育的结合。与此同时，我内心一直保留着我的民族情感，并相信，最近的将来，事态发展将把我们引向德意志的统一[8]；我还曾和我的美国友人科芬打赌说，这一目标将在二十年内达到。

在第一学期，适逢汉巴赫节[9]（1832 年 5 月 27 日），那节日的歌声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而在第三学期，则遇到了法兰克福暴动（1833 年 4 月 3 日）[10]。这些现象使我十分反感，以暴力侵害国家制度的行为令我这个受过普鲁士精神教育的人十分厌恶。我回到柏林时已比我离开那里时更少自由主义思想了。但是在我同国家机构发生直接的联系之后，这种逆转又减弱了。我是在解放战争[11]的意义上、从一个普鲁士军官的立场，来观察当时公众很少过问的外交政策的。一看到地图，法国占有斯特拉斯堡，我就感到愤怒，而海得尔堡、施佩耶尔和普法尔茨[12]的访问勾起我的复仇思想和好战情绪。

在 1848 年以前，对于一个与内阁大臣和高级官员没有任何关系的上诉审法院陪审员和政府法官[13]来说，他不花费几十年光阴走完单调的官场阶梯受到上级的注意并得到提拔，就几乎没有任何希望参与普鲁士政治。当时，家里给我指出的仕途榜样是像波默尔·埃舍和德尔布吕克等人；而作为合适的工作，则推荐去关税同盟[14]和与之有关的机构。根据我当时那个年龄对官场生涯的认真考虑，我所注目的是外交，虽然在以后我为此向安西隆大臣报

告时很少得到鼓励。这位大臣不是对我而是对高级官吏指出，我们的外交所欠缺的一切品质，弗利克斯·利希诺夫斯基[15]公爵全都具备堪称楷模，虽然这位人士当时在柏林的举动显然不会博得这位出身于新教的大臣的赞赏。

这位内阁大臣感到，我们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乡村贵族不具备 3
他所期望的、为我们的外交所需要的才能，而且也没有能力弥补他在这个部门人员的干练方面所见到的种种缺陷。这种感觉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担任内阁大臣时，对土生土长的普鲁士外交官们一向怀有一种同乡的善意；但是因公务上的责任感我很少有可能实行这种偏爱，通常只有在所涉及的人士是从军界转入外交界的才有这种可能。我常常发现，在那些根本没有或很少受过军人纪律的影响、纯普鲁士的文职外交官身上，有一种好批评人、过于自信、好反对人和个人器量狭小的强烈倾向；而古老的普鲁士贵族则有一种平等观念，当一个与他地位一样的人骤然位居其上，即非因军事功勋而成为他的上司时，这种平等观念所感受到的不满，便加强了上述种种倾向。在军队里，几百年来这种人对于这种事已经习惯，而当他们获得更高的职位时，就把他们对原先上司的怒气发泄到他们后来的部下身上。外交界情况复杂，因为候补人[16]中间有些人有钱有势，或者碰巧懂得外国语，特别是法语，就把它当作一种获得优遇的理由，因而比别人更傲慢地对待和更喜好批评上级领导。语言知识，即使只像招待员领班的水平，在我们这里也轻易地成为自信可担任外交职业的证件，例如使节报告，特别是 ad Regem（呈交国王的），长期来必须用法语写就。这一条虽未一直遵守下来，但是直至我任内阁大臣时，却一直是有效的规定。在我们的老一辈使节中，我认识不少人，他

们对政治一无所知，仅仅由于熟悉法语便得到高官；即使在他们的报告中，谈的也只是他们能够用法语谈得通畅的事情。1862年[17]，我还从彼得堡用法语书写公文，有些使节给大臣写的私人信件也用法语，以此表示自己适合于做外交官，虽然尽人皆知，他们在政治上一点判断能力都没有。

还有，安西隆认为，使我们地方贵族的大部分候补人摆脱他
4 们当时柏林的、可以说是地方性的狭隘观念很困难，而要给他们这些特殊的普鲁士官僚在外交方面涂上一层欧洲式油漆则绝非易事。我们不能说他的这种感觉是错误的。只要统览一下当时外交官员的名单就会清楚，这种见解是符合实际的；令人吃惊的是，其中很少有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驻柏林的异邦公使的儿子的地位，就能给自己带来许多优遇。在小宫廷中长大而后在普鲁士供职的外交官，在宫廷官员中间就具有较大的应付自如的优点，而较少本地人那种忸忸怩怩的小家子气。在这方面，冯·施莱尼茨先生首先就是一例。名册中往下便都是豪门成员，他们那里，门第代替了才能。在我被任命到法兰克福[18]时，除了我、卡尔·冯·威尔特尔男爵、茹尼茨和娶了法国夫人的马克斯·哈茨费尔特伯爵外，我回想不出哪一个重要驻外使团的领导人是普鲁士人了。外国姓名十分吃香：如布拉西埃、佩庞舍、萨维尼、奥里奥尔等。一般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法语熟练并且喜欢这些名字都是“远方来的”。此外，（普鲁士出身的外交官员们）①当不能像1806年[19]在起自弗里德里希[20]时代的老式训练下的军队中那样，缺乏明确无疑的训令作护符，便不大乐意承担责任。在那时候，我们完

① 括弧中的文字为编者所补充。

善地训练了直至团指挥官的军事人才，这是任何其他国家不能比拟的；但是，再往上去，则普鲁士血统的人就不像在弗里德里希大帝本人时代那样具有足够的才智了。我们功绩昭著的元帅们，如布吕歇尔、格奈泽瑙、毛奇、哥本，都不是祖籍普鲁士人，而文职官员中的施泰因、哈尔登贝格、莫茨和格罗尔曼，同样不是。似乎我们的政治家，像苗圃中的树苗一样，为了充分发展根系，必须移植一下才行。

安西隆建议我首先通过考试成为政府陪审官[21]，然后经过关税同盟机构中的事务工作转而进入普鲁士的德国外交界；但他并不期望本国的乡村贵族子弟投身于欧洲外交。我把他的忠言铭记在心，决心首先通过政府陪审官考试。

我最初供职的司法机构的人员和制度的状况对我这年轻人的理解来说，应该批判的比应该肯定的要多。承审员的实际训练始于刑事法庭的录事工作。我被派到冯·布劳希奇法律顾问手下工作，他分配给我的工作比我分内应做的多，因为那时候我比一般人书写得既快又清。从“审讯”中，如同在当时适用的审查方法方面被称作刑事诉讼那样，我得到的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一个在柏林分布很广的从事反常罪行的集团。参与者的各种俱乐部组织、各种纪念册、被禁止者的共同活动对各阶层的毁灭性影响——这一切早在 1835 年就已经表明，道德败坏的现象丝毫也不亚于（1891年 10 月）海因策夫妇案件[22]。这个集团的一些分支深入上层人士当中。因为维特根施泰因侯爵的影响，这个案件的案卷全被司法部调走，至少在我在刑事法庭工作期间没有退回来。

我从事录事工作四个月之后，便调到审理民事案件的市法院去了，从口授手写的机械工作突然升为独立工作，我的缺乏经验

和我的感情给我的职务增加了困难。当时司法新手独立工作的第一阶段，就是处理离婚案件。这些案件显然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都交给一个无能的名叫普腊托里乌斯的法官审理，在他主持之下，又交给没有经验的年轻陪审员处理；他们依据平庸的律书来进行充当法官的初步实践；名义上确实由普腊托里乌斯负责，但他却不参与审理。有人对我们青年人描绘这位先生说，在会议中，为了表决而不得不把他从假寐中唤醒时，他总是说："我赞同我的同事泰佩尔霍夫的意见"，有时甚至不得不提醒他，泰佩尔霍夫先生并不在场。

有一次，我向他陈述我的难处，因为我当时的年龄才二十岁零几个月，就得对一对闹得很凶的夫妻进行调解。我认为这件事具有某种宗教上和道德上的圣光，但我觉得，这种圣光和我的心灵并不协调。我发现普腊托里乌斯的厌烦情绪，就像一个被不合
6 时宜地叫醒的老绅士那样，而且，他怀有许多老官僚对年轻贵族所怀有的那种厌恶。他带着轻蔑的微笑说："法官先生，如果一个人一点也不懂得设法自处，那才讨厌呢；我告诉您该怎么办吧。"我同他一起回到了传讯室。案情是这样的：男的要离婚，女方不愿意，男的责怪她不贞，女方则泪如泉涌，发誓说自己清白无辜，而且，不管男方如何虐待，也愿意留在他身边。普腊托里乌斯用低低的舌音对那女人说："夫人，别当傻瓜啦，有什么好处呢？你一回家，你男人就要把你打个臭死，直到你无法忍受。你干脆说声'同意'，然后跟这个酒鬼立刻分离。"那女人边哭边喊："我是个正派女人，不能受此恶名——不离婚。"经过这种声调的几次抗辩之后，普腊托里乌斯对我说："她不通情理；法官先生，请写下……"他令我记录下来的口述，由于印象深刻，至今

尚能背诵出来："经进行调解和为此提出的有关道德和宗教方面的理由均无效果之后，继续审理如次。"我的上司站了起来，说："要记住该怎么办。您以后可别拿这类事情来打扰我了。"我送他出门，又继续进行审理。

就我所回忆，办理离婚的差事持续四到六个星期，再也没有调解任务交付给我。当时确实需要一个处理离婚案件的条例，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实施一项改变婚姻法财产权法令的尝试由于枢密院[23]的反对而失败后，便不得不只颁布了关于处理离婚的条例。这里还应当指出，根据上述条例，在施行普遍民政法[24]的各省首先实行了司法稽查官制度，司法稽查官必须是婚姻保护人，还得防范当事人的狼狈为奸。

审理普通案子的下一阶段是颇为吸引人的。没有经验的年轻法官至少可以在听取诉讼和讯问证人中获得实践经验，但是一般总是更多地把他当作助手来使用，而不是通过教导来鼓励他。法庭所在地和诉讼程序造成的忙乱往来有点像一个铁路部门的问讯处。审判长和三个或四个承审员背对着公众坐着的那块地方用木栅栏围起来，在这样形成的一个四角弧形地区，被诉讼双方交替的和时强时弱的争吵叫闹声所包围。

我调到了行政部门[25]之后，对机构和人员的印象基本上没有改变。为了缩短通往外交生涯的曲折路程，我又选择了莱茵地区的一个官厅，即亚琛官厅，这里的工作期限可以缩短到两年，而在普鲁士"旧省"至少需要三年。①

① 参看亚琛居留文书（《俾斯麦年鉴》第三卷），法官考试的应试工作（《俾斯麦年鉴》第二卷），霍·科尔出版。（斯图加特，科塔图书公司）——德文本注

在我看来，1816 年莱茵省行政机构的组织[26]与 1871 年阿尔萨斯·洛林[27]的组织机构十分相似。那些必须交出一部分人员的官厅，并不考虑国家的需要，不是为完成同化重新获得的居民这一困难任务而输送那些他们认为最好的人员，而是按照他们上司或他们自己的愿望选出一些同事，推出去了事；在同事中还可以看到以前的法国统治时期的行政区[28]文官和其他遗老。人选总不符合当时像我这样二十一岁的青年人所怀抱的不切实际的理想，而当时日常工作的内容与此理想就更加不相符合了。我回忆起来，当时在官吏和受管辖者中间，或者两类人自身中间，发生许多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意见的争论年复一年地增加了宗卷，我习惯地处于这种印象之下："是的，也可以这样办嘛"；对许多问题提出来的各种意义的解决办法连记录所用纸张的费用也抵偿不了，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工作由一位行政长官拿四分之一的精力就可以办到。虽然如此，除下级僚属人员外，官吏们的日常工作量是轻微的，特别各科科长纯粹是尸位素餐[29]。离开亚琛时，除了对富有才能的区长[30]阿尔宁·博伊岑堡伯爵外，对于我们的官僚政治，从个别方面到整体，我的评价都是不高的。后来我对某些方面的评价变好，这是由于我在 1837 年调往波茨坦地方政府时的经历造成的。因为那里不同于其他省份，间接税由政府控制；而正是间接税具有重要意义，倘若我想使关税政策成为我未来事业的基础的话。

8 这里的同事给我的印象要比亚琛的同事好，可是就整体看，不过是发辫和假发[31]的印象，由于我那青年人的骄傲自大，我把具有父亲般尊严的省长冯·巴塞维茨也归属为这一类人。亚琛的区长阿尔宁伯爵虽然也戴了一般国家官员的假发，但是没有精神上

的发辩。后来[①]我脱离公职过农村生活时[32]，我在自己作为一个地主同官厅接触中，对于我们的官僚制度的价值的评价根据我今天的判断来看是过低的，几乎是极大地倾向于加以批判。我还记得，在我代理县长[33]时，对取消县长选举的计划作了一次专门发言，大意是：官僚制度的威信从县长以上就下降；官僚制度维持这种尊敬仅仅在于县长这一具有两面神头的形象，他的一面向着官僚制度，另一面向着乡村。

在当时家长式的统治下，对于种种生活条件进行令人惊讶的干涉的倾向或许要比现在厉害，但是干涉的机构不是那么多，并且在教育和修养方面也比今天的一部分机构要高。值得赞美的王家政府的官吏们都是诚实的有学问和有良好教养的官吏，不过，他们善意的努力不是总是得到称颂，因为他们缺乏本地的专门知识，于是把精力耗费在一些琐事上。对于这些琐事，这些坐办公桌的有学识的城里人的观点却并不总是胜过居住在乡间的农民的健康的符合人情的思想的批评。当时政府机构人员很多，但没有很多事可做，并且缺乏比较崇高的任务，使得他们找不到足够数量的重要工作来做，便凭职务上的热情干出超过受管辖人民所需的事情，从而处于制定条规的喜好中，即瑞士人所谓的“发号施令热”。

人们用比较的眼光看一看现在，就希望通过实施今天的地方自治，国家机关将会免除一些事务和官吏；但是恰恰相反，由于同从省议会至村社管理机构这些自治机关的通信和摩擦，官吏的数量及其负担的事务大大增加了。迟早有一天要发生危机，那时

9

① 1839 年 10 月 22 日。——德文本注

我们会被文件报表，特别是被下级官僚政治压垮。此外，由于实行这种“自治”，对私人生活施加专横的压力加强了，在村社中这种压力比以前更为严酷。过去，对居民和对国家同样接近的县长是国家官僚制度的基层；在他下面是地方管理机构，这些地方管理机构确实处于地区或内阁官僚政治的监督之下，但是不像今天那样处于它们的惩罚权之下。依照准许给予农村居民的自治政府，他们所享有的不是城市好久以来所享有的那种自治，而是他们得到一个以乡长身份出现的长官，这位长官通过上级、县长的命令，在纪律惩罚的威胁下，以国家的教阶制精神，用种种报表、通告和要求等负担加到他所辖地区的同胞头上。被统治的纳税人不再把县长当局看作是他们免受粗暴干涉的保证；先前，这种保证在于这种状况：一个居民当了县长后通常都决心终生留在本地区并且和本地区的居民同甘共苦。今天，县长职位成为晋升到高级官厅的宦途上的最低阶梯，而为那些有创造自己经历的合理的功名心的青年陪审员所追求。为此，他们与其说需要取得本地区居民的好感，不如说更为需要赢得大臣的青睐，于是便通过惊人的狂热和在实施没有什么价值的官僚式的实验方面向所谓的自治政府的乡长施加紧张的压力，以便得到大臣的赏识。地方“自治”下的居民负担过重的原因极大部分就在这里。“自治”也就是官僚政治的严厉化，就是官吏的数量、他们的权力以及他们对私人生活的干涉的增加和加强。

人的天性就是他对于任何一种安排强烈地感到的是芒刺，而不是玫瑰，而且这些芒刺会促使他反对现存的事物。老派政府官员在和他们统治下的居民直接交往时，总显得迂腐拘谨，又由于他们忙于案牍而对实际生活状况很陌生，但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

他们诚心诚意并且确实努力做到正直。在各个政党彼此尖锐对立的地区，那里今天的各级地方自治机构就不能假定是同样的状况了。对政治上的朋友怀有好意，对政敌则有情绪，这容易成为公平地处理各种机构的障碍。此外，根据我在那一时期和以后一段时期的经验，如果将法院的决定和行政机构的决定加以对比，我不认为，或者至少不能完全认为前者在主持公道方面优胜。恰恰相反，我的印象是：下级法庭和地方法庭的法官比行政官吏更容易和更屈服地受到党派思潮的强烈影响。也找不到任何心理学的根据来说明，法官和行政官吏在具备同等教养的情况下，后者在作出行政决定时应当被 a priori（先验地）认为比前者不公正和不讲良心。但是我同意，行政决定之所以不能在公正和适当方面获得好评，就是因为这些决定是集体制定的；且不谈以多数票表决问题时算术和偶然性代替了逻辑论证，就是这种成为决定的公平合理的基本保证的个人责任感，由于无记名的多数票[34]表决，而立即丧失了。①

在波茨坦以及亚琛两地官厅中的工作经历对于我的勤奋热情没有鼓励作用。我觉得分配给我的工作既琐碎又无聊，我在磨粉税诉讼方面和在伍斯特豪森附近罗西斯为建筑水坝强制捐款方面的工作情况没有给我留下对我当时的活动的怀念。我放弃了官宦生涯的功名心，心甘情愿地遵从父母的愿望，来经营管理我们在波美拉尼亚的庄园中的陷于停顿的事务[35]。如果在农业上我能取得成就，我便打算在农村中度过一生；如果爆发战争，也可能在

① 参看 G.V.维尔莫夫斯基：《我对俾斯麦的回忆》。他引用了俾斯麦在 1868 年 11 月说的话："如果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那就是当时没有人负责和必须明确地自认负责。不可能把握一个人并且将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打击。"——德文本注

战争中建立功业[36]。就我在乡间时所具有的功名心而言，就是当一位后备军[37]上尉。

11

（二）

我在童年时代所感受到的印象，很少有助于使我容克化。在按照裴斯泰洛齐和雅恩原则创办的普拉曼教育机构中，我姓氏前面的“冯”[38]在我与同学和老师交往时，对于我的童稚的欢乐是一种不利。我在格劳恩修道院的中学时，也忍受到了某些老师对贵族所怀有的憎恨，而这种憎恨在大部分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中是作为对1806年[39]以前时代的回忆而延续了下来的。但是即使资产者阶层中在某种情况下出现的这种进攻性的倾向，也从没有引起过我的针锋相对的冲击。我的父亲没有贵族偏见，他内心的平等感情之有所变化，大概只是由于青年时期当军官时的印象，决非由于过高估计了出身门第。我的母亲是出自莱比锡教授家庭门肯①、在宫廷圈子中被认为是自由派，当过弗里德里希大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内阁顾问的女儿。这个家庭的后代中与我亲近的某些成员都曾在普鲁士外交部门和宫廷中供职。冯·施泰因男爵称我的外祖父门肯为一位正直的、具有强烈自由派思想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母亲奶汁中吸吮的观点，与其说是反动的，不如说是自由派的；如果我的母亲能够活到我担任内阁大臣职务时期，则几乎不会同意我的行

① 安·路·门肯（1752—1801年），弗里德里希大王时的内阁秘书、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和三世时期的内阁顾问。——德文本注

动方针，即使她会为我的公务生涯的表面成就而感到巨大的喜悦。母亲是在官僚和宫廷圈子里长大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追忆童年嬉戏时称她为“可人儿”。因此我可以声明，人们对我青年时代的观点的评价是不公允的，有人把“我这一阶层的偏见”强加在我身上，并且断言，似乎对于贵族特权的留恋是我对内政策的出发点。

旧普鲁士王权的无限权威过去和现在也都不能最后决定我的信念。在第一次联合省议会上，我确信，君主的这种权威在国家 12
法意义上是存在的，但是要结合这样的愿望和对未来的思考：国王的无限权力不被推倒就应当为自己规定出权限的尺度。君主专制政体首先要求当权者公正、诚实、忠于职守、有工作能力和谦虚谨慎。即使这些都具备，国王的宠臣（男的和女的，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合法夫人），国王自己的虚荣心和对阿谀奉承的喜爱等也都会减少国王的善意给国家带来的果实；因为君主不是全知全能的，而且也不可能对自己任务的一切方面都有同样的了解。早在1847年我就主张，应该让议会和报纸有公开批评政府的可能，以便保护君主，免除女人、宫廷侍臣、野心家和幻想家蒙蔽君主的危险，因为这种蒙蔽会妨碍他看到他那君主职责的全貌、妨碍他避免或改正错误。随着我对宫廷官员有更多的了解以及不顾他们的思潮和地区爱国主义的反对而必须捍卫国家利益时，我的这种信念就愈加明确和肯定了。指导着我的完全是国家利益，即使是善意的评论家指责我曾主张贵族统治，那么这也是诽谤。我从不认为，出身能够代替缺乏干劲。如果说我曾维护过地产，那决不是为了与我同一等级的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是因为我把农业的衰落看作是影响我们国家生存的最大危险之一。作为

理想，我一直认为君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应受到一种独立的（依我之见应为等级的或行业的）全国性代表机构的监督，以致君主或国会不能单方面地、而只能是在报纸和邦议会公布一切国家大事并对之进行公开评论时取得意见一致的条件下才能改变现存法规。①

有人深信路易十四首次实施的不受监督的君主专制制度是统治德国臣民的最合适的形式，即使有这种信念的人，只要他们像我于曼托伊费尔[40]时期在我个人极为敬爱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宫廷中所做的那样，对宫廷史做专门研究和批判观察，
13 也都会放弃这种信念。国王是位虔诚的、认为受命于天的专制制度的拥护者，而勃兰登堡以后的大臣们通过国王的签字而得到庇护，即使他们自己对于所签署文件的内容不能负责，这个时候他们通常是满意的。那时我听见一位具有君主专制思想和地位很高的宫廷官员在论及保皇党人在纳沙泰耳起义[41]的消息时，对我和几位同事有点不知所措地说："这就是保皇派，今天只能在离宫廷很远的地方才能见到。"平时这位老先生并不习惯于挖苦讽刺。

我在农村对于地区军曹[42]和僚属官吏的受贿和诈骗行为有所觉察，我作为县议员和代理县长也和施特丁的政府发生过小冲突，这些都增加了我对官僚制度的统治的反感。举一个关于这类

① 本书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写到的俾斯麦关于国内的专制制度、议会主义、内阁地位和政府的见解是俾斯麦公爵作为领导的国务活动家在官方场合和私人交往中表示的。俾斯麦不是议会主义的原则上的反对者，但是他认为一种完全依靠议会多数的政府是不可能的，就像完全依靠君主专制主义是不可能的一样。（参看维尔莫夫斯基：《我对俾斯麦的回忆》第161页。）——德文本注

冲突的例子。在我代理当时正在休假的县长时，政府委托我使屈尔茨[43]的庇护人（此人正是我）承担一定的捐税。我把这项委托放在一旁，在县长返任后移交给他，但我又不断受到催促，还必须邮寄交纳一个塔勒尔[44]作为抵触法规的罚款。于是我写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里我起先作为代理县长出庭作证，然后作为屈尔茨的庇护人出庭作证。出庭人以第一种身份给自己提出规定的指控；又以第二种身份举出他必须拒绝这项要求的理由；接着备忘录由他双重确认并签了字。政府理解了这一玩笑，便把罚金退还给我。在其他的场合导致很不愉快的勒索。我倾向于进行批评了，因此也就成了当时地主圈子内用来标志对官僚制度表示不满这种意义上的“自由派”了，而官僚机构的多数成员则比我更是自由派，不过含义不同而已。

我这种等级—自由派情绪在波美拉尼亚几乎得不到理解和同情，但在舍恩豪森却得到了诸如瓦滕斯累本·加罗夫伯爵、席尔施泰特·达伦和本地其他一些人的赞同。他们中间一部分人都是教会保护人，后来在“新纪元”[45]时期曾受到过法院审判。第一次联合省议会的反对派的那些我毫无好感的做法使我又一次越出了这种情绪。只是在会议的最后六个星期，我才应邀作为患病的议员冯·布劳希奇的代理人参加联合省议会。东普鲁士代表索肯·塔尔普琴、阿尔弗雷德·奥尔斯瓦尔德的演说，贝克拉特的富于感情，海特和梅维森的莱茵·法兰西的自由主义，芬克演说的粗野狂暴都令我十分反感，即使现在我读这些辩论材料，也给我一种不适当的陈词滥调的印象。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国王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要求人们给他时间并在他个人的发展中保护他。

14

1847 年 5 月 17 日，我第一次发表长篇演说时，和反对派发生了冲突。在演说中我批驳了一种神话，即普鲁士人 1813 年参战是为了获得一个宪法[46]；我还对认为异族统治本身不应成为进行斗争的充足理由这种看法表示了理所当然的愤怒①。在我看来，民族已经自己解救了自己，为此还要向国王呈递一份在宪法条文中支付的账单，这是不足取的。我的发言引起了一阵暴风雨。我一直站在讲台上，翻弄放在那里的一份报纸，直等喧嚣平息下去之后，才结束我的演说。

在联合省议会召开期间举行的宫廷庆祝活动中，国王和普鲁士亲王妃[47]都明显地回避我，不过原因有所不同，王妃是因为我既不是自由派，又不孚众望，国王出自什么原因，我后来才明白。在接见议会成员时，他避免和我谈话，在他绕场一周依次和每个人谈话时，刚刚走近我便止步转过身去，或者向大厅的另一端走去；这时候我认为不得不设想，我的保皇主义狂热的态度已经越过了国王为自己划定的界限。几个月以后我在新婚旅行到达威尼斯时[48]，才发觉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国王在戏院里认出我之后，便指定次日接见并宴请我。这件事出乎意料，我的行装既简单，本地裁缝的手艺又不高，致使我不可能穿上合适服装出现于
15 这种场合。对我的接见是十分亲切的，话题也涉及政治内容，从中可以悟出，国王对于我在议会中的立场是赞同和鼓励的。国王

① 参见俾斯麦 1847 年 5 月 18 日致冯·普特卡默尔的信："我……昨天引起了一阵令人厌恶的闻所未闻的风暴，当时我由于发表了关于 1813 年人民运动性质的没有讲得很清楚的见解，而遭受到本党许多人的无益的误解，而反对派自然一片声地反对我。愤怒情绪是巨大的，或许正是因为我讲了真理，当时我谈到 1813 年时用了这样的词句：任何人（普鲁士人）受到另一个人（法国人）如此长久的鞭挞，直到他起来反抗以前，他不可能对第三者（我们的国王）做出功绩。"——德文本注

还命我冬天去进谒他，后来我去了。这次谒见以及在宫廷中的小型宴会都使我深信：我受到了两位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在联合省议会期间国王避免公开地和我谈话，并不是为了批评我的政治态度，而只是不想在当时其他人面前表示赞同。

16

第二章　1848 年

(一)

关于 1848 年 3 月 18 日和 19 日事件[1] 的最初消息，我是在我庄园的邻居卡罗夫的冯·瓦滕斯累本伯爵家里得知的，已有几位太太从柏林逃到了他那里。对于这一事件的政治影响我最初的感受不如对于我们的士兵在街上惨遭屠杀使我愤怒那样强烈。我想，只要国王是自由的，他会很快地控制局势；我认为当前的任务是把必定处于暴动者的威胁之下的国王解救出来。

20 日，舍恩豪森的农民向我报告说，离此四分之三里远的坦格明德城的代表来了，要求像城里那样，在钟楼上升起黑红金三色旗[2]，还威胁说如果拒不照办，就要带增援队伍再来。我问这些农民他们是否愿意自卫，他们一致而激昂地回答“是”；我建议他们把城里人从乡村赶走，这件事在妇女们的热心参与下完成了。然后我让人把教堂里存放的一面有黑色铁十字图案的白旗升到钟楼上，并查问了村里有多少武器弹药，现有大约五十支农民用的猎枪。算上旧式武器，我自己大约有二十支。我还派人骑马去叶里霍夫和拉特诺夫取火药。

然后我和我的妻子到邻近各村去，看到农民们都热心地准备

到柏林去营救国王。在纳伊尔马尔克，有一位名叫克劳泽的老年堤坝检察官，斗志尤为昂扬，他曾在我父亲的“枪骑兵”[3]团里充当卫队长。只有我的近邻对柏林的运动表示同情，责备我在农村点燃战火，还宣称如果农民果真准备出发，那么他就要干预并加 17
以镇压。我回答他：“您知道我是个不爱生事的人，不过如果您要那样干，我就要对您开枪。”他说：“您不会这样做。”我回答说：“我说的是老实话。您知道，我是守信用的，您还是不要这样干。”

接着我独自去了波茨坦，在火车站上见到在 19 日还是内务大臣的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他显然不希望让人看到自己曾同我这个“反动分子”谈过话，我向他致意时他用法语回答道：“不要和我说话。”我说：“我们那里农民起来了。”“为了国王吗?”“是的。”“这个踩钢丝的人”，他一面说，一面用双手按住热泪盈眶的双眼。在城里卫戍部队驻地教堂附近的种植区我看到了露营的近卫步兵。我和士兵们谈了话，发现他们对于撤退命令十分气愤，要求参加新战斗。在归途中沿着运河堤岸有几个密探模样的市民尾随着我，他们设法和士兵们搭话，并对我说些威胁性的话。我衣袋里有四颗子弹，不过我没有必要使用。我投宿在我的朋友罗昂家里，他是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顾问，在城堡中有几间房子。在“德意志之家”[4]拜访了冯·默伦道夫将军，他在和暴动者谈判时遭到殴打，行动还困难；还拜访了在柏林当过指挥官的冯·普里特维茨将军。我向他们描述了农村居民的情绪，他们向我讲述了这次事件直至 3 月 19 日凌晨以前的详细情况。他们所说的一切和后来从柏林传来的消息都只能更使我相信，国王失去了自由。

比我年长的普里特维茨判断事物比较沉着，他说："您不必给我们派农民来，我们不需要，士兵足够了；宁可给我们送些马铃薯和粮食来，可能的话还有钱，因为我不知道士兵的粮饷是不是能得到充足的供应。如果援军来了，我会接到从柏林来的命令，一定率领军队，把他们击退。"我说："请把国王解救出来！"他回答说："这不会有大的困难，我有足够的力量攻取柏林，可是这意味着我们又得打仗；国王既然已经下令要我们接受战败者的角色，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没有命令我不能进攻。"

18 在这种事态下我考虑，从不自由的国王那里是不能指望得到一项行动的命令的，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去得到，于是便设法去求见普鲁士亲王。[5]有人告诉我去找亲王妃，因为必须征得她的同意，我便去见她，以便得知她丈夫的去向（我后来知道，他正在孔雀岛）。[6]她在中层的一间侍从室里接见了我，她坐在一张松木椅子上，拒绝提供我所要求知道的情况，并且感情激动地声称，她的职责就是维护她的儿子的权利。[①]她说这些话是设想国王和她的丈夫不能保持他们的地位了，因此让人考虑，在她的儿子未成年期间实行摄政。为了得到议会[7]中右派的合作以达此目的，通过乔治·冯·芳克向我作出正式的建议。[8]因为我不能拜见普鲁士亲王，便试图劝说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我向他指出，多么必要使王室和军队保持联系，如果陛下现在身不由己，那么即使没有国王的命令也要为他的事业采取行动。他回答我时情绪极为激动，他说虽然他很赞成我的想法，但是他毕竟太年轻，实现不

① 王妃奥古斯塔在3月18日事件之后，于19日晨和她丈夫一起经过施潘道逃到孔雀岛。这对夫妻在3月22日在这里分手，王妃去波茨坦，带着她的孩子迁入城堡。因此俾斯麦和奥古斯塔王妃的谈话不可能早于3月23日。——德文本注

了这种设想，而且不能仿效那些参与政治的大学生，他本人并不比大学生年岁大。这样，我便决定谒见国王。

卡尔亲王在波茨坦宫给了我一封公开信，作为证书和通行证，内容如下：

> 呈信者——我的熟人——受托亲自向我至尊兄长陛下恭请圣安并为我带回信息：因何缘故，我多次亲笔询问“我是否可以前往柏林”一事，经过三十小时尚未见复示。
>
> 卡尔，普鲁士亲王
>
> 波茨坦，1848 年 3 月 21 日午后一时

我来到了柏林。从联合省议会以来许多人熟悉我的仪表，所以我认为刮去胡须、戴上一顶帽徽花哨的宽边帽是可取的。因为希望谒见，我穿了大礼服。在火车站出口处摆着一个为街垒战士 19
募捐的盘子，旁边站着一个肩负火枪的瘦高个子的市民卫队[9]队员。在下车时我遇到了我的一位堂兄，他摸出钱袋。我说：“别给杀人犯捐钱”。他向我警戒地看了一眼，我又说：“你不怕牛蹄子吗?”[10]这时我发现，站岗的人是我的朋友、高等法院顾问迈埃尔，他听说“牛蹄子”生气地转过身，接着喊叫道：“唷，俾斯麦！瞧这一身打扮！怎么在这儿撒野啦!”

宫里的市民卫队问我，在这里想干什么。我回答说我要把一封卡尔亲王的信交给国王，警卫以不信任的眼光注视我说，这不可能，亲王正在拜会国王。如是，亲王一定在我之前就从波茨坦动身了。警卫要看我带的信，我给他看了，因为信没有封口，内容也无

害。他放我走了，但不让到宫里去。在迈因哈德旅馆底层窗口，躺着一位我认识的医生，我就到他那里去了。在那里我把要向国王奏明的话都写了下来。我带着这封信去见鲍古斯拉夫·拉德齐维尔公爵，他可以自由交往并能够把信呈交给国王。信中写道，革命仅限于大城市，国王只要离开柏林，在农村依然是君主。国王没有作答，可是后来告诉我说，这封写得不工整、纸张又不好的信是他当时得到的第一个同情的标志，他还小心地保存着这封信。

我在街上步行察看战斗的痕迹时，一个陌生人走来对我耳语说："有人在跟踪您，您知道吗?"在菩提树下大街又有一个陌生人轻声对我说："请跟我来。"我随他到了小城墙街，他说："请您赶快离开，不然要逮捕您的。"我问他："您认识我吗?"他回答道："是的，您是冯·俾斯麦先生。"威胁我的危险来自何处，警告又来自何方，我一点也不清楚。陌生人很快离开了我。街上一个小男孩在我身后喊道："瞧，这里走着又一个法国人!"我曾不止一次地由于后来的调查而回忆起这一评语。我独独没有刮掉的下颚胡须、宽边软帽和大礼服给这个男孩留下了一个外国人的印象。街道空空荡荡，不见一辆马车；只有几支穿着罩衫、打着旗子的军队步行过去，其中有一支队伍护送一个戴了月桂花冠的街垒英雄沿着弗里德里希大街到什么地方去庆功。

当天我就返回波茨坦，并非由于警告，而是因为我在柏林找不到活动的地盘，我当天就返回波茨坦，并且同默伦道夫和普里特维茨两位将军再次商谈采取自主行动的可能性。"应该怎样着手呢?"普里特维茨说。我坐在打开的钢琴旁边，心不在焉地弹奏步兵冲锋进行曲。默伦道夫泪流满面，忍着伤痛僵直地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高声道："愿您能够给我们安排这件事!"我回答道："我

不能，但是没有命令您就这样干，您究竟会蒙受什么？国家会感谢您，国王到最后也会感激您的。”普里特维茨说：“您能向我保证弗兰格尔和赫德曼会一起干吗？我们不能把不服从命令和纠纷带到军队里来。”我答应做一番调查，自己到马格德堡去并派一名亲信到斯德丁去摸清这两位正在进行指挥的将军的意图。冯·弗兰格尔将军的答复是：“普里特维茨怎么办，我也怎么办。”而我自己在马格德堡却不怎么走运。起初我只见到冯·赫德曼将军的副官，一位年轻的陆军少校。我向他说明来意，他对我表示同情。但是，不久他便到旅馆来找我，要我立即离开，以免给我造成不愉快并置将军于荒谬可笑的境地，因为这位将军打算把我当作叛逆加以逮捕。当时该省的最高政治权威、总督冯·博宁发布了以下内容的声明：“柏林爆发了革命，我将采取超党派的立场。”这位“王位的支柱”后来当上了内阁大臣和一些有权势的高级职务。赫德曼将军则属于洪堡集团。①

返回舍恩豪森之后，我尽力使农民明白，武装进军柏林是不可能的；但是由此我被人怀疑在柏林感染了革命的狂热。因而我向他们建议（建议被采纳了），由舍恩豪森和其他村子派出代表同我一起前往波茨坦亲自看一看并和冯·普里特维茨将军、或许还和普鲁士亲王谈一谈。25 日我们到达波茨坦车站时，国王也正好来到，并受到一大群人的善意迎接。我对同我一起来的农民说：“那就是国王，我把你们介绍给他，请你们和他谈一谈。”但他们胆怯地谢绝了，并迅速地退到人群后面去。我极为恭敬地向国王致意，他表示感谢，但没有认出是我，便去宫中了。我跟随

① 他是威廉·冯·洪堡的女婿。——德文本注

着他；并且聆听了他在大理石大厅中对近卫部队军官们的演说。当他说“我从来没有过比在我的公民的保护下更为自由和安全”时，响起一阵喃喃的埋怨之声和剑鞘的撞击之声，这种声音是普
21 鲁士的国王从未在自己的军官当中听到过的，并且希望永远不再听到*。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回到了舍恩豪森。

我在波茨坦和普里特维茨陆军中将谈话的回忆，促使我于5月份向他寄了一封由我在舍恩豪森的朋友们共同签署的书信，信文如下：

> 任何人，只要他胸膛中有着一颗普鲁士人的心在跳动，一定会和我们这些签名人一样，在阅读3月19日以后最初几周内报界对国王军队的攻击时感到愤慨，国王的军队在斗争中忠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接到撤退令后的行动堪称军事纪律和自我克制的无与伦比的榜样，而所得的报偿却是攻击。如果说一段时期以来报界采取了比较适当的态度，那么原因与其说在于统治报界的政党自那时起对于事实真相有了正确的认识，不如说在于新事态的迅速发展排挤了对于旧事态的印象，有些人还表示出这种姿态，由于军队新建的功绩**而愿意原谅它过去的行为。甚至在听到柏林事件的最初消息时几乎怒不可遏的农村居民中间，歪曲的消息开始取得市场；这些消息来自各个方面而没有受到任何认真的反驳，

---

* 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回忆录和《普鲁士总汇报》、《福斯报》和《西里西亚报》的相互矛盾的报道。（沃尔夫：《柏林革命编年记》第1卷第424页。）

** 4月23日军队占领了什列斯维希。

部分地是由报界，部分地是由正在劝导居民进行选举的使者们传播的，以致农村居民中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已经相信，这个消息毕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即柏林的巷战是由军队有预谋地挑起的（受到大量诽谤的王位继承人知道和同意或没有让他知道和没有他的同意，目的在于从人民那里夺回国王所做的让步）。对于另一方面的准备工作、对于有组织地劝导人民的工作，几乎再也无人愿意相信了。我们担心，这一谎言至少在下层人民的意识中会长时期地成为历史，如果没有用对事态的真实过程作出详尽的、具有证据的说明来驳斥，而且要尽可能快地这样做，因为局势的发展过程出乎预料，今天和明天也许就会发生新的事件，其重要性会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以致对于已往事件的说明不再会得到同情。

如果能够使居民稍微明白柏林事件的肮脏的根源，比如 22
明白三月英雄为达到所声称的目的（即为了保卫陛下许诺的君主立宪制度）而进行的斗争是没有必要的，那么，按照我们的意见，这对于他们的政治观点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我们认为阁下作为在这一事件中参加过战斗的值得嘉奖的军队的司令官，特别地有责任并能够令人信服地把这一事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们深信，这件事对于我们的祖国有多么重要，同时军队将赢得多么大的荣誉，因此请原谅，我们不得不向阁下提出急迫而崇高的请求：在职责允许的范围内，尽快从军事立场向公众提供一份有关柏林事件的准确的、附有证明文件的说明。

冯·普里特维茨将军没有接受这一请求。1891 年 3 月 18 日

已退休的陆军中将冯·迈耶林克才在《军事周刊》附刊上发表了一篇适用于我所提出的目的的说明文章，可惜太迟了，最重要的见证人——侍从武官爱德温·冯·曼托伊费尔和奥里奥拉伯爵在这期间已经死去。

作为对三月事件的历史的贡献，我在这里要引用事件发生后几周内我同某些人的一些谈话，这些人把我看作是保守派的亲信而来拜访我，一些人是为自己在3月18日以前和当天的立场辩解，另一些人则是为了向我叙述他们的体会。警察总监冯·米努托利抱怨说，有人责备他已预料到起义而未加防止。他争辩说，他未曾发觉过任何异常的征兆。我反驳说，在根廷有目击者告诉我，3月18日以前的日子里，有些看上去像外国人的人，大部分说波兰话，有些带着武器，另一些背着沉重的行李，向柏林方向走去。米努托利解释说，冯·博德尔施文格内阁大臣于3月中旬约见他，对笼罩社会的骚动表示忧虑；于是米努托利把他引到帐篷前面的一个群众集会上去。博德尔施文格听完了那里的演说之后说："这些人的讲话完全可以理解，谢谢您，您使我避免了一件蠢事。"对于评论米努托利来说，他在巷战后几天里众望所归是令
23 人怀疑的。对于一位警察总监[11]来说，由于一次叛乱而获得声望是不自然的。

指挥驻守王宫周围的军队的普里特维茨将军也来访问我，并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撤退的：当他知道《致我亲爱的柏林同胞》[12]这一公告之后，他便中止了战斗，但还占据着王宫广场、军械库以及附近的街道以便保卫王宫。这时博德尔施文格走来向他提出要求："王宫广场的军队必须撤离"他回答道："不行，这样我就背弃了国王。"博德尔施文格接着说："国王在他的公告中已命令

要从一切‘公共场所’* 撤离。王宫广场是不是一个公共场所？我还是一位大臣，作为这样的一位大臣应该干什么，我很清楚。我要求您撤离王宫广场。”

普里特维茨在结束他的讲述时说：“我除了把军队撤走还能干什么呢？”我回答道：“我认为最恰当的是命令一位下级军官：‘请您把这位公民看管起来’。”普里特维茨回答说：“从市政厅来的人总是聪明些。[13]您是作为政治家在评论；我作为一个军人，绝对遵照当权的大臣的指示行事，大臣依仗的是国王陛下签了字的通告。”——我还从别处听说，普里特维茨在中断这次和博德尔施文格在户外的最后一次谈话时由于气愤而脸色青红，把剑撞入鞘中，并低声说出了葛兹·冯·伯利欣根在窗口向帝国使者喊出的话。[14]然后他把马头向左调转，穿过王宫周围辖区默默无语地一步一步地走去。宫里派出一位军官问他军队的驻地，他挖苦地回答：“他们从我手指头溜掉了，那里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

从陛下左右最亲近的军官那里我还听说如下的情节。他们找国王，一时没有找到，因为国王由于自然的原因①到里面去了。当他重新出来时，他们问他：“陛下是否已经命令军队撤离？”国王回答道：“没有。”——“可是他们确在撤离。”副官说着把国王引到窗口。王宫广场上黑压压地挤满了市民，还可看到在市民后头的正在撤退的士兵的最后一排刺刀。“我没有下令，这是不可能

---

* 公告中说：“一切街道和广场”。

** 我知道博德尔施文格的牧师 1891 年 11 月 8 日的书信（《十字报》1891 年 11 月 18 日第 539 号）和列奥波德·冯·格尔拉赫的生平传记。——德文本注

① 指解大小便。——译者

的。”国王又惊又恼地喊道。①

24 关于利希诺夫斯基公爵，有人告诉我说，他交替地上面在宫廷里散布军队软弱无能、缺少粮饷弹药等涣散人心的消息，下面在广场上用德语和波兰语鼓励起义者坚持下去，说什么上面的人都已灰心丧气。

(二)

4月2日，在第二次联合省议会的一次短暂例会上，我说道：

“我是对请愿书[15]将投反对票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我要求发言只是为了说明投反对票的理由，并且向你们声明，就请愿书是一项未来的纲领而言，不用多说我接受它，不过，唯一的原因是我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为环境所迫；因为六个月以来我的观点并没有改变；我认为唯一能够把我们从目前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引导到一种有秩序、有法制的状态的机构是内阁，出于这个原因我将尽可能处处向内阁贡献我微薄的支持力量。但是促使我反对请愿书的是表明对近日发生的事态的欣喜和感谢。过去的事已经被埋葬了，我比你们中间许多人更为痛心地惋惜的是，在王冠自己投入棺木埋入土中之后，任何人间的力量都不能使它起死回生。但是既然我为环境的压力所迫承认了这种事情，就不能够用谎言来辞别我在联合省议会中的活动，即对我至少必须认为是一条错误道路的事情表示感谢和欣

① 这里的叙述由威廉亲王的信所完全证实。——德文本注

喜。如果在现今业已采取的新道路上真正能够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祖国，达到一种幸福的或者即使是只靠法治的有秩序的社会状况，那么，这时我才会向新秩序的奠基人表示谢意，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我想再说几句，但是由于内心激动而说不下去，并且陷入一种痉挛哭泣的状态，不得不离开讲台。

几天以前马格德堡一家报纸对我的一次攻击促使我向编辑部投寄如下一封信件，在这封信里我为自己要求了人们热烈要求的、通过废止检查得到保证的成就之一，即：《自由发表意见权》。没有预料到，四十二年以后人们会就此项权利对我提出异议。[16]

25

阁下：

贵报今天这一号上刊登一篇题为《来自阿尔特马尔克》的文章，它使某几位人士，间接地也使我，受到诬谤，所以我诉之于您们的正义感，是否刊登下述答复。我虽然不是这篇文章中所指的那位从波茨坦到施滕达尔的先生，但是上周我同样在我附近的村社声明：我认为国王在柏林没有自由，并且要求他们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应去的地方。但是我不能允许把贵报记者所援引的自私动机转嫁到我身上来。第一，凡是了解在军队撤走之后一切与国王个人有关的事件的人，都会认为当时国王不能决定做什么和让人做什么；第二，我认为一个自由国家的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向他的同胞表述自己的意见，如果他的意见与当时的舆论相矛盾；在发生新近的事件之后，甚至很难对某人通过鼓动人民来支持自己的政治观点的权力表示异议；第三，如果最近十四天陛下的全部行

动都是自愿的（这是贵报记者和我都不能确切知道的），那么柏林人进行斗争想要获得什么呢？这样，3月18日和19日的斗争至少是多余的和无目的的，全部流血事件既无起因，又无结果；第四，我相信我能够表达大多数贵族的意见，即在关系到普鲁士今后的社会生存和政治生存的时刻，在德国受到不只一个方向来的分裂威胁的时刻，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爱好把我们的精力浪费于反动的尝试或保卫琐碎的、我们这里至今尚保留的地主权利。而愿意把精力转用到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去，我们认为上述问题是次要的，而在德国建立法律秩序、维护我们祖国的荣誉和不受损害，是每个对于政治形势的看法不受党派观点干扰的人当前唯一的任务。

如果你们愿意发表上文，我不反对公布我的名字。请接受最崇高的敬意。

阁下最忠实的仆人　俾斯麦

于叶里霍夫附近的舍恩豪森　1848年3月30日

26 我在这里附带述及，我从青年时期起签名就不写“冯”，现在写“冯·俾斯麦”始于对1848年取消贵族这些提案的抗议。[17]

我亲笔写的下面一篇文章的草稿还保存着，从内容来看，这篇文章是在第二次联合省议会和选举国民议会期间写的。它刊登在哪一家报纸没有查考。

来自阿尔特马尔克

在按等级区分的制度下享有强大代议权的一部分同胞，

即城市居民，开始感觉到，新的选举方式使城市居民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将与数量上多得多的农村居民进行竞争，他们的利益将不得不让位于大量农村居民的利益。我们生活在物质利益的时代，在新宪法确定之后，在现今的骚动平息之后，各党派的斗争所围绕的焦点在于：是否国家税收根据财产平均负担，抑或主要从一直准备纳税的地产上课取，对地产的征税是最方便和最可靠的，而且它的面积是不能隐瞒的。当然，城里人总在想方设法使税务官尽可能地远离工厂企业、城市房产、依利息为生者和资本家，而宁愿使他们依赖农田、牧场及其产品为生。这已经开始了，在迄今征收磨粉税的城市，最低等级免交新的直接税，而农村居民则同往常一样交纳等级税。[18]我们还听说正在采取步骤由国库开支支援工业，但没有听说要对农村居民进行帮助；他们由于沿海地区的战事迫近，不能以相应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产品，但是他们在这贫穷缺钱的岁月由于需要偿还贷款便迫不得已出卖自己的庄园。同样，在涉及间接税时，我们听到谈论更多的是有利于国内机器制造业和工商业的关税保护制度，而不是从事农业的居民所需要的自由贸易。正如所述，城市里的一部分居民考虑到上述争执之点，便会很自然地不怕使用一切手 27
段，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削弱农村居民的代议权。为达到后一个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方法，就是竭力在农村居民面前败坏他们成员中某些人的声誉，而这些人的教养和知识能够在国民议会中有效地维护地产的利益；为此，有人人为地散布反对贵族地主的不满情绪，他们说，为了不伤害这个阶级，农村居民必须选举不太过问农村

利益的律师或其他城里人，或者是淳朴的农村居民，他们考虑通过党派首领的雄辩或聪明的政策在国民议会中可以暗地里领导他们。因此，有人力图把迄今存在的贵族描绘成想维护和复辟旧秩序的人；而贵族地主和任何其他有理智的人一样，承认要阻挡时代潮流或使之逆转是荒谬和不可能的。[19]人们还尽力在农村中唤起和加强这样一种观念，即：根据分离协定应向贵族地主交纳的赎金[20]可以不加补偿而得到解除的时刻已经来临；但他们却闭口不谈：一个想维持法制与秩序的政府，决不能首先掠夺国民中的一个阶级，以便馈赠给另一个阶级；以法律、判决或条约为依据的一切权利、一个人可能对另一个人提出的一切要求、一切对于借贷的利息和资本的权利都可能以同样的法律名义从享有这一切的人那里夺取，有人将用这种法律夺取贵族地主的地租而不完全补偿。有人欺骗农村居民，使他看不清与贵族地主在农业上有共同利益，看不清在排他性的工业体系中有共同的敌人；而这一工业体系正在攫取对普鲁士国家的统治；如果这种欺骗得逞，那么我们要希望，这种欺骗不会维持多久，通过在法律上迅速取消贵族地主迄今享受的政治权利就结束这种欺骗，不要使农村居民在付出代价之后才恍然大悟，聪明的城里人是怎样欺骗了他们，这可是太晚了。

在第二次联合省议会开会期间，格奥尔格·冯·芬克以其同党[21]人士的名义，并据称还受到更高级人士的委托，要求我协助实现一项计划：通过议会促使国王退位，并且越过普鲁士亲王、可
28 是又像是取得了他的同意，为亲王妃的未成年的儿子确立亲王妃

的摄政。我立即拒绝了并且声明，对于这种内容的提议，我的回答将是当作叛国案提议法庭审理。芬克为他的这项提议辩护，说它是政治上必要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准备的措施。他认为，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亲王有了“炮弹亲王”[22]这一不应得的绰号，所以他已不可能继位了，还声称已有亲王表示同意的书面意见。他所指的是这位有骑士风度的先生可能发表的一个声明：如果国王能够由此而免除危险，他就准备放弃继承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一声明，亲王也从未和我谈起过这一声明。最后冯·芬克先生冷淡而轻易放弃了争取我支持亲王妃摄政的企图，说声称没有极右派的赞同（他把我看成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国王的退位就决定不了①。会谈是在我住的王子旅馆一层右室进行的，双方说的话要比这里记述的多。

我从来没有对威廉皇帝说起过这件事和在三月事件期间在波茨坦宫中从皇后处听到的谈话，也不知道别人曾否对他说起过。对于这些事件我一直保持缄默，甚至在四年冲突[23]、奥地利战争[24]和文化斗争[25]时期也没有说过；当时我不得不把奥古斯塔王后看作是我的对手，在我坚持我认定的职责时，她使我这种坚持的能力和神经经受了一生中最严峻的考验。

---

① 参看卡尔·冯·霍亨洛埃侯爵的《回忆录》第 2 卷第 135 页。在 1874 年 10 月 24 日，“他（俾斯麦）还告诉我关于皇后的许多事。例如，1848 年 8 月 1 日，格·芬克找到俾斯麦并向他说，联合省议会想要并必须提议国王退位，普鲁士亲王也退位，普鲁士王妃成为摄政以代替她的儿子。俾斯麦反对并且说，人民将不会理解这一处置。当芬克坚持时，俾斯麦说：‘如果明天你提出这一提议，那么我向您发誓，我将提议，把您作为叛国者逮捕。’芬克接着说：‘啊，那这件事必须放弃。’俾斯麦说：‘是的，请您把这告诉王妃。’于是芬克笑了笑走了。在这之前王妃已经同俾斯麦谈过话，谈话的调子使俾斯麦了解她在阴谋反对她的丈夫。”——德文本注

另一方面，亲王妃必然给她在英国的丈夫写过信，告诉他我曾竭力求见他，以便得到他的支持来营救国王、反击革命运动。因为当亲王在6月7日于返回途中在根廷车站逗留几分钟，我因为不知道他以“维尔齐茨的代表”的身份是否愿意被人看见同我会晤而向后退去时，他从人群的最后排认出了我，便穿过站在我前面的人群，向我伸出手来说：“我知道您曾为我进行活动，我将永志不忘。”

我第一次和他会见是在1834至1835年冬天的一次宫廷舞会上。我站在梅克伦堡的冯·沙克先生身旁，这位先生和我一样个子很高，而且也穿着陪审员的制服，于是亲王开玩笑说，司法部门如今也按照近卫兵的标准选择人员了。然后他又转身向着我问道，为什么我没有当一个军人。我回答道：“我有过这个愿望，不
29 过双亲反对，因为前景太不妙了。”对此亲王说道：“前途的确不光明，不过在司法界也不好。”在第一次联合省议会期间，他作为贵族院的议员参加会议，在联席会议上他曾多次和我谈话，从谈话的态度上证明他是赞同我当时所采取的政治立场的。

根廷会见后不久，他邀请我去巴贝尔斯贝格[26]。我向他叙述了三月事件中的许多情况，部分是我亲身经历的，部分是我从军官们那里听来的；特别是谈到了军队从柏林撤退时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从行军时所唱的悲苦的诗句中流露出来的。我艰难地向他朗诵了这些诗句，诗句历史地描绘了军队受命撤出柏林时的情绪：

这是些普鲁士人，黑色的和白色的，
旌旗又一次在前面迎风飘扬，

这是国王的忠实臣民在为国王捐躯，
为了国王，他们前赴后继，一片欢声。
即使看到牺牲者被不断抬走，
我们也毫不畏缩，
这时一声呼喊刺破了忠诚的心：
“你们不再是普鲁士人，应是德意志人。”

我们怀着爱戴之情向王座靠近，
仍然信任和充满信心，
这时国王向我们表明人们怎样报答忠诚的人，
他再也不听我们这些普鲁士人的呼声。
纽带松了，
我们的祖国在忍受痛苦！
自从他摈斥他的忠实臣民以来，
我们的心碎了，他的支柱裂了。

当暴风雨在他高贵的头上呼啸之时，
正是愚民愤怒地向他诅咒和责难之日，
他们现时在我们胜利的战场上大肆破坏，
正是军队的英勇保护您国王。
他们挺立而不颤抖，
为他们的主人、为他们的国王
而流血牺牲，
他们的死是甜蜜的，他们的荣誉是纯洁的。

在您的英勇的忠诚的战士倒下的地方，
神圣的祖国，审视这种丑行吧，
人们看到愚民的卑鄙的大批屠杀，
手挽手地围住了那个国王。
那时他们重新发誓：
啊！爱戴和忠诚。
虚伪是他们的誓言。
而他们的自由是借口，
我们幸运的是他们不愿再做普鲁士人。

黑红金三色旗在阳光下闪烁，
受到亵渎的黑鹰低头忧伤；
在这里结束了，索伦家族，您的光荣的历史，
在这里倒下了一个国王，但不是在战斗中。
我们不再愿意看到
已经陨落的星辰。
您这里所做的，君王，您将悔恨不已，
没有人会像普鲁士人那样忠诚。

这时他失声痛哭了起来。他像这样的痛哭我还只见过一次，那是在尼科尔斯堡我反对继续战争[27]的时候。

直至我去法兰克福任职以前，我受到他的夫人、即亲王妃的恩宠，有时命我到巴贝尔斯贝格去聆听他的政治观点和愿望，叙述完之后她总要说："我很高兴听到你的意见。"虽然我并不能阐述己见。未来的皇帝弗里德里希当时才十八九岁，但显得更为年

轻，在这种场合总要向我表示他的政治上的同情感，即当晚上我登车告辞时，他在幽暗中和我友好地紧紧握手致意，似乎他不便在白天公开地表示自己的观点。

(三)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统治的最后二十年里，统一德意志的愿望仅仅是以德国大学生协会的活动及其在法律上被镇压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德意志民族情感，或像他自己所写的，“条顿”[28]民族情感，比他父亲更热烈殷切，但由于他的中世纪式的修饰和在实际活动中不愿做出明确果断的结论，所以这种情感受到了压制。因此他失去了 1848 年的有利时机，而且这还不是他失去的唯一时机。在包括维也纳革命[29]在内的南德各邦的革命和 3 月 18 日事件之间的一段时期内，显而易 30
见，在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所有德意志邦国中，普鲁士是唯一保持稳固的邦国，所以德意志各邦君主都准备到柏林并以超过如今所实现的走向统一的条件寻求庇护。甚至巴伐利亚的骄傲自信也动摇了。如果按照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 3 月 10 日的声明，于 3 月 20 日在德累斯顿召开德意志各邦君主大会的话，那么从与会各邦国宫廷的情绪来看，可以期待他们会像 1789 年 8 月 4 日[30]法国人那样成为在祖国的祭坛上的自愿的牺牲。这种见解符合实际形势。为了制止革命浪潮，并为未来的立法和秩序向其他德意志邦国提供当时各王朝可以接受的保证，军国主义的普鲁士是未受损伤和足够强大的。

3 月 18 日事件证明，暴力干涉甚至对于只有使用暴力方可达

到的目的也是多么有害。不过，直到3月19日早晨还没有造成任何损失。起义已被镇压。起义的领袖（其中有我在大学时代就已熟悉的陪审员鲁道夫·施拉姆）都逃到德绍去了。他们认为军队撤退的最初消息是警察设的圈套，等到看了报纸以后才返回柏林。我认为，倘若果断而巧妙地利用这一胜利（这是当时欧洲的一个政府战胜起义而取得的唯一胜利），那么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就会比我参加政府后最终实现的更为充分。是不是这样更有利、更持久，我姑置不论。

如果国王在三月份断然镇压了柏林暴动，并不让其死灰复燃，那么，在奥地利崩溃之后，我们在建立一个新的巩固的德意志国家的时候就不会遭到从尼古拉皇帝那里来的阻难[31]。他的同情最初与其说在维也纳方面，不如说在柏林方面，即使弗里德里希四世个人并未享有这种同情，而且由于他和尼古拉皇帝的气质不同，不可能享有这种同情。

3月21日国王在大学生协会的彩旗下沿着街道巡行[32]，对于补偿内政外交方面的损失最为无济于事。形势由此而倒转过来：以致国王已经不再是他的军队的首领，而是街垒战士、桀骜不驯
31 的群众的首领了。几天以前，德意志各邦君主由于受到这些群众的威胁，在国王那里寻求保护。由于这次不光彩的巡行，把计划中的君主大会从德累斯顿迁往波茨坦当作三月事件的唯一结果这种想法就失去了任何可靠性。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处于不称职的、或许是背信弃义的顾问的压力下，受到女人的眼泪的逼迫，愿意通过命令军队放弃业已赢得的胜利，软弱地结束已经获得胜利的柏林流血事件，他的这种软弱给我国政策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带来了错过时机的危害。

如果国王能够保持并利用他的军队的胜利，那么这个进步是否会持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确实此后国王的情绪不会像我在第二次联合省议会期间所见到的那样抑郁，而会是由于胜利而精神振奋、言辞流利，就像他在 1840 年忠诚宣誓、1842 年在科隆和其他场合[33]所展现的那样。我不想揣测，断然地镇压了叛乱（叛乱在除俄国以外的大陆上仅仅没有战胜他一个人）这种意识会对于国王的态度、对于面对奥地利和各邦君主的中世纪帝国回忆的浪漫主义精神、以及对于以前和以后国内君主们如此强烈的自主意识会产生什么影响。巷战中取得的成就会是另一种性质，其效果比以后在战场上所取得的成就要小。我们像到达上帝所许之地之前的犹太人一样，还必须经过 1848 年至 1866 年[34]内部斗争的沙漠中的迷津，这对我们的未来或许更有好处。我们的在 1848 年崩溃的邻国依靠巴黎、维也纳和其他地方的援助而重新奋起和振兴后，对我们来说 1866 年和 1870 年的战争[35]毕竟是很难避免的。如果遵循 1848 年 3 月胜利的较短和较迅速的途径，历史事件对德国人的影响是否会同今天一样，这是令人怀疑的，而今天的印象是：各王朝、并且正是以往那些特别具有分立倾向的王朝比各个党派对待帝国更为友好。

我是在不顺利的情势下第一次访问无忧宫的。[36]6 月初，在鲁道夫·康普豪森首相辞职①的前几天，我正在波茨坦，一个宫廷使者到旅馆访我，通知我说国王希望同我谈话。我抱着投石党[37]式的反对情绪说，我很抱歉，不能执行陛下的命令，因为我正准 32
备回家去，我的妻子的健康状况需要特别照顾，如果我在外边耽

① 鲁道夫·康普豪森于 1848 年 6 月 20 日辞职。——德文本注

搁的时间超过了约定的时间，会使她焦躁不安。过一会儿，国王的侍从武官爱德温·冯·曼托伊费尔来了，以邀请赴宴的形式重复这个要求，还说国王拨给我一名使者供使用，让他去通知我的妻子。我别无他法，只得前往无忧宫。如果我的记忆不错，餐桌上的人很少，除了男女陪客外，只有康普豪森和我。宴会后，国王带我到凉台上去，亲切地问："您近来好吗?"我怀着从三月事件以来就一直怀有的激愤情绪回答："不好。"国王接着说："我想您的情绪是好的。"接着，我在几项其内容已记不清的指令的印象下说："情绪原来很好，可是自从王家的官厅在利用王家的印章的情况下把革命接种到我们身上以后，情绪便变坏了，缺乏对于国王的支持的信赖。"这时王后从树丛后面走出来说："您怎么能够和国王这样说话呢?""不用管我，伊丽莎，"国王回答说，"我要和他谈完。"然后他又对我说："您究竟责备我什么呢?""撤离柏林。""我并不愿意这样做。"国王回答道。王后离得不远，还能听见，便补充道："这完全不是国王的过错，他当时三天没有睡觉。"我说："一位国王必须会睡觉。"国王对这句粗暴的话并不激动，说："人要是从市政厅来，就变得越来越聪明；即使我承认自己的行动蠢得像'驴子'，又会得到什么好处？责备不是扶起倾覆了的王位的方法；我需要的是支持和有效的忠诚，而不是批评。"他说这些话和其他相类似的话时所显示的善意征服了我。我来的时候怀着投石党人的情绪，如果这种人被毫不客气地赶出门去倒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走时却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说服了。

我建议，他是一国之主，有权力恢复各处受到威胁的秩序。他说他必须谨慎从事，以免在形式上越出法律的轨道。如果他想

要同被当时某些人称为“短工议会”的柏林议会[38]闹翻，那么他为此必须在形式上使法律站在他这一边，不然他的事情就会基础不牢，整个君主政体就不仅会受到内部运动的威胁，而且也会受到外来的威胁。他这时想到的可能是德国在内部发生起义的情况下同法国的战争。对我来说更为可能的是，在他希望我为他效劳的时刻，他正不愿意向我显露出他担心损害他的普鲁士的德意志前景。我回答道，正规法律及其界限在目前情况下是极为模糊的，而且不会受到敌人（如果他们一旦取得政权）的尊重，就像 3 月 18 日那样。我对形势的观察，更多地是着眼于战争和自卫，而不是法律上的论据。可是同时国王坚持说，如果他偏离了法制基础，他的地位就会变得软弱；而我的印象仍然是，最初他是把恢复在普鲁士的秩序的可能性从属于由拉多维茨向他灌输的、如人们当时所说的黑、红、金三色旗[39]思想之下的。 33

从这第一次谈话之后进行的多次谈话中，我还记得国王下面的几句话：“我想实施反对国民议会的各种倾向的斗争，但是正如目前的情况那样，尽管我对自己的公正合理深信不疑，可是其他人，归根结蒂，广大民众是否也是这样，我就没有把握了。为了使我能有把握，国民议会必须更多地违反公理，并且是在不仅我容易了解的、而且是所有人都容易了解的、我有权利用暴力保卫我自己这样一些问题上违反公理。”

我无法使国王承认我的信念：国王对自己的权力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问题仅仅在于当他想保卫自己反对议会的不能容忍的侵犯时，是否相信自己有理。我的信念的正确性很快就得到了证实：面对着大大小小的暴动，任何一项军事部署都是毫不犹豫和热心地完成的，而且是在一开始就把遵守军纪同镇压已发生的武

装反抗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完成的。同时，议会因其活动被认为危害国家而被解散，在部队中并没有引起对于服从军事命令的疑问。甚至在袭击军械库[40]以及类似事件之后大批军队开进柏林一事，不仅会被士兵，而且也会被大多数居民理解为无可置疑的王权发挥了值得感激的职能，即使少数处理这事的人不这样理解；即令市民卫队企图进行反抗，那也只会在军队中加强正义的战斗激愤。我很难想像，国王在夏天竟然怀疑他的物质力量能否制止
34 柏林的革命，我的揣测宁可是，国王有他内心的考虑：在某种形势之下，柏林议会和同议会及其法律根基的和平相处能否直接或间接地加以利用，无论是通过和法兰克福议会[41]联合的方式，还是反对法兰克福议会，还是在其他方面对德国问题施加压力；他又考虑，与普鲁士国民代表制度的公开破裂是否可能使德国的前景受到危害。在德意志彩旗下游行一事，我当然认为不应归于国王的这种意向；当时他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已极为疲惫，对于向他提出的强硬要求不能进行反抗。

我在出入无忧宫期间，结识了在政治问题上也得到国王信任的人士，而且在内阁中时时遇到他们。其中特别应提出的是列奥波德·冯·格尔拉赫将军和冯·劳赫将军，后来还有枢密顾问尼布尔。

劳赫比较讲求实际；格尔拉赫的缺点是常常通过巧妙的格言来决定急迫的事件，他是一个性格高尚、富于活力的人，可是没有他弟弟路德维希·冯·格尔拉赫议长那种狂热劲头，在日常生活中他是谦逊和无能的，像个孩子，在政治上他是勇敢而有远见的，但是肉体上的惰性妨碍了他。我记得当着两兄弟——议长和将军的面，我不得已用以下的方式说明我的对于他们不切实际所

作的责备："如果我们三人在这里看到窗外街上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那么议长先生会借机发表一通关于我们缺乏信仰和我们的机构不完善等等的机智的想法；而将军呢，就会准确地说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才能帮上忙，可是仍然坐着不动；只有我才会到街上去或叫人来帮忙。"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宫廷党[42]中，将军是位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他风格高尚和无私，是国王的一位忠臣，但是在精神上或许像在肉体上一样由于体重过度而不能把自己的正确设想及时付诸实现。在国王对他不公正或不赏识的那些日子，晚祷时在将军房里大概可以听到一首古老的教会歌曲：

不要相信君主，
他们像摇篮一样摇摆不定。
今天还为你祈祷祝福，
明天就把你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在这种基督徒式的发泄不满情绪的情况下，他对于国 35
王的忠诚并没有丝毫减弱。即使是在他认为国王已误入歧途的情况下他也是全心全意拥护国王的，就像他最后几乎是心甘情愿地为此而死去，这是因为他在刺骨寒风中，不戴帽子，手里捧着盔甲，跟随在国王的灵柩后面走着。这种老仆人对于主子的灵柩在礼仪上的最后的忠诚表示，损坏了他本来已经虚弱的健康，他回家后得了头部丹毒症，几天后便死去了①。他的结局使我想起古代日耳曼君主的侍从，他们情愿和主人一同死去。

① 1861 年 1 月 10 日。——德文本注

从1848年起劳赫对国王具有同格尔拉赫一样的影响，也许还要更大些。他很有才干，具有健康的人类理智，勇敢正直，虽然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却具有普鲁士将军最为良好的志向，他多次作为驻彼得堡武官而从事外交活动。有一次劳赫带着内阁首相勃兰登堡伯爵的口头委托从柏林来到无忧宫，请求国王对一项重大问题作出决断。当国王难以作出决断从而不能作出决定时，劳赫最终从衣袋中掏出表来，看了一眼表面的时针说："现在离我乘的火车开车还有二十分钟，陛下反正必须下令，我对勃兰登堡伯爵说'是'还是'否'，或者我应该向他传达，说陛下既不说'是'，也不说'否'。"这几句话是用气愤的、由于军事纪律而压低了的声调说出来的，表现了不满情绪；这种情绪表现在明快果断但又被毫无裨益的冗长讨论弄得疲倦不堪的将军身上，是可以理解的。国王说："哪，由我而言就说'是'吧。"于是劳赫立即告辞，尽快穿过城市奔往火车站。国王沉默伫立了一会儿，仿佛在掂量着违心的决定会发生什么后果似的，然后转向格尔拉赫和我说："这个劳赫！连德国话都说不好，可是他比我们大家具有更多的健全的理智。"他走出房间时还向格尔拉赫说："他确实越来越比您聪明。"国王说的是否有理，我且不论；格尔拉赫比较机敏，劳赫比较实际。

（四）

事态的发展没有为德国的事业提供利用柏林议会的机会，而对议会的侵犯反倒与日俱增。因此，为了使议会成员摆脱威吓的压力，也可能是为了解散它，把议会会址迁移到另外一个城市的
36 想法成熟了。于是在建立能够实施这一措施的内阁的时候，便增

加了困难。从议会开幕时候起，一般说来国王就不容易物色到大臣，特别是那些能够顺从地赞同他那多变的观点、同时又具备无所畏惧的坚定性能保证在决定性时刻不致失去作用的大臣。我还记得春天时的多次不成功的尝试：格奥尔格·冯·芬克对我的试探答复说，他是一个“红土”人[43]，可以批评和反对，而不适宜于做大臣的角色。贝克拉特只有在极右派无条件地服从他，并且保证国王支持他的条件下才同意组阁。在国民议会中有影响的人，都不愿意毁掉自己的前途，即在未来、在恢复秩序以后成为和保留为立宪的议会制的大臣。此外我在已经被物色为商业大臣的哈尔科特处听到这种意见，恢复秩序必须通过由官吏和军人组成的专家内阁来完成，要在忠于宪法的大臣能够接事之前；此后人们做了准备。

不愿意担任大臣职务的心情，由于觉得这个职务会危及个人安全这种想法而加强，因为已经发生过保守党议员在街上遭到殴打的事件。按照街道居民的习惯和极左派议员们对他们的影响，假如政府试图对民主党的进迫予以反击并把它转到安定的道路上来，就必然会遇到更大的骚乱。

勃兰登堡伯爵对于这些忧虑采取无所谓的态度，表示准备出任首相，这样问题就在于必须为他物色一些合适的同僚。在呈给国王的名单中也有我的名字；正如格尔拉赫告诉我的，国王对此曾在页边空白处写道：“只有在刺刀不受限制地实行统治时方可使用”。* 在波茨坦，勃兰登堡伯爵亲自告诉我说：“我接受了这件

---

* 格尔拉赫的话比维兹图姆·冯·埃克施塔德伯爵所依据的材料更为可信，他在《柏林和维也纳》一书（第 247 页）边注上是这样写的：“极端反动分子，有血腥味，以后使用。”

事，可是我不怎么读报纸，对国家政治问题不熟悉，除了拿脑袋冒险外什么也不会。我需要一个‘牵象人’[44]，一个我可以信赖而且告诉我我能够做什么的人。我着手工作，像一个在黑暗中行
37 走的孩子一样。我谁也不熟悉，只熟悉奥托·曼托伊费尔（内政部首脑），这个人具有基本的修养，同时得到我个人的信任，可是他还犹疑不决。如果他愿意，明天我就到议会里去；如果他不愿意，那么我们必须等待和另外找人。请您去柏林说服曼托伊费尔吧。”在我从九点钟一直劝说他到午夜，并答应通知他在波茨坦的夫人，还向他谈到了为保护大臣的人身安全而在剧院[45]及其附近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之后，这件事才办成功。

11月9日清晨被任命为军政大臣的冯·施特罗塔将军来见我，勃兰登堡命他拜访我是为了让我对他讲清局势。我尽可能地做到这一点，并问道：“您准备好了吗?”他反问：“规定穿什么服装?”“便服。”我回答。他说：“我没有便服。”我安排了一个仆人伺候他，很幸运他在规定好的时刻之前在一家服装店买到了一套服装。为了保卫大臣们的安全，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安全措施。首先在剧院里除安排了人数众多的警察部队以外，还安排了近卫猎兵营的大约三十名最佳射手。如果大臣们受到暴力威胁，他们就按照约定的信号，出现在大厅和走廊上，以其百发百中的精确射击来保卫大臣。可以设想，枪声一响，在场的人会迅速离开大厅。在剧院各窗口以及宪兵广场各建筑物上也都作了相应的布置，目的在于保卫从剧院撤出的大臣们免遭有可能发生的敌对性的袭击。人们估计，只要从不同方向来的枪声一响，在那里可能聚集的较大人群也会散开。

冯·曼托伊费尔先生还提请注意处于狭窄的夏洛特街的去剧

院的入口处没有掩护；我建议在剧院对面那座属于正在休假中的汉诺威公使克尼普豪森伯爵的住宅中布置士兵。我连夜去军政部会见陆军上校冯·格里斯海姆，他是受命执行军事部署的；但他表示怀疑：是否可以为此目的而利用公使馆。于是我拜访了汉诺威的代办普拉滕伯爵，他住在菩提树下大街属于汉诺威国王的住宅里。他认为，此时公使馆的办公地点是在菩提树下大街他的住宅，于是授权我写信给冯·格里斯海姆上校说，为了公共安全的 38
目的他把“他的外出友人”克尼普豪森伯爵的住宅提供使用。我睡觉时已很晚了，可是翌日晨七时普拉滕的一位信使把我唤醒，请我去见他。我发现他十分气愤，因为一支大约一百人的队伍开进了他的住宅的庭院，也就是说正好是他指出作为公使馆所在地的地方。大概是格里斯海姆得到我的通知后给某一位官员下达了命令，而这位官员造成了误解。于是我便到他那里去，给队长下达了占用克尼普豪森住宅的命令，命令执行了，这时天已大亮，占用其他选定的建筑物是在夜间秘密完成的。大概正因为这种做法意料不到地显露了一种直率的决心，所以当大臣们步入剧院时，宪兵广场空无一人。

当弗兰格尔带着队伍进城（11 月 10 日）之后，便和市民卫队谈判，劝他们自动撤退。我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性错误；如果发生过极小的冲突，那么柏林便不是由于投降而是通过武力取得的，这样政府在政治上的地位就会不同了。国王没有立即解散国民议会，而是把会期推迟数日并把会址迁往勃兰登堡，力求可否在那里形成一个可以与之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协议的多数。这一切都表明，在国王想像的政治发展中，议会的作用到此尚未完毕。某些我记忆犹新的征兆表明，议会在德意志问题上的这种是

值得思考的。在议会休会期间与有影响的政治家们的私下谈话中，德意志问题比以前更为突出出来；而在内阁中，在这方面人们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萨克森人冯·卡洛维茨身上，就德意志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他那公认的辩才本应发生作用。勃兰登堡伯爵对德意志问题是怎么考虑的，当时他没有直接告诉过我。他仅仅表明准备以士兵服从命令的态度执行国王命令的事情。后来在埃尔富特他才比较坦率地和我谈到这个问题。[46]

第三章　埃尔富特、奥尔缪茨、德累斯顿

(一)

对于1848年以后我国政策的种种失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潜在的德意志观念比他的优柔寡断负有更大的罪责。国王希望，他所值得企望的事情将会实现，而不用损害他的王朝正统主义的传统[1]。如果国王完全没有要求普鲁士在1848年以前所没有占有的东西的愿望，即使这只是根据1840和1842年的演说[2]使人揣测的一种历史的褒奖；如果国王没有需要一定声望方能实现的目标和心愿，那么在勃兰登堡内阁站稳脚跟之后，究竟是什么阻碍他像对付巴登的起义[3]和普鲁士个别省城的反抗那样去对付普鲁士内部的革命的成果呢？这些起义的过程也向那些不谙内情的人表明，军队是可以信赖的；在巴登，就连那些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地区的后备军[4]也竭尽全力地尽了自己的责任。毫无疑问，军事反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一经颁布钦赐[5]宪法，在君主专制意义上比现成情况更为尖锐地修改作为基础的比利时的宪法法式[6]的话。国王内心想利用这种可能性的心愿由于担心失去那些具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情绪的人的好感而不得不打消，他正是把希

望寄托于这些人身上，即不通过战争和以同王朝正统观念相和谐的方式为普鲁士在德国取得领导地位。

这种希望或者期待——直到“新纪元”[7]之前是用普鲁士的德意志使命和道义上占领等这样的说法躲躲闪闪地表示出来——
40 的根据是1848年3月到次年春天在无忧宫和圣保罗教堂[8]中决定的双重错误：即过低估计了德意志诸王朝及其统治下的诸邦国的生命力，和过高估计了可以用“街垒”一词概括的那种力量，而这个词则可理解为包括准备街垒的时机、鼓动和以巷战相威胁这一切。颠覆的危险并不在于街垒本身，而在于对街垒的恐惧。多少有点像费阿基式的各邦政府[9]还没有来得及拔出剑就已在三月中被打倒了，部分是由于对敌人的恐惧，部分是由于政府官员对敌人的内心同情。无论如何，对于站在各邦君主之首的普鲁士国王来说，利用军队在柏林的胜利来建立德国的统一，要比尔后在圣保罗教堂的国民议会这样做容易一些。即使这次胜利得到巩固，国王的个性是否不会妨碍建立这样的统一，或者正如三月中博德尔施文格所担心的那样，是否会把已经建立的统一又弄得不可靠，这都还难以判断。国王在世最后几年的思想情绪，正如列奥波德·冯·格尔拉赫的记载及其他资料所表明的那样，再次突出了他那对宪法机构的原有的反感，关于国王的权力必须具有大于普鲁士宪法[10]所规定的行动自由的限度的信念。在他重病垂危时，他仍然活动着一种以“国王特许书”替代宪法的想法。

法兰克福议会受这种双重错误所束缚，认为王朝的问题已经过时，便以德国人特有的好钻研理论的精力，使这种观点也用之于有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事情。在那些能够在法兰克福熟悉地表达普鲁士各省和奥地利的德意志各地区居民的情绪的议员中间，

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于隐瞒真实情况。诚实与否姑且不论，议会感到失望——真诚地或不真诚地——的事实是：如果在法兰克福议会的决议和普鲁士国王的命令之间发生矛盾时，在八分之七的普鲁士居民中间，议会的决议是无足轻重的。凡是那时候在我国东部各省生活过的人，至今都能记得：所有掌握物质力量以及在发生冲突时领导或统帅武装力量的人物，对于法兰克福议会的讨论并未像按照聚集在议会里的科学界的和议会里的大人物的地位所能够期待的那样，给予认真的重视。如果当时有一道号召群众 41
握紧拳头援助各邦君主的帝国命令，那么这道命令不仅会在普鲁士，而且会在德意志各个大的中等邦中发生足够的效用；当然各个地方所产生的效果的程度不尽同于普鲁士，但是在各地毕竟达到了可以满足警察对物质力量要求的程度，只要君主们敢于任命坚决而明确地捍卫其事业的大臣。1848 年夏天普鲁士的情况不是这样；但是一俟国王在 11 月决定任命准备不顾议会决议而维护王权[11]的大臣的时候，一切鬼怪便立即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这个反击将会超越理智的范围这个危险。在北德意志其他邦国中，还不曾出现过像勃兰登堡内阁在某些省城内必须对付的那种冲突。连在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不顾反对王权的大臣，王权终究还是比革命更为强大。

1849 年 4 月 3 日国王拒绝了皇帝的冠冕[12]，不过从法兰克福议会的决议中取走了他懂得其价值的“就任权”；促使他这样做的，主要是由于这个提议起源于革命，或者总还是起源于议会，还由于法兰克福议会因缺少各个王朝[13]的支持而缺乏国家法的全权职能。但是，即使所有这些缺陷都不存在，或者它们在国王眼里不存在，那么在他的治理下，帝国机构也难以期望会像在威廉

皇帝治理下那样得到完善和加强。威廉皇帝所进行的历次战争[14]将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是应该在帝国建立之后、作为帝国的产物，而不是在帝国建立之前，为了准备和建立帝国来进行。是否能促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适时地进行这些战争，我不得而知；这甚至对他那位具有好战本性和普鲁士军官情感的兄弟[15]也是困难的。

我指出普鲁士当时的人事状况和事业状况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在战争时期及和平时期领导德国，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在那时候对此就有像现在回顾以往四十年的发展过程时那样明确的预见。我那时对于国王拒绝皇冠感到满意，并不是由于我对他个人的上述评价，而是由于对普鲁士王冠及其代表的威望的强烈的感情，但更多的是由于对于1848年街垒战之后的事态发展和它在议会中的决定本能地感到不信任。对于议会的决定，我和我在政治
42 上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印象：议会和报界的领导人，部分是自觉地，大部分是不自觉地支持并执行了一条“必须毁坏一切”的纲领，而且当时的大臣都是些既不能领导运动又不能阻止运动的人。当时，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与议会里某些派别的议员今天尚在坚持的立场没有基本的差别，这种立场的基础是：忠于友人，不信任或敌视对手。在党派生活中至今流行一种确信：对手无论做什么事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褊狭的，而在可能的情况下是不怀好意、丧尽天良的；还流行一种厌恶：不愿与自己派别的同志发生意见分歧和破裂；当时成为危及国家生存的现象的基础的这些信念要比现在活跃和真实得多。当时对手们互相很少了解，四十年来他们是有机会互相了解的，因为各党所有的领导成员的人事状况一般都变动得很缓慢、很小。当时人们的确相互认为不是傻瓜，就是坏蛋，人们确实怀有那种在今天为了对选民和

君主施加影响才伴言说出的情感和信念，因为这种情感和信念也是属于纲领的组成部分；人们依据这个纲领在一定的党派中效劳，通过相信这个党派的正确性，依赖其领袖人物，才“参加进去”。政治野心对于派系的存在和维持，今天要比四十年前起的作用更大；在那时，信念是比较诚挚和比较自然的；即使各个派系及其首领们的狂热、仇恨和相互间的妒忌，为派系利益牺牲国家利益的倾向，如今也许发展得强烈得多。无论如何，魔鬼一无所失。虽然卑躬屈膝和虚情假意地投国王之所好在上层小集团中得到鼓励，但是议会中各派系还并没有开始争夺宫廷的恩宠。一般总是错误地认为，信赖王权的威力不如信赖自身的作用。人们最担心的就是被视作是奴颜婢膝的和附属的。一部分人根据自己的信念竭力加强和支持王权，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们自己的和国家的福利就在于反对和削弱国王的权力。这里有一个证据：如果不是普鲁士王权的威力，但毕竟是对这种威力的信赖，当时明显地比今天要弱。即使通过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样一个没有很强意志 43
力的君主的个人愿望就可以通过拒绝接受皇冠而缓和整个德意志运动，和王权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为实现民族愿望而紧接着爆发的自发性起义[16]这些事实，也没有改变对王权的力量的估计不足。

从维也纳的梅特涅公爵垮台到军队撤离柏林[17]的一段短暂时期中，重又造成了一种虽然不太明显的对普鲁士有利的局势，这是由于觉察到国王和军队在犯过一切错误之后，依然足够强大，有能力镇压德累斯顿的起义[18]并促成三王同盟[19]。在民族的意义上迅速利用这种局势也许是可能的，不过前提条件是具备明确的和切实的目标以及果断的行动。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有利的时机全浪费在议论未来宪法的细节上，其中费尽唇舌的问题之一是德

意志各邦君主有权和德意志帝国一起派遣自己的公使团的问题。当时我在我接触的宫廷圈子里和议员中间主张的见解是：派外交代表的权力并不具有人们所赋予的那种重要性，而是从属于各德意志联邦君主在帝国内部或在国外的影响这个问题。如果一位君主对政治的影响微不足道，那么它的驻外使团也不能削弱帝国的统一的印象；如果他保留的对战争与和平，对帝国的政治与财政方针，或者对外国宫廷的决定的影响仍很强烈，那么就没有办法去阻止君主们的信使或者多少有点名气的私人使者直至国际牙科医生之类会成为政治谈判的执行者。

当时在我看来，把现存的有生命力的普鲁士军事力量放在前列，代替关于宪法章节的理论探讨，是比较有益处的，正像对付德累斯顿起义时发生的情况那样，而在普鲁士以外的其他德意志各邦中也会那样。德累斯顿事件已经证明，只要普鲁士援军使军事形势稳定下来，萨克森军队的纪律和忠诚就是不可动摇的。同
44 样，在法兰克福战斗中的黑森军队、在巴登战斗中的梅克伦堡军队都证明是可以信赖的[20]，只要他们深信存在自觉的领导和统一的指挥和只要没有人要求他们任凭敌人进攻自己而不自卫。如果当时柏林及时而充分地增援我们的军队并毫无内心的顾虑地接过对军事行动的领导权，那么我就不明白，对于良好的结局还会许可有什么怀疑。在一切法律和道德问题上形势不像 1848 年 3 月初那样明朗，但是在政治上无论如何不是不利的。

我谈到内心的顾虑，指的是以此失去有亲戚关系的各邦君主王室、议会、历史学家以及日报方面的赞美和拥护。当时作为舆论在报刊和议会里甚嚣尘上的日常思潮是激动人心的，但是这种思潮对于人民的情绪不起决定作用，而群众是否会接受上面通过

正常渠道提出的要求，则取决于人民的情绪。上层万人在报界和讲坛上的精神上的潜力受到互相交叉而极为错综复杂的企图和力量的支持和引导，只要演说家和著作家的福音凭借他们在群众中找到的信仰而不拥有“在空间必然”[21]相撞的物质力量时，政府就不能从这种错综复杂中获取它们行动的准绳。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政治上必须认真对付的不可抗力也就出现了。只要不存在这种通常不会很快发生的作用，只要在较大中心中渴望变革的人的叫嚣以及报刊和议会生活的激情需要在制造喧闹，那么对于现实政治家来说，科里奥兰对于群众性的反抗运动的见解[22]就是有效的，虽然没有在文字上谈及这些见解。但是，当时普鲁士的领导集团被大大小小的议会的喧闹声搅得头晕目眩，没有用气压计来测量那些喧闹的意义，对他们来说把军队排列成队伍或使军队面对动员令就是掌握了这种气压计。由于高级官员们部分地对运动的自由派一翼、部分地对民族主义一翼表示同情，这就大大促成对现实力量的对比关系做出错误的估计，我可以肯定当时宫廷和国王本人存在这种迷误。这是一种没有来自上面的推动也能起阻碍作用的因素，但这种因素事实上不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面对着局势提供的试探，国王有一种像我这个虽是游泳爱好者但在一次寒冷的暴风雨天气的日子打算下水时那样的不愉快感 45
觉。他对于事情是否已经成熟这一问题的顾虑是由于他和拉多维茨进行的对历史的讨论等等而造成的，这些讨论不仅涉及萨克森和汉诺威派遣使团的权力，还涉及在统治者和附庸、各邦君主和各个显贵人士、世袭的和非世袭的伯爵[23]之间按国会机构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类别分配“国会”席位的问题，其中包括商讨冯·格罗特·绍恩男爵的特殊性问题。

（二）

虽然当时我对军事事务没有像以后那样关系密切，但是我认为，我做的这一设想是不会错的，即：在动员军队去镇压普法尔茨和巴登的起义所使用的干部和基干兵团超过了人们所建议和所要求的，如果人们让动员起来准备作战的军队出发的话。事实是：在奥尔缪茨会晤[24]期间军政大臣就向我指出过，被迫签订和约或推迟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可能把大部分军队及时地或一般地动员起来，这支人员不足的军队的基干部分正处在巴登或在常驻地和实行动员地区之外的别的地方。如果在1849年春天我们就注意了军事解决的可能性并且通过无非是做好战斗准备的军队就可以完全具备动员兵力的能力，那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就不仅足以镇压普鲁士邦国内部和外部的任何起义，而且如果当时的主要问题尖锐化到成为军事力量问题的时候，这一做好战备的战斗力量同时提供了为我们准备在1850年以不用顾虑的方式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手段。明智的国王所缺乏的不是政治上的预见，而是果断。虽然在具体情况下他那在原则上对自己的绝对权威的强烈信念能够对付政治顾问，但是对付不了财政大臣的重重顾虑。

当时我就深信，普鲁士的军事力量足以镇压一切起义，这种被排除的反抗越大，有利于君主政体和民族事业的这种镇压的成
46 果也就越大；而最令人满意的是在一次战役中消灭全部企图反抗的力量。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起义时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使人疑虑：巴伐利亚军队的一部分会倒向何方。我还记得，巴伐利亚公

使莱辛费尔德伯爵[①]在那些关键的日子里在动身前往慕尼黑之前向我告别时，我对他说："但愿您的部队——既然它如此不可靠——公开背叛好了；这样，斗争将是激烈的，却是决定性的，它将治愈脓疮。如果您和您那不可靠的部队和平相处，那么脓疮就会在内部烂下去。"莱辛费尔德既震惊又诧异，说我不慎重。我在谈话结束时说："请您相信，我们在毁坏您的和我们的事业；越乱越好。"他不相信我的话，但是我的坚定见解却激励了他；我到今天依然认为，如果巴登的革命预先由于当时人们担心的一部分巴伐利亚军队和维尔腾堡军队的背叛而得到加强，那么对于一种值得希望的解决当时危机的机会还会更好一些。自然这样的机会后来也仍然会没有被利用。

我不能断定，面对当时严重的危险之所以采取犹豫不决和畏缩怯懦的措施是否只是由于财政大臣的胆小怕事或者朝廷感到于心不安和最高当局的优柔寡断应负其责，或者说是否由于在官僚阶层中间有一种类似在三月事件中妨碍博德尔施文格和其他人采取正确解决办法的忧虑在起作用，即：担心随着国王重新感到力量强大而无所顾忌时，会又采取专制主义的方针。我记得，我曾觉察到在高级官员和宫廷自由派人士中间就有这种忧虑。

还有一个问题，即冯·拉多维茨将军是否从天主教化的动机出发，以一种在国王身上能生效的方式向他施加了影响，以阻止信奉新教的普鲁士觉察到有利时机，并蒙蔽国王使之忽略这一时机。我至今尚不清楚，作为天主教徒的冯·拉多维茨是普鲁士的

---

① 古·安·冯·莱辛费尔德伯爵作为巴伐利亚的全权代表参加了1849年5月17日在拉多维茨主持下召开的同盟谈判。——德文本注

敌人呢，还是仅仅致力于确保他在国王身边的地位*。对于充满
47 中世纪幻想的国王来说，他确实扮演了巧妙的服装保管员的角色，并使国王陛下沉溺于历史的礼仪问题和帝国历史的回忆之中而错过对现时代发展进程进行有效干预的机会。建立三王同盟的有利时机由于迟钝犹豫[25]而被次要的礼仪问题占去了，致使奥地利终于再次强大起来，迫使萨克森和汉诺威退出，以至这个三王同盟中的两位共同创立者在埃尔富特背叛了。在埃尔富特议会开会期间，在冯·普富尔将军宴请的一次聚会中有人谈到一些代表收到的关于正在波希米亚集结的奥地利军队数量的确实情报，这支军队对议会起着平衡力量和纠正的作用。数目的说法不一，有的说八万，有的说十三万。拉多维茨默不作声地听了一阵，然后以他那通常所固有的不容置疑的神气坚定地说："奥地利在波希米亚有两万八千二百五十四名士兵和七千一百三十二匹战马。"他话里提出的千位以上的数字，是我偶然记住的，而其余数字则是我随意加上的，只是为了突出将军提供的情报的极端精确性。当然从这位普鲁士政府的官员和有权力的代表①嘴里道出的这个数字竟

---

* 冯·格尔拉赫将军于1850年8月写道（《回忆录》I，第514页）：
"国王敬重拉多维茨有两方面的原因：(1) 由于他那表面上机智的逻辑—数学式的推理，由此他那无思考的冷漠态度就可以使他避免同国王发生任何矛盾，而国王则把这种与自己的思路格格不入的思想方法看作是对自己设计的事例的试金石，并因此而获得对自己事业的信心。(2) 国王把他的大臣和我都看作是役畜，因为必须和他一起办理日常实际事务的那些人并不符合他的心思。他不相信自己有能力使这些大臣听命于他，也不相信可以找到其他的人，因此他便放弃这条途径，认为只有拉多维茨才有办法从德国内部复兴普鲁士，一如拉多维茨在《德国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书中直言不讳地保证的那样。"

① 冯·拉多维茨陆军中将作为同盟行政委员会的首席委员领导埃尔富特议会的讨论。——德文本注

使其他不同说法一时销声迹匿。现在可以确定，1850 年春天奥地利在波希米亚究竟拥有多大的实力；在奥里缪茨时期，奥地利军队远远超过十万人，这是我根据那年 11 月从军政大臣提供给我的确凿情报必然得出的假定。

我在埃尔富特同勃兰登堡伯爵的进一步接触使我认识到，他的普鲁士爱国主义主要是从对 1812 年和 1813 年的回忆中汲取营养的，因此他早就渗透了德意志民族情感。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仍是王朝的和博鲁士[26]的情感以及扩大普鲁士权力的愿望。他受到了当时正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我的政治教育的国王的委托，利用我在极右派中的某些影响来支持埃尔富特的政策，并且做了努力，他在一次城市和施泰格尔森林之间的独自散步中对我说："在 48
整个事业中什么可能给普鲁士带来危险？我们安心地设想，什么东西将帮助我们加强力量，'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同时我们暂时放弃那些不能得到的东西。我们是否会长期容忍国王被迫同意的宪法条文，这只有从经验教训中才能得知。如果不行，那就干脆拔刀出鞘，让这些家伙通通见鬼去。"我不否认，他这番议论的军人式的结语颇得我的好感，但我仍然怀疑，在紧急关头陛下的决定是否多半会取决于其他的影响而不是取决于这位颇具骑士风度的将军。他的悲惨的结局完全证实了我的疑虑。

国王也委托冯·曼托伊费尔先生试图争取普鲁士极右派支持政府政策，并按这个精神为我们和加格恩党[27]达成一个协议开辟道路。他做这件事的方式是邀请加格恩和我赴宴，也不说几句介绍话或开场白，便独自走了，让我们两人留下喝酒。加格恩只是含糊不清地对我重复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东西，如他的党的纲领和压缩了的政府方案等。他说话时不是看着我，而是双目斜视，望着

天花板。我向他说明我们普鲁士保皇党人最为担心的是，有了这部宪法，君主的权力不会保持足够强大；而他对于我的意见的回答是在发表一通冗长的滔滔不绝的演说之后，便沉默不语，脸上露出鄙夷的神色，这给人造成一种罗马已表示了意见[28]的印象。当曼托伊费尔回来时，我们已经有好几分钟沉默地坐着，我是因为在等待加格恩的反驳，他则因为回想自己在法兰克福的地位而认为对一个普鲁士乡村容克谈话如果不是作为法律，就有失尊严；他的志向是宁可当一个议会演说家和议长，而不是当一个政治性的实业家，并认为自己是雷神朱庇特。加格恩走后，曼托伊费尔问我他说了些什么。我回答道："他对我发表了一通演说，好像我是国民议会。"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德国和普鲁士代表民族自由主义的两个家族，加格恩家族和奥尔斯瓦尔德家族，各有三兄弟，其中各有一位将军，这两位将军在各自兄弟中间都是讲求实际的政治家
49 并且都由于革命运动而被杀，他们两人出自美好的爱国主义信仰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都曾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奥尔斯瓦尔德将军1848年9月18日在法兰克福遭到杀害，据说是由于他被人认作拉多维茨。他在第一次联合省议会期间曾自夸说，他作为一名骑兵团的长官单骑百哩，目的就是推动农民在选举时投反对派的票①。

1850年11月我同时被任命为团的后备军军官和即将开幕的议院议员[29]。在前往团部[30]途中路经柏林时，我拜会了军政大臣

① 弗里德里希·冯·加格恩将军1848年4月20日在同海克尔的谈话失败后返回他的部队时在康特尔恩被巴登义勇军射死。——德文本注

冯·施托克豪森，他和我私人关系很好，我个人为他效过绵力，他很感谢。经过和老门房的一番交涉之后我才被放进去见大臣，我表现了由于被征召和由于那些奥地利人说话的腔调而激起的好战的情绪。大臣是一位刚毅的老兵，我相信他的身心是坚强的。他主要地对我说了如下的话：

“目前我们必须尽可能避免破裂。即使奥地利没有萨克森的支持，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奥地利人对我们的破坏。我们不得不把柏林让给他们，而在首都以外的两个中心，也许是但泽和威斯特伐利亚进行动员。要用十四天我们才能向柏林调拨大约七万人，而这也不足以对抗奥地利现已做好准备反对我们的军队。”他接着说，如果我们要发起攻击，首先必须赢得时间，因此希望众议院的辩论不要由于申辩和决定——像人们根据报纸上流行的论调必然期望的这种申辩和决定那样——加速破裂。所以他请求我留在柏林，对已经在场和即将到来的和我友好的议员们根据适可而止的精神亲密地施加影响。他抱怨浪费基干部队，这些部队是按和平时期的编制散开和使用的，而且远离补给地和军械库，一部分在内地，大部分在德国西南部，即在那些按战时编制进行迅速动员很困难的地方。

当时巴登的军队是利用不伦瑞克的威悉河地区沿着难以通行的道路前来普鲁士的。——这是一个证据，证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畏惧地敬重邦联各邦国的地域界线，而它们的主权的其他标志在为帝国和三王同盟拟定的宪法草案中或者被轻率地忽视了，或者被废除了：在草案中几乎达到附庸化[31]的程度，但是没有人敢于在条约规定的现有军用道路之外要求驻扎部队的军营。到1864年丹麦战争爆发后，才在施瓦陶冲破了这种怯懦的传统，布置在奥尔 50

登堡的木栅被普鲁士军队除掉了。

对于像施托克豪森那样的有专门知识和爱惜荣誉的将军的见解，我不能妄加批评，就是今天也还不能。他向我描述的我们在军事上自己捆住手脚的罪责并不在他，而在于三月事件过程中以及其后在军事方面和外交方面我国的政策指导毫无计划性，而且还混杂着轻率和吝啬。在军事方面尤其是这样，人们根据当时采取的措施不得不断定，柏林一般说来没有考虑过最终将采用战争或军事的方法解决业已紧迫的问题。人们的心思过多地被舆论、演说、报纸和拟定宪法所牵拢，以致不能在外交方面、甚至在普鲁士以外的德意志政策方面实现稳固的计划和实际的目标。施托克豪森不能通过突然的军事成就来改正我们政策上的疏忽之罪和无计划性，而他所处的局势就是这样，就连内阁政治领导人勃兰登堡伯爵本人也认为这种局势是不可能的。勃兰登堡伯爵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荣誉感，他在生前最后日子里痛感失望。指责施托克豪森心胸狭隘是不公正的；我有理由认为，就连国王威廉一世在我担任他的大臣期间也同意我对 1850 年 11 月军事形势的见解[①]。不管当时我作为保守派议员对一位大臣来说，还是作为一个后备军少尉对一位将军来说，都是没有资格进行批评的。

施托克豪森通知我那驻扎在劳齐茨的团队说，他已命令冯·俾斯麦少尉留在柏林。我首先去访问我的议会同事司法顾问

---

① 在 1850 年 11 月亲王赞成战争（参看俾斯麦 1850 年 11 月 16 日的信）。在普鲁士亲王和军政大臣的一次争论中，前者“严重地侮辱了”后者，施托克豪森对亲王说：“在健康的人类理智不再存在的时刻，我不认识这种时刻对待的荣誉。”（俾斯麦 1850 年 11 月 24 日给夫人的信）在 11 月 25 日的信的结语中俾斯麦谈到了普鲁士亲王的威胁和平前途的战争狂热。——德文本注

格佩特。他当时虽然不是我的党派的首领，但他领导着可以称之为右派中心的一大帮人。他们愿意支持政府，但是认为不仅必须在原则上、而且还要通过迅速的军事行动来坚决捍卫普鲁士的民族使命是合适的。我首先遇到的是他那与军政大臣的纲领不一致的议会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尽力劝说他改变在我和施托克豪森谈 51
话以前我自己也基本上有过的那种见解，而这种见解可以看成是受到损伤的民族荣誉感或普鲁士军人荣誉感的一种自然产物。我记得，我们的会谈费时颇多，反反复复。会谈对于右翼党派的影响可以从关于请愿书辩论中看出。我自己则在12月3日的讲演中表述了我当时的见解，以下我引述几段：

“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普鲁士民众在自己国王的召唤下已经万众一心地奋起，他们忠实而驯顺地站起来了，他们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为了进行普鲁士历代国王下令进行的战争而站起来了！而在这以前，先生们，请注意这一点，在这以前，他们并不知道在这些战斗中究竟要争得什么；这是参加后备军的人当中恐怕没有人知道的。

我曾经希望，在议会范围内，在掌握政权人士的更小范围内，能再次萌发这种万众一心和忠诚的情感。我在柏林的短暂逗留，对于这里生活的仓促观察告诉我，我错了。请愿书草案称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但是除了个人的虚荣外我在这里没有发现任何伟大的东西，除了缺乏信任没有任何伟大的东西，除了党派之间的怨恨没有任何伟大的东西。这是三项伟大的东西，依我的判断，这些东西给我们的时代打上了成为卑微的时代的印记，同时也给爱国之士提供了一种暗淡的前景。我上面指出的人士中间缺乏团结，这在请愿书草案中是用说大话来勉强掩饰的，而这

种豪言壮语人人都可按各自的需要去理解。在请愿书及其附件中，我觉察不出这种使国家振奋的信任的迹象，觉察不出这种建立在对国王陛下忠贞基础上和建立在国家同治理它已有两年之久的内阁相处甚好这一经验基础上的可以为之献身的信任的迹象。当我们的邻国手持武器反对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拿起武器奔赴国境的时候，在信任的精神在那些在别的情况下似乎不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中间活跃起来的时候，在请愿书中每一个涉及对外政策的问题都包含着战争与和平的时候，需要通过非军事力量人员的一致来提高和加强举国一致奋起在欧洲造成的印象，我认为在这时候，尤其需要这样的信任。先生们，这是什么样的战争呢？这不是派几个团去远征什列斯维希或巴登，也不是在骚动不宁的省份里作炫耀武力的散步，而是对付欧洲大陆三大强国中两个强国的大规模战争，与此同时，第三个强国又正陈兵在我边界之上对我虎视眈眈，它清楚地知道，在科隆大教堂中可以找到珍宝，
52 占有这批珍宝，就能够结束法国革命，并巩固那里当权者的地位，即法兰西皇冠……

内阁或议会中的政治家坐在炉火旁边取暖，吹起附和公众思潮的战斗号角，或者从讲坛上发表振振有词的演说，同时却让那在雪地流血而死的步兵来决定他们的制度是否会获得胜利和荣誉：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是轻而易举的。没有比这更轻易的事，然而现在不注意寻找在战后仍然站得住脚的作战理由的政治家是要吃苦头的……

我确信，普鲁士的荣誉并不在于：普鲁士在德国到处为那些受到损害的议会名流扮演唐吉诃德的角色；这些议会名流认为他们的地方宪法已面临危险。我认为普鲁士求得荣誉的地方在于：

普鲁士首先摆脱与民主的任何可耻的联系，普鲁士在这个问题和其他所有问题上都不承认在没有普鲁士赞同的情况下在德国发生的某些事情，一切由普鲁士与奥地利经过共同的独立的探讨而认为是明智的、政治上正确的东西，都应该由德国两个权利平等的保卫者来付诸实施……

赋予德国的模式，调整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调整普鲁士、奥地利与诸小邦的关系等，这是一个包含着战争与和平的主要问题，它应在几天之内成为自由讨论的对象，因而它现在还不能成为战争的对象。如果有人无论如何也要进行战争，我可以以此安慰他，在自由讨论中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它：如果渴望战争的话，在四或六个星期内。我绝不想在本是如此重要的时刻以建议来妨碍政府的活动方式。如果我要对内阁表示自己的希望的话，那就是：在自由讨论会得出一项积极的结果之前，我们不能解除武装；这样，如果我们真正荣誉地不能避免或者不愿避免战争的话，那么我们仍然总是有时间进行一场战争的[①]。

怎样应当在同盟中寻求德国的统一，我还不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统一，因为从一开始就要求为了这个特殊同盟的利益而时时在官方枪杀和刺死我们的德国同胞。这种特殊的统一认为德国的荣誉在于全部德国问题的重心必须转向华沙和巴黎。请您设 53
想：德意志两部分持枪对垒，双方力量的差别不显著，不至于非要一个不亚于俄国和法国的强国站到一方，才能使它占决定性的优势。我不理解，自己愿意造成这种力量对比关系的人有什么理

① 俾斯麦的这一建议没有被接受。施瓦岑贝格在自由的讨论会开始前在奥尔缪茨要求解除武装，普鲁士在1850年12月10日解除了武装。——德文本注

由抱怨在这种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重心移到外国去了。”

我演说的主导思想是：根据军政大臣的想法，力求做到将战争推迟到我们武装好之后。但我不能清楚地公开表述我的想法，我只能暗示这一想法。要求我国的外交敏捷熟练，按照需要去推迟、防备或挑起战争，这大概不是过分的要求。

在1850年11月，俄国对在德国爆发的革命运动的理解要比1848年首次爆发时沉着得多了。我同俄国武官本肯多夫伯爵很友好，1850年我和他做过一次亲密的交谈，所得的印象是：包括波兰的运动在内的德国的运动在彼得堡内阁引起的惊恐已不再像运动爆发时在彼得堡引起的那样了，也不再被理解为一种战时的军事危险了。1848年3月，德国和波兰的革命的发展对俄国人来说还显得是某种不可预料的和危险的事情。在彼得堡通过他的报告表示不同见解的第一个俄国外交官是当时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代办、后来驻柏林的公使冯·布德贝格男爵。他那关于圣保罗教堂会谈及其意义的报告，从开头起就带有讽刺的色彩，而这位青年外交家在报告中对于一些德国教授的演说和国民议会的权力地位的评价很低，却使尼古拉皇帝大为欣赏，因而布德贝格竟飞黄腾达，很快升为公使和大使。在报告中，他从反德意志的立场出发，表达了一种类似于他过去在其中生活过的柏林旧普鲁士人士的政治性的评价，这些旧普鲁士人士是用同胞和关注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可以说，他是这种观点的第一个发明者，并因而在彼得堡官运亨通，这种观点来源于柏林的“卡西诺”[32]。从那时候起，俄国不仅从根本上加强了在维斯拉河畔的军事地位，而且对
54 于革命以及德意志各邦政府当时的军事力量也有着一种微弱的印象；1850年11月我在同我友好的俄国公使美延多尔夫男爵和他的

同胞处听到的谈话，贯串着一种从俄国人的观点看是完全可以安心的、具有一种个人的善意、但是对我来说是有损于友邦普鲁士的前途的干预。这些言论给我的印象就是认为奥地利是德国更为强大、更为可靠的部分，而俄国本身足够强大可以决定双方的争端。

(三)

当我作为门外汉对外交事务的方法与习惯还不如以后那样熟悉的时候，我却不怀疑，如果一般说来战争对我们是有利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即使在奥尔缪茨协定之后，在德累斯顿谈判[33]期间，任何时候都可发生和通过中断谈判导致战争。施托克豪森偶然告诉我说，需要六周时间才能做好战争准备。依我看，如果一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是我们不能通过战争解决问题的唯一理由，那么通过巧妙地引导在德累斯顿的谈判，不难争取一倍于此的时间。从普鲁士的观点看，如果德累斯顿谈判未被按照普鲁士的见解用来获得一种更高的成果或者获得导致战争的冠冕堂皇的借口，那么我永远也不会明白，我们在德累斯顿谈判的目标受到明显的限制究竟是来自国王呢，还是来自新任外交大臣冯·曼托伊费尔先生①。我那时得到的印象只不过是，这位曾经作过邦议员、县长和内务部首脑的大臣，由于施瓦尔岑贝格公爵待人接物态度傲慢、盛气凌人，而在行动举止上感到局促不安、心神不

① 奥·冯·曼托伊费尔从1848年11月8日起是内务大臣；1850年11月大臣冯·拉多维茨辞职后他临时接任外交部的领导职务；1850年12月19日他成为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德文本注

宁。甚至这两位在德累斯顿的家庭生活状况也在两大国代表的自我感觉中以及其他德意志代表对他们的评价上产生了不利于我们的影响：施瓦尔岑贝格公爵住在一层，有穿仆役制服的侍从，有银制器皿和香槟酒；而普鲁士大臣则只有小公务员和几只装水的杯子，住在上一层。弗里德里希大帝向他在伦敦的代表推荐古老
55 的普鲁士的俭朴作风时说："你步行的时候，就说身后有十万人跟着你走。"这种古普鲁士的朴素精神证明是一种夸张，机智的国王只有在极度节俭时才能信赖这种夸大。现在每个人都有十万人，只是在德累斯顿时期我们似乎不曾有过那么多人。当时普鲁士政策的根本错误就是认为只有通过斗争或准备斗争才能取得的成果可以通过政论的、议会的和外交的伪善来达到，好像是对于我们的"德意志精神"的雄辩活动的报答，而硬要给我们的谦虚美德加上这些成果似的。后来人们称此为"道义上的"征服。这只不过是希望让别人来为我们做我们自己还不敢做的事情。

第四章　外　交　家

56

由于奥地利的努力，邦联议会[1] 恢复了自己的活动，于是普鲁士政府决定向该议会派遣代表，从而补足了议会成员，接着便临时任命过去和现在驻彼得堡的冯·罗霍夫将军为驻邦联议会公使。同时公使馆还配备了两名参赞，这就是我和冯·格鲁纳先生。在我被任命为参赞以前，国王陛下和冯·曼托伊费尔大臣就已告诉我，可望于近期任命我为邦联议会公使。罗霍夫本应该带领并指导我工作，但是他自己也不能胜任工作，便把我当作一名文书来使用，不让我熟悉政治事件。

我被任命之前与国王的一次谈话（在我已故友人约·洛·莫特莱致夫人的书信中曾有简述）经过如下。曼托伊费尔大臣突然问我是否愿意接受邦联议会公使这样一职位，我简单地回答说“愿意”，之后国王便召见我，并对我说：“您很有勇气，立即就同意接受一个您不熟悉的职位。”我回答说：“陛下，是您有勇气把这样一个职务托付给我；同时，只要这个任命证实不合适，则陛下完全可以不受约束而撤销这项委任。在我熟悉这项任务之前，我自己也没有把握说我能胜任。如果我不能胜任愉快，我就会第一个请求调离此职。既然陛下敢于任命，我也就敢于从命。”于是国王说：“那我们就试试看吧。”

1851 年 5 月 11 日我来到法兰克福。罗霍夫先生之为人，与其说是热衷于功名，不如说是喜好安逸与舒适。他被彼得
57 堡的气候和繁忙的宫廷生活弄得精疲力尽，宁可长期留在法兰克福，因为这里可以满足他的全部愿望。他在柏林进行活动，要把我任命为驻达姆施塔特公使，同时兼在拿骚公爵和法兰克福市[2] 的外交代表，也许还不反对将他在彼得堡的职位让给我作为交换。他喜欢住在莱茵河畔和同德国各宫廷交往。但他的努力并未成功。6 月 11 日，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写信告诉我，国王已批准任命我为驻邦联议会公使。大臣写道："不言而喻，不能粗暴地解除冯·罗霍夫先生的职务，所以我准备今天还要给他写几句话谈谈这件事。我相信，如果我在这件事上充分照顾冯·罗霍夫先生的意愿，您肯定会同意的。事实上我对他只能感谢，因为他承担了困难的、费力不讨好的使命，不像某些人那样总是评头论足，而在需要实干时，便打退堂鼓。不需要保证：我这里指的不是您，因为即使困难当头，您也是敢于应付，而且我相信，即使只剩下您一人，也将进行保卫。"

7 月 15 日，我被正式任命为驻邦联议会公使。虽然人们对待冯·罗霍夫先生非常照顾，但他依然感到恼恨，并因心愿未遂而迁怒于我，一天清晨，既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向我移交工作和留下文件，便起程离开法兰克福。当我从其他方面得知消息时，便及时赶到火车站去，目的是感谢他对我表示的好意。关于我在邦联议会的活动和体会，已经发表了许多官方的和私人的材料，因此我只做些补遗。

在法兰克福我遇到了从临时协定[3]时期①起就任职的两位普鲁士委员：冯·伯蒂歇尔省长（他的儿子后来作为国务秘书和大臣当我的助手）和冯·波伊克将军（他使我有机会第一次来研究勋章的性质）。他是一位能干而勇敢的军官，受过很高的科学教育，而这种教育后来在他担任军事学校总监时得到了应用。1812 年他在约克军团[4]服役期间，他的大衣被盗，不得不穿着单薄的军装撤退回来。由于严寒，他的脚趾冻坏了并且还忍受了其他种种痛苦。这位聪明而勇敢的军官虽然其貌不扬，却得到美丽的舒伦堡女伯爵的垂青，因此他儿子后来得到了阿尔特马克的申克·冯·弗勒希特林根家族一笔丰厚的遗产。与他的智力上的重要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讲究外表这个弱点，因此给柏林土话增添了一个词儿。当谈到任何人胸前同时佩戴过多勋章时，人们就说："他波伊克化了。"

58

有一天早晨我去拜访他，见他正站在一张桌子旁边，桌子上排列着许多他应得的、起初是在战场上因功荣获的勋章。这些勋章在他胸前构成的习惯的排列被一颗刚授予的新的金星勋章打乱了。寒暄之后，他和我谈的不是关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什么事，而是要我判断，从艺术鉴赏的观点看，应该把这颗金星勋章插在什么地方。从儿童时代起我就对这位建立大功的将军怀有尊敬的

---

① 临时协定时期，人们是指 1849 年 9 月 30 日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缔结的条约，目的是任命一个由两国各派两名全权代表组成的邦联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直至最终解决德意志宪法问题之前（至迟到 1850 年 5 月 1 日）领导邦联事务，特别是管理邦联财产。委员会的成员是：奥地利的冯·科伯克和冯·舍恩哈尔斯将军，普鲁士的冯·拉多维茨（后来由冯·波伊克代表）和伯蒂歇尔省长（这个贵族称号最初赠予儿子，即卡尔·亨利希·冯·伯蒂歇尔大臣）。由于意见分歧，这个委员会在 1849 年 12 月 20 日才成立，于是帝国摄政约翰大公辞去了他的职务。——德文本注

情感，这使得我十分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只是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谈公务。

我承认，当我第一次受到表彰，得到一枚拯救奖章[5]（1842年）的时候，我是兴高采烈的，因为当时我作为一个乡村容克在这方面还没有充分享受过。后来在国家公职中我很快就丧失了这种最初的感觉；我已不再记得后来我得到的奖赏时在客观上给了我什么满足，而仅仅是对从外表上证明国王就我的忠诚用奖章加以报答这种善意，或者对证明其他各邦君主表彰我那赢得了他们信任和好意的成功的政治措施的善意感到主观的满意。有人对我们的驻德累斯顿公使冯·约尔丹诙谐地建议，请他从他那许多勋章中让出一个来，他答道："我可以让给你所有的勋章，不过请给留下一个，以便我在外交上遮遮羞"。事实上，一条绶带是一位公使的不可缺少的装饰品，如果它不是由本国宫廷所赐，那就可以替换。对于一个温文尔雅的外交官来说，这正是所希望的，有如太太们对于更换服装一样。在巴黎我曾亲眼看见过，碰上了佩戴勋章的先生，一场对付群众的不可理解的暴力行动就突然中止了。除了在彼得堡和巴黎，我从来没有感到需要佩戴勋章。在这两个首都，谁如果希望警察和公众对他彬彬有礼[6]，那么上街时必须在上衣挂上任何一种勋章的绶带。在其他任何场合，我只是视
59 情况的需要而佩戴勋章。每当我看到官场中的同僚和同事收集勋章的那种病态狂热时，我就觉得那是一种中国式的习气；像有些枢密顾问[7]本来就已经无法安排好胸前成排的勋章，却还要去准备任何一项无关紧要的协议，这仅仅是为了收集共同订约的国家的勋章来充实自己的收藏而已。

议院的成员们应当在1849—1850年审查钦定宪法[8]，便展开

了十分紧张的活动：八点到十点举行委员会会议，十点到四点是全体会议，有时这类会议晚间还要再开，还要插进一些长时间的党派会议。因此，我只能在夜间满足我对运动的需要，我记得有好几次夜深人静时我在歌剧院和勃兰登堡门之间的林登大街上徘徊。当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注意到了跳舞与健康的益处。我在二十七岁时便已不再跳舞，觉得这种娱乐只适宜于“青年”。在一次宫廷舞会上，同我关系亲密的一位女士请求我帮她找寻不见了的跳科底蓉舞的舞伴，因为我没有找到他，她便要求我代替他。我在白色大厅光滑的镶木地板上跳过几圈消除了怕头晕的担心之后，便愉快地继续跳了下去，舞会之后那一觉睡得非常香甜，是很长时间都没有享受过的。在法兰克福，人人都跳舞，带头的是六十五岁的法国公使德·塔尔内侯爵先生，在法国宣布帝制[9]以后又称为尊贵的德·塔尔内侯爵先生。我不知不觉就沾染上了这种习惯，虽然我在邦联工作有足够的时间去散步和骑马。就是在柏林，我成了大臣以后，当亲密的女士们邀请跳舞或公主们吩咐时，我也未曾拒绝过。但我常常总要因此而听到国王对我说的讥讽话，例如他对我说：“有人指责我，任用了一位轻佻的大臣。您还是不要因为跳舞而加深这种印象吧。”后来就禁止公主们选我作舞伴了。冯·凯德尔先生①长期来爱好跳舞，当涉及提升他的职务时，也使我在国王那里遇到了困难。这适应皇帝的拘谨性格，他习惯于维护自己的尊严，避免招致外界的毫无意义的批评。在他的概念中，一位跳舞的国家官员只有参加盛大的宫廷里 60

① 罗·冯·凯德尔，1863 年被任命为外交部助理，直至 1872 年属于俾斯麦的亲密僚属，常出入俾斯麦之家。——德文本注

的卡德里尔舞方为恰当；而如果他跳急速旋转的华尔兹舞，那么他就是失去了对他的建议的合理性的信赖。

我在法兰克福完全熟悉了情况，我同奥地利的代表发生过激烈的冲突，首先是在舰队的问题上，这位代表竭力缩小普鲁士在威信和财政方面的作用，以使普鲁士在将来丧失活动能力。在此以后，国王召我去波茨坦并于1852年5月28日向我说明，他已决定把我派往维也纳高等外交学校，先当代办，然后作为身患重病的阿尔宁伯爵的继任人。为此目的，他交给了我一封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陛下的介绍信，日期是6月5日，内容如下：

皇帝陛下，敬请允许我对本信呈递者向贵朝廷作亲笔介绍。这位是冯·俾斯麦·舍恩豪森先生。他属于一个骑士家族，这一家族早在我的王室之前就已定居在我们的马尔克[10]之内，这个家族自古以来特别在俾斯麦身上保持了古老的道德。在不久前的邪恶的日子里，我国平原地区的令人可喜的秩序得以维护和巩固，这应归功于他的勇敢顽强的努力。陛下知道，冯·俾斯麦先生曾任我国驻邦联议会公使要职。因为现在我国派驻陛下皇廷的公使阿尔宁伯爵的健康状况要求他暂时离职，（我认为）我们两国皇室之间又不允许建立次级的使节关系，所以我选定冯·俾斯麦先生在阿尔宁伯爵离职期间代理他的职责。想到陛下能认识他，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在我国由于他对朝廷的骑士般自愿的忠诚和对革命直至它的根源的不可调和的敌视而赢得许多人的敬重，当然也遭到一些人的嫉恨。他是我的一位朋友和忠臣，他是带着对我的原则、我的活动方式、我的意愿以及我还要加上我对奥

地利和陛下之敬爱的新鲜感受和真诚同情去维也纳的。如果
需要的话，他能够向陛下和您的最高级顾问们就许多情况提 61
供说明和回答，而能胜任于此的人委实不多。如果不是长期积累的闻所未闻的误解根深蒂固的话——愿上帝保佑防止了这种情况——那么，他在维也纳的短期任职将是真正富于成效的。冯·俾斯麦先生从法兰克福来，孕育莱茵同盟[11]的一些中等邦国大喜若狂地称作是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分歧的东西，任何时候在法兰克福总是能够得到最强烈的反应，而且往往能找到其根源的。他对这些事和当地的活动都能以敏锐而准确的目光加以考察。我已经命令他要像回答我提出的问题那样，回答陛下和陛下的大臣们在这方面提出的任何问题。陛下或许希望他能说明我对于关税同盟的理解和态度，那么我相信，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即使不能有幸得到陛下的赞同，也一定能够得到陛下的尊重。高贵尊敬的尼古拉皇帝来到这里，这对我来说是一件真正的喜事。①我老早就有的坚定愿望，即陛下、他和我都一致地认识到这一真理，即：只有我们三方的牢不可破的、充满信任和积极有效的充分一致才能把欧洲和我们这个难于驾驭的、却又毕竟是亲爱的德意志祖国从目前的危机中拯救出来；这一愿望的证实使我心中充满了对于上帝的感谢，并且加强了我对陛下由来已久的挚爱。我最亲爱的朋友，愿您保持在特格恩湖畔那些美好日子里对我的好感并巩固您对我的信任和友谊，因为这对我们的共同的祖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强有力的和必不可少

① 沙皇尼古拉在1852年5月16—26日在柏林。——德文本注

的！最亲爱的朋友，作为陛下忠实而诚挚的叔叔、兄弟和朋友[12]，我最衷心地赞美这种友谊。

无忧宫，1852 年 6 月 5 日

在维也纳我遇上了由布奥尔、巴赫、布鲁克等组成的“单音节”内阁[13]，他们都不是普鲁士的朋友，但对我却亲切友好，相信我会感受到皇帝的善意，并在公事上予以报答。表面上我受到的尊重超乎我的预料，但是在公务上，即在关税事务上，我的使命却没有获得成功。奥地利当时是打算和我们统一关税的，但是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都不认为迎合他们的这一愿望[14]是明智的。关
62 税统一必不可少的基础之一是生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性。在德意志关税同盟内部，北部和南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利益差别确实是好不容易而且只是以与出自民族同一性相适应的善良愿望而得到克服的。匈牙利和加里西亚为一方，关税同盟[15]为另一方，他们之间在需要征税的货物方面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以致看来不可能实现关税统一。关税收入的分配比例将会始终不利于德国，虽然从数字看是不利于奥地利的。莱塔河此岸，尤其是莱塔河彼岸[16]的奥地利人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而不是进口的产品生活。此外，对于东部非德意志人的下级官员，我在那时是一般不怎么特别信任的，即使现在有时也是如此。

我们驻维也纳使馆的唯一的一位秘书由于没有当上代办而对我表示不满，于是他便到柏林去请求休假。大臣拒绝了他，我却立即批准了他。于是我去找早年旧友——汉诺威公使阿道夫·冯·普拉滕伯爵，请他向大臣们推荐我，并把我介绍到外交界中去。

在推心置腹的交谈中，他偶然问我是否认为自己已被确定为曼托伊费尔的继承人。我回答道，暂时我还没有那种愿望。不过我确实认为，国王是想在晚些时候任命我当大臣，为此他在培养我，并按这一意图把出使奥地利的特殊使命交付给我。我的心愿是，在法兰克福或其他各个宫廷当上十年公使，见见世面；然后很愿意再当上十年大臣，尽可能赢得个好名声；然后就告老还乡，思考自己的经历，要像在波茨坦附近滕波林地方我年老的叔父那样，从事果树嫁接工作。这几句诙谐的话被冯·普拉滕传到了汉诺威，在那里又传到了税务总监克伦策的耳朵里。这个人正在和曼托伊费尔谈判关税事宜，他从自由派官僚的立场出发，痛恨我这个容克贵族，便迫不及待地把普拉滕的报告中的内容加以歪曲，告诉曼托伊费尔，好像我正在为推翻曼托伊费尔而活动。我从维也纳返回柏林（7月8日）时，从种种迹象察觉到这种谗言的作用。这表现在我的上司与我的关系冷淡了，我到柏林去时不再像以前那样被邀请住在他 63
家里。而且我与冯·格尔拉赫将军的友好关系也受到了怀疑。

阿尔宁伯爵的痊愈使我可以结束在维也纳的逗留，也使国王暂时打消了任命我为阿尔宁继任人的意图。不过即令他没有痊愈，我也不会愿意接受那个职位，因为那时我已有一种感觉，我在法兰克福的作风已使我变成了一个在维也纳 persona ingrata（不受欢迎的人）。我很担心有人会在那里继续把我当作敌对分子看待，增加我工作的困难，而且会在柏林宫廷里败坏我的声誉，如果我身在维也纳执行职务，那么他们通过宫廷通信会比通过法兰克福更容易达到这个目的。

我还记得后来我和国王在一次长时期的铁路旅行中单独地谈论了维也纳。我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如果陛下发出命令，我就到

那里去，但并不自愿。我在法兰克福为陛下效劳，已招致奥地利宫廷的厌恶。如果再派我到维也纳去当公使，我觉得就是把我交给我的对手。任何一个政府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损害外国派驻的任何一位公使，而且通过像奥地利在德国使用过的那种政策手段来动摇他的地位。”国王的回答总是：“我不愿意命令您，您应该自愿到那里去，并请求我准许您去。这对提高您的外交家的才能来说是一所高等学校，我在这方面造就您，是因为知道对您值得这样做，您应该感谢我。”

当时甚至大臣的职位也非我所愿。我深信，我作为大臣，并不能在国王那里获得我所能接受的地位。他把我看成是一个他下的蛋而且还是他亲自孵出小鸡的蛋，所以在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他总觉得似乎蛋要教训母鸡。我清楚，在我看来普鲁士对外政策的目标并不完全符合国王的目标。同样清楚的是，一位负责任的大臣必须克服重重困难，因为这位君主刚愎自用，自行其是，见解朝三暮四，办事杂乱无章，而且容易受到幕后渗进来的政治阴谋家的影响。这些阴谋家从选帝侯的炼金术士一直到近代，都能钻到宫廷中来，甚至在严格而有主见的弗里德里希·威
64 廉一世时也在所难免，那些家伙们全是些巫医、变戏法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恶棍[17]。在那个时期，成为一位顺从同时又负责的大臣，比在威廉一世统治时期要更为困难。

1853 年 9 月，曾给我担任汉诺威的大臣打开了前景。我在诺德奈[18]结束了矿泉浴治疗之后，刚刚退出舍勒内阁的大臣巴克麦斯特尔就试探我是否愿意担任乔治国王的大臣。我表示的意思是，只有在汉诺威国王同普鲁士全面携手合作的条件下，我才能为汉诺威的对外政策服务；我不能像脱掉一件外套那样放弃我的普鲁

士人的身份。我从诺德奈途经汉诺威到达日内瓦湖畔的维尔涅夫的自家人那里，同国王曾做过几次会谈。其中有一次谈话是在王宫一层国王寝室与王后寝室之间的办公室里进行的。国王希望我们会谈的事不要声张出去，却请我五点钟去赴宴。他没有重提我是否愿意当他的大臣这个问题，他仅仅要求，我作为熟悉邦联议会事务的专家，能够就如何利用邦联的决议来修正 1848 年宪法[19]的问题向他做一报告。我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以后，他要求我把它写出来，而且要马上就写。在国王不耐烦地坐在桌旁等着的情况下，我扼要地写就了行动计划纲要。这确非一件易事，因为文具长期未用而很不称手：墨水既稠，笔尖又坏，纸很粗糙，且无吸墨纸；我写的政治备忘录长达四页，墨点斑斑，看起来不像按公文规格要求誊清的文件。国王只是签了名，而这一签名在他接见我用的这间房子里为保密起见他也几乎不愿意写。可是秘密自然没有保住，因为事情一直拖到六点钟，而被邀于五点参加宴会的宾客对宴会推迟的原因是不会推测不出的。当国王身后的座钟敲响时，他跳了起来，一句话也不说，虽然眼力不好，却以惊人的速度安全地穿过陈设家具的房间，闯进隔壁的寝室或更衣室去了。剩下了我一个人，不知如何是好，又不知道宫中房屋的配置情况，只记得国王说过，三个门中有一个通往患麻疹而卧床的王后的寝室。我认定不会有人来引我之后，便推开第三个门走出 65
来，正好遇见一位侍从，他不认识我，我出现在宫中这个地方使他又怕又惊，不过当我听懂了他提出疑问的口音，用英语加以回答，并吩咐引我去参加国王的宴会时，他便放了心。

我不记得是在当天晚上还是在次日晚上，国王又一次长时间召见我，而且没有旁人在场。召见时，我诧异的是，眼力不好的

国王竟受到如此的怠慢。宽大房间的全部照明设备是一架两个插头的烛台和两根蜡烛，上面还罩着一个沉重的金属制成的灯罩。由于蜡烛点完，一个灯罩落在地板上发出一声敲锣似的声音，可是没有人应声而来，甚至隔壁室内也没有人，于是君主不得不亲自指给我铃在什么地方。更使我奇怪的是：国王受到的冷落还表现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公文和私人信件，只要国王轻轻一动，就会有几件掉在地上，于是我就必须俯身拾起来。使人同样惊奇的是，眼力不好的君主和一个像我这样的外邦外交官会谈几小时竟没有任何一位大臣知道。

提到我当时在汉诺威的停留，我又回忆起一件我至今尚不明白的事。当时，从柏林派了一位领事施皮格尔塔尔去协助在汉诺威就当时的关税问题进行谈判的普鲁士全权代表。当我向我的友人冯·舍勒大臣谈到他是一位普鲁士的官员时，他笑着表示惊讶说："从他的行迹来看，我认为这个人是一名奥地利的代理人。"我用密码电报向冯·曼托伊费尔大臣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建议：由于这位施皮格尔塔尔将于近日赴柏林，在边境海关检查时要仔细检查他的行李并没收他的文件。我期待以后几天将会读到或听到这件事的消息，这种期待没有实现。10月最后几天我在柏林和波茨坦逗留时，冯·格尔拉赫将军对我说道："曼托伊费尔有时有些十分奇怪的念头，如不久前他曾要求邀请施皮格尔塔尔领事参加国王的宴会，甚至用列为内阁问题以实现自己的要求。"当我对他讲了我在汉诺威的见闻时，他对自己的想法做出了难以名状的表达。

第五章　周报党。克里木战争

(一)

对于德国的事情，人们在反对王权的各集团中将微弱的希望寄托在类似科堡公爵[1]的具有杠杆作用的力量上，寄托在英国甚至法国的援助上，但是首先寄托在德国人民的自由主义的同情上。这些希望的实际有效活动仅仅限于宫廷反对派的狭小圈子里，即限于为了自己及本派的目的而竭力争取普鲁士亲王的贝特曼·霍尔维克集团。这个集团完全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很少得到当时被称作“哥达”派[2]的民族自由派的支持。我从来就不认为这些先生是热心德意志民族事业的人，恰恰相反。有影响的今天（1891 年）还健在的威廉皇帝任职多年的副官卡尔·冯·德尔·哥尔茨伯爵，总是为他的兄弟及其友人敞开通道，而他本人原来是一位文雅豁达的近卫军官，地道的普鲁士人和宫廷侍从，他对于普鲁士以外的德国事务的兴趣，全然决定于他在宫中地位的需要。他喜欢享乐，爱骑马打猎，长得漂亮，颇能讨女人欢心，在宫廷中举止适宜；政治对他说来并不特别重要，只有在宫廷中需要政治的时候，政治对他才有意义。没有人比他更好地懂得，在反对曼托伊费尔的斗争中要使亲王成为同盟者，办法就是

提起奥尔缪茨协定[3]。他使这根损伤亲王的感情的刺保持有效，无论是在旅行还是在家里总是有很好的机会的。

后来按贝特曼·霍尔维克名字命名的党，正确地说是一个集团，原先是以罗伯特·冯·德尔·哥尔茨伯爵为靠山的，这是一
67 个具有超群才干和活动能力的人。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很笨拙，对这位奋发能干的人待遇不好，因此缘故而失去地位的伯爵成了这个最初作为宫廷党派、后来作为摄政内阁[4]出现在舞台上的集团的总管。这个党派开始在报刊上，特别是通过它创办的《普鲁士周报》[5]，以及通过同在政界和宫廷人士的个人联系来发生作用。“财政筹措”，用交易所的话来说，是以贝特曼·霍尔维克和菲尔斯滕贝格·施坦海姆伯爵和阿尔贝特·普尔塔勒斯的巨额财产为依靠的，而政治任务——它的当前目的是推翻曼托伊费尔——则由灵敏的哥尔茨伯爵和普尔塔勒斯伯爵来处理。他们两个人都能写优雅漂亮的法文，而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在撰写外交文件时则主要依靠来自柏林法国侨民区的他的那些官员的平庸的手笔。普尔塔勒斯伯爵在职务上为首相所不满，因受到国王的鼓励而成为曼托伊费尔的对手。

毫无疑问，哥尔茨如果不能当曼托伊费尔的直接继承人，毕竟想迟早当一名大臣。在这方面，他比哈里·冯·阿尔宁更有资格，因为他的虚荣心较少，爱国心较多，性格较为坚毅；当然，他更容易激愤，由于他内在的能量，这成为他的实际活动中的一个负数。我曾先帮助他被任命出使彼得堡和后出使巴黎，我又将哈里·冯·阿尔宁从他担任的不重要职位上迅速地提升起来，这并非没有遭到内阁的反对，可是，我这两位在外交方面最精明强干的同事，却使我经历了像夏米索[6]诗歌中伊格兰诺在安塞尔莫身

上经历的那样的事情。

鲁道夫·冯·奥尔斯瓦尔德也谨慎地参与了这个党派，他于1854年6月到法兰克福来访问我并告诉我，他认为最近几年之内他从事的活动都已失败，愿意脱身不干；如果他能得到驻巴西公使的职位，他希望不再为内政操心了。虽然我曾建议曼托伊费尔为了自己的利益予以同意，以便用这种体面的方式使这个聪敏、细致、经验丰富和受人尊敬的人，普鲁士亲王的友人采取中立态度，但是他和冯·格尔拉赫将军对奥尔斯瓦尔德的不信任和反感十分强烈，以致内阁拒绝任命他。曼托伊费尔和格尔拉赫相互之 68
间一般说来虽然不太一致，但是在反对贝特曼·霍尔维克党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奥尔斯瓦尔德留在国内，成为反曼托伊费尔分子和亲王之间的联系的主要承担者之一。

罗伯特·哥尔茨伯爵自青年时代起就是我的朋友，曾在法兰克福争取我参加那个党派。我拒绝了，因为要求我合作推翻曼托伊费尔，我的理由是，我当时的状况是受到曼托伊费尔的完全信任才获得了法兰克福的职位，所以我认为利用我对国王的地位去推翻曼托伊费尔是不正当的，只要曼托伊费尔并没有逼得我非和他决裂不可；即或到了这一地步，我也要事先公开向他表示挑战并说明原因。哥尔茨伯爵当时正准备结婚，他告诉我说，他当前的要求是雅典的公使职位。他辛酸地补充说："应该给我一个职位，而且要一个好的；对此我不必忧虑。"

导致奥尔缪茨政策的罪责，事实上应负更多责任的与其说是普鲁士的谈判代表，还不如说至少是直到谈判代表与施瓦尔岑堡侯爵会见时对普鲁士政策的愚蠢领导；而对这一政策的尖锐批评及其后果的描述，正是冯·哥尔茨攻击曼托伊费尔和取得普鲁士

亲王同情的第一个武器。在普鲁士亲王那种士兵的情感中，奥尔缪茨协定是一块创伤，只是军人的纪律和对国王的忠诚才使他对这方面所感受到的屈辱和痛苦加以控制。虽然他对他的俄国亲戚怀有深情厚意，其最终表现就是与亚历山大二世的亲密友谊，但他还是保留着尼古拉皇帝[7]使普鲁士忍受的屈辱的感觉；他反对曼托伊费尔的政策和奥地利的影响越使他靠近早先他较为生疏的普鲁士的德意志使命，这种受屈辱的感觉也就变得越强烈。

1853年夏天，看来哥尔茨正在接近于自己的目的，虽然不是把曼托伊费尔排挤出去，但是他快要当上大臣了。格尔拉赫将军于7月6日写信给我说：

> 我听曼托伊费尔说，哥尔茨已经向曼托伊费尔声明，只有国王周围的人事发生变动，这就是说，首先要撤我的职，他才能够进入内阁。此外，我认为，我甚至可以说，我知道曼托伊费尔愿意哥尔茨进入外交部当顾问，以便在那里对付勒·科克[①]那样的另一些人（不如说为对付格尔拉赫及其在
> 69 官中的友人）形成对立平衡。现在，谢天谢地，这件事由于哥尔茨抵制而化为泡影。我推测，有一项计划正在酝酿之中（是否全部指定参与的人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整个意识到还是一半意识到，我姑且不管），就是准备在普鲁士亲王的庇护下组成一个内阁，在解除冯·劳麦、威斯特华伦、博德尔施文格的职务之后，任命曼托伊费尔当首相，拉登贝格负责宗教事务，哥尔茨负责外交，于是内阁就会在议会中形成多

① 勒·科克——普鲁士外交部的枢密顾问。——德文本注

数派，我看这并不很困难。那时，可怜的国王就会夹在议会多数派和他的继承人之间，动弹不得。威斯特华伦、劳麦是仅有的有所作为的人，他们所造就的一切重又丧失，更不用说其他的后果了。曼托伊费尔作为两次在11月[8]走运的人，而现在他也是不可或缺的人。

力图对国王的决策施加影响的各派之间的对立加剧了，在克里木战争[9]期间贝特曼·霍尔维克集团对曼托伊费尔的攻击也重又恢复起来。首相反对与奥地利决裂，反对如导向波希米亚战场[10]那样的政策，在我国和奥地利友好关系的关键时刻，表现得最为强烈。在施瓦尔岑堡侯爵时期，在此后的克里木战争和利用普鲁士来推行奥地利的东方政策[11]的时期，我们与奥地利的关系使人回想起列波累洛与唐璜[12]的关系。在克里木战争时期，除了奥地利，其余德意志各邦都努力要求普鲁士在法兰克福代表他们的利益免遭奥地利和西方强国的暴力侵犯。在法兰克福我作为普鲁士政策的执行者不由得感到羞愤交加，因为我看到，对于奥地利以并不总是有礼貌的方式提出的过分的要求我们总是牺牲自己的政策和独立的观点，步步退让。在自卑感的重压之下，我们惧怕法国，屈服于英国，于是只好乘上奥地利的拖船苟且偷安。对于我的这些印象，国王并非没有同感，但是他不倾向于通过一项有气魄的政策来摆脱这种处境。

1854年3月28日英国和法国对俄国宣战后，我们和奥地利于4月20日订立了攻守同盟[13]，普鲁士有义务无论如何于三十六天之内集结十万人（三分之一在东普鲁士，其余三分之二在波兹南或布勒斯劳），如果情况需要时，还要将军队扩展到二十万人。对 70

上述一切都和奥地利达成了协议。

5月5日，曼托伊费尔给我写了下面一封流露出愤懑的信[①]：

> 冯·格尔拉赫将军刚才通知我，国王陛下为在邦联讨论奥普同盟问题已命令阁下到这里来，而且将军先生也就此事已给阁下写过信。遵照我事前一无所知的陛下命令，谨请阁下立即前来这里。考虑到邦联议会即将进行的讨论，您在这里的停留将不会长。

在讨论4月20日条约时我向国王建议，要利用这一机会把我们和普鲁士政策从这种从属性的、在我看来是不足取的状况中解脱出来，并且要采取会使我们在德意志诸邦中获得同情和取得领导权的立场；因为这些邦国希望和我们一起并通过我们保持独立的中立地位。我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只要奥地利要求调派军队，我们表示欣然同意就行。不过提供的六万六千人或更多的军队不应配置在利萨，而应在上西里西亚，以便我们的军队可以同样轻易地越过俄国边界或奥地利边界；特别是如果我们不必太拘谨的话，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把人数增加到超过十万。如果有二十万人的军队可供调遣，在这种时候陛下就可以主宰整个欧洲的局势，决定媾和条件，并在德国获得与普鲁士完全相称的地位。

法国正忙于解决克里木问题，无力威胁我国的西部边界。奥地利可以调用的力量都部署在东加里西亚，在那里军队由于疾病造成的死亡要比战场上的伤亡更为惨重。这支军队被根据报纸所

---

① 根据原文发表，原文载本书第2卷附录第170页。——德文本注

说至少数量为二十万人的俄国军队死死地牵制在波兰。俄国军队假如向克里木进军，就会决定那里的局势，不过，奥地利边界上的军事安排看来不允许它这样做。那时候已经有一些外交家把在奥地利庇护下恢复波兰国家列入自己的纲领。这两支军队互相对 71
峙，这样普鲁士就可以通过支持其中的一方而使其占上风。英国对我国海岸可能进行封锁的危害，不会比几年以前我们遭到丹麦不止一次的同样全面的封锁所造成的危害更大，而且如果我们和德国能获得独立，解除奥地利·法国同盟的压迫和威胁以及对位于两国之间的中等邦国的暴力侵犯，那么我们就会得到补偿。克里木战争期间，符腾堡的年迈国王威廉在斯图加特一次亲密的炉边谈话中告诉我："我们这些南德意志邦国不能同时既和奥地利又和法国交恶，我们距离斯特拉斯堡太近，这是法国出击的大门，而在柏林对我们的援助到达之前，我们可能已被从西面来的人所占领。符腾堡会遭到袭击，而且我如果真心诚意地转入普鲁士阵营，那么我那遭受敌人压迫的臣民的呼救声也会把我召唤回去的；符腾堡的衬衫比邦联的外套更贴我的身"[14]。这位年迈的谨慎的君主一席话中流露的不无根据的失望心情，邦联中其他各邦或多或少的愤懑情感只有达姆施塔特除外，因为冯·达尔维克·克霍恩先生牢牢地依靠法国，这些情绪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普鲁士在上西里西亚的坚决态度证明，如果我们果断地利用他们岌岌可危的被剥夺一空的处境，则奥地利和法国当时都不能够对我们进行强有力的反抗。

我向国王陈述了我对局势和所能采取的种种措施，我这种具有说服力的意见使他不无感触。他和悦地微笑着用柏林方言说："亲爱的，这一切都很美妙，但是要我付的代价太高了。能采

取这种暴力行动的，只能是像拿破仑那样的人，我可不行。”

（二）

在班贝格[15]举行会议的德意志中等邦国[16]犹豫不决地加入4月20日条约，布奥尔伯爵制造战争状态的努力由于俄国军队撤离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17]而化为泡影，他背着普鲁士向西方大国[18]提议并于12月2日与之签订的同盟，维也纳会议的四项条款[19]，以
72 及直到1856年3月30日巴黎和约[20]的事态进一步发展过程——这些事情，济贝尔都已根据档案资料予以描述过。我对这些问题的正式态度也在《邦联议会中的普鲁士》一书中加以阐明了。关于内阁中所发生的一切，关于在不同阶段决定着国王行动的种种设想和势力，我都从冯·格尔拉赫将军那里有所听闻，下面我抄录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段落。从1855年秋天起，我们就为这种信函制定了一种类似密码的东西，用我们熟悉的村庄名称代表国家，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主人公代表人物，这不无幽默之感吧。

柏林，1854年4月24日

弗拉·狄阿沃洛（曼托伊费尔）和（炮兵总监）[21]海斯签订了一项协议，对这种协议我只能称之为败仗。我的军事上的所有估计，您那些断然指出如果没有我们奥地利就不敢同西方（即西方强国）签订一定的协议的信件，都无补于事。人由于害怕而变得胆小起来，所以我不能不同意弗·狄·的见解：奥地利可能因为恐惧而冒险跳到西方一边去，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协议是一个既成事实，现在必须像在打过一场败仗之后那样，集合四散的力量，以便再次与敌人对垒。必须指出，协议中的一切都是以双方的一致同意为依据。然而正因为如此，当前的和十分恶劣的后果是：只要我们作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解释，就有人指责我们口是心非、背信弃义。首先我们对此不应该予以理睬，随即要在发生争执之前就对此有所预料，并且在维也纳和法兰克福要赶快拿出我们对条约的解释。因为目前的情况是，强有力的、勇敢的外交大臣的手脚尚未受到束缚。我们在彼得堡独立自主地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因而能保持前后一贯并始终达到一致，通过这一方式有助于相互关系和条约中所缺乏的一切东西。对布德贝格和胡·冯·明（斯特）[①]伯爵我已尽力加以抚慰；尼布尔在这方面十分活跃和热心，举止总是很灵巧和卓越。可是修补窟窿是无济于事的，归根到底总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君主在内的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如果他和一个仆人 73
一起打中了一头牡山羊，甚至一头牝鹿，他就会把这个仆人看成是最亲近的，而对那些明白事理的忠实朋友却十分怠慢。眼下我的处境就是这样，不值得羡慕……

无忧宫，1854 年 7 月 1 日

……情况再次混乱到了可怕的程度，不过又一次成为这样：如果一切顺利，还可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如果我们不能够尽可能长久地控制住奥地利[22]，那么我们就要承担严重

① 普鲁士驻俄国宫廷的武官。——德文本注

的罪责：使成为莱茵联邦的开端和把法国的势力一直带到柏林大门口的三位一体[23]复活。现在班贝格分子[24]试图在俄国的庇护下作为三位一体组织起来，他们十分明白，改换一个庇护者是容易的事，尤其如此的是，假如英国不赶快睁开眼睛，看不到战争以及同法国结盟是糊涂透顶，那么整个曲子的尾声就会是法俄同盟……

无忧宫，1854 年 7 月 22 日

……对于德意志外交来说，既然现在如此广泛地以普鲁士为出发点，于是就展现出了辉煌的用武之地；因为，令人遗憾的是，普罗克施为他的皇帝大吹军号，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维也纳的消息毫不特殊，尽管我不否认，到最后时刻布奥尔和皇帝会分道扬镳……现在可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利用巴伐利亚、符腾堡、萨克森和汉诺威的我还不完全理解的反对法国的激情，任其消失。只要奥地利的立场一明朗，就是说，只要它明确地对西方强国表示好感，我们就应当和德意志诸邦开展最活跃的谈判，应当缔结一个各邦君主同盟，不过这种同盟完全不同于弗里德里希二世[25]时所缔结的同盟，并且要更为巩固……

夏洛滕堡，1854 年 8 月 9 日

……弗（拉）·狄（阿沃洛）直到现在十分理智，不过正如您所知道的，不可以信赖。我认为，您应该向两方面为走上正确道路发挥作用。首先，您把正确的政策尽量向您的朋友普（罗克施）解释清楚，并使他理解，现在激励奥地利同俄国作战的任何借口都已消失，然后，您应该向德意志各

邦指出他们应走之路……特别不幸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 74
国王）在慕尼黑的逗留又刺激起某些地方的德意志崇拜狂。幻想建立一支以他为首的德意志后备军，这真是一种昏乱思想，对政治会产生不良影响。路易十四曾说过："朕即国家。"陛下则更有理由说："朕即德国。"

路·冯·格

下面是内阁顾问尼布尔给我的信件，它进一步说明了宫中的情绪。

普特布斯，1854 年 8 月 22 日

……我确实没有忽视一些善良的意图，即使这些意图我认为用的不是（正确的）地方，执行的也不正确；我甚至也不否认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哪怕这种利益是同我必定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背道而驰的。但是我要求真实和真诚，缺乏这些品质就会使我绝望。我并不谴责我们的政策缺乏对外的真实性，但是这种政策应受谴责的是对待我们自己的不真实。如果我们维护了这方面的真正动机，而不是故作姿态，说什么我们政策中的某些条款始终是根据政策本身正确的基本思想产生的，那么我们的处境就会大不相同，就能抑制许多事情。我们在英法舰队来到达达尼尔海峡[26]后继续参加维也纳会议，现在最终在彼得堡支持西方强国和奥地利提出的要求，这一切的真实原因就是一种幼稚的恐惧，怕"被从 concert europeén（欧洲音乐会）[27]中赶出来"，怕"失掉作为强国

的地位"。这是些可以想到的最为愚蠢的见解：在两个强国同第三国进行战争的时候，奢谈欧洲音乐会就无异于一块毫无生气的死铁；我们具有强国地位确乎不是由于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的善意，而是应当归功于我们的利剑。除此之外，各处都流露出一种反对俄国的情感，我完全理解，而且也有同感，但是现在要想不给自己造成麻烦，就不能纵容这种情感。

一个人如果对自己都不真实，他就不会光明磊落。我们生活和行事虽然还并不似维也纳那样昏聩，在那里人们像个
75 贪睡的醉汉，一举一动仿佛他们已经对俄国宣了战似的。可是人们怎么（能够）[①]在保持中立、充当和平调解人的同时，又推荐类似海上强国提出的建议[28]呢，这是我这简单的头脑无法理解的。

下面的摘录又是引自冯·格尔拉赫的书信。

无忧宫，1854 年 10 月 13 日

……我读过全部材料并尽力进行比较和衡量之后，觉得十分可能的是，奥地利会得到不少于所要求的三分之二的票数[29]。汉诺威在演假戏，不伦瑞克亲西方强国，图林根人也一样，巴伐利亚两者兼备，国王陛下则像一根芦苇那样摇摆不定。甚至关于博伊斯特也正在流传着各种可疑的消息。加之维也纳看来已决定进行战争。很明显，武装起来进行等待这种立场是不能持久的，从财政上说是不行的，而且返回比

① 括弧中的文字为原稿所没有的。——德文本注

前进更加危险。事实上返回也不容易，我也看不出皇帝的这种决心从何而来。初看起来，奥地利似乎要比普鲁士更加容易（接受）①西方强国的革命计划，例如复兴波兰，毫无顾忌地对待俄国，等等；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不容怀疑的是，法国和英国既可以在匈牙利，又可以在意大利[30]给奥地利，而不是给我们制造困难。皇帝被他的警察所控制——这意味着什么，我最近几年才明白*——皇帝听信谎言，竟以为似乎俄国在唆使科苏特等等。他也就因此而心安理得了。警察作不到的事情由教皇权力至上论[31]和反对正统教会及反对信奉新教的普鲁士的勇气完成了。因此现在已经有人在谈论奥地利大公[32]治下的波兰王国……从这一切中应该得到什么结论？结论是必须常备不懈，以防变生不测，甚至必须准备对与奥地利结成同盟的西方强国进行战争；结论是不能信赖德意志各邦君主，等等。但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被视为软弱；但是老实说，我并不特别信赖我们的命运的操纵者。所以我们必须紧密团结起来。1850 年拉多维茨曾积极地把我们引导到的境 76
地，也正是如今布奥尔消极地从彼处造成的境地……

（无忧宫）1854 年 11 月 15 日

……至于奥地利，通过最近的谈判我终于弄清楚了那里

① 括弧中的文字为原稿所没有的。——德文本注

* 格尔拉赫指的可能是欧姆和汉特格，以及由富于想像和被高价收买的奥地利人陶芳瑙从伦敦发出的关于德国流亡者有危险图谋的报告。国王必定对这一报道的可靠性有所怀疑；他通过自己的内阁直接委托本生公使向英国警察局询问，警察局回复说，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正在为衣食而奔波，没有工夫思考谋刺。

的政策[33]。一个人到了我这种年纪，他的思虑是迟钝的。奥地利的政策（这是说基本上）不是教皇权力至上论性质的，虽然正如陛下所断定，他们在必要时还需要教皇权力至上论；奥地利也没有在东方的宏伟的征服计划，虽然它也曾乘机在那里有所收获；他们也不想要德意志皇冠。这一切都高不可攀，只不过有时当作达到目的的小手段加以利用而已。奥地利的政策是一种胆小怕事的政策，根据就在于：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形势内外交困，本国的财政处于困境，法制遭到破坏，畏惧波拿巴，担心俄国报复，甚至也怕普鲁士，怀疑普鲁士居心叵测，其实何人曾有过这种想法；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对这种政策的虚伪的辩护理由。美延多尔夫说："我的内兄布（奥尔）是个政治上的胆小鬼。他害怕一切战争，但是害怕同法国的战争更甚于害怕同俄国的战争。"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正是这种恐惧规定了奥地利……

我认为，如果考虑到处境孤立总是危险的，而国内的形势特点又说明如果使其尖锐化也很危险，因为不论弗（拉）·狄（阿沃洛）还是[34]……都不可靠，那么在我看来，只要有可能就追随奥地利倒是个聪明办法。但是与法国结成任何联盟的做法都会使这一可能性化为乌有。这种联盟，我们不论从道德上、从财政上还是从军事上都不能忍受。对我们来说，这就会是死亡，我们就会丧失我们借以生存的1813—1815年的荣誉[35]，我们就将会把堡垒让给有理由不相信我们的同盟者，我们还得养活他们。波拿巴这位七百万人的当选人[36]，就会很快找到一位具有像他自己那种法律称号的波兰国王，人们还可以为这位国王易如反掌地想得到

多少选民就能得到多少选民。

波茨坦，1855 年 1 月 4 日

……我相信，如果您在此地，我们是会一致的，即使不是在原则上，那也会在实践方面取得一致，因为我信奉圣经中的话，人们不可作恶，恶不会变成善，作恶者应堕地狱[37]。向波拿巴、向自由主义讨好就是作恶，而且依我看来 77
在现成条件下也不明智。您忘记了（一种凡是离开这里片刻的人都要犯的过失）那些起决定作用的人士。您怎么可以和一个完全没有原则、不可信赖、不由自主地被引入歧途的大臣，和一个至少可以说是不可捉摸的奇特君主玩弄那种迂回的手腕呢？请您考虑，弗（拉）·狄（阿沃洛）基本上是一个波拿巴分子[38]，请您想一想他在政变时的所作所为，以及对克韦尔文件的庇护。如果您还想知道点新东西，那么我可以告诉您，现在他在致威尔特尔（那时驻彼得堡公使）的信中竟胡说什么谁如果想利用俄国，就得参加 12 月 2 日条约[39]，以便在会谈中享有发言权……

如果维也纳的会谈有一种可能指望获得成功的转机，那么别人就会接近我们，就不会忽视我们的三十万军队。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我们总是心怀两意[40]，而且有时竟至心怀三意，结果弄得谁也不信任我们，谁也不害怕我们了。

我殷切地希望，您能到这里来，哪怕逗留几天也好，以便商定我们的方针。我凭个人的经验知道，有人只要稍长时间不在这里，便会多么迅速地堕入五里雾中。正是由于我们的环境具有个人的性质，所以书信是很难将这种环境说清楚

的，特别是如果还有些无原则的、不可靠的家伙从中捣鬼的话。每当陛下与弗（拉）·狄（阿沃洛）私下密谈时，我总会感到凄怆不悦；因为如果国王在上帝和自己的良心面前确信他的事业，那么他不仅对我、而且对许多人都要比对弗·狄更为开诚布公。可是那种密计的作风只能一方面造成软弱和欺诈，另一方面造成罕见的奴颜婢膝这样一些习俗，这种情况通常只能为世界带来严重的不幸。

柏林，1855 年 1 月 23 日

……使我感到特别沮丧的是，波拿巴主义的广泛流传，以及人们以冷漠和轻率的态度来看待即将来临的最大危险。此公[41]意欲何为，这难道如此难以识破？……而这里的情况
78 又是如何呢？国王是不会做错事的。国王我就不去说了。弗·狄是个完全的波拿巴分子……伦敦的本生和乌泽多姆不是普鲁士人。巴黎的哈茨费尔特娶了一个信奉波拿巴主义的老婆，真使他洗心革面了，连他的妹夫也认为，老的波拿巴[42]和今天的波拿巴相比，只能算作一头驴子。这种情况将来会如何呢？能否因为国王有这么一批臣仆而谴责国王呢？更不用说那些非正式的顾问了……

曼托伊费尔对待积极而进取的反奥地利政策的可以期望的赞许还不如国王。在两个人单独地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当时的上司给我的印象是，我对布奥尔·普罗克施政策中对待我们那种轻藐和有害的态度表示了我作为普鲁士人的愤怒。对此，他似乎是赞同的。但是，一旦形势要求采取行动时，一旦必须根据反奥地利

的方针采取有效的外交步骤或者哪怕是只要求保持与俄国的关系而对这个迄今一直友好的邻居不采取直接敌对的行动时，问题就尖锐化了，通常导致国王与首相之间的内阁危机。国王有时威胁说要用我或用阿尔文斯累本伯爵来取代首相。有一次，1854 年冬天，竟然用贝特曼·霍尔维克集团的阿尔贝特·普尔塔勒斯伯爵来威胁他，虽然这位伯爵的外交政策观点与我的观点直接对立，与阿尔文斯累本伯爵的观点也格格不入。

危机总是以国王同大臣重新合作而告终。在大臣职位的三个候选人中，阿尔文斯累本伯爵近乎公开宣称，在这个君王手下不再谋求任何官职。国王想派我到埃尔克斯勒本[43]去找他。我劝阻不要这样做，因为不久以前阿尔文斯累本在法兰克福已经再次对我怨恨地重复过上述声明。后来我们又见面时，他的不满已经消除，表示愿意同意陛下的提议，还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我和他一起进入内阁。不过，国王却再未和我谈起阿尔文斯累本，大概是因为在我访问巴黎（1855 年 8 月）之后宫里（特别是王后陛下）对我有些冷淡的缘故。普尔塔勒斯伯爵由于富于家财，使国王觉得“不驯服”[44]。国王的看法是，贫困和依靠薪俸生活的大臣们会比较听话。我自己在这位君王治下则尽可能地避免负责的职位，并尽力使他和曼托伊费尔和解，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才到曼托伊费尔的庄园（德兰斯多夫）去拜访他[45]。

（三）

在这种形势下，周报党[46]（人们也这么称呼他们）耍了一套双重戏法。我记得，这些大人先生们当时交换过大量的备忘录，

有时还向我介绍其内容，希望将我拉向他们一边。备忘录中提出了作为欧洲先锋战士的普鲁士应该追求的目标，这就是：肢解俄国，把包括彼得堡在内的东海沿海地区的各省[47]划归普鲁士和瑞典，肢解波兰共和国在其版图最广大时的全部疆域，剩余部分瓜分给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尽管在波兰共和国版图最大时小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曾经属于波兰。为了给这样一种纲领进行辩护，被偏爱地援引的是冯·哈克斯特豪森·阿本堡男爵[48]的理论（《关于俄国内部状况、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机构的研究》），因为他的著作指出，这三个地区连同其互为补充的产品就必然保证一亿俄国人——如果他们保持联合——在欧洲享有优势的地位。

根据这一理论，得出了培植同英国结成天然同盟的必要性的结论，同时还隐约指出，如果普鲁士用自己的军队帮助英国反对俄国，那么英国就会鼓励当时被称作“哥达政策”[49]的普鲁士政策。可以有把握地预言的、由威廉国王后来用军队在战场上争得的德国状况的形成必须有这样一些助力：在所谓的英国国民舆论的协助之下，时而同对国王和普鲁士亲王进行多余的教训的阿尔贝特亲王结盟，时而同帕麦斯顿勋爵结盟，此人在 1851 年 11 月同一个城郊激进代表团谈话时称英国是争取自由的一切人民的明智助手[50]，后来又使人写传单抨击阿尔贝特亲王是一切要求解放者的最危险的敌人。一个问题是，帕麦斯顿或者其他某位英国大臣是否愿意和哥达派的自由主义、和普鲁士宫廷里的反对党齐心协
80 力地把欧洲推入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斗中去，并且把英国的利益作为牺牲奉献在德国统一的祭坛上。另一个问题是，在没有其他大陆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仅仅凭借以科堡精神为指南的普鲁士政策，英国能否这样做——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没有人感到有必要

去加以深思熟虑，而认为最没有必要的人就是这类实验的拥护者。当时宫廷内暗中亲西方强国的政策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其一切裂缝皆被花言巧语和为了党派利益而赞同一切愚蠢的打算所掩盖。玩弄这种幼稚的乌托邦游戏的无疑是贝特曼·霍尔维克党内那些装扮成政治家的聪明才子们。他们认为，在未来的欧洲，有可能把六千万大俄罗斯人看作是废物[51]。他们认为，似乎可以随意虐待这一民族，而不致因此就会把他们变成普鲁士的任何未来敌人的可靠同盟军和不致迫使普鲁士在任何对法战争中要在后方防备波兰，因为如果不瓦解普鲁士的现状，在普鲁士各省、在波兹南、甚至在西里西亚，就不可能找到使波兰满意的解决办法。当时，这些政治家不仅自认聪明，而且自由派的报刊也这样称颂他们。

在普鲁士周报的成就中，我仍记得的有一份备忘录，据称这是尼古拉皇帝时期彼得堡外交部为指示王位继承人而制定的；在该备忘录中，把体现在来历不明的、大概于1810年①在巴黎产生的彼得大帝遗嘱[52]中的俄国政策要点应用于当前，并且使人看来俄国正忙于从事反对世界各国的颠覆活动，以便谋求世界霸权。后来有人告诉我，交给外国报界，亦即英国报界的这部精心推敲之作，是由康斯坦丁·弗兰茨提供的。

当哥尔茨和他的那些柏林志同道合者相当巧妙地干着他们的事情的时候（上面提到的文章可以作为佐证），驻伦敦公使本生却掉以轻心，于1854年4月向曼托伊费尔寄出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要求复兴波兰，把奥地利版图扩大到克里木，提埃内斯特一

① 准确地说是1812年，大概是拿破仑第一所策动。——德文本注

系[53]的人为萨克森国王，等等；备忘录中还建议普鲁士协同实现这项纲领。同时本生还向柏林报告说，如果普鲁士愿意向西方强国靠拢，英国政府将同意由普鲁士取得易北河各公国[54]；他还在伦敦表示，普鲁士政府在获得所指出的报酬的条件下，是会同意这样
81 做的。本生发表这两项声明并未得到任何人的授权。所以，虽然国王对本生很宠爱，但当他得知此事时，他也觉得事情做得太过分。于是便通过曼托伊费尔命令他长期休假，然后转为退职。在本生家族出版的本生传记中，他的备忘录删去了几处最令人不快的地方，不过删节处没有标出而已，而那些导致休假的正式信件则被复述得带有偏袒色彩。在1882年才在报刊上公布的阿尔贝特亲王致冯·施托克马尔男爵的信中，“本生的垮台”是用俄国的阴谋来解释的，并对国王的所作所为也做了轻蔑的评价。此信促成了备忘录全文的公布，并且对事实真相做了虽然是谨慎的，但却是证据确凿的说明。（《德意志评论》，1882年，第152页。）

没有人把宰割俄国的计划告知普鲁士亲王。究竟怎样才使这位在1848年之前还仅仅是在尊重和服从兄长的限度内对国王的自由主义政策和民族政策表示疑虑的亲王转变为赞成反对俄国，又是如何才使他对政府政策采取相当积极的反对态度，这个问题我是从他在一次危机期间同我的谈话中才得出真相的；在危机期间，国王召我前往柏林，要我支持他反对曼托伊费尔。我到达柏林后，立即受命去见亲王，亲王此时则因受周围人士的影响而处于情绪激动状态中，他希望我去劝说国王反俄国亲西方列强。他对我说：“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两个互相斗争的流派，一个以曼托伊费尔为代表，另一个对俄国抱友好态度的以格尔拉赫和驻彼得堡的明斯特伯爵为代表。您才来这里，是位新人，国王召见您，是

让您当个仲裁人。因此您的意见会起决定性作用，我恳求您，请您在谈话时不仅要考虑到欧洲局势的要求，也要考虑到对俄国友谊的真正利益的要求。俄国招致整个欧洲与自己为敌，最终要被战胜的。”——“全部华丽的军队”，——在俄国于塞瓦斯托波尔城下的战斗失利之后常有人这样说——“我们所有在那里牺牲的朋友”，——他列举了几个名字——“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介入并迫使俄国签订和约的话，如今还会活在人间。”[55]他又指出，结局一定是，我们的老朋友和老盟友俄国将被消灭，或者被严重削弱。天意赋予我们的任务就是强行恢复和平，即使违背朋友的意愿也要挽救朋友。

哥尔茨、阿尔贝特·普尔塔勒斯和乌泽多姆差不多是以亲王可以接受的方式，根据他们旨在推翻曼托伊费尔的政策，使普鲁士担任反俄的角色，在这里亲王妃对俄国的反感帮助了他们。 82

为了使亲王摆脱这种思路，我向他说明，我们绝对没有自身的理由同俄国作战，在东方问题上我们也没有任何利益能为对俄战争或者即使只是牺牲与俄国的长期友好关系作出辩解；恰恰相反，任何获胜的反俄战争在作为邻国的我们参与之下，都不仅会因为我们没有正当的作战理由而引起俄国的长时期的复仇感情，而且同时也会在我们面前提出十分棘手的任务，这就是要以普鲁士勉强可以忍受的方式来解决波兰问题。既然我们的切身利益不是要求而是反对与俄国决裂，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受到挑衅就去进攻我们迄今的朋友和永久的邻居，那就是因为惧怕法国或者是为了向英国和奥地利献殷勤了。我们将会扮演在英国的保护下有义务为英国进行历次战争的印度的陪臣诸侯的角色，或扮演出发参与1812年战争[56]的约克团的角色——当时我们对法国的恐惧虽然

情有可原，却强使我们变成了它的俯首帖耳的盟友。

我的话刺伤了亲王，他愤怒得红着脸打断了我的话说："这里根本谈不到什么陪臣和恐惧。"不过他并未中断谈话。谁如果得到他的信任和赏识，谁对他说话就可以肝胆相照，措辞激烈也无妨。我明白，我未能动摇亲王在家族、英国和贝特曼·霍尔维克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坚定信念。贝特曼·霍尔维克党对他的影响，我或许可能加以克服；但对于亲王妃的影响，我则无能为力。

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如果我的记忆是正确的，正是这一战争之故，长期盗窃电报的行径才为世人所知。几年以前，一个穷困潦倒的警察密探[①]施展了他的狡猾伎俩：在布勒松伯爵担任法国驻柏林公使期间，一天黑夜他游过施普累河，潜入在莫阿比特的伯爵别墅，抄录了他的文件。现在他又受到曼托伊费尔大臣的指派，要通过一些被收买的仆役把文件夹弄到手，文件夹里面放着收到的电报以及国王、格尔拉赫和尼布尔之间有关电报的往来书
83 信，并且要将文件的内容作成复制本。他得到了曼托伊费尔的普鲁士式吝啬的报酬后，便找寻机会进一步设法出售他费力弄到的东西，他通过另一个密探哈森克鲁格的介绍，先在法国公使穆斯蒂埃、后在其他人那里找到了这种机会。

在这个密探的主顾之中，也有警察总监[57]冯·辛凯尔迪。有一天，他拿着一封信的抄本来见冯·格尔拉赫将军，在这封信里将军曾向某人，可能是尼布尔写道："现在国王和一批显贵正在施托尔岑费尔斯，去到那里的有某某、某某、其中有辛凯尔迪。圣经上说：尸之所在，群鹰集焉[58]；现在可以说：鹰之所在，腐户集

① 铁辛（Techen）。——德文本注

焉。”辛凯尔迪请将军解释一下含义，当将军问他如何得到这封信时，他回答道：“这封信花了我三十塔勒尔。”格尔拉赫说：“真太浪费啦！给我三十塔勒尔，我可以给您写十封这样的信！”

（四）

我对于普鲁士参加巴黎和平谈判所发表的正式意见，可以用我给格尔拉赫的下列信件加以补充。

法兰克福，1856 年 2 月 11 日

我一直希望，我们会采取比较坚定的立场，直到他们决定邀请我们参加会议；即使得不到邀请，我们也不要从这一立场上后退。依我之见，这是促使他们邀请我们参加的唯一办法。可是根据我昨天得到的指示，我们准备立即多少带有保留地同意那种规定我们和邦联[59]有义务支持初步协议的措辞。如果西方强国和奥地利只在初步协议草案上签了字之后才从我们那里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在会议上为什么还要为我们操心呢？人们更愿意趁我们不在场的时候，根据需要和意愿利用我们和邦联中的其他中等邦国在邦联中所表示的附着力，并且深信，只要提出要求，我们无不屈从。对这伙人，我们真是太善良了。我不应该批评国王陛下和我的主管人员的决定，因为决定已经通过（2 月 12 日）；可是我总是身不由己地会对此进行批评。在接到表示退却信号的这一指示后，我有一天一夜不断发作呕吐，而且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低烧。我发现只有回忆起 1848 年春天我才处于类似的身心状 84

况；我对形势越是清楚，就越难找到可以树立我的普鲁士人荣誉感的东西。在八天以前，我以为一切都已确定不移了，我自己还曾请求曼托伊费尔让奥地利在我们可以接受的两项建议中加以选择，却做梦也没有想到布奥尔伯爵会把两者都否定掉，甚至还要规定我们对他的建议应该如何作复。我曾经希望，不管我们的回答最后如何，在我们保证参加会议以前，我们决不能任人摆布。然而我们眼下的处境又如何呢？奥地利在两年之内四次玩弄把戏，要我们退出我们的全部阵地，我们稍作抗拒之后就让出一半或差不多一半。现在涉及的已是普鲁士还可勉强立足的最后一平方英尺阵地了。奥地利因为取得成就而趾高气扬，现在不仅要求我们（我们还自称是强国并要求二元政体的平等权利）把这最后剩余的独立地位也为它牺牲掉，甚至还指令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词句来放弃权利，而且粗暴地以小时计来催逼我们，拒绝给予我们任何可以当作治疗创伤的补偿。在普鲁士和德国应当发布的声明中，我们不敢坚决要求做一点修改。普福尔滕正在与奥地利商谈事务，因为他认为，事先就可以指望普鲁士同意，只要巴伐利亚说了话，那对普鲁士来说就是已决事件。最近两年，至少是在开始时，我们曾在类似的情况下向德意志各个宫廷提出一项普鲁士的纲领，但是在我们同奥地利达成协议以前，它们之中没一个作出决定。现在巴伐利亚正在和维也纳达成协议，而我们则同达姆施塔特和奥尔登堡凑成了杂乱的一伙。这样一来，人家那时向我们索取什么，我们便得交出最后的东西。而他们一旦把邦联议会决议连同普鲁士的表决票装入了口袋，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布奥尔怎

样地耸耸肩膀表示惋惜说，没有办法克服西方强国反对我们参加会议的抵抗。根据我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因为当我们为了得到一张参加会议的入场券而必须牺牲我们政策的最后一点残余时所必然感到的不满情绪，正中俄国人的下怀。除此之外，俄国人显然担心我们作为“调解者”会去支持他们的敌人的政策，这种担 85
心胜过指望我们在会议上给他们什么支持。布隆诺夫虽然在外交上老奸巨猾，但我和他的谈话以及我见到的彼得堡信件，毫无疑问都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争取参加会议的唯一手段，现在和将来都是保留我们关于奥地利提案的声明。如果人家已经把邦联议会决议连带我们都装在口袋里，那么人家何必还在会议上同普鲁士争吵呢？如果我们不在那里，奥地利当然懂得如何解释决议。从奥地利政府报刊和莱希贝克的举动便可以看出，奥地利现在已经把奥地利·巴伐利亚草案中微不足道的保留严格限制在第五款*里了。对交战国将要提出的特别条件，我们和邦联都可以进行自由判断，但对奥地利提出的条件则不行；至于对四点条款的解释，则有一种假定：认为普鲁士和德国早已同意了作为代表它们的保护国奥地利的观点。这一假定得到了证实，因为我们以前因此而要求的保留条款已被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否决了，于是我们只好罢休。

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整套计划打乱，在我们认为时机到来

---

* “根据欧洲的利益，参战列强保留属于它们的权利，可以提出四点条款之外的特别条件。”

之前，我们就决不表态。只要他们还需要我们并争取我们，我们就采取这一态度。这里未必有人会采用多数票表决的办法来压我们，就连萨克森和巴伐利亚采取的立场也只是因为“假定”我们同意了奥地利的提案；他们已经习惯于我们终究会让步这种常例，所以他们作出这种推测。但是如果我们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意见，别人就会认为在解决德国政治问题时需要费心等待普鲁士的声明。如果我们坚持要求推迟作出决议，并把这个想法向德国各官廷说明，那么现在就会有相当多数的邦国站在我们这一边，即使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可能完全投靠布奥尔也罢，不过后来事情并非如此。

86 如果我们对此不愿意冒险，我们就必须准备让撒丁和土耳其在巴黎就邦联通过的两点提案自主地讨论保护德国利益问题，在此期间是奥地利在代替我们处理一切。我们甚至还不配充当奥地利的头等跟班，因为布奥尔伯爵在为德国执行假定的全权使命时宁可听取普福尔滕和博伊斯特的意见，而不理睬他个人所痛恨的曼托伊费尔；一旦他争取到萨克森和巴伐利亚，那么他在邦联议会决议之后就将比决议之前更少地顾及普鲁士的反对了。

但愿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不再出现，我们宁愿以欧洲大国的身份直接同法国和英国谈判我们参加会议的问题，而不是像一个未成年的人那样要在奥地利的监护下才能做这种事，也不是为了在会议上仅仅成为布奥尔箭匣中的一支箭，难道我们不该这样做吗？……

冯·俾

这封信中所叙述的奥地利在形式上和事实上都藐视我们以及我们不能容忍这种轻视态度所造成的印象，在以后普奥关系的发展上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87

第六章　无忧宫与科布伦茨

给国王和普鲁士亲王的那些备忘录被哥尔茨集团[1]当作同曼托伊费尔作斗争的工具，又被报界和外国外交官们所利用，它对亲王产生了影响——这一切我深信不疑，因为我在其中发现他谈到哈克斯特豪森关于三个区域的理论[2]。

比贝特曼·霍尔维克集团的政治论据更强烈地对亲王产生影响的是亲王妃的亲西方强国的意识，从而造成他与自己兄长的某种对立；这种对立其实与他的军人本能是格格不入的。奥古斯塔亲王妃从她在魏玛的青年时代直到去世，一直保持一种信念，认为法国的、特别是英国的杰出人物和权威人物都要比我们本国人高明。在这一方面，她真是具有显示了我们民族特性的德意志气质，这种特性可用一句德国辛辣的俗话加以表述："不是远方来的东西所以不好"。虽然在魏玛的极乐净土[3]上产生过歌德、席勒和其他伟人，但是这个在智慧上特出的名城仍然摆脱不了至今压在我们民族情感上面的沉重负担，即：一个法国人，特别是一个英国人，由于他的出生和国籍就会比德国人要高贵，而巴黎和伦敦舆论的赞赏要比我们自己的认识更能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的价值。奥古斯塔皇后虽然富有才智，虽然她在各个领域中充满责任心的活动赢得了人们对她的赞颂，但是她毕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

偏见。一个能说流利法国话* 的可靠的法国人就使她敬服；一个英国人，只要没有反证，都可望在德国被当成高贵的人。七十年前，魏玛风尚就是这样，这种风尚的残迹我在公职活动中也曾常常感觉到。大概在谈到的那个时期，普鲁士亲王妃为她儿子和英国联姻所作的努力，加强了使哥尔茨及其友人力求把她丈夫引向这一方向。 88

克里木战争把亲王妃扎根于童年时代的、以前没有显露出来的对俄国的一切事物深恶痛绝的情感表露无遗了。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宫廷舞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她这位年轻美貌的妇人，她在选择舞伴时总喜欢跟外交官跳，也包括俄国外交官，让那些舞技不如口才高超的人在光滑的镶木地板上一试他们的本领。她后来表现出来对俄国的明显而强烈的反感，是难以从心理上加以解释的。对于她的外祖父——保罗皇帝[4] 被暗杀的回忆，也难以有这样经久不衰的影响。这可能是母亲、她的俄国宾客和女儿之间的意见不一致造成的：魏玛大公夫人是一位天赋才能很高的母亲，在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上都是一个俄国人；而成年的女儿性情活跃，在自己的同伴中间总喜欢扮演领导角色；也可能是对于专横显赫的尼古拉皇帝有特异的反感造成的。总之有一点是确确实实的：这位高贵的妇人的反俄情绪就是在她当王后和皇后时期，也使我在陛下驾前执行我认为必要的政策时常常遇到严重的阻碍。

给予贝特曼·霍尔维克集团[5] 以重大支持的是冯·施莱尼茨先生，他是亲王妃的政治专家，从他这方面来说促使他反对曼托

---

* 她的诵读官（热拉尔）可以算做法国间谍！

伊费尔的原因是：因为他被解除了在汉诺威[①]的一个十分良好的职位，虽然在职时他并不显得十分热心公事；而且他的公使薪俸延期到他当了大臣之后才支付给他。他作为不伦瑞克一位大臣的儿子和职业外交官，习惯于宫廷生活和外事官员的外在的优越地位；没有财产，在职时又受到屈辱，但却受到亲王妃的宠信，因此他就自然而然地为曼托伊费尔的对手们所物色，他也愿意向他
89 们靠拢。他是“新纪元”[6]的第一任外交大臣，死时是奥古斯塔皇后的宫廷大臣。

在早餐时，亲王妃向她的丈夫报告情况，有时提供为此目的编集的书信和报刊文章。亲王的这种习惯后来当了威廉皇帝时仍然保留下来了。我曾偶然指出，某些信件可能是根据王后的安排由施莱尼茨撰写和张罗的，却遭到了十分激烈的反驳。国王以一种骑士精神为他的夫人作保证，虽然情况很清楚是反对她的。即便是事实，他好像也绝不容人相信竟有这样的事情。

我从来不认为把任何引起不满的琐事向本国报告是驻友好国家宫廷的使节的任务；特别是当我在彼得堡受到一种信任的礼遇的时候，如果也以这样的信任给予驻柏林的外国使节，我认为那是冒险行为。任何可能引起我们和俄国之间不满的报告，都会被王后的当时的和通常的反俄政策利用来疏远我们同俄国的关系，不管这是出于反俄情绪和为得众望而作出的临时打算，还是出于讨好英国和一种设想：即讨好英国，甚至讨好法国，比讨好俄国更能显示出一种较高的文明程度和教育程度。

---

① 他在1848年6月作为普鲁士的代表被派到那里；1849年他进入勃兰登堡内阁当外交大臣，一直任职到1850年9月。——德文本注

1849 年普鲁士亲王作为莱茵省总督把自己的常驻官邸迁往科布伦茨[7] 之后，无忧宫和科布伦茨两个宫廷的双方关系渐次发展成为一种隐蔽的敌意，在这中间从国王这方面说妇女的因素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程度要比亲王方面受妇女的影响小。伊丽莎白王后的有利于奥地利、巴伐利亚、萨克森[8]①的影响是直率的和公开的，这当然是观点一致、家族间相互同情的亲戚关系的结果。王后和冯·曼托伊费尔大臣之间不存在任何个人的同情，这是由于他们性格的不同造成的；虽然这两个人时常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对国王的影响都同样是有利于奥地利；可是在王后方面，她在决定性时刻的影响则只限于姻亲和王后的感情为了她的夫君的王位的利益所涉及的范围。对于国王威信的关切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其表现形式与其说是鼓励国王采取行动，不如说是由于女人 90
的怯懦而惧怕自己观点造成的后果，因而也就不再作进一步的影响。

亲王妃在科布伦茨居住期间还形成了一种习气，一直到她生命终结都对她的政治活动产生了影响。

天主教对于北德意志人，特别是对于纯粹新教徒居民中心的小城镇的思想见识来说是陌生的，但对于这位王妃来说，却有某种吸引力，因为她对外国的一切比对近在身边的、日常所见的、本乡本土的东西更感兴趣。在她眼里，一个天主教主教要比一位路德教会教区总监[9] 更为高贵。对于天主教事物的某种程度的好感，以前在她身上就已经有过，例如在选用宫中男性侍从和仆役

① 伊丽莎白王后的同胞姊妹阿玛利娅，同萨克森的约翰亲王（后来的国王）结婚；同胞姊妹中的一个妹妹索菲娅同奥地利的弗兰茨·卡尔大公（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父亲）结婚，另一个妹妹玛利娅同萨克森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结婚。——德文本注

方面已有所显露，这种好感通过她在科布伦茨居住而有了充分发展。她习惯于自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古老的主教权威管辖地区[10]和教职人员的地方利益。以历史传统为基础的现代教派的自信，使亲王身上的对新教的同情常常明显地流露出来，对此他的夫人感到格格不入。她在莱茵地区争取人心的努力成效如何，可由冯·德·雷克·福尔默尔施泰因于1863年10月9日给我的信来说明；信中写道：莱茵河畔的善良人们都建议，国王可以不必前来参加大教堂落成典礼，倒可以恭请王后光临，“她一定会受到竭诚欢迎”。她竭尽全力支持教会意愿的一例便是：在修建所谓的麦茨铁路时，测定的线路要碰到一个天主教教会安排的一个墓园，于是皇后又卓有成效地予以支持，以致改变了线路，并为此目的不得不进行繁重的建筑工程。

1877年10月27日，国务秘书冯·毕洛夫[11]写信告诉我，皇后要福尔克大臣拨给一个教皇权力至上主义者画家旅行费；而画家本人不仅并不想提出这一请求，而且他还正忙于作颂扬马尔品根[12]的画。1878年1月25日他又给我写道：王储在起程（前往意大利）以前，同皇后发生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争执，皇后要求他这个八百万天主教徒的未来统治者去拜会年高望重的教皇。[13]在王
91 储回来去见皇帝时，皇后也从她的内室走来。当谈话转到关于翁伯托国王[14]立场的问题而使她不悦时，谈话便中止了，她站起来说：“看来我在这里是多余的”。后来皇帝十分伤感地对王储说：“当时在这些事情上你母亲又失掉了克制力。”

在使这种宫廷斗争复杂化上起辅助作用，还有亲王妃与冯·克莱斯特·雷措夫省长的不和。省长住在皇宫第一层，在亲王的房间的下面，省长身上的一切——他的外貌，他作为一个极

右派演说家，以及他每天和家人祈祷时还要唱赞美歌的乡巴佬习气，都使亲王妃十分厌恶。省长处理公务比处理宫廷关系更内行，他认为他在宫中和宫中花园的存在是代表国王的特权，以便和他所谓的亲王对王朝事务的过多插手相抗衡；而且他虔诚地认为，在经济上利用宫中房产方面，如果他不针对王储宫廷的要求而在王储夫人面前尽力坚持他作为一个省长的要求的话，便是有损于国王——他的君主。

无忧宫参谋总部[15]长官在冯·劳赫将军死去后是列奥波德·冯·格尔拉赫，而他的助手（有时也是他的对手）是内阁顾问尼布尔和埃德温·冯·曼托伊费尔，在克里木战争期间还有明斯特伯爵。除此之外，属于宫廷党[16]的还应该算上安东·施托尔贝格伯爵，弗里德里希·楚·多纳伯爵和冯·德·格勒本伯爵。

在亲王宫中，致力于维护国家利益以防止由于女人影响而造成祸害的人士，是坚定而干练的古斯塔夫·冯·阿尔文斯累本，虽然他不同意政府的政治措施，但却竭尽全力促进两宫和解。他同意我的观点，即必须在战场上解决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敌对的问题，因为不可能有别的解决办法。他曾在波蒙和色当指挥过第四军团，他的弟弟康斯坦丁在维昂维尔和马斯·拉·图尔自主地作出决定，在麦茨城前挡住了法国的莱茵部队[17]，两人都是将军的典范。有一次我有机会问他，照他看我们和奥地利人之间的第一次决战结局将会如何，他回答道："会打得他们人仰马翻。"他的信心增加了我在1864年和1866年的困难决策时的勇气。考虑国家大事、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考虑问题的阿尔文斯累本对亲王 92
的影响和亲王妃对亲王的影响这二者之间的对立，有时使他十分激愤，他当时发泄感情所说的话我不便在这里重复；一位具有爱

国心的士兵对玩弄政治的女人的全部怒火，却是用近乎对刑事犯判罪的语言表达的。亲王面对他的夫人在自己身边保留这位副官，是他的固有特性的产物，这种特性在他当了国王和皇帝之后仍然保持着，这种特性就是：对于忠实的仆人来说，他是忠实的主人。

第七章　来往于法兰克福和柏林之间 93

(一)

在我的维也纳的使命完成之后，由于克伦策等人[1]搬弄是非，在曼托伊费尔大臣和我之间产生了隔阂，其后果是，国王在这位大臣不顺从他的意志时就越来越频繁地召我来柏林以便对他进行“恫吓”。我途经龚特斯豪森在法兰克福和柏林之间旅行，一年之内行程二千英里。旅途中我总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或是酣睡一觉。国王不仅就德意志政策和外交政策征求我的意见，偶尔在外交部向他呈报草案时，他也指令我制定出对策。之后我总要把国王的这一指令和我提出的方案同曼托伊费尔商议，他通常避免提出修改意见，即使我们的政治观点是分歧的。他宁可迁就西方列强和奥地利的意愿。而我，并不代表俄国的政策，却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为了别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普鲁士的利益，使我们同俄国多年的和平关系成为问题；我还认为，如果普鲁士为了与我们不相干的利益而反对俄国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惧怕西方列强和对英国卑躬屈膝的结果。曼托伊费尔避免由于明显地主张自己的观点而更加激怒国王，也避免由于支持我主张的所谓亲俄的见解而刺激西方强国和奥地利，他宁愿不露真情。穆斯蒂埃侯爵知

道他的立场，我的上司就此托给他这样一项任务：说服我转向亲西方列强的政策，并在国王面前维护这一政策。有一次在我访问穆斯蒂埃时，他竟情绪奔放地说出这样带威胁性的话："您奉行的政策会把您引到耶拿[2]"，我对此回答说："为什么不引到莱比锡[3]
94 或者罗斯巴赫[4]呢？"穆斯蒂埃不料在柏林竟有人对他以这样独立的口气答话，他默然不语，气得脸色发白。沉默片刻后我又说："总而言之，每个民族打仗都有胜有败。我来不是为了和您研究历史的"。以后的谈话就不再融洽了。穆斯蒂埃在曼托伊费尔那里抱怨我，曼托伊费尔又把他的埋怨告诉了国王。可是国王却对着曼托伊费尔赞扬我，后来又直接赞扬我，因为我对那个法国人的回答很对。

贝特曼·霍尔维克党最有能力的活动家哥尔茨、普尔塔勒斯，有时还有乌泽多姆，通过普鲁士亲王而在国王处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有些紧急的电报不是由曼托伊费尔，而是由阿尔伯特·普尔塔勒斯伯爵起草，国王又把电报草稿交我审核，我又和曼托伊费尔商讨修改意见，他又请来副国务秘书勒·科克，科克仅从法文修辞学的角度推敲措辞，电报一拖就是整整一天，他借口说还没有找到完全恰当的法文词汇——即还未确定暗淡的、不清的、怀疑的和疑虑的等词汇之间的细微差异，好像这些琐碎细节就是问题的症结。

（二）

我想方设法以巧妙的方式摆脱国王让我扮演的角色，并尽可能为他和曼托伊费尔之间的谅解开辟道路；在关于里诺·克韦尔

产生的严重龃龉中，情况就是这样。由于恢复邦联议会[5]而使普鲁士的民族的分离主义的努力暂时受到阻碍之后，人们在柏林开始整顿内部秩序，而国王却犹豫不决，生怕疏远了其他德意志各邦的自由派分子。但在整顿的目的和步骤上，曼托伊费尔大臣和“虽然小但是有威力的党”之间立即出现了意见分歧，这种分歧竟在去留一个相当次要人物的争论中尖锐化起来，并演变成为一场公开而猛烈的斗争，真是咄咄怪事。在1851年7月11日通知任命我为驻邦联议会公使的同一封信中，曼托伊费尔写道①：

95 至于我们的内部关系亦即有关邦议员的事务，如果人们处理得较有分寸、更为巧妙的话，那么情况的发展会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威斯特华伦在这些事情上是高明的，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我同他的见解基本上一致。在我看来克吕措夫②的文笔尚欠畅达，从形式上看无疑有某些可以避免的错误。而《十字报》[6]在此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就更令人不快了。它不仅以笨拙而伤人的方式庆祝胜利，而且还好走极端，这种走极端的态度给他们自己也未必带来愉快。例如，假定有可能并且的确成功地恢复了纯粹的联合省议会（连同他的一切后果）[7]的话，——再进一步毕竟已不可能——那么这样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我认为，如果政府在一种彻底的机构上的改革成为必要前，把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搁置起来，那么政府的地位会有利得多。我希望并期待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废止

① 这封信在第1版中是按照一个有错误的副本印行的，这里根据原稿做了校正；参看《回忆与思考》第2卷第7页及以下各页。——德文本注

② 内务部监督。——德文本注

省区议员代表制而恢复依据古老的历史境界而定的自治区议员代表制（这种历史境界在莱茵省[8]还没有泯灭，而在所有古老的省份则依然清晰可辨），而邦国的代议机关也应该从这一制度中产生。但是这种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怎么也免不了有重大冲突，不过冲突还是有理由避免的。现在《十字报》正式向我挑战并要求辞退克韦尔作为我屈从的代价和标志，却不考虑：即使我想抛弃一位勤劳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这不是我的本意），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根本不能作此等事情。

里诺·克韦尔原来是新闻记者，曼托伊费尔早在埃尔富特议会期间就已通过他在报刊上为自己的政策进行过辩护。这个人思想丰富和充满激情，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写得一手好文章，但是过分追求虚荣。以曼托伊费尔和克韦尔为一方，以《十字报》和宫廷党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情况以及全部复杂内情，从格尔拉赫下列这些书信内容中可以明显看出：

96

波茨坦，1852 年 5 月 17 日

曼托伊费尔不把克韦尔赶走，就不会有好结果……我认为曼托伊费尔是一个正直的人，可是他的政治经历却是特殊的。他签署过十二月宪法[9]，赞同过联盟政策[10]，坚决地实施过村社条例[11]和赎免法[12]，大赦了波拿巴主义者等等。在所有这些事情中，他都不是贯彻始终的，而这倒给他带来声誉；可是即使陛下说过，贯彻始终的精神在一切美德中最不足道的，那曼托伊费尔的有始无终毕竟也有点过分了。有人发言

反对议院和立宪主义。从十八世纪中期以来到现在，除了改革[13]以前的议院制英国以及普鲁士（1823 年和 1847 年[14]有短期间隔）外，所有的政府都是革命的。《十字报》在它的小小的议院辩护书中实在不无道理，而我们的首相却还向往绝对没有前途的波拿巴主义。

此外，曼托伊费尔昨天说，他想请您到这里来；但愿您能准时到来，以便认识一下皇帝[15]和涅谢尔罗迭伯爵。可是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请您使曼托伊费尔摆脱克韦尔，因为曼托伊费尔现在还是不可缺少的，而和克韦尔搅在一起便没人问津了。他会轻而易举地宣布关于这一篇报纸文章他连知道也不知道，是的，他与《时代报》[16]没有关系，可是这样也仍不能了结，因为梯勒（编辑）就是克韦尔和曼托伊费尔指派的。我也担心小曼托伊费尔的拥护绝对专制主义的游移不定的意志。

1852 年 5 月 19 日

由于您上次写给我的信中提到的那篇文章①的缘故，曼托伊费尔又受到了多方面的压力，为的是说服他和克韦尔分离。我没有参与这件事，因为我和他关于这个人相互谈论过，那时我们之间似乎成立默契，再不谈及这个题目。可是昨天曼托伊费尔本人却和我谈起此事，最坚决地为克韦尔进行辩护，还声称宁可去职也不和他分离，毫不隐讳地表示了对《十字报》的痛恨，而且对内务部的活动和我们都同样敬

① 《俾斯麦致路·冯·格尔拉赫将军书信集》第 30 页。——德文本注

重的几个人还说了几句很不得体的话。

97 无忧宫，1852 年 7 月 21 日

我刚才收到您在 6 月 25 日和 7 月 19 日发自奥芬·法兰克福的信①，书信从头到尾都使人兴味盎然。可是关于您要求我的事却难以完成。您希望我说明这里的局势，这里的局势如此混乱和错杂，以致就是你身临其境也大惑不解。只要瓦盖纳[17]不想使自己完全与党隔绝，他对曼托伊费尔的攻击就无法加以解释。像《十字报》这样的报纸也只有在其全党成为反对派之后，才敢于反对一位首相，就像拉多维茨那时的情况那样……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是不可继续的了。瓦盖纳 nolens volens（不管愿意与否），不得不与《普鲁士周报》[18]合唱一个调子，这是很坏的事；辛凯尔迪和小曼托伊费尔原是死敌，也会因为《十字报》而联合起来，就像伊罗德和彼拉多因为耶稣[19]而联合起来那样。我觉得最可悲的是曼托伊费尔大臣了，这个人难以保留，但又必须保留，因为他那些可能的继任人简直令人吃惊。人们都大声疾呼，要他免去克韦尔的职务。我认为这也没多大好处可言。可能接替克韦尔的康斯坦丁·弗朗茨也许更糟糕。如果曼托伊费尔自己不和正派人士联合起来，那对他是帮助不了什么的……

无忧宫，1852 年 10 月 8 日

……我利用曼托伊费尔对他的亲信的奇特举止，利用任

① 《俾斯麦致路·冯·格尔拉赫将军书信集》第 32 页。——德文本注

命拉多维茨[①]的机会，和曼托伊费尔开诚布公地谈过话，可是一无所获。我告诉他，我不属于那些想使克韦尔处于不幸境地的人，但是他，曼托伊费尔，不管怎样应和正派人接触，并和他们合作，巩固自己的地位。结果是白费唇舌。现在他又和波拿巴分子弗朗茨一起活动了。对于瓦盖纳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对他刚愎自用，不肯听从任何劝告和忠言，我不愿意加以辩护，但有一点他是正确的，即他认为曼托伊费尔是在把保守党从根本上毁掉，而且也把他瓦盖纳激到了极点。德国唯一受到迫害和查封的报纸就是《十字报》，这实在令人惊讶。关于这一切之中最使我惴惴不安的事就是这种局势对陛下的影响，我就完全不想多说了。还是请您考虑用什么办法来罗致人才加强内阁吧。请您再到这里来一次，亲眼看看这里的局势……

夏洛滕堡，1853 年 2 月 25 日

……最近我曾提请陛下注意，如果为了正义事业把一切置之度外的瓦盖纳于近期监禁入狱，而他的对手克韦尔反而不过是靠着惯性力就当上了枢密顾问的话，那总是不公道的吧。尼布尔成功地使国王和瓦盖纳和解了，虽然瓦盖纳依然 98
想拒绝编辑《十字报》……曼托伊费尔倾向下面克韦尔、勒文施坦等人的意向，因为他对于从上面来的真实情况总是满腹狐疑，不肯相信。他用彼拉多的话说道："真理是什么呢？"[20]然后便到克韦尔和同党那里去寻求真理……在克韦尔

① 任命为军事教育机构的领导人。——德文本注

的运动下，曼托伊费尔现在每有机会就刻毒地、隐蔽地和消极地跟着别人攻击起威斯特华伦及其一切措施来了，而这些措施在1848年以来我们国家行政管理中是最好的和最大胆的。曼托伊费尔竟容忍克韦尔利用报纸极其无耻地攻击威斯特华伦、劳麦等人，而且有人告诉我说，为此他还索取代价……几乎不用怀疑，克韦尔及其同党有朝一日会导致曼托伊费尔的垮台，我以为那就很不幸了，理由很简单，我看不出谁是可能的继任人。

波茨坦，1853年2月28日

……我竭尽全力把《十字报》保持下来，或者确切点说，给《十字报》保留瓦盖纳。他说，面对克韦尔的阴谋，他不能继续干下去。由于曼托伊费尔的信任，他支配着国王的金钱，从中他给瓦盖纳的合作者们优厚的酬金，并把他们从《十字报》夺走；甚至听说在他的建议下还要求驻外使节们提供《十字报》驻外记者名单，以便离间他们使之离开《十字报》……

1853年6月20日

……国内情况使我很不高兴。我担心克韦尔会战胜威斯特华伦和劳麦，原因很简单，因为曼托伊费尔在国王面前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为不可缺少的，而国王出自于正确的和不正确的理由竟也赞同这种见解……

夏洛滕堡，1853 年 6 月 30 日

……如果我对比关于克韦尔搞阴谋诡计的各种的消息；如果我注意到克韦尔和霍尔维克党签订了协定，按照这一协定对曼托伊费尔采取宽容态度，而对其他不喜欢的大臣劳麦、威斯特华伦、博德尔施文格则加以肆无忌惮的攻击；如果我还注意到曼托伊费尔在他与普鲁士亲王的关系问题上对我怀有恶意，现在他对尼布尔比对我更亲热，而平时他总是在我面前抱怨尼布尔；如果最后我注意到，克韦尔直截了当地把普鲁士亲王及其公子看作是同他自己和曼托伊费尔意见一致的（我从最可靠来源得知），他还对此津津乐道，而凡 99
此种种都着眼于拉多维茨（原文如此），那么我觉得我脚下的土地动摇了，虽然未必能够把国王卷入这种纷扰中去，而且对我个人来说，谢天谢地，这一切都还算无关紧要。可是您呢，我尊敬的朋友，您还年轻，您必须积蓄力量准备斗争，为了拯救祖国，在适当的时刻撕穿这一谎言的罗网……

无忧宫，1853 年 7 月 17 日

……现在已经有人奉承克韦尔了，一些达官贵人聚集在他的客厅之内，坐在他家的沙发上。另一方面，我认为有朝一日曼托伊费尔把克韦尔一脚踢开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感激之情决不是这位满腹狐疑因而常感绝望的政治家的固有特征。一旦曼托伊费尔离职，将会怎么样呢？再组织一个内阁当然可以，可是要组织一个能与陛下共事哪怕仅只四个星期的内阁也未必容易。由于这种原因，再加上我对曼托伊费尔

怀有诚挚的敬爱，所以我不忍心带头去推翻他。对这些事情请您考虑一下，并请赐复……

在写了这最后一封信以后不久，国王和曼托伊费尔之间的关系就急剧地紧张起来，曼托伊费尔一气之下返回了他在德兰斯多夫的庄园。为了把他造就成一个“驯服的大臣”，这一次国王决定不用我这个大臣候选人去吓唬他，而是命我去拜访正在埃尔克斯累本的阿尔布雷希特·冯·阿尔文斯累本伯爵这个国王称之为“吃云雀老手”的人，并询问他是否愿意领导一个新的内阁，在这个内阁中由我主管外交部。伯爵不久以前以对国王十分不敬的口气向我说明，只要国王主持政府，他决不参加任何内阁[21]。我把这话告诉了国王，我的旅行随即取消。后来当重又显露出这种动向时，阿尔文斯累本还是表示同意组阁了；但这时国王却已和曼托伊费尔言归于好，曼托伊费尔也答应“服从”。我没有去埃尔克斯累本，而是主动到乡下曼托伊费尔的庄园，劝说他和克韦尔一刀两断，并且不必向国王作解释，而径自重新担负起自己的职责来。他以1851年7月11日信中的精神回答说，他不能够把一个勤勤恳恳、忠心耿耿为他服务的人抛弃。因为我认为曼托伊
100 费尔还有爱惜克韦尔的其他原因，所以我说道：“请您赋予我使您摆脱克韦尔的全权，但我要做得不致使你们两人决裂；如果我能成功，您就可以向国王报告克韦尔已经去职的消息，并继续做您的事，好像国王和您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和一样。”他同意这个想法，我们又商妥，由他促使当时正在法国旅行的克韦尔在返回途中来法兰克福拜访我。他果然来了。我利用了国王起用阿尔文斯累本的计划以尽力说服克韦尔，使他相信，如果他不离职，将

要承担他的保护人垮台的罪责，并建议他趁着为时尚不晚的时候赶快利用保护人的权力。我对他说："您要趁机行事，事情不会这样长此下去。"我逼问他，让他说明他的愿望：他是想去哥本哈根总领事馆并望大大增加薪俸。我告知了曼托伊费尔；看来这件事情已经了结，但是事情的最终解决还是拖延了一段时间，因为柏林的那些人很不精明，克韦尔还没离职就公布了曼托伊费尔的地位得到巩固的消息。克韦尔回到柏林之后，发现他和曼托伊费尔的地位并不像我所描绘得那样不巩固，便制造了一些困难，从而更有利于他被任命去哥本哈根的事。

对于那些法国公使馆里盗窃电文的密探也不得不举行类似的谈判，其中包括哈森克鲁格；在审讯这次盗窃案期间，法国警察看来是取得了他本人的同意后才逮捕了他，并把他扣留起来，直到案件被人遗忘。

当时国王怨恨曼托伊费尔，和他交往时一反常态，失去了他所特有的文雅风度，谈论他的话语也尖酸刻薄。他一般地怎样看待一个大臣的地位，表现在他说的关于阿尔贝特·普尔塔勒斯伯爵（有时此人也被用来吓唬曼托伊费尔[22]）的一句话中："凡没有三万帝国塔勒[23]额外收益的人，就可以当我的大臣；那里隐藏着不驯服的根子。"如果我当了他的大臣，我就会比其他人都更能够亲自感受到他这一观点的作用，因为他把我看作是他的门徒，把无条件"服从"视为我的忠君观点中的基本要素。我说出的每一个独立见解都可能使他惊异而不快，我坚决不接受驻维也纳公使职位一事，在他看来简直是叛逆不忠[24]。两年以后我通过一件有深远影响的亲身经历对此深信无疑。

101

（三）

我被多次召往柏林并不都是因为外交政策问题，有时也是因为邦议会中发生的问题；在我被认命为公使[25]之后，于1851年10月13日我又重新被选为邦议会议员。

在问题涉及把上议院改组为贵族院[26]的时候，我收到了曼托伊费尔1852年4月20日的通知：

本生唆使国王越来越倾心于贵族体制[27]。他断言，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认为，几年之内欧洲大陆将分裂为两个部分：1.以贵族为支柱的立宪制新教国家；2.天主教—耶稣会—民主制—绝对君权国家。他把奥地利、法国和俄国列入后一类。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的国家种类。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发展道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既不是天主教徒，又不是民主主义者，而是一位绝对专制主义者。可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却给陛下留下了深刻印象。宣扬多数派掌权的立宪制，我认为无非就是新教体制。

第二天，4月21日，国王写信给我：

夏洛滕堡，1852年4月21日

尊敬的俾斯麦，我提请您注意，在下议院即将开始的关于改组上议院的讨论中我指望于您和您的协助。我之尤其需要这样指望，是因为从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我遗憾地听到右派

癞皮的母山羊和左派臊臭的公山羊合伙策划的肮脏阴谋，他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为了打乱我的计划而勾结在一起。从一切条件来看，这种景象是令人伤心的，令人伤心得“自扯其发”；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使我们付出如此高昂代价的法国的立宪主义的说谎机器。让上帝来纠正吧！阿门。

弗里德里希·威廉

我写信给格尔拉赫将军，说明在这些人士之中我是最年轻的。如果我能早一点知道陛下的意图，我或许可以施加一些影 102
响；如果我在短短的两天之内纯粹作为国王的代表而不维护自己的思想来利用自己的影响的话，那么我在柏林实施和在两院的保守党内拥护国王的命令就可能会损害我在议会中的地位，而我的这种地位在解决别的问题上则可能对国王和他的政府很有用。因而我询问：是否我可以不履行国王给我的与奥古斯滕堡亲王[28]会谈的委托而不参加邦议会。我通过电报得到答复，令我不要借口奥古斯滕堡的事，而应立即前来柏林。我遂于4月26日动身。这时在柏林由于保守党的努力已通过一项决议，这项决议与国王的意图大相径庭，看来国王发起的一场战役就此便告失败。27日我拜访住在夏洛滕堡宫离岗亭不远的侧翼的格尔拉赫将军时，我听说国王因为我接电后没有立即起程而恼怒；他认为如果我能赶到场，就可能阻止通过决议。格尔拉赫去见国王报告我已到达，好长时间没有回来，后来他终于回来了，他带来回话说：陛下不愿见我，但是令我等候。这一自相矛盾的命令说明国王的性格：他生我的气，想以拒绝觐见的方式使人认识这一点；但同时又让我

相信，我很快又会得到他的恩宠。这也算得一种教育方法吧，正像在学校里有时先把学生赶出教室，过后再放他进来。我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拘留在夏洛滕堡宫中，后来由于我被招待吃了一顿精美早餐我才感到松快了一点。柏林城外，特别是在波茨坦和夏洛滕堡，国王的生活设施就像一位农村的大领主。客人们在通常时间内总是会受到合适的款待，如果谁有愿望，任何时候上门也会受到款待。家务管理当然不是按照俄国方式，但是以我们看来，一切都很雅致，什么东西都富足有余，可又不显得奢侈浪费。

大约一小时之后一位值班副官引我去觐见国王，接待比平时要冷淡些，但不像我所担心的那样无情。陛下曾期待我召之即来，还指望我能够在表决以前二十四小时内，像下一道“向后转!”的军事口令一样，使保守派转向国王主张的那个方向。我解释说，这样是过高估计了我对这一党派的影响和低估了该党的独立性；并说，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国王没有分歧；如果国王给我以时间，而且他愿意以新的形式再次表达他的愿望的
103 话，我准备在自己同一党派的同事中维护国王的观点。看来国王和我言归于好，表示赞同，于是送别我时他便委托我为他的计划进行宣传。结果宣传的效果超过我的预料。反对改组议院的人仅仅是党派的领导人，他们持反对意见的顽强态度，其基础并不在于集体的信念，而在于每个党派中公认的领导人习惯享有的威望——这也不无道理，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些优秀的演说家和工作能力无与伦比的能干人士，他们使其余的人免去研究当前问题的辛劳。对于党派内不享有同样威望的反对者，党派的领袖人物（一般都是些比较机智的演说家）往往能够很容易地使他失去为未来进行抵抗的企图（如果他还知道羞怯的话），正是在我们这

里在保守派大部分所属的各阶层内这种反对者还不多见。

我发觉当时我们人数众多的这个派别——大约超过一百人——都完全受着他们的领导人所制定的政治信条的束缚。自从我在法兰克福对奥地利采取防备的立场以来，我也就走上了这一派的领导所不赞同的道路，因此我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便摆脱了上述领导的束缚；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危及到我们同奥地利的关系，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分歧，总的来说，动摇了我对我们这一派的领导的信任。然而使我惊异的是，我的辩护演说与其说对国王的现存观点还不如说对同他的合作关系发生了迅速的效果，在投票表决时我们派别的领导人处于孤立的境地；几乎整个派别都表示愿意跟随国王走一条路。

如果我今天回顾这些事件，那么我觉得我鼓动起保守派来反对的那三位或者六位领导人，他们在同国王有分歧的问题上根本是正确的。上议院对解决立宪制下归它解决的问题要比现在的贵族院更为适合。上议院在居民中所享有的威望，贵族院时至今日也难以获得。贵族院只是到冲突时期[29]才有机会表现一种突出的 104
政治上的成就，它在那时忠诚无畏地维护君主政体，从而表明它已完全成熟，足以胜任上议院的防卫任务。可以推测，在君主政体处于危急时刻，贵族院定会表现出同样的勇敢的坚定性。但我怀疑，它是否能够起到像上议院那样的作用，即在表面看来是和平的时期将能防止发生类似的危机。如果上议院在社会舆论的评价中是一个政府政策的、甚至国王政策的机构，这就泄露了宪法中的缺陷。根据普鲁士宪法，国王及其政府像两院中的任何一院一样，本身享有参加立法的同等权利；他不仅享有完全的否决权[30]，而且还享有充分的行施权，因而立法的创议在事实上和法律

的行施在法律上都属于王权。王权如果意识到本身的力量并有勇气使用这种力量，那么它在君主立宪政体中是足够强大的，因而不需要百依百顺的贵族院作为一个支杖。即使在冲突期间，贵族院同意众议院就提出的预算问题[31]所作的决议，那么按照第99款[32]规定，要通过预算法，也仍然必须经过第三个因素、即国王的同意，预算法才能生效。我深信，即使贵族院在它作出决议中与众议院的意见一致，威廉国王也是不会表示赞同的。我并不相信，“上议院”会这样做，恰恰相反，我以为，上议院通过讲求实际、平心静气的辩论老早就会对众议院产生影响，起到一种克制的作用，并且能够部分地阻止众议院的过激倾向。贵族院在社会舆论中并没有那样的分量，人们倾向于把它看作是政府权力的替身和国王意志的一种类似的表达形式。

对于这样的见解我当时已经不生疏了。与此相反，当国王反复和我讨论他的计划时，我都极力主张，贵族院除了一定数量的世袭的成员外，其主要成员都应该从选举单位中产生；选举单位的基础是附有同等价值地产的一万二千或一万三千个骑士庄园、重要城市的市政局[33]和没有地产但按照高赋税的高额纳税者[34]；我还主张使众议院现行的规定议员任期和解除任期的章程也推行于贵族院中的非世袭成员。国王十分坚决和鄙夷地否定了这一看法，因而我不得不放弃作一番详细讨论的希望。在对我来说是新的立法领域当时我还不能坚信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而在我和国
105 王直接交往（这对我也同样是新的）的条件下并在考虑到我的官职的情况下，要敢于维护自己在立宪问题上的独特见解，坚信自己正确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在某种情况下能使自己感到有权也有责任去这么做，我还需要具备比当时更多的管理国家事务的经

验。如果是在二十年后提出保留上议院或把上议院改组为贵族院的问题的话，那我就会把第一个二者择一问题变为内阁问题。

（四）

我在保守集团中所持的态度，阻碍了国王同我或有意同我一起主张的计划。1854 年年初他已考虑立即把我提升为大臣，但他的意图不仅遭到曼托伊费尔的反对，而且也遭到宫廷党的反对，这个党的主要人物为格尔拉赫将军和尼布尔。他们也像曼托伊费尔一样，不愿意和我一起分享对国王的影响，还认为他们和我朝夕共处不如在远处更好相处。格尔拉赫的当院长的弟弟助长了他的这种看法，此人一贯把我形容成为总在考虑“真理是什么?”[35]的彼拉多式的人物，因而不是集团内的可靠的同道者。关于我的这种评价也尖锐地表现在保守派及其紧密的委员会内部的斗争之中。当我根据自己驻邦联议会公使的身份和负责向国王报告有关德意志各邦情况的地位，要求能够在德意志政策和外交政策上对党团的态度施加更多的影响时，格尔拉赫院长和施塔尔却要求对各个方面的绝对的全部领导权。我和他们两人处于对立地位，但和格尔拉赫比和施塔尔对立得更厉害，因为格尔拉赫当时就声称，预见到我和他必将分道扬镳并终究要成为对手。在保守派几经变迁的各个发展阶段中，观点和我始终一致的是毕洛夫·霍亨道夫和阿尔文斯累本·埃尔克斯累本。

1853—1854 年冬天，国王多次召我去柏林，并每次都长时间挽留我；这样一来，从表面上来看，我就变成了追名逐利一类的人物，这类人为推翻曼托伊费尔而奔走，为争取普鲁士亲王反对

他的兄长而出力，力图为自己谋取职位或者至少获取委任，在国王眼里成为有希望取代曼托伊费尔的竞争者。在国王几次要我这样地扮演反对曼托伊费尔的角色，即由我起草电文复稿之后，我
106 便去访问格尔拉赫，在沿施普累河伸展的王宫的侧翼中国王办公室旁的小屋中找到了他，请求他从中斡旋允许我返回法兰克福。格尔拉赫走进国王办公室请示，国王喊道："见鬼，让他等着，我不下令他就不许走！"格尔拉赫出来时，我笑着说，国王的答复我已听到了。这样，我便在柏林又停留了一段时间。到了我终于能够起程的那一天，我留下了国王准备发给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信件的草稿；信稿是我依照陛下的命令拟就的，陛下打算亲笔抄写出来。曼托伊费尔同我对信稿的内容取得一致意见之后，由他呈交给国王。信稿的重点是结尾一句话，不过即使没有这一句话，信稿也是一个完整的文件，当然其效果就十分不同了。我请值班侍从武官呈交文件誊清稿时提请国王注意，最后一句话是诏谕的决定性的部分。在外交部，人们并不知道有过这一预防措施；宫中进行的审核，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修改了原稿，使它更接近于奥地利的政策。在克里木战争以及战争以前的谈判过程中，政府人士中间常常为了一句亲西方和亲奥地利的或者亲俄国的语句而争执不休，虽然这样的语句墨迹未干就已失去任何实际意义了。

1854 年 9 月，发生了由一个文件的措辞引起的、影响到事态发展过程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国王正在吕根；我在从法兰克福到莱茵费尔德途中，我的妻子正在那里卧病；(8 月 29 日）斯德丁的一名高级邮政官员受命追上我，传达了国王要我到普特布斯[36]去的邀请。我很想逃避，但这位邮政官员不理解，一个具有老派普鲁士特性的人怎么竟会躲避这种邀请。我动身前往吕根，心中有些

不安，怕又要听到让我当大臣的要求，这样一来我便会在同国王的关系中陷入我不能接受的境地。（8 月 30 日）国王仁慈地接待了我，并向我介绍了关于由于俄国人撤出多瑙河流域各公国[37]而造成的形势的意见分歧。这里涉及的是布奥尔伯爵 9 月 14 日的一封电报和曼托伊费尔拟定的答复草稿；国王认为这一答复太亲奥地 107
利了。按照国王的旨意，我重新拟定了另一个草稿，国王表示赞同，并送到了柏林，虽然遭到一位重要大臣的反对，还是命令先送给驻维也纳的阿尔宁伯爵，然后通告德意志各邦政府*。国王接受我的草稿所表现出来的情绪也见之于本肯多夫的接待上。本肯多夫带着书信和口头委托来到普特布斯，而我所能用以接待他的，却是关于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克里木[38]登陆的消息。他回答说："我很高兴，我们在那里的力量很强大。"这里流露出一种亲俄情绪。我以为在政治上我已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又得到了妻子病况不好的消息，便请求准假回家。请求被间接地拒绝了，我被编入了随从人员，这是一种高度赏识的证明。格尔拉赫警告我不可对此评价过高。他说："您不要以为您在政治上比我们更老练。眼下您很得宠，而国王送给您这份电报就和他送给一位太太一束鲜花一样。"

这些话多么正确，我当时就有所感受，但只是后来才逐渐充分理解。当我坚持请假回家，和事实上（于 9 月 1 日）动身离开时，这却引起国王的严重不满；他对格尔拉赫说，对我来说整个帝国不如我的家室重要。被国王欣然同意的我起草的电报稿在寄发时被压住了，后来又做了修改。但是国王的不满究竟有多深，只是在我访问巴黎[39]之时和之后才明白。

---

* 日期标为 9 月 21 日，在《雅斯蒙德》I，第 363 页中刊载。

108

第八章　访问巴黎

(一)

1855 年夏天，我国驻巴黎公使哈茨费尔特伯爵邀请我去参观工业博览会；他还相信当时在外交界流传的一种看法，认为我很快会成为曼托伊费尔在外交部的继任人。如果说国王有时有这种想法，那么宫中知道内情的人当时已经知道事情已发生了变化。我在巴黎遇到了威廉·雷德恩伯爵，他告诉我，公使们都还依然相信我会被任命为大臣，他自己也相信这一点；但是国王的心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详情他不知道。——这大概发生在自吕根以来。①

8 月 15 日是拿破仑生日[1]，庆祝活动之一是赶着俄国俘虏在游街。8 月 19 日英国女王来访，8 月 25 日为向女王表示敬意，在凡尔赛宫举行了盛大的舞会，舞会上我被介绍给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

亲王身着黑色制服，漂亮而冷漠，同我谈话彬彬有礼，可是在他的举止中可以看出某种恶意的好奇心。我从中猜想，他不是

---

① “这大概发生在自吕根以来”这句话包含俾斯麦的猜测。为了使之更清楚些，我把这句话用破折号同前面的句子分开。——霍·科——德文本注

不知道我的反西方强国的立场对国王的影响。亲王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在寻求解释我的立场的原因时，没有从这些动机的真正所在去寻找，即不受外国势力的影响而保障我的祖国的独立的利益，而这种外国势力的影响的肥沃土壤就是我国小市民对于英国的崇拜和对于法国的恐惧，以及希望避免卷入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是由于依从奥地利和英国的政策而进行的战争。在亲王眼里，我是一个站在俄国一方推行绝对专制主义和容克政策的反动分子。这我自然不是得自我被介绍给亲王时的短暂印象，而是得 109
自后来的事实材料和文献材料。不久之后便成为我国王储妃子[2]的阿尔伯特亲王的女儿接受了她父亲和科堡公爵当时的同党的见解，这是不奇怪的。

在她来到德国之后不久，1858 年 2 月，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通过王室几个成员已深信亲王妃个人对我已抱有成见。使我吃惊的并不是这一事实，而是她当时在家族小圈子内表示对我的判断的方式：说她不信任我。由于我的所谓反英意识和对英国势力持不顺从的态度，亲王妃对我不怀好感，对此我是有准备的；当 1866 年战争之后，在一次宴席上她坐在我旁边，她半开玩笑地说，我有野心，想当国王，或者至少想当一位共和国总统。这时我不得不猜想：亲王妃这个妇人在后来一段时间内却根据广为流传的诽谤之言来评论我。我同样用半开玩笑的语调回答道，我不配当共和党人，因为我在家庭的忠君传统中长大，为了人间的福利，我需要君主制度；谢天谢地，我命中注定不会像国王那样活着使人尊敬，终我一生我是国王的忠实臣民。不过，我不能担保我的这种信念将普遍地遗传下去，并不是因为忠君派绝迹了，而是因为国王或许不复存在了。要做炖兔肉，就得有兔子；要君主

政体，就得有国王。我不敢担保，由于没有国王，下一代人就不会成为共和派。我说这番话的时候，不由得忧虑地想到没有把君主传统传给继承人的王位更替。亲王妃在谈话中避免使用严肃的词句，一直保持开玩笑的语调，仍然像往常一样，和蔼而融洽。给我的印象是，她只是想取笑一下自己的政敌。

在我任大臣职务的最初几年里，在席间谈话中我还多次观察到，通过开玩笑地批评某些人和某些事以刺激我的爱国情感，这很使亲王妃感到惬意。

在那次凡尔赛宫中的舞会上，维多利亚女王和我用德语谈话。我从她那里得到的印象是，她把我看作是一个虽然值得注意却不使人同情的人，不过她那语调中并没有我从阿尔伯特亲王的
110 言词中感觉到的那种讥讽人的优越感。她态度和蔼，彬彬有礼，就像不想得罪一个乖僻的怪人那样。

晚宴的安排和柏林比较起来我觉得有些奇特：全体赴宴者被划分为三等，菜单也各不相同，那些应邀赴宴的客人到门口时还得到一张有号码的卡片。在第一等的卡片上还写着主持那一宴桌的女士的姓名。每桌能坐十五至二十人。我到门口时，得到在瓦列夫斯卡伯爵夫人主持的餐桌就座的卡片，后来在大厅内又得到外交界和宫廷的另外两位赞助女士的两张卡片。也可以说，没有安置客人就座的精确计划。我确定了瓦列夫斯卡伯爵夫人的餐桌，我作为外交官是属于她的部门的[3]。在往宴会厅走时，我遇到了一位身着近卫步兵团制服的普鲁士军官，他手挽着一位法国女士，正在和一位宫廷执事激烈地争吵，后者因为他们二人没有进门卡片而不让他们入内。我问是怎么回事，军官做了解释，并说那位女士是第一帝国[4]时期具有意大利封号的公爵夫人，这时我告

诉那位宫廷官员说，军官先生的卡片在我这里，便把我的卡片中的一张交给了他。可是这位官员仍然不想让女士进去，于是我把我的第二张卡片给了军官，让公爵夫人进场。这位官员提醒我说："您没有卡片也不得入内"；当我向他展示第三张卡片时，他显出一脸惊异之色，并让我们三人进了大厅。我建议我的两位被保护人不要按卡片上的桌次入席，而是去找其他席位就座，后来没有听说因为我转让卡片引起什么争辩。座位安排得十分混乱，我们的餐桌没有坐满，这说明赞助女士之间没有事先商妥。年迈的公爵皮克勒或者没有得到卡片或者找不到他的餐桌。当他认识我而向我打招呼时，瓦列夫斯卡伯爵夫人便邀请他在我们桌旁的一个空位上入座。晚宴虽划为三等，但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准备上都不如我在柏林见到的类似如此盛大的宫廷宴会那样高的水平；服务倒是充裕而敏捷。

使我最为吃惊的不同之处是人员流动的安排。凡尔赛宫比柏林的宫廷接纳客人要方便得多，因为大厅的数目也较多，除了白厅之外，各大厅的空间也较宽敞。可是在这里，晚餐已毕的一等客人退席和饥肠辘辘的二等客人入席都走同一条路，二等客人横 111
冲直撞，表明他们不太懂得宫廷社交规矩。身穿军衣配着绶带的大人先生和雍容华贵的女士互相碰撞，女士们经过时有骂人和打人的，这在柏林的宫廷内是不可能发生的。我退席时心上感到宽慰的是，虽然皇宫是多么金碧辉煌，但是在我们那里以及在彼得堡和维也纳，宫廷服务、宫廷社会的教养和作风要比巴黎的高，而且把法国和巴黎宫廷视作学习礼节和良好风度的学校的时代已经过去。甚至那些和彼得堡比较起来已经过时的德意志各小邦宫廷的礼节，也要比法兰西帝国的实践尊严得多。的确，在路

易·菲利普统治时期，我已有这种印象，在他治理下的法国，放荡不羁，举止无礼，特别是对女士，已成为风气。在第二帝国[5]时期这方面的情况虽然略有好转，但是官场和宫廷社交界的作风以及宫廷本身的礼仪，比之东方三大国宫廷还是大为逊色的。在路易·菲利普和路易·拿破仑时代只有在与官场无关的正统派人士中间，情况才有所不同：作风无可指摘，彬彬有礼，和蔼热情；偶尔的例外是一些比较严重地沾染巴黎风气的年轻人，他们的习气并非在家里养成的，而是从俱乐部里学来的。

我当时在巴黎期间，第一次谒见了皇帝[6]。他在几次不同内容的谈话中，仅用一般性的措辞表达了他对建立密切的法普亲近关系的愿望和意图。他说，我们这两个邻邦，由于它们的文化修养和结构而居于文明世界之首，需要相互支持。并未表现出由于我们拒绝赞同西方强国[7]而要向我提出抱怨的意思。我感觉到，英国和奥地利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为强使我们在西方强国阵营中提供军事效劳所施加的压力，比起皇帝抱着主张我国特别同法国取得谅解的愿望和期待而同我谈话时所采取的友好方式要强烈得多，甚至可以说是激烈得多、粗暴得多。对于我们对待西方强国政策方面的过失，他较之英国和奥地利要宽容得多。当时和后来他都没有用德语和我谈话。

112 当年9月底，我觉察到，我在巴黎的访问为我国宫廷所不满，加剧了早已存在的对我的恼怒，特别是伊丽莎白王后。国王为参加大教堂落成典礼去科隆而在莱茵河上旅行时，我到了科布伦茨觐见国王，我和我妻子应国王邀请乘汽船随他同往科隆，但是我的妻子在船上和在雷马根[8]都遭到了王后的冷遇。普鲁士亲王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便向我妻子伸出手来，引她入席。席后我请

求允许我返回法兰克福，获准。

直到冬天，国王才又和我亲近起来，有一次席间他坐在我对面，问我对路易·拿破仑的看法；他的语调是讽刺的。我回答道："我的印象是拿破仑皇帝是一位谨慎的、和蔼可亲的人，但是并不像世人所说的那么睿智。世人把一切发生的事情都记在他的账上，甚至东亚雨水不调，也被说成是由于皇帝的恶意阴谋。我们这里习惯于把他看作是一种恶神，似乎他心上时时盘算着怎样在世上制造祸乱。我认为，当他能在闲适中欣赏什么美好事物的时候，他是快乐的。人们夸大了他的智慧而损伤了他的心地；其实他为人心地善良，谁要是为他尽一点力，他是会感激不已的。"

国王大笑起来，那样子使我困惑，于是我便问他，是不是允许我猜测一下陛下此时此刻的想法。国王表示同意，我便说道：

"有一次，冯·卡尼茨将军在军事科学院给年轻军官们作关于拿破仑的几次征战的报告。一位学习勤奋的听众问他，拿破仑为什么会疏忽了这样的或那样的调兵。卡尼茨回答道：'是呀，您看，拿破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一个心眼挺好的汉子，就是蠢，蠢。'当然，这番话引起军事学校学生的哄堂大笑。我担心，陛下对我的想法类似冯·卡尼茨将军对拿破仑的想法吧。"

国王笑着说："您也许有道理。不过我对现时的拿破仑不十分了解，不能对您以为他的心地比他的头脑好这种印象进行争辩。"我从宫廷琐事中已觉察到，王后对我的见解很不满意。

(二)

对于我同拿破仑的交往的不满来源于一个概念，或者准确地

113 说，来源于“正统主义”[9]一词。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是塔莱朗所规定的，并在1814和1815年为了有利于波旁王朝而颇为成功地像使用一个迷惑人的咒语那样使用了这一个词。

这里我插入我和格尔拉赫的通信片段，信是稍后写的，但写信的动因在前文引用的他的信件片段中已经可以看出。

法兰克福，1857年5月2日

……在对内政策方面尽管我们的见解一致，但在对外政策方面我却不能顺应您的观点，照我看，这种政策观点应受到指责，因为它无视现实。您的出发点是，我为了个别令我景仰的人而牺牲了原则。对于所谓敬仰的人和牺牲原则这两句话我都要拒绝，此人绝不令我景仰。好敬佩他人的倾向在我身上只得到有限度的培育，毋宁说我的一双眼睛有一个缺点，即看缺点比看优点的能力强。如果我上一封信的色彩比较激烈的话，那么就请您把它看作仅仅是修辞方式而已，我本想用它向您施加影响。但是关于所谓我所牺牲的原则，我还不很具体地清楚您指的是什么，请您在复信中再加以阐述，因为我需要在原则问题上不和您分手。如果您指的是应当运用于法国及其正统主义的原则，那么我当然要承认，我是把这一原则完全置于我特有的普鲁士爱国主义之下的；法国只有当它对我的祖国的状况有影响时，它才使我感兴趣；我们推行政策只能同现存的法国一起，而不能把这样的法国排除在这种组合关系之外。一位像路易十四那样的正统主义的君主，就像拿破仑第一一样，是一个敌对因素，而拿破仑第一的今天的继承人如果为了享受宁静的私生活而生退位之

念，那么他这样做也绝不是为了取悦于我们，而亨利五世[10]也不会成为他的继承人；即使有人把他抬上空缺的许可的王位上，他也不会维持长久。我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可能为他的遭遇而流泪；我作为一名外交官，如果我是法国人的话，我会是他的一名臣仆。但是对我来说，不管法国由谁来领导，法国都不过是政治棋盘游戏中的一个棋子，而且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棋子；在这种游戏中，我的使命只能是效力于我的国王和我的国家。在履行我国的外交职责这一任务时， 114
我的责任感不允许自己或别人表现出对外国或外国人士的同情或仇视。因为正是在这里潜藏着对于我们所效力的君主或国家不忠的萌芽。特别是如果使现存的外交关系与和平时期所保持的和睦关系适应这种情绪的话，则更是如此；照我看实际上就不是执行什么政策了，而变成个人独断专行了。使国家利益从属于对外国的喜爱或痛恨的个人情感，依我看就连国王也无权这样行事；不过，国王如果这样做，他要对上帝而不是对我负责，所以我也就不必对此多言了。

或许您认为我所牺牲的原则就是一个普鲁士人应该永远是法国的仇敌这样一个公式？从我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我对外国政府的态度并不取决于凝固的仇视，而是取决于据我判断能对普鲁士带来损害或益处的权衡。以感情为依据的政策是没有交互性的，这种政策只是普鲁士的特点；任何别国政府都把自身的利益当作它们行为的准则，不管他们是如何用合乎法律的或充满感情的推论来竭力掩饰。人们承受我们的感情，利用它，还打算不让我们避开被他们所利用的处境，并且据此对待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甚至不说一声感

谢，而把我们仅仅当作可以利用的傻瓜。

我相信，如果我断定今天我们在欧洲的威望已不同于1848年以前，您会认为我是有道理的；我甚至认为，在1763年至1848年间[11]——当然应除开1807至1813年[12]那一段时间——我们的威望要比任何时候高得多。我承认，和其他强国相比，我们的国力，特别是攻击能力，在1806年以前要比现在强大，但是不包括1815年到1848年那一时期；当时的强国如今大部依然如故。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借用歌德一首诗中一个牧羊人所说的话："我走到了山谷之底，却不知怎样走来。"[13]我不想声称我就知道其中原因，但毫无疑问，许多道理就包含在如下情况之中：我们没有结盟，也不推行任何外交政策，就是说，没有积极的外交政策，我们局限于收集落在我们菜园里的石块，并尽可能刷掉落在我们身上的尘埃。我所谈到的同盟，不是指攻守同盟，因为和平还没有受到威胁；但是为预防战争来临而建立这样或那样的同盟、加
115 入这样或那样的集团的可能性、设想或打算的种种迹象都依然是今天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可能施展其影响的基础。谁在战争中处于较弱的集体中间，谁就不免要忍气吞声；谁完全孤立，便只得放弃自己的影响，特别是如果它是强国中最弱的一个的话。同盟是共同利益和共同意愿的体现。现在我们一般说来是否在政策上有明确的目标和打算，我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是有利益的，这一点别人已经提醒我们。可是迄今我们可能与之建立同盟的国家，其利益都是同我们的利益极其复杂地交错着的，甚至是互相冲突着的，也就是说同德意志诸邦和奥地利。如果我们从而把我们的对外政策视作是封

闭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设想：在和平时期把我们在欧洲的影响降低到邦联会议核心会议[14]的十七分之一的选票，而在战争期间则手捧邦联宪法孤独地留在图尔恩和塔克西斯官殿[15]之中。我问您，在欧洲是否有一个内阁比维也纳内阁更为感到其切身和自然的利益在于不是使普鲁士强大起来，而是削弱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影响呢？是否有一个内阁更急切、更巧妙地追求这样一种目标，更冷酷更无耻地把一己的利益当作自己政策的准绳，给我们、俄国人和西方强国提供众多的和令人信服的、证明它作为一个盟友的诡诈和背信弃义的证据呢？难道奥地利还羞于同外国缔结任何符合于它的利益的同盟，并以此来公开威胁德意志邦联的各成员国吗？您是否认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在维护非奥地利的利益时具有牺牲精神和忠诚不渝的本性吗？您能从这一“原则”立场出发，在约瑟夫皇帝的布奥尔·巴赫的统治方式[16]和拿破仑的统治方式之间找到什么区别吗？后者的代表在巴黎对我说过：对他说来，“我要竭尽全力摆脱这种过度集中的制度，这种制度最后是以一个警察书记官为主宰的，我认为这种过度集中的制度就是法国遭受的全部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感到甚为惊异的是，奥地利却正在作出最大努力追求这种集中制。我还要问您，而且请您在回答时不要闪烁其词：除了奥地利政府，还有哪个政府比各德意志中等邦国更不乐意为普鲁士做一些事呢？在和平时期，它们觉得需要在德意志邦联和关税同盟中扮演角色，在 116
我们的国境线上坚持他们的主权，和冯·德·海特争吵；而在战争期间，它们对我们的态度则是出于惧怕或是不信任；

只要世界上还有他们可以投以一瞥的地图，就是天使也不能消除它们的这种不信任。还有一个问题：在发生战争时您和国王陛下究竟是否相信德意志邦联及其军队？我指的不是法国为反对与俄国结盟的德国而进行的革命战争，我指的是一场争夺利益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同普鲁士一道的德国和奥地利所能依靠的会是他们自己的力量。如果您还对此有所指望，那么我便不能和您继续争论下去了，因为我们彼此的前提太不同了。既然优势不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一边，而且没有人有一点儿根据去相信普鲁士和奥地利会同心同德又互相信任，那么您有什么理由认为，巴登大公或达姆施塔特大公，符腾堡国王或巴伐利亚国王应当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去做列昂尼德[17]的事情呢？麦克斯国王在枫丹白露[18]也未必会对拿破仑说，皇帝只有踩着他的尸体才能越过德国或者奥地利的边界。

我特别惊奇的是，在您的信中读到，奥地利人声称他们在诺恩堡[19]为使我们获益而做的事比法国人还多。只有奥地利才能这样厚颜无耻地说谎；奥地利人即使愿意为普鲁士效力，他们也不可能做到，而且他们不会为了我们而真的同法国和英国发生争吵。恰恰相反，他们曾尽其所能地在军队过境问题上为难我们，诽谤我们，唆使巴登反对我们，现在在巴黎和英国串通一气和我们作对。我从法国人和基谢廖夫那里得知，在所有恰恰是有决定意义的谈判中，只要哈茨费尔特不在场，许布纳尔①就总是第一个和英国人结成一伙反对

① 当时奥地利驻巴黎公使。——德文本注

我们；跟着是法国，然后是俄国。可是一般说来，为什么人家应当在诺恩堡问题上为我们出力做事，维护我们的利益呢？难道人家能够因为对我们效过劳而期望得到我们的报答或者因为没有对我们效过劳而害怕我们吗？别人可以期望我们在政治上是从情谊或从一般正义感出发来处理事情，我们则不能期望他们这样做。

如果我们今后还想这样孤立地生活、愿意不受人重视、甚至还愿意受人恶劣的对待，那么我自然也无力加以改变； 117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重新获得威望，那么通过把我们的基础仅仅建立在德意志邦联的沙地上并静待其垮台的方法，我们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点的。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深信，在欧洲棋盘上有一部分按照我们自己的愿望仍然对我们封闭起来，或者从原则出发我们自己把自己的一只手捆缚起来，而其他人则伸出双手利用我们的困境，人家就会毫无恐惧和毫不感激地利用我们的善良意志。我决不是要求我们同法国缔结同盟来密谋反对德国；但是只要法国人让我们安静地生活，那么我们和法国人友好相处不是比冷眼相待更理智些吗？我想要的无非是，使别人不要以为他们想和什么人就能和什么人结成亲密的友谊，而我们则宁愿自己忍受切肤之痛的牺牲，也不愿借法国人的帮助来保护我们的身体。礼让是一枚廉价的钱币；即使它能导致使别人不再认为，他们随时可以指望法国人反对我们，而我们也经常需要有人帮助反对法国人的话，那么这对和平外交来说是巨大的胜利了；如果我们轻视这种外交手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那么我就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还不干脆节省或缩减外交费用，因为这一帮人虽然竭诚努

力也完不成国王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事，即：在和平时期通过友好联系和可能建立的同盟关系的表面现象来恢复普鲁士的威信。同样，陛下也可以通过表示出冷淡态度而轻易地削弱全部外交工作；如果我们造成不是朋友或期望奥地利的友谊的印象，那么我或我们的另一位公使在这里应实行什么呢？只有回到柏林，如果有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谈论奥地利对我们的某种支持，那么他就不得不回到柏林，以免惹人嘲笑。而且就是在柏林，我知道也只有极少数的人，在谈论我国外交政策时，才不感到痛心。我们对付全部灾难的处方就是扑到布奥尔伯爵怀里向他尽情吐露我们的兄弟情谊。在巴黎时我曾听说，某位伯爵诉苦要求和他妻子离婚，因为他当场抓住从前当过马戏团女骑手的妻子与人通奸已经是第二十四次了。在法庭上，他的律师赞扬他是温情宽厚的模范丈夫；但是比起我们对奥地利的高尚情意，他还差得远呢。

我们国内状况受到国内本身缺点的影响，未必超过受到我们在国外丧失威望、我们政策的完全被动这种痛苦和普遍
118 的感觉的影响。我们是一个爱好虚荣的民族，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夸耀，我们便感到痛苦；如果哪一届政府在国外给我们赢得一点声望，我们就会对它很好、很满意，甚至慷慨解囊。可是如果关于内政我们必须说，我们消除我们的大臣医生给我们注入的疾病，更多地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良好的身体素质，而不是通过他们的治疗和他们规定的养生之道，那么在外交方面要想寻找一种安慰就是徒劳的。尊敬的朋友，您毕竟熟悉我国的政策，您是否能够举出这个政策事先选定的任何一个目标？哪怕是举出预定执行几个月的一项

什么计划也行。正是在目前情况下，有谁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吗？在柏林有谁了解？难道您相信在其他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那里也同样存在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观点这种情况吗？还有，您能否给我指出一个盟国的名字来，这个盟国，如果今天发生战争，普鲁士对它可以有所指望，或者在比如诺恩堡那样的急切问题上它会为我们说话的，或者由于期待我们的协助或由于惧怕我们的敌对，它会为我们做某些事的？我们是最厚道、最无恶意的政治家，可是没有人真正信赖我们；我们被当作不可靠的伙伴和无危险的敌人。我们在外交方面的举动和内政方面的腐败，似乎完全同奥地利一样。我不是说的现状，可是您能给我举出从拉多维茨的三王同盟[20]以来我们在外交政策中的任何一项积极的计划（预防性的计划倒挺多）或什么目标吗？是的，曾有过一个亚得湾计划[21]；可是它至今仍是一个污水坑，而我们以最殷勤的方式让奥地利从我们这里取走关税同盟，因为我们没有决心干脆利落地说个“不”字。我惊奇的是，我们这里有些外交官竟还有勇气怀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要做出某些成就的事业心尚未熄灭。而我得像我的许多同事一样，简单地去完成上面来的指令，参加会议而不参与我国政策的总过程。这样可以日趋健康而少费精力。

或许您会说，我由于怨恨（因为您不同意我的意见）而把一切看得漆黑一团，并且像鹦鹉那样刺刺不休。但是，如果我能发现别人有什么思想，我也会像维护自己的思想一样来竭尽全力加以维护的。如果这样继续尸位素餐下去，我们就根本不需要这一整套外交机器。往我们这里飞来的可供烤

119 烧的鸽子，我们是不会让它们飞跑的，但如果我们不把嘴张开的话（假如我们不是正好打呵欠），那也是会飞跑的。我努力争取的只是：我们任凭事态发展，不要放弃合适机会，在和平时期给各国内阁造成一种印象，我们和法国相处不坏，人们休想指望我们为反对法国而需要他们的援助，并因此对我们施加压力；如果他们对我们不尊重，我们便能和任何人结成同盟。如果我现在说，通过礼让和相互往来便可以得到这些好处；那么我期待，或者有人向我证实，这根本不算什么好处，更符合我们利益的是：外国和德意志各宫廷有根据推测，在各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武装起来对付西方并需要建立同盟，甚至还可能需要援助以反对西方，即使上述各宫廷利用这种推测当作针对我们而采取的政治措施的基础。或者我期待有人拿出不适合和法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另外一些计划和见解。我不知道政府是否有一种计划（我未见到这种计划），我认为没有，但是如果有人对一个大国做出的外交上的接近加以拒绝，而且在调节两个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时仅仅以对人们不能和不愿改变的状况和人物的好感或反感为依据的话，那么我只能克制地说：我作为外交官，不能同意这种做法，而且在外交关系中采用这种制度，我认为整个外交活动直至领事事务都是多余的了，实际上等于被废除了。您对我说："这个人是我们的天然敌人，不久就会表明，他现在是这样的，将来也必定仍然是这样的。"对此我要争辩，或者同样有理由说："奥地利和英国是我们的敌人，情况就是如此，这早已是明显的事实，这在奥地利显得很自然，在英国显得还不自然。"但也可以放下不谈这些，甚至假定您的论

断有理，那我也依然不认为在和平时期就让别国和法国知道我们的忧虑，在政治上是可取的；相反，我认为，在您所预见的破裂真正发生之前，始终有益的是，让人们相信，我们并不认为在不久或较远的将来同法国打仗是不可避免的，至少这样的战争决不是与普鲁士的状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法国敌对的紧张关系并不是我们机体上的缺点，也不是任何人 120
都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投机的我们禀性中的天生弱点。只要人们认为我们对法国冷淡，邦联中的同事也会对我冷淡……

冯·俾

格尔拉赫的复信如下：

柏林，1857 年 5 月 6 日

您 2 日的来信一方面给我带来很大的愉快，因为我从中看到您诚心诚意地希望和我保持或取得一致见解，而这是大多数人很少关心的；另一方面，您的来信使我要求提出异议并进行严密的申辩。

首先我想，在最内在的基本方面，我和您的见解还一直是一致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我也就不会如此详尽细致地进行反驳，因为这样做会是毫无用处的。如果您在原则问题上有不同我分手的需要，那么我们首先就要从事于探究这一原则，而不要只是注意一些诸如“忽视现实”、“把法国排除在政治组合关系之外”的否定性词句。同样我们也不应该从“普鲁士爱国主义”、“对普鲁士有害

和有利”、“只效力于国王和国家”等词句中去寻找这种共同的原则，因为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关于这些东西您可以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认为从我的政策中比从您和任何其他人的政策中可以更好更多地找到这些东西。但对我来说，探究原则之所以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是因为我认为没有这样的原则，一切政治联合便都是有缺点的、不巩固的、极其危险的；在最近十年中并且正是通过探究原则而得到的成效使我对此深信不疑。

现在我不得不把事情追溯得远一点，也就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查理大帝时期。当时欧洲政治的原则是传播基督教。查理大帝曾为这一事业尽过力，和萨拉森人、萨克森人、阿瓦尔人[22]等等进行了战争，他的政策确实不是不实际的。他的继承人相互之间进行无原则的纷争，中世纪的伟大的诸侯们再度忠实于古老的原则。普鲁士的威力是通过勃兰登堡边疆侯爵和德意志骑士团[23]同那些不愿服从皇帝、教会牧师的民族进行的斗争而建立的，这种情况持续到直至教会衰落而导致领土分立主义、帝国解体和教会的分裂[24]。从那时期起，基督教世界中就再也不存在共同的原则。从最初的
121 原则中保留下来的只是对土耳其人的危险势力的反抗，当奥地利以及后来的俄国按照这项原则同土耳其人进行斗争时，它们的确并不是不合实用的。同土耳其的历次战争巩固了这些国家的威力，如果人们都忠实于同土耳其帝国进行斗争这样一条原则的话，那么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欧洲或者基督教世界面对东方就会处于一种比今日更为良好的地位，而如今我们正受到来自东方的极大威胁。在法国大革命这一激烈的

非常实际的背弃基督教教会的行动面前，首先是在政治领域中存在过一种所谓爱国主义的“利益”的政策，这一政策引导到哪里去，我们已经有目共睹。没有比从1778年到法国大革命这一期间[25]的普鲁士的政策更为不幸的事情了；我要提醒人们：弗里德里希二世付给俄国的补助金[26]等于是纳贡，我要提醒人们对英国的仇恨。在荷兰，到1787年[27]还保持着弗里德里希二世旧日的威望；可是赖兴巴赫协定[28]已经是一种由于背离原则而造成的耻辱了。大选帝侯进行的战争是为了新教的利益，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反对法国的战争其实是反对革命的战争[29]。1740年至1763年间的三次西里西亚战争[30]实质上也具有新教的性质，虽然领土分立主义和均势的利益也起了作用。

席卷欧洲的革命给欧洲政治带来的原则[31]，依我看至今仍然有效。不能说忠于这种观念是不合实用的。英国直至1815年一直忠于反对革命的斗争，而且没有被老波拿巴引入歧途，所以国力上升到了顶点；奥地利经历许多失利的战争之后，毕竟平安地经受住了这种考验；普鲁士由于巴塞尔和约[32]的后果而深受苦难，只是在1813—1815年间才恢复了元气；遭受和约损害的西班牙[33]，则蒙受了更多的痛苦；而照您的见解，德意志各中等邦国，令人遗憾的是革命及由其产生的波拿巴主义这一万恶之源在德国的产物，这一产物在维也纳会议[34]上由于姑息和猜忌而被强制推行并受到了保护。如果人们根据原则，在维也纳会议上把比利时归还奥地利，把两个法兰克侯国归还普鲁士[35]，那么德国的状况就会与现在不同，特别是如果人们能同时强令畸形的怪胎巴伐利亚、符腾堡、达姆

施塔特[36]退回到它们原来的版图内的话。然而，当时人们在
122 划定边界等等方面，全然把力学的利益放在原则前面。

我这种范围广泛的议论一定使您烦躁了，所以我回过来谈当代问题。现在普鲁士与奥地利互相敌对，波拿巴的统治伸展到德绍[37]，没有他的允许，在德国就休想有所作为——您认为这种状况好吗？难道和法国缔结同盟，就可以换来1815—1848年期间任何外国也不插手德国事务的那种局势吗？我和您一样深信，奥地利和德意志各中等邦是不会为我国作出任何贡献的。此外我还认为，法国，亦即波拿巴，也不会为我国作出什么贡献。我也和您一样，不赞成对法国采取不友好和不礼貌的态度；把法国排除在政治组合关系之外，这是荒谬的。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波拿巴的来历，把他请到柏林来，以致把国内外的种种观念弄乱。在诺沙泰尔[38]问题上，他表现得不错，因为他制止了战争，并公开说他从此不再干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让“感情用事的政策”来支配，而把问题提交在伦敦备忘录[39]上签了字的各欧洲大国，不是预先躲藏在波拿巴的羽翼之下（这是很有问题的，却正是奥地利所希望的），是不是更好吗？这样，对于人们能够为之进行调停的战俘[40]，便不会发生不幸了。

此外，您责难我们实行孤立政策。当共济会会员[41]乌泽多姆希望把我们牵入12月2日条约[42]时，他对我们也进行过同样的责难；现在作为乌泽多姆的死敌的曼托伊费尔，也很信服这一思想；而您在当时，感谢上帝，倒是不是这样。奥地利当时赞同了十二月条约，可是给了它什么好处呢？它逡巡四周寻求同盟者。巴黎和约[43]之后，它立即缔结了一个徒

有其名的同盟，现在又同英国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我在这些事情方面看不出有任何好处，只看到种种困境。秘密协定只适用于这种情况，即法英同盟破裂了，即使到那时也阻挡不了帕麦斯顿与撒丁[44]同意大利眉来眼去。

我的政治原则现在是，今后也依然是，同革命进行斗争。您说不服波拿巴不站在革命的方面。他也不愿意站到别的营垒中去，因为那里有他的决定性的利益。可见这里也就谈不到什么同情和反感。波拿巴的这种立场就是一种“现实”，是您所不能“忽视”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对待 123
他的态度不应该讲究礼貌、谦逊、赞许和谨慎，也绝不是意味着不可以在一定的事情上同他联合。但是如果我的原则，如反对革命的原则，是正确的话（我想您也会承认它是这样一种正确的原则），那么在实践上也就必须一贯坚持，以便在需要实践的时候（如果原则是正确的，这种时候一定会到来）使那些也将会承认这一原则的人们（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奥地利以及英国也会这样做）懂得，他们从我们这里可以得到什么。您自己说，人家不会信赖我们，但也不能不承认，只有按照确定的原则、而不是按照动摇不定的关于利益的观念等等行事的人，才是可信赖的。英国和按自己方式行事的奥地利，在1793年至1813年期间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因此尽管法国人使它们遭到种种失败，但它们始终能够找到盟友。

至于我们的德意志政策，我认为，我们的使命就是向各小邦表明我们普鲁士的优势地位，不能允许他们，例如在关税同盟关系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上，直到狩猎邀请、亲王就任

我们的职务等方面，随心所欲地自行其是。在这里，就是说在德国，在我看来也必须是反抗奥地利的地方；但同时对奥地利也应避免任何空隙。这就是我对于您的书信的回答。

谈到我们对德意志以外地区的政策，那么如果我们在一个时期之内处于孤立境地，我认为不必惊异，也不必忧虑，因为在这时期一切关系都头脚倒置了：英国和法国现在还是紧密的同盟，法国不敢考虑采取可靠措施对付瑞士的激进派[45]，因为怕可能触怒英国，但是在此期间法国又作登陆准备以恫吓英国，还在采取同俄国结盟[46]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奥地利与英国结盟，这竟然不断地挑动了意大利[47]等等。依照您的见解，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何去何从？要像正在这里停留的普隆—普隆[48]所暗示的那样，同法国和俄国结盟来反对奥地利和英国吗？这样的同盟必然会立即使法国在意大利占有优势，使意大利完全革命化，同时会使波拿巴的影响在德意志占优势。人们只让我们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起一点作用，但不会很大，也不会持久。我们确已看到过在1801至1803年处于俄国和法国势力影响下的德国，当时主教辖区还
124 俗了，而且是按照来自巴黎和彼得堡的指令分配的[49]；普鲁士当时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都好，但与奥地利和英国的关系却坏，它在这种分配中也得到一些，不过所得不多，而它的影响那时比任何时候都弱小。

利·冯·格

我于5月11日写信给这位将军，对他的信没有深谈：

……柏林的消息告诉我，宫里有人称我为波拿巴分子。这样对待我是不公正的。在1850年，我们的对手就曾责难我背叛性地倾向于奥地利，称我们是柏林的维也纳帮[50]；后来又有人认定我们身上有俄国的皮革气味，称我们是施普累河上的哥萨克。那时候有人问我是俄国的还是西方各国的，我总是回答，我是普鲁士的；我认为对外政策中的理想就是没有偏见，决定问题不要受对于外国及其当政者的反感或好感的影响。至于外国，我一生中仅仅对英国及其居民曾经抱有同情，而且现在有时还不能摆脱；但他们却并不希望我们去热爱他们；无论我们的军队向谁开火——向法国人也好，俄国人也好，英国人或奥地利人也好，只要能向我证明，这是符合于健全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普鲁士政策的利益的，我就会同样感到满意。但在和平时期，我认为招惹别人对自己的不满或助长这种不满，而又不和一种实际的政治目的结合起来，为了不确定的、没有报偿的同情而牺牲将来作出抉择和缔结同盟的自由，并仅仅从善意和博取别人赞赏的意愿出发作出像现在奥地利在拉施塔特[51]问题上所要求我们的那种让步，这是削弱自己的轻率行为。如果我们现在对人殷勤而不能得到同等的报答，那么我们就应当不做这种让步；可以当作协调对象的机会以后也还会有。有利于德意志邦联不能是普鲁士政策的唯一准绳，因为对于邦联来说，最大的利益毫无疑问会是使我们以及德意志各邦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和在关税同盟内部的商业上都从属于奥地利；假如有了统一的领导，邦联在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便能成就完全不同的事情，而一旦发生战争，也将是真正坚固的……

格尔拉赫于5月21日给我复信说：

本月11日来信收悉，我想这也许是您对我针对您本月2日的详尽来信所试作的反驳的回答。我当时精神很紧张，因为
125 和您见解不一使我极为苦闷，我期望着我们的意见能一致起来。但是您对指责您主张波拿巴主义的辩解向我表明，我们之间的距离还很大……我确实相信您不是波拿巴分子，正如大多数政治家，不仅在我们这里，而且在其他国家，真实情况也是这样那样，例如帕麦斯顿、巴赫、布奥尔等；我原先也知道，在法兰克福和在德国，我还得加一句说在莱茵联邦中，您碰见过不少这类分子。您在上次邦议会中对反对派的态度，已经排除了您主张波拿巴主义的责难。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才对您怎样看待我们的外交政策百思不得其解。

我也认为，不应该对波拿巴采取不信任、僵硬和厌恶的态度，应该对他采取最好的方式，只是不能像您所希望的那样把他请到这里来，因为那样做人们便会有所损失，使还存在的良好意识遭到扰乱，引起不信任，丧失他的尊严。因此，您的备忘录中的许多东西我都赞同；历史导言（1—5页）具有高度的教育意义，而且其余的大部分也很可以利用；可是请您原谅，全文无头无尾，既无原则，又无政治目的。

1．难道您能够否认，拿破仑第三像拿破仑第一一样，也躲不开他的以人民主权[52]（七百万人的当选人）为基础的绝对专制主义的一切后果（他像老拿破仑一样对这些都感觉很好）？……

2．法国、俄国、普鲁士三国同盟，普鲁士在加入时嘴里说："请接纳我加入你们的同盟，在你们之中我当老三吧"①，它仍是三国中最弱的一个，奥地利和英国对它抱着不信任的防备态度，它却直接促成了"法国利益"的胜利，即先统治意大利，然后再统治德意志。1801 至 1804 年俄国和法国瓜分了德意志，只划给了普鲁士一小部分[53]。

3．您所建议的政策与 1794—1805 年豪格维茨[54]的政策有什么区别？那时候所谈论的也是一种"防卫体系"。图古特、科本茨尔、勒尔巴赫丝毫也不比布奥尔和巴赫好，奥地利方面还不时发生背信弃义的事情，俄国比现在更加不可相信，英国倒反而可靠些。国王心里也是厌恶这个政策的……。

由于我和您的见解有分歧，我经常考虑，我的观点过时了，虽然我还不能承认我主张的政策不正确，但也许有必要尝试一种另外的政策，这种政策应当先予以实行并掌握。在 1792 年马森巴赫主张与法国结盟；并在战争期间写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1794 年豪格维茨主张防卫体系或者保持中立等。革命的绝对专制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征服性的，因为只有当周围各国的情况同它本国的情况一样时，它在国内才能维持下去。帕麦斯顿不得不支持反对比利时报刊的游行示威，等等。拿破仑第三对待瑞士激进主义的态度是十分软弱的，虽然公认激进主义对波拿巴十分不合心意。还有类似的事例。1812 年，格奈泽瑙、夏恩霍斯特及其他少数人反对与 126

① 席勒歌谣《担保》最后二行。——俄文本注

法国结盟；众所周知，这个同盟还是成立了，是通过派遣辅助军团[55]实现的。结果当然对主张结盟的人有利。虽然如此，我还是会很乐意站在格奈泽瑙和夏恩霍斯特一边。1813年克奈泽贝克主张停火，格奈泽瑙则表示反对[56]，我当时是一个仅有二十二岁的军官，坚决反对停火；虽然后来停火了，现在我也敢证实我是有道理的。胜利者的事业使上帝欣慰，失败者的事业令卡托①欢喜[57]这句话，如今仍不失其意义……

实施同法国和俄国结盟的防卫体系政策——以前有人称它为中立政策，在东方问题上英国是不愿容忍这样的政策的——对您来说并不艰难，因曼托伊费尔一伙和其他许多人是站在您那一边的（国王陛下心里是不愿站在您那一边的，但他会采取消极的立场），而他们这样做也只是在波拿巴主义还能维持的时候。但在这期间可能发生的什么事情还会少吗？您如果能够不卷进事端，而把握好权柄，那么我是十分高兴的。老波拿巴统治了十五年[58]，路易·菲利普统治了十八年，您认为现今的制度将维持得更长久吗？

利·冯·格

我写信作答如下：

法兰克福，1857年5月30日

① 马·普·卡托（公元前95—46年），罗马贵族，顽固的共和派，恺撒的主要对手；在公元前46年恺撒于塔朴苏斯取得胜利后，他在乌迪卡自杀。——译者注

在回答您最近两封信的时候，我深深感到人类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的不完备而苦恼；每次试图表明自己观点，都造成了新的误解；我们不能在纸上或者口头上表明人的全部思想，也不能使他人对我们所表达的片断思想了解得像我们自己所感觉得一模一样：一方面是因为语言次于思想，一方面是因为吸引我们注意的外部事物，绝少能被两个人从同样的角度所觉察，除非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判断并采纳另一人的见解。

因为事务繁忙、宾客不断、风和日丽时的出游、懒散、孩子生病和我自己生病，还有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种感觉，所有这一切使我没有勇气以更进一步的论据答复您的批评，这些论据中的每一个论据本身都不完满，有漏洞。您在评论时请注意，我的健康才开始复元，今天才第一次喝了马利恩巴特矿泉水，如果我的见解与您有分歧，那么就请您在枝叶中而不要到根本中去寻找不同之处，因为对于见解的根本方面，我深信我和您的见解是一致的。

我也承认为反对革命而斗争这一原则是我的原则，但是我认为把路易·拿破仑看作是唯一的或者即使只是首要的革命代表是不正确的，而且我认为在政策中贯彻这一原则时不可能采取这种方式，即：使这一原则的最遥远的贯穿其他一切考虑，使它可以说成为纸牌中唯一的王牌，连其中最小的牌也可以击败其他花色牌中最大的牌。

在现今的政治世界上，没有在革命的土壤中扎下根子的实体还多吗？请看西班牙、葡萄牙、巴西、美洲的所有共和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希腊、瑞典[59]，以及至今仍然有意识地立足于1688年光荣革命[60]的英国；甚至对于现在的德

意志各邦君主一部分从皇帝和帝国、一部分从与他们同一等级的诸侯以及一部分从邦议员那里夺取的土地，并没有证实自己完全合法的占有权，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生活中还不能避免使用革命的支柱。许多这样的现象现在已经根深蒂固，我们也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正如在我们周围每天二十四小时发生的那些奇迹在我们看来已经不再神奇一样，这并不妨碍任何人用完全不比我们自己的诞生和人类的日常生活更为奇异的现象来确定“奇迹”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承认一项原则是最高的、普遍适用的原
128 则，那么只有这一原则在任何情况和任何时候都证实正确时我才能承认；一开始就是虚弱的并不能由于岁月的流逝而变得健康[61]这条原理与教义相比依然是正确的。在过去的革命事件还没有变得失去时效，人们谈论这些事件可以像《浮士德》中的魔女谈论她的迷药，说“这儿我有一瓶，我自己也常常服用，它不再有恶臭”[62]那样的时候，甚至在那时人们也不总是因保持贞节而避免性交；十足反革命的统治者曾把克伦威尔称为“兄弟先生”，并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向他寻求友谊；十分尊严的君主们在联合邦[63]得到西班牙的承认之前便与这个联合邦结成同盟。还在斯图亚特家族提出自己有王位继承权时，我们的祖先便已承认奥伦治的威廉[64]及其在英国的继承人是完全正当的，我们还根据1785年海牙条约对北美合众国的革命起源表示谅解[65]。葡萄牙现任国王[66]曾到柏林访问我们，而我们若不是因为偶然发生的阻碍，也已和贝尔纳多特[67]家族结亲了。

在什么时候，根据什么样的特征，所有这些政权不再是

革命的了呢？可见，一旦他们不再对我们构成危险时，它们的不合法的诞生也就被谅解了，随之人们在原则上也就不反对他们了，虽然他们继续毫无悔改地、甚至自夸地承认他们不正当的根源。

我没有见到，在法国革命之前我有一位政治家（即使是最诚实和最富于基督教精神的政治家）竟会想到，把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他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态度从属于“同革命进行斗争”这一原则，而且仅仅用这一试金石来检验本国与对别的国家的关系；其实，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68]的原则是和在法国招致的权力的继承性的中断的那些原则极为相似的，如果不计流血程度和因民族性格而不同地形成的同宗教一起的骚乱的话。我不能设想，在1789年以前就没有几个富于基督教精神和保守的政治家，几个像我们这样正确认识什么是罪恶的人，也不能设想他们竟会没有注意到被我们认定是任何一种政策的基础的那种原则的正确性。我也不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一原则像严格地应用于法国那样来应用于1789年以后的一切革命事件。奥地利存在类似的法制状态，革命在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和如今彻底革命的丹麦[69]的盛 129
行，英国政府公开承认和宣传革命的基本思想，并在诺恩堡冲突中实践这些革命思想——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我们去评论我们的国王对待这些国家的君主的关系比对待拿破仑第三的关系更为温和。在波拿巴身上和一般来说在法国革命中，究竟有什么特殊的东西？波拿巴的非君主出身固然关系重大，但同样情况在瑞典也发生，然而它并没有造成同样的后果。是否正是在波拿巴家族中存在这种“特殊的”东西呢？

须知并非这个家族把革命带到世上来的，因而即使灭尽这个家族，也不会铲除革命或者哪怕使之不能为害。革命比波拿巴家族要古老的多，它的基础也要比法国广阔的多。如果想在世上探寻它的根源，那么就不要在法国，而是宁可在英国去寻求，如果不是更早地在德国或罗马去寻求的话，而这就要按照我们各自是将宗教改革运动的狂乱还是罗马天主教的狂乱和把罗马法引入日耳曼世界[70]看作对此负有罪责了。

拿破仑第一是以为了他的野心而有效地利用法国革命开始的，后来他又毫无成效地并试图用错误手段反对革命；他把革命果实摘取到手并塞入衣袋之后，又极欲把革命从他过去的生涯中抹掉；至少他对于革命的促进的程度不像他以前的三位路易：在路易十四时由于实行了绝对专制主义，在摄政时期[71]和路易十五时由于秽闻四播，在路易十六时由于软弱无能（他在1791年9月14日通过宪法时，宣称革命已告结束）；确实革命已经成熟。即使不把菲力普·埃加利特算入波旁王室，波旁王室为革命所做的也要比所有波拿巴分子还多。

波拿巴主义不是革命之父，正像任何绝对专制主义一样，它只是对于革命的种子的肥沃土壤；我绝不想以此来把波拿巴主义置于革命现象的领域之外，而是只想在展现它的时候除掉并非它本质上固有的杂质。此外，我认为可以算作这些杂质的有不义的战争和征服。这些并不是波拿巴家族或以其姓氏命名的统治制度的特征。古代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也能够这样做。路易十四按照自己的力量在德国经营的残暴程度并不亚于拿破仑[72]，假如拿破仑以他的天赋和习性生为路

易十六的儿子的话，那么他大概也会使我们不得安生的。

征服的欲望是英国、北美、俄国及其他国家的特性，并 130
不亚于拿破仑法国；只要有力量、有机会，连最合法的君主国，未必会由于谦虚节度和热爱正义而限制自己。在拿破仑第三身上，这种欲望作为本能看来并不占主宰地位；他并不是一位统帅，在可能赢得重大胜利或遭到严重失败的大规模战争中，作为他的统治支柱的法国军队，更多地注目的是一位应运而至的将军而不是皇帝。因此，只有当他认为内部的危险使他必须挑起战争的时候，他才会寻求战争。但是，对于法国的正统国王来说，如果他现在掌了权，这种迫切需要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

因此，无论对于他伯父[73]征服狂的回忆，还是他的权力的不正当起源这一事实，都并没有使我有理由把当前法国人的皇帝看作是革命的唯一代表，看作是为反对革命而斗争的最好的对象。第二个缺点是他和许多当今执政者共同具有的；而第一个缺点方面，对他的怀疑至今还不能多于他人。尊敬的朋友，您指责他说，如果他周围各国的情况不同他本国的情况一样，他便会不能维持下去；如果我承认这是正确的，那么这就足以动摇我的观点了。但是波拿巴主义之所以有别于共和国，是因为它没有必要用暴力来传播它的统治原则。拿破仑第一本人也没有竭力向并不直接或间接地屈从于他的国家推行他的统治方式；而是人们心甘情愿地竞相模仿这种统治方式。用帮助革命来威胁别国，今天很明显已成为英国一些时期以来的专长，如果路易·拿破仑也有帕麦斯顿的意图的话，那么我们早就会碰到那不勒斯爆发起义了。法

国皇帝如果向邻国推广革命体制，就可能给自己制造危险；他深信法国现今的制度有缺点，并且为了维持他的统治和王朝的利益，他宁可竭力为自己获取比革命的基础更为牢固的基础。他能否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对于波拿巴主义统治体制的缺陷和危险，他无论如何不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他自己对此公开地发表过意见，并对它进行过抱怨。

131 对于法国来说，现行的统治形式并不是路易·拿破仑可以任意确立或任意改变的东西；对他来说，这种统治形式是一种既成的东西，是也许按照它能够在法国长时间进行统治的唯一方法；要采用任何别的形式或者一开始就在民族特性中没有基础，或者是这种基础已遭破坏和丧失。如果亨利五世现在登基，一般情况下，那他也不会用其他方法进行统治。路易·拿破仑并没有造成国内的革命状态，他的统治不是通过反抗现存的合法权威获取的，而是从无政府状态的旋涡中把它作为无主财产捞到手的。如果他现在放弃政权，那他就会把欧洲置于困境，大家会相当一致地请求他留下来；他如果把政权让给波尔多[74]公爵，那么这位公爵也将不能保持权力，犹如他不能获取权力一样。路易·拿破仑自称为七百万人的当选人，他只是提到了他不能否认的事实；他不可能给予自己一个与他所具有的不同的起源；但是，对他却不能说，在他已经掌权之后，实际上他还继续遵从人民主权的原则，并把民众的意志视为法律（就像这种情况现在在英国日益显见那样）。

在拿破仑第一时期，我国所受到的压迫和侮辱给所有亲

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些人看来，被称为走运的士兵——革命的继承人的那个人及其家族同我们所反对的以革命为形式的罪恶原则是同一的。人们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可是我觉得，您对今天的拿破仑未免归咎过多了，如果您正是把他、也仅仅把他看成是可恨的革命的化身，并且根据这一条理由，对他宣布放逐，以至同他交往皆为可耻行为的话。他身上所具有的任何革命的标志，您在其他地方也会发现，但是，您并不以同样严格的学理精神把自己的仇恨转注到那里去。波拿巴主义的对内统治方式，连同它的粗暴的集权制、它的消灭独立性、它的对法律与自由的蔑视、它的官方的扯谎、它的国家机构和交易所的腐败以及它的那些没有脊梁骨的、没有信念的无耻文人，在不配被您那样偏爱的奥地利也如同在法国一样盛行，而在多瑙河两岸是由于自由使用全部权力有意识地推行的；而路易·拿破仑在法国所遇到的这种制度是现成的、是他本人所不欢迎的、但却是不易改变的历史的结果。

我认为，那种使我们今天特别把法国革命才称为革命 132
的“特殊东西”，并不在波拿巴家族身上，而是在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都离我们很近之中，是在发生这些事件的这个国家的巨大和力量之中。因此，这些事件更为危险，但我并不因此认为，同波拿巴保持关系，比同由革命造成的其他国度，或者和那些自愿让自己混同于革命的政府（如奥地利）以及积极散布革命原理的政府（如英国）保持关系更坏。

我绝不是想用这一切来为法国的某些人士或法国的状况进行辩护；我对那些人士没有偏爱，我认为那里的状况是这

个国家的不幸；我不过是要说明一下，和我们所承认的一个强国的君主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既不是罪恶，也不是耻辱——如果政治事态的进程要求我们这样做的话。我并不是说这种联系本身有什么珍贵之处，我只是说，其他的一切前景都更坏，为了改善这种关系，我们就应当和法国在实际上或表面上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只有用这一方式我们才能使奥地利理智起来，使它放弃施瓦尔岑堡式的过分的野心[75]，使它寻求同我们谅解，而不是力求诈骗我们；也只有用这一方式我们才能阻止德意志中等邦国和法国继续发展直接的关系。英国也只有担心它可能错过同我们结盟的机会从而有利于法国时，它才可能认识到和普鲁士结盟的重要性。可见，即使从您的偏爱英国和奥地利的观点出发，我们也必须从法国着手，以便使上述两个国家清醒过来。

尊敬的朋友，您在您的信中预见到，我们在普、法、俄同盟中只能起微不足道的作用。我从来不把这样一个同盟看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看来迟早要从目前的混乱中产生出来的一个事实，对此我们不能加以阻挡，因而我们必须估计到它，还必须明白它的作用。我还要补充的是，既然法国寻求我们的友谊，我们只要赞同这种意愿，或许可以阻止这种同盟的建立或改变它的作用，无论如何总可以避免以“第三者”的身份加入这个同盟。只要我们不比现在更强大一些，则我们在和其他大国结成的任何联盟中，我们便会处于相对弱者的地位。奥地利也好，英国也好，如
133 果我们和它们结盟，它们也不会为我们的利益来利用它们的优势；在维也纳会议[76]上我们吃了亏，有过这种经历。奥地

利不会帮助我们在德意志起重要的作用，英国不会帮助我们发展海上贸易和舰队，而且对我们的工业怀有嫉妒。

您把我与豪格维茨及当时的“防卫政策”[77]进行对比。但是当时的情况是不同的。法国在当时已经掌握令人不寒而栗的优势力量，其首领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危险的征服者；反之，对英国倒有把握可以指望。我有勇气不对巴塞尔和约加以谴责[78]；同当时的奥地利及其图古特、勒尔巴赫以及科本茨尔的结盟，就如同与今日的奥地利的结盟一样使人不堪忍受；在1815年我们行程艰难，但我并不归咎于巴塞尔和约，而是我们未能不顾与我国对立的英国和奥地利的利益而发展起来，因为我国国力微薄，同其他强国相比不足以使人畏惧。莱茵联邦有它们完全不同于我们的“巴塞尔”，却在维也纳会议上大获成功。在1805年我们没有抓住机会[79]为击溃法国的优势力量助以一臂之力，曾是令人瞠目的愚蠢；我们本应该迅速而坚决地向拿破仑进攻，直到最后一口气。作壁上观比站在法国一方更令人不可理解；这些机会我们既然都任其丧失，因而在1806年我们便只好不惜任何代价恪守和约，等待有利时机[80]的到来。

我完全不赞成“防卫政策”，我只是说，我们可以不必怀有侵略意图和承担任何义务去接受法国亲近我国的尝试；这样的立场给我们的好处就是可以使每个大门都为我们敞开，自由地掌握朝任何一个方向旋转，直到事态变得更为稳定和明朗为止；我认为我所提出的方针不能理解为反对别人的密谋，而只能理解为我们自卫所必需的谨慎态度。

您说：“法国也不会比奥地利和德意志中等邦为我们作

更多的事情。”我认为，如果不同时符合自己的利益，任何人也不会为我们做什么事的；但是奥地利和各中等邦国现在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方针是与普鲁士生死攸关的任务完全互不相容的，而且只要奥地利不采用一种对待我们有节制
134 的制度（这方面至今很少希望），我们的政策便将毫无共同之处。

您赞同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向各小邦显示普鲁士的优势地位”；可是在邦联法规范围之内我们用什么办法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只有十七票[81]中的一票，奥地利又反对我们，在此情况下是无法大有作为的。

由于我在别处论述的理由，路易·拿破仑对我们的访问这件事本身将会使我们的意见在各小邦眼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们对我们的敬重甚至忠诚，和它们对我们的恐惧适成正比。他们永远不会信赖我们。只要看一眼地图它们就会失去这种信任。它们知道，它们的利益和分立欲望妨碍普鲁士政策的总的方针，对它们的危险正在于此，而现时对付这种危险的唯一保障就是我们仁慈的君王的公正无私。这个法国人对我们的访问总之不会加剧本已存在的对普鲁士的不信任，而国王希望驱散这种不信任的想法，绝不会得到别人对他的谢意，他只不过是由人家获益，被人家利用而已。现存的什么“信任”在危急情况下也是不会给我们一兵一卒的；而如果我们善于使他们感到恐惧，那么就会使整个邦联受我们控制。而通过明显地表现我们同法国有良好的关系就可引起这种恐惧。

如果不采取这类的措施，那么就很难长期同法国保持您

也赞同的这种友好关系。因为人家在向我们表示好意，需要给自己建造一个同我们一起的纪念物，希望同我们会晤。如果我们加以拒绝，必定会造成关系冷落，而为其他官廷所注目，因为新贵在最敏感的地方是易于感到自己被人触犯的。

假如您向我建议一种其他的政策，我会诚恳地、毫无成见地和您讨论；但是，因为我们处于欧洲的中心，所以不能够消极地执行漫无计划的政策，而只满足于别人还给我们安宁；这样的政策今天对我们来说可能像1805年[82]一样的危险。如果我们不设法成为铁锤，那么我们就将成为铁砧。我认为您无权满足于“失败者的事业令卡托欢喜”，[83]如果您在这种情况下冒必定使我们共同的祖国遭到失败的话……

如果我的观点得不到您的一点赞赏，那您至少也不要对我整个一生作出严厉判决；请您想一想，我们不仅在艰难岁月中 135
有过共同的基地，而且在这块基地上培育过共同的禾苗；我这个人是接受忠告的，而一旦认定自己错了，就知过必改……

冯·俾

格尔拉赫复信回答道：

无忧宫，1857年6月5日

……首先我愿意赞同您观点中讲究实际的一面。涅谢尔罗迭像您一样，在这里正确地指出，只要布奥尔（您还正确地提到巴赫）执政，就不可能和奥地利合作。他说，奥地利曾高唱友谊—安全来煽动欧洲[84]反对他们（即俄国人），割去

了他们比萨拉比亚[85]的一块土地，到现在还给他们带来火辣辣的疼痛。奥地利也以同样的态度对付我们，并在东方战争期间背信弃义，实在可恨。因此您说不可能同奥地利合作，这相对地说是正确的，所以，在这种具体情况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未必有什么分歧。可是您不要忘记，罪恶总是一再带来罪恶的，奥地利对我们也造成了一系列卑劣的罪恶，例如由于1849年反对进军巴登湖区，结果丧失了普鲁士亲王当时本应该夺取的诺恩堡，[86]又如拉多维茨的政策[87]，再如甚至在施瓦尔岑堡表示了良好意愿的时候在临时协定时期[88]表现的骄横态度，最后如一堆琐碎的小事：一切都是重复1793年至1805年的政策。但是，认为我们与奥地利的恶劣关系只应是相对恶劣的这一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切合实际的，因为它首先可以使我们避免采取只能造成灾难的报复做法；其次可以使我们保留和解和接近的愿望，因而可以避免使这种接近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和解和接近我们都没有得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政治家们都投身到波拿巴主义中去了。

但是对于这一点，老年人比青年人更有资格评论。但是这里在台上的老人就是国王和鄙人，青年人就是弗拉·狄阿沃洛（曼托伊费尔）等人，因为弗拉·狄阿沃洛在1806年至1814年期间已在莱茵联邦，而您还没有诞生呢。我们实际研究了波拿巴主义已经十年了，把它全都琢磨透了。所以，我们的分歧仅仅在于我们对这个现象的性质有不同的理解，而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您说，路易十四也是一个掠夺者，奥地
136 利的联合力量[89]也是革命的，波旁家族比波拿巴家族对革命负有更大的罪责，等等。您说一开始就是虚弱的并不能由于

岁月的流逝而变得健康这条原理只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我不曾同意过这一点，因为从错误中可以产生出正确的东西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定能产生出来。从违背上帝意旨在以色列建立的王国中产生了救世主；得到广泛承认的长子权被卢本·押沙龙等破坏殆尽，和淫妇约示巴私生的所罗门受到了主的祝福[90]，等等）。但是您如果把这一切都同波拿巴主义混为一谈，那便证明您完全误解了波拿巴主义的实质。波拿巴——不论是拿破仑第一还是拿破仑第三——不仅具有革命的不合法的来历，像威廉三世、大概还像奥斯卡尔国王[91]等人那样，而且他们自身就是革命的化身。这两个人，拿破仑第一和第三，都感觉到这是自己的灾难，但他们又都没有办法摆脱。请您读一读现在已经被人遗忘的一本书《拿破仑·波拿巴与让·菲埃凡的关系与书信》，从中您就会找到老拿破仑对国家本质的深刻的观察；正如现在的波拿巴也以确立贵族称号、恢复长子继承权[92]、理解集中制的危险、对交易所投机进行斗争、恢复旧省份的愿望等这样的思想使我敬服一样。但是这改变不了他的统治的性质，正如哈布斯堡·洛塔林王室[93]的性质不会由于自由主义的、甚至是革命的约瑟夫二世[94]皇帝或者由于弗朗茨·约瑟夫及其高等贵族出身的施瓦尔岑堡和街垒英雄巴赫[95]而改变一样。本性难移[96]。因此波拿巴家族中没有一个人会弃绝人民主权，而他们也没有这么实行过。上面提到的书可以证明，例如当拿破仑一世在下令枪决昂吉安公爵[97]时，他便放弃了他要弃绝自己革命出身的企图；拿破仑第三也会这样做并且已经这样做了，例如在诺恩堡谈判[98]时，他觉得这是复兴瑞士的最好

的、在其他情况下求之不得的机会。但正如瓦列夫斯基老实承认的那样，他畏惧帕麦斯顿勋爵和英国的舆论，俄国畏惧他，奥地利畏惧他和英国，这样，这笔可耻的买卖就成交了。多么奇怪：我们有眼却视而不见，有耳却听而不闻[99]，在诺恩堡谈判之后紧接着就是比利时事件、自由派对教权派
137 的胜利、议会中少数派和街头起义者结成的胜利联盟来对付议会的多数派[100]。在这里，从正统的国家方面是不应当干预的，波拿巴对此将是确实不会容忍的；如果这一切不能缓和下来，就会有来自波拿巴主义方面的干涉，不过很难对教权派或宪法有利，而是对享有主权的人民有利。

波拿巴主义不是绝对专制主义，也不是恺撒主义[101]；绝对专制主义可以以神权为基础，例如在俄国和东方，但它对于那些不承认神权的人并不起作用，对他们来说它是不存在的；除非是诸如阿提拉、穆罕默德或帖木儿这些独裁君主[102]才会想起宣布自己为上帝的鞭子。不过这究竟是例外。恺撒主义就是在一个合法的共和国里强夺最高权力，并以某种必要性为自己辩解；但是对于波拿巴来说，不论他愿意与否，革命，也就是说人民主权，是对内的法制名义，而在发生任何冲突或需要时，也是对外的法制名义。由于这个原因，您把波拿巴、波旁和绝对专制主义的奥地利相比较不能令我满意，就如同比较拿破仑第三的个性一样，即使拿破仑第三的个性在许多方面都令我钦佩。如果他不去进行征服了，那他的继承人也必然去从事征服，虽然皇储并不比其他许多人有更多的希望登上皇座，而肯定要比亨利五世少[10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破仑第三也和拿破仑第一一样，是我们的天然

敌人，我要求的只是您能注意到这一点；而不是要求我们和他争吵，讥笑他，刺激他，拒绝他对我们的友好态度；但是，我们的荣誉和权力都使我们有义务对他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他应当明白，我们并没有策划推翻他，我们对他没有敌意，对他十分诚挚，但是我们认为他的来历是危险的（他也作同样想法），而且他如果想利用这一点，那我们就要对他进行反抗。他和整个欧洲都应该在这一点上信赖我们，不需要我们来说明；不然他可能会给我们穿上鼻勒，想往哪儿牵就牵到哪里。一种良好政策的实质就是不要从事争论，使那些实际上和我们见解一致的人信任我们。为此需要和人们开诚布公地谈话，而不是像弗·狄·那样用沉默和诡计来激怒他们。普鲁士自己造成的严重过错是，它是神圣同盟[104]三个强国中第一个承认路易·菲力普[105]的，并且促使其他国家也这样做。如果人们诚恳地对待菲力普，经常给他点颜色看看，从而提醒他想到自己的篡位者的地位的话，那么，或许他至今还在执政。 138

有人谈到普鲁士的孤立处境；但是，如果像弗兰茨皇帝于1809年在匈牙利议会上所说的那样：全世界都疯了，那人们怎么能够寻求巩固的同盟呢？英国在1800年至1813年的政策是促使波拿巴在欧洲大陆上无暇他顾，以便阻止他在英国登陆，在1805年他是认真地想要登陆的。现在，拿破仑正在他的所有港口里进行军事准备，以便伺机登陆，而轻率的帕麦斯顿却还与所有的大陆强国为敌。奥地利理所当然要为它掌管的意大利担心，却又和不干涉它在意大利事务的仅有的两个国家普鲁士与俄国为敌；它和从十四世纪以来便对意

大利垂涎三尺的法国亲近，却又把控制意大利入口和出口的撒丁尼亚逼得陷入绝境；奥地利还和热心鼓吹并支持意大利起义的帕麦斯顿眉来眼去。俄国开始在内政上搞自由化[106]，同时讨好法国。到底应该和谁结盟？除了等待之外，还可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在德意志，普鲁士的影响之所以如此轻微，全是因为国王从来不下决心向各德意志君主表示自己的不悦。不管这些君主的举止多么无益，他也心甘情愿和他们一起打猎，并在无忧宫予以接待。1806 年普鲁士在十分不祥的征兆下与法国开战，而跟随它的毕竟还有萨克森、库尔黑森、不伦瑞克、魏玛；而奥地利在 1805 年就已经没有任何追随者了……

列·冯·格

我已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再通过答辩来继续进行这种本身漫无目标的通信了。

第九章　旅行·摄政

(一)

次年，1856 年，国王重又和我接近；曼托伊费尔（或许还有其他人）担心：我可能以他们为牺牲来赢得自己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曼托伊费尔向我建议：我应接管财政部，他将保留内阁首相职务和外交方面的职权，以后和我替换位置，他作为首相任财政大臣，我任外交大臣。他在行动上表示出，这个建议似乎是由他提出的。虽然在我看来这个建议有些奇特，我并没有立即拒绝，而只是提醒他当我被任命为驻邦联议会公使时，一些报纸把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那位谈吐诙谐的教长[1]对约翰·罗素勋爵说的嘲弄都用在我身上了：这个人应该去指挥一艘三桅军舰或者进行一次肾结石手术。如果我当上了财政大臣，那么更可肯定会出现类似的评论，虽然我无论如何也能履行作为财政大臣的博德尔施文格的签字工作。一切取决于这种过渡状态持续多久。其实建议是由国王作出的；当国王询问曼托伊费尔结果如何时，他回答说："他率直地嘲笑了我一番。"

国王不是口头上提议，而是屡次命令我接管曼托伊费尔的职务，他这样说："即使您伏地请求也无济于事，您必须当大臣。"

可是我隐约地得到的印象总是，这一表示适应于使曼托伊费尔屈服、使他“服从”这个需要。即使国王是认真的，可是我感到在他手下我是不可能长期保持一个我所合意的大臣位置[2]的。

1857年3月，在巴黎开始了调解普鲁士与瑞士之间争端[3]的
140 谈判。皇帝对于柏林的宫廷和政府圈子中间的情况一向是消息灵通的，显然知道国王同我的关系比同别的公使的关系要更为亲密，并在心目中一再把我当作大臣的候选人。在和瑞士谈判期间，皇帝对普鲁士表面上采取了——尤其和奥地利相比——友善的态度，看来他预计以后可以指望普鲁士在其他问题上对其让步。他同我争论说，责备他竭力要以莱茵河为国界是不公正的。他认为，面对欧洲的法国感到有约三百万居民的德国莱茵河左岸是一条不能持久的边界；事物的逻辑将会推动法国去获得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或者至少使这些国家处于可靠的依赖地位。因此，有关莱茵河为界的活动，迟早会使法国增加一千万至一千一百万勤劳而富裕的居民。法国力量这样地增强是欧洲所不能容忍的，——“devrait engendrer la coalition”（“必然造成联盟”），使得保持这种力量比争得这种力量更为困难，——“un dépôt que l'Europe coalisée un jour viendrait reprendre”（“它是结成联盟的欧洲有朝一日要竭力取回的抵押品”）；这样一种使人回忆起拿破仑一世的抱负，在现时情势下是太高了；人们会说，法国伸手反对每个人，因而每个人都会反对法国。或许他在某种情况下为了满足民族自尊心而要求“une petite rectification des frontières”（“略微调整一下边界”），可是不这样做他也能生存。如果他又需要打一场战争，那么他宁可设法对意大利打仗。一方面这个国家究竟与法国有巨大的亲和力，另一方面法国是足可

成为大陆强国和在陆上取得胜利。扩大海上威力对法国人将会是非常诱人的合意之事。他并不考虑把地中海变为法国湖，“mais à peu près”（“只是偶尔有过”）。法国人没有海员的天赋，而是优秀的陆上步兵，正因为如此，海上的成功是对他们的过分的吹捧，这正是能够诱使他协助摧毁俄国黑海舰队[4]的唯一原因，因为俄国一旦具备了像希腊水兵那种精良的装备，就会成为地中海上极为危险的劲敌。我的印象是皇帝谈到这一点时并不十分坦率，对他来 141
说摧毁俄国舰队毋宁是遗憾的事，并竭力为这场战争的结局辩解，而英国在他的合作之下，——用英国外交大臣[5]的话来讲，——如同一艘没有舵手的船一样，we are drifting into war（我们被拖入了战争）。

他思考的作为下一场战争的结果的是意大利和法国的亲和力和意大利依附于法国的关系，或许还考虑取得几个沿海据点。属于这个步骤的还有，普鲁士不要反对他。法国和普鲁士应当互相依赖；他认为普鲁士在1805年没有像其他德意志邦那样支持拿破仑是一个错误。令人想望的是通过获得汉诺威和易北河两公国[6]来巩固我们的领土，并从而奠定一个更为强大的普鲁士海上强国的基础。缺少的是这样的二等海上强国，这些国家的战斗力量和法国的战斗力量联合起来，就能终止英国目前的压倒优势。这对于它们自己和对于欧洲其余国家不可能构成一种威胁，因为它们联合起来不会从事单方面的利己主义的——法国的图谋，仅仅是为了摆脱英国的优势，争取海上自由。他首先希望得到保证：一旦由于意大利而同奥地利打起仗来，普鲁士保持中立。我希望就所有这些问题探问一下国王的意思。

我回答道，皇帝把这些设想直接告诉了我，我倍感荣幸，因

为，第一，我认为这证明了他对我的信任，第二，在普鲁士外交官员中间，大概只我一个人会接受对国内的整个舆论甚至在他的君王面前保守秘密。[①]我迫切地请求他抛弃这些想法；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国王同意这样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如果向他提出这些意见，那么答复无疑是否定的。此外，最后存在君主们在口头交往中泄漏秘密和暗示国王抵制了某种诱惑的巨大危险。如果使另一个德国政府向巴黎报告关于这种轻率的泄密行为，那么，对于普鲁士十分可贵的同法国的良好关系就要受到破坏。皇帝不
142 安地打断了我的话说，“Mais ce ne serait plus une indiscrétion，ce serait une trahison!”（“可是这不只是泄密，而是背叛!”）我接着说，“Vous vous embourberiez!”（“那您也要陷在泥潭里了!”）。

皇帝发现这一措辞中肯、鲜明，并重复了一遍。我们的谈话结束时他对我的坦率表示感谢，我应允对他所说的保持缄默。

（二）

同年，我利用联邦议会的休假时期到丹麦和瑞士去打猎。8月6日，我在哥本哈根觐见了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他接见我时身穿军装、戴着头盔，和我谈话时夸张地描述了他在历次战斗和围攻中的经历；而他根本没有参加过那些战斗和围攻。我询问道，他是否认为，这个宪法（1855年10月2日产生的第二个共同

① 事实上，在1857年4月11日和24日以及5月1日给曼托伊费尔的报告中一点也没有谈到这次会谈。——德文本注

的宪法）将保持下去，他回答道，他对躺在灵床上的他的父亲[7]发过誓要坚持这个宪法；这时他却忘记了，在他父亲逝世时（1848年）还不存在这个宪法。在谈话时我看到在洒满阳光的邻接的走廊墙壁上有一个女人的身影；国王不是为我而是为丹纳尔女伯爵[①]说话呢；关于这位女伯爵和国王陛下的关系，我们听到过一些奇异的轶事。我还有机会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知名人士进行交谈。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德意志小邦这种事，他们都不想知道；“对他们来说更乐意的是在哥本哈根的这种欧洲人资格，哪怕一点点也好。”

在瑞典打猎时，我于8月17日撞在一块岩石上而使胫骨受到重伤，遗憾的是，我为了去库尔兰打麋鹿而对创伤并没有在意。我离开哥本哈根后，于8月26日回到柏林，9月3日[②]参加了一次盛大检阅，我第一次穿上刚刚为“重骑兵”团实施的白色制服；随后去库尔兰。

7月8日，国王从马里安温泉[8]出发到舍恩布鲁恩[9]去拜访奥地利皇帝。在返回途中，于7月13日在皮尔尼茨[10]拜访了萨克森国王，当天在那里就感到“不适”；宫廷御医们的病况报告书说这是由于在酷暑中旅行引起的，因此起程的日期推后了几天。国王于17日返回无忧宫后，他周围的人察觉到他有精神疲惫的病征，特别是爱德温·曼托伊费尔，他不安地尽力阻止或中断国王同别

---

① 路易丝·克里斯蒂安娜·拉恩姆孙（Luise Christiane Rasmussen，1815—1874年），1850年8月7日起是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降尊迎娶的妻子。——德文本注

② 这里所说的日期有误。俾斯麦离开柏林是在8月27日晚，8月28日在默默尔，9月4日在卡莱顿。这里提到的检阅大概是在8月27日上午举行的。——重骑兵团的白色制服是根据1857年8月20日的内阁命令实施的。参看普鲁士《国家公报》1857年8月30日第204期。——德文本注

人的谈话。国王在舍恩布鲁恩和皮尔尼茨的亲属那里所得到的政
143 治上的印象使他郁郁寡欢，那些争论使他疲惫不堪。7 月 27 日军事操练时我骑马在国王身边，在谈话中我发觉他神思衰竭，不得不协助驾驭他的乘骑。

10 月 6 日他陪同烟瘾极大的俄国皇帝[11]前往下西里西亚边区车站，在密闭的沙皇的华丽专车中，烟叶的气味如同火漆的气味一样使他不堪忍受，* 由此他的健康状况恶化。

众所周知，接着他得了中风病。[12]在高级军事官员中已传说，在 1848 年 3 月 18 日至 19 日[13]的夜间他就发过同样的病状。医生们商讨，是否应给他放血，顾虑放血会损坏大脑，不放血又会死亡，延宕了数日才决定放血，这使国王恢复知觉。

在这几天里，普鲁士亲王面临立即登基的可能性，10 月 19 日和我在新建的庭园中做了一次长时间散步，他和我谈到，如果他执政，是否应该不加改变地接受宪法呢，还是应该事先要求对它加以审核。[14]我说，如果采邑授予制[15]可以适用，拒绝宪法才能辩解，根据这个采邑授予制，继承人只受父亲的、而不受兄长的嘱言所约束。但我建议，从政治上考虑，不要触动宪法这件事，不要招致与即使是有条件地拒绝宪法相联系的我们国家政治状况的不安定。不应引起每次王位变动时可能发生制度变更的担心。普鲁士在德国的威信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能力会由于王权和邦议会之间的不和而受到削弱，在德国的自由派中间反对这一拟定的步骤是普遍的。我在描述值得担心的后果时，出发点正是 1866 年在豁免责任法[16]问题上我向他阐述的那些同样的想法[17]，即：宪法问

---

* 连国王的亲笔信也不是当着他的面加封，这一说法很可怀疑。

题应当从属于国家的需要及其在德国的政治地位，现在触及这个 144
问题并不是当务之急；现在最紧要的事是政权问题和内部团结。

回到无忧宫时，我发觉爱德温·曼托伊费尔对于我和亲王的长时间谈话和我可能进一步的插手表示出疑虑不安。他问我为什么不到我的岗位上去，在目前的情况下，那里很需要我。我回答道："这里更需要我。"

根据10月23日的敕令，普鲁士亲王最初被委托代理国王三个月，后来又三次延长期限，每次三个月。如果没有再次延长期限，1858年10月就到期了。1858年夏天，一种认真的尝试在准备中，即促使王后[18]安排国王签署一封致其兄弟的信。信上应说，他感觉自己已充分康复，可以管理政府，并为亲王从事的代理之职向他表示感谢。有人这样论证：亲王代理执政是通过国王的一封信而开始的，那么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封信予以终止。然后，在王后陛下的庄严批示的监督下，由宫廷中才能胜任的或自愿效劳的人士领导政府。也有人口头上请求我参与这一计划，我公开地拒绝了，我说那将会是一种后宫政府。我从法兰克福被召到了巴登—巴登[19]，在那里把这项计划告诉了亲王，而没有指明发起者。亲王叫道："我就辞职！"但我对他说，他摆脱军事职务无济于事，反会使事情变得更坏。这项计划只有在内阁暗中同意下才能实施。因而我向他建议打电报召见正在自己庄园等待计划的成功的曼托伊费尔大臣，他对这项计划是清楚的；并且采取适当指示切断这一阴谋的线索。亲王同意了。我返回法兰克福后，收到了曼托伊费尔的信，内容如下：

我荣幸地告知阁下，我计划于本月22日，星期四，早晨

7 时从这里出发前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并于次日清晨尽可能早些去巴登—巴登。如蒙阁下同行，我将十分高兴。我的夫人和儿子也将可能同我一起前往，他们现在还在乡间，不
145 过明天将到这里。

我不希望事先在法兰克福传播关于我的旅程的议论，但请允许我通过这几行字让阁下知道这一消息。

柏林，1858 年 7 月 20 日

曼托伊费尔

代理执政问题的进一步情况，可从曼托伊费尔下面一封信中看出：

我们所采取的有关领袖和国家的重大行动，刚在第一幕的时候就停止了。这件事给我带来了许多忧虑、烦恼和不应有的为难。关于此事昨天我还收到了格尔拉赫一封情绪十分激烈的信。他认为从此主权[20]一半被掷出窗外。我抱着最良好的善意也不能承认这一点；对这件事情，我的设想如下：

我们有一位有资格治理国家却没有能力治理国家的国王；他承认，而且也应该承认，他已经一年多不能管理国家了；医生和他本人都无法甚至大致说明，何时他重新能够亲自执政；不自然地延长迄今为止的全权委托是不适当的，国家需要有一位只对自己负责的首脑[21]；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国王才命令负有继承王位的使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国家宪法的规定行事。此后，恰恰在这点上措辞准确并符合君主

政体精神的宪法有关规定才会实施，并且进行即使在国王声明之后成为多余的、但在宪法中有充分理由规定的邦议会投票，但是严格限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必要实行摄政制度[22]？换句话说：国王辞退政务，是否具有①充足的理由？我不明白，有人怎么想否定地回答这个问题；的确还有某些困难，主要是形式上的困难需要克服。举例来说，对于宪法中规定的联合会议[23]缺乏议事规则。这个规则不得不临时拟定。我则希望，将在大约五天之内作出决议，然后亲王可以进行宣誓，会议可以结束。对其他议案，例如与批准拨款有关的议案，在这次会议上自然不予考虑了。如果您的公务允许，我希 146
望您到这里来出席邦议会并尽可能在开幕以前到达。我听到极右派的令人惊异的建议，对于这些建议，或许为了共同的利益，甚至为了这些先生们本身的利益，能够加以制止。

威斯特华伦恰恰在此刻[24]退职，我是很不希望的。他自己要求退职时，我就曾劝阻过一次。现在亲王想完全根据他的自愿的决定和没有他的请求的情况下接受他的退职，还寄给我与此有关的致威斯特华伦的私人信件，命他立即提出请求。但我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送出亲笔信，而向亲王就时机问题提出异议，费了不少心力之后，这些异议总算奏效了。我被授权，至少暂缓这一处理，并把信件保留在我处。这时，威斯特华伦在本月 8 日不仅给亲王而且给我写了一封令人诧异的信，他在信中收回了早先的声明，又提出让他在准备颁布的和已经制定的法令上副署[25]，就必须使亲王颁布的

① 原稿有“没有”字样。——德文本注

法令也特别提请国王赞同；这个要求，考虑到近日来国王的精神状态的日益恶化，实际上近乎荒谬。于是亲王丧失了耐心，指责我没有立刻寄出他的信，事情不能再延宕了。选择弗洛特韦尔[26]，我没有协助，是亲王独自决定的，这一选择有不少反对意见，也有不少支持的意见。

柏林，1858 年 10 月 12 日

我出席了邦议会并在党团会议上反驳那些试图反对通过宪法程序实行摄政制度的先生们，坚决地主张接受摄政制度，这个制度毕竟还是实行了。

10 月 26 日普鲁士亲王担任摄政之后，曼托伊费尔问我，他该怎么办才能避免他所不情愿的解职；在我的要求之下，他把他同摄政王近期的书信给我阅读。我回答说，十分清楚，亲王要他退职，他认为我的回答不公正，也许认为是有野心。11 月 6 日他被免职。接替他的是伴随有“新纪元”[27]内阁的霍亨索伦公爵。

147

(三)

1859 年 1 月①，在穆斯蒂埃或者卡罗利伊的家庭舞会上，施梯尔弗里德伯爵向我做了诙谐的暗示，我从中得出结论：把我从法兰克福调往彼得堡一事几经计议即将完成；这位伯爵还善意地

① 俾斯麦 1859 年 1 月 13 日到达柏林和 1 月 27 日回到法兰克福，在此之前他在 1 月 24 日直接询问亲王，他是否可以在 26 日起程。在这一天根据宫廷报告他觐见了摄政王；在觐见时进行了重要的谈话，结果就是任命他为驻彼得堡公使。——德文本注

加上一句："Per aspera ad astra"（"鏖战已毕，胜利在望"）。[①] 这位伯爵的消息，无疑是由于他和亲王妃的宫内人员上至侍从长官[28]下到宫内仆役等所有天主教徒的关系都很亲密。我与这些耶稣会教徒的关系在当时还没有受到损害[29]，而且施梯尔弗里德对我还很友好。我理解伯爵的明确的暗示，第二天（1月26日）去求见摄政王，坦率地同他说：我听说要把我调往彼得堡，请允许我对此表示遗憾，希望能够收回成命。他首先反问道："是谁告诉您这件事的?"我答复说，我如果说出此人姓字，那未免轻率，我是从耶稣会方面听说的，我同他们的关系已经很久了；我对此事感到遗憾，因为我相信我在法兰克福邦联议会这个狐狸窝中，熟悉了它的全部出口和进口，直至肮脏的角落，可以比任何一个接替我的人提供更有益的服务；而接替我的人先必须从新熟悉以同许多宫廷和大臣的关系为基础的十分复杂的地位，因为我在变动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这方面的八年经验，不可能传授给他人。每一位德意志君主，每一位德意志大臣以及邦联各君主的驻在地的宫廷，我本人都很熟悉，而且我为普鲁士所能获得的在邦联议会和德意志各个宫廷中的影响而高兴。我被调离法兰克福，普鲁士外交积累和争得的这一资本就会无目的地付诸东流。任命乌泽多姆会削弱德意志各宫廷的信任，因为他是一个思想混乱的自由派，与其说是一位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讲野史轶事的内廷侍臣；而且冯·乌泽多姆夫人由于行为怪僻和印象不佳，也会使我们在法兰克福陷于窘境。

---

① 关于即将调往彼得堡的暗示必定更早地为俾斯麦所知道，因为他在1858年12月10日的信中要求他的妹妹访问法兰克福，"在我被冷落在涅瓦河畔之前"。——德文本注

于是，摄政王说："这就是说，乌泽多姆的大才在任何别的地方也不能利用，因为他的夫人在任何一个宫廷中都会给我们带来
148 麻烦。"这种麻烦不仅在各个宫廷、而且也在比较宽容的法兰克福发生过，她过分倚仗她的外交特权给在野者带来的不快，甚至闹到当众出丑的地步。但是乌泽多姆夫人生为英国人，①德意志人的自我感觉很低劣，因而宫廷里对她持以宽容态度，对此没有任何一位德国妇女是感到高兴的。

我对摄政王提出了大致如下的异议："那么我没有也娶一位轻率的女人是一种过错了，不然的话，我就可以和乌泽多姆伯爵一样担任我已熟悉的职务了。"

摄政王接着说："我不明白，这件事为什么使您如此愤懑；驻彼得堡公使可一向被认为是普鲁士外交界的最高职位，我派您去那里，您应该看作是对您的高度信任。"

我接着说："既然殿下给了我这样的旨意，我自然应当不再说什么；但任何时候殿下总是容我自由发表意见，我就不能不说出我对国内状况及其对于德国问题的影响的忧虑。乌泽多姆是一个brouillon（头脑混乱的人），不是一个事务家。他将从柏林接受指示；如果施利芬伯爵仍任德意志事务文牍官[30]的话，那么这种指示会是不错的；但对乌泽多姆会认真执行指示，我还不相信。"

尽管如此，乌泽多姆被任命派赴法兰克福。他后来在都灵和佛罗伦萨[31]的所作所为证明，我对他的评论不是不公正的。他一会儿装作战略家，一会儿装作"恶魔似的汉子"，一会儿又装作内行的密谋家，同加里波第和马志尼有往来，并从中取利。由于爱

① 马尔科尔姆（Malcolm）陆军中将之女；她死于1886年10月9日。——德文本注

好从事地下秘密的联系，他在都灵雇用一个所谓的马志尼党人（实为奥地利间谍）为私人秘书，把文件交给他阅读，还把密码交给他。他几周甚至几个月擅离职守，留下签了名的空白公文纸，公使馆秘书就用这些纸写报告。这样，外交部就不断收到有关他与意大利大臣们进行谈判的并有他的签字的报告，而在所提及的时间内，他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些先生们。但他却是一名显要的共济会会员[32]。当1869年2月我要求召回这样一个无用又可疑的官员时，遇到了国王的反对，国王以一种近乎宗教的虔诚来履行对他那些共济会会友[33]的义务，我多日未去视事也未能打消他的这种反对态度，我便起了请求辞职的念头。现在，二十多年后，我重新阅读有关的文件时，深感歉意，我当时在坚持我对国家利益的信守和维护我个人对国王的敬爱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时，我选择了而且不得不选择了前者。我今天深感惭愧的是，国王的亲切仁厚，容忍了我在职务上的拘谨固执。我本来应该为了他和他的共济会信念而牺牲我国驻佛罗伦萨的代表机构。1869年2月22日，陛下写信给我： 149

递交此信的人（内阁枢密顾问韦尔曼）向我报告了您委托给他的关于您自己的事。您怎么能够想像，我会同意您的考虑！我的最大幸运就在于[①]能和您生活在一起并且一直有巩固的谅解。您怎么变得如此多疑，我的唯一的一次不同意见竟使您采取最极端的步骤！您曾经从瓦尔辛写信给我，谈及在弥补赤字的问题上产生的不同意见时说，虽然您的见解

① 原稿上在“我的最大幸运就在于”下面画有双线。——德文本注

和我不同，但是在采取您的态度时，您有责任在向我表述您出于本分所考虑的意见之后，照例是接受我的决定的。这次究竟是什么使您完全改变了仅仅三个月以前您高尚地表述的意向？我重复一遍，我们之间仅有的唯一不同意见，就是关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34]问题的不同意见。对于 Usedomiaua[35]，我昨天已以书面形式十分详细地按照您的愿望做了处理；内部事务可以调解；关于人员安排我和您是一致的，但是有些人却不愿意！有什么理由要采取极端措施呢？

您的名字在普鲁士历史上将比任何一位普鲁士政治家更加光彩照人。我还能放您走吗？永远不会。宁静和祈祷①将弥合一切。

您最忠实的朋友②威廉

次日，我收到了罗昂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柏林，1869 年 2 月 23 日

我尊敬的朋友，昨晚离开您以后，我不断地思考着您和
150 您的决定。这使我放心不下。我必须再次向您呼吁：您写信表达必须留有回旋余地。或许您还没有寄发，那就还可以修改。请您注意，昨天收到的几乎是温情的便笺提出了真实的要求，虽然这并无充分证据。便笺这样写并且要求不要把它看作一枚伪币而要看作一枚十足的真币；还请您考虑，真币

① 原稿上在“祈祷”下面画有双线。——德文本注

② 原稿上在“朋友”下面画有三线。——德文本注

中搀和的合金不过是一种假装羞怯的铜，对此，写便笺的人不愿意并且考虑到处在那样的地位也不可能承认：我做了很错误的事，愿意改正。

您焚船而走，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您不应该这样做。如果这样做，您就在国人面前毁了自己，整个欧洲都会嘲笑。指导您的动机不会被理解；人们会说：他对实现他的事业感到绝望了，因此抽身而去。我毋须多言，不过是想表述我忠贞不渝的情谊罢了。

您的　冯·罗昂

我撤回辞职请求后，收到如下一封信：

柏林，1869 年 2 月 26 日

我对韦尔曼的报告甚感惊异，遂于 22 日给您写了一封仓促而成的、但十分急切的便笺，希望您弃绝您的破坏性的计划；我可以设想，您在作出最后决定来回答我时，会听从我的意见——我果真没有错。您没有辜负我的期望，感谢，衷心地感谢！

关于使您一度想到辞职的主要原因，我是充分承认其重要性的；您可以回忆起，在去年 12 月您重新理事的时候，我是多么急切地请求您设法尽可能减轻负担，从而您不致重新被可以预见到的繁重的事务和大量的工作累倒。可惜的是，您认为这样地减轻负担是无法办到的，就连劳恩堡[36]都没有推卸，我在这种情况下的忧虑完全得到了证实，竟至于使您产生了极为不幸的念头和决定。照您的描述，如果在处理个

别事务中还出现困难的话，那么没有人比我更为惋惜的了。这种困难之一是祖尔泽的职位。[①]很久以前我就表示愿意为其调职出力，欧伦堡本人那时也深信这件事，但是事情没有成功便不是我的过错了。如果说乌泽多姆事件会给您增加类
151 似的事务，那也不能归咎于我，因为他写的辩护文书——这可不是我引起的——要求得到您的说明。如果说我没有立即同意您提议的对此事的处理，那么，您大概必定从我的惊讶中预料到了，当您告知我您已经采取的反对乌泽多姆的步骤的时候，我是带着这种惊讶接受您的报告的。这件事是在拉·马尔摩拉[37]事件开始平息不到三个月，在1月中旬您才告知我的，因此我还未能改变夏天致您的信中已说明的对乌泽多姆留在都灵一事的看法。2月13日[②]就乌泽多姆的事务活动向我提出的报告说，即使不对他进行惩戒性的审查，那么也要把他立即解职；我曾将此报告搁置数日，因为同时有消息说，凯德尔在您预先知道之下已要求乌泽多姆采取应付步骤。而且我还在都灵的答复到达之前，在2月21日就询问过您，您怎样考虑再次任命这一外交职位的人选，从而表明，我同意确认这个职位空缺。尽管如此，您在本月22日还是对韦尔曼采取了事件决定性步骤，导致这一步骤的动因应是乌泽多姆。您感到的另外一个动因想是我在听取内阁有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报告之后没有再次征求您的意见便确定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因为法律草案提案及其所附报告中您

① 内务部副国务秘书。——德文本注

② 应读作14日。——德文本注

对事件的见解和诸大臣的见解已经阐述得十分明确，而这份提案当时又要求我刻不容缓地签署以立即送交议院，因此在我看来，为确认我的观点和意图再次征求意见不必了。如果在内阁违背我往日的意见确定了解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问题的办法之前，向我报告这一情况的话，[①]那么在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下，通过交换意见就可以找到出路，并且避免意见分歧、避免失去必要的合作精神以及避免反复议事的麻烦等等，总之，就可以避免您公正地极为抱怨的一切。您所说的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立宪国家机器运转困难等等一切我都同意；我不能同意的只是这一种见解，似乎您和王国其他各位顾问得不到我的十分必要的信任。[②]您自己还说，这是从1862年以来我们之间第一次出现的不同意见，难道这足以表 152
明我对我的政府各机构不再信任了吗？在多么动荡的六年的时间中，我们之间从未产生过不同意见需要调解，任何人也不比我更珍惜这种幸运；但由此我们变得放任了，习惯于这种幸运，以至于现时一时的冲动——超过可以证明的程度——产生出令人震惊的动摇（Ebranlement）！是的，哪一位君主能够比我给予自己的首相以更大的信任呢？我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并且直至今天仍然向您寄发商讨当前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的私人信件，从而您可以相信，我并没有背着您做任何事。我曾向您寄发[③]过冯·曼托伊费尔将军在默麦尔事

① 这里需要时间的自由。——俾斯麦边注
② 俾斯麦在边上注：乌泽多姆。
③ 俾斯麦边注：命令！

件[①]中的信件，因为其中有一点在我看来是新的事情（：托特莱本：[②]），因此我想听取您的意见；我还曾将冯·博伊恩将军的信以及一些剪报告知您并附以说明：这些材料准确地重复了我多年来到处和在公开场合下表述的见解；所以我可以认为，我几乎不可能更增加我的信任了。您本人也不会要求我对在某些重要时刻对充分信任地向我提出的意见充耳不闻。

我在这里举出您信中所说的导致您目前这种情绪的几点原因，其他的不谈，我还想回顾您自己的说法：您称您的情绪是一种病态；您觉得疲倦、精力衰竭[③]，对安静的渴望笼罩着您。这一切我都充分理解，因为我和您一样也有这种感受；——我[④]能不能够、允不允许因此离开我的职位[⑤]？我不允许这样做，您也同样不允许这样做！您并不仅仅属于您自己；您的存在与普鲁士、德国、欧洲的历史如此紧密相连，不能允许您离开您参与创造的这个舞台。但是，为了能够全
153 部身心献身于您所创建的这个事业，您必须[⑥]减轻工作，我最恳切地请求您，给我提出各种建议。如果是讨论一般性事务，那么您可以不参加内阁会议[⑦]。德尔布吕克如此忠诚地

---

① 这里涉及的是默麦尔·提尔西特铁路。冯·曼托伊费尔将军的信促使国王再次改变了根据有关内阁大臣的报告而作出的决定。

② 托特莱本（Tottleben［Iwanawitsch］，1815—1884），俄国将军，曾参加1853—1856年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译者

③ 俾斯麦在边上注：因为什么？

④ 原稿上在“我”下面画有双线。——德文本注

⑤ 俾斯麦在边上注：不，但是应该信任在三千万臣民那里人们自己看不见的东西和应该相信一位大臣以职责来担保的东西。

⑥ “必须”两字之下原稿上画有双线。——德文本注

⑦ 俾斯麦在边上注：我是这样做的。

做您的帮手，许多事他可以为您代劳[①]。请您给我只送最重要的报告等等[②]。但是，最主要的是请您不要疑虑我经久不渝的信任和永志不忘的感谢！

您的　威廉

乌泽多姆被免职留用。国王陛下在这件事上不顾王国私人资财管理的惯例，命令从他个人资财中拨款以定期弥补他在职时的收入和备用期内的薪俸之间的差额。

（四）

我回过来记述我和摄政王的谈话。我就驻邦联议会公使职位问题说明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又谈到了总的局势，并且说："殿下在整个内阁里没有一个是有能力的国务活动家，全是些见识短浅的平庸之辈。"

摄政王说："您认为博宁见识短浅吗？"

我说："不这么认为；但是他连自己的书桌抽屉都收拾不好，更不用说一个内阁了。施莱尼茨是一位侍臣，不是政治家。"

摄政王激动地说："您是不是把我差不多看作一个懒汉？我自己将担任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在这些方面我懂。"

我表示了歉意并且说："如今，就是最能干的行政区长官若是

① 俾斯麦在边上注：他也是这样做的。

② 俾斯麦在边上注：还有？

没有一位聪明能干的书记官也不可能把他的行政区治理好，并且总是依靠这样的人；普鲁士君主国就更需要这样的人了。要是没有聪明能干的大臣，殿下就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政绩。内政方面的事务我接触不多；可是一想到施韦林，我就忧虑不安。他勇敢、诚实，他如果当个兵，会像他的祖先在布拉格城下[38]一样战死沙场；可是他缺乏深谋远虑。请殿下注视他的侧面；眉头上可以迅速产生计谋，法国人称这种特质为 primesautier①，但是他没有
154 像颅相学家[39]所寻求的蕴藏智谋的额头。施韦林是一位没有眼力的政治家，破坏的能力胜过建设的能力。”

谈到其他一些人见识短浅时，亲王同意我的意见。整个说来他竭力作为一种优遇让我出使彼得堡；我的印象是，由于我主动和他谈话而解决了他也感到不愉快的有关我的调任问题，他似乎感到松了一口气。觐见结束时，摄政王态度和蔼，而我自己也带着对他忠贞不渝的感情离去，而对那些靠亲王妃撑腰而使当时的摄政王处于他们的影响之下的追求官职之徒我则更为蔑视。

在新纪元时期，这位高贵的妇人起初还被视作内阁的奠基人和保护人。但是就在这个内阁期间，她的影响能起统治作用的时间也没有保持多久，而是很快就只能袒护一些不适于担任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大臣了。受到她袒护最多的大概是受到后来的但泽市长[40]文特尔及其他自由派官员影响的施韦林伯爵了。他身为大臣，却对摄政王闹独立性，甚至以书面方式取消摄政王的书面命令，说这些命令没有副署。有一次，内阁不得不请求摄政王签署一个他所不赞同的文件，他签字的字迹难以辨认，还压碎了笔

① 指一有暗示立即行动的人。——德文本注

尖。施韦林伯爵让人再次誊清文件，并要求签字字迹清晰。摄政王虽然照常签了字，但把文件揉成一团，扔到角落里去了，有人把它拾了起来展平才归了档。从我在1877年的辞职请求书上可以看出，皇帝在作出批复之前，也曾把它揉作一团。

(五)

1859年1月29日我被任命为驻彼得堡公使，但是在3月6日才离开法兰克福，并且在柏林逗留到3月23日。在此期间，我有机会对于奥地利秘密基金的使用获得一个实际的印象，在此以前我只在报刊上读到过涉及这一基金的报道。银行家莱文施泰因几十年来在我的上司那里并且接受他们的机密使命，同维也纳和巴黎的外交界领导人以至拿破仑皇帝有个人来往；就在我起程的那天早晨，他送给我一封信：

阁下，请允许我谨祝您一路平安，并顺利完成所负使 155
命，希望不久之后我们能在此再次向您祝贺，因为您的才华在祖国比在别国更能发挥作用。

我们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人物，需要活动的能力，人们理解这一点可能为时过晚。但是当今之世事态发展迅速，我担心，和平未必能够长久保持，尽管几个月来人们在努力弥补窟窿。

今天我完成了一件小动作，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当会带来硕果，详情容后奉告。

在维也纳，有人因您任彼得堡公使的使命而不高兴，因为他们把您视为他们的主要对手。

在那里把关系搞融洽，这是最好不过的，因为迟早这些大国会同我们达成良好的谅解的。

如果阁下愿意随意写几行字通知我，您个人并不倾向反对奥地利，那么就会有不可估量的益处。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常常说，我在实现一种思想时是不屈不挠，不达目的，决不休止。不过他还补充说，我既不热衷于荣誉，也不追求金钱。我引以为自豪的是，至今——感谢上帝——没有一个人由于和我来往而蒙受损失。

在您不在这里期间，我将愉快地为您效劳，料理您在这里或其他地方的事务。您或许未必能够从任何别的地方获得更高尚和更诚挚的效劳。

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阁下最忠诚的仆人　莱文施泰因

柏林，1859 年 3 月 23 日

我没有复信，在当天我动身去火车站之前，莱文施泰因先生在我居住的皇家旅馆拜访了我。他向我递交了布奥尔伯爵的亲笔介绍信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建议我参加一项金融事业，“每年肯定会给我带来二万塔勒尔的利润”。我谢绝说，我没有资金可投入，他回答道，这项事业不需要现金投资，我的投资是要求我：
156 在俄国宫廷，我在提倡普鲁士政策的同时，也提倡奥地利的政策，因为所谈的事业只有在俄国与奥地利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的情况下才能成功。我希望得到一份有关此项自愿效劳的书面证据，以便向摄政王证实我对布奥尔伯爵政策的不信任是有真凭实据

的。因此我向莱文施泰因提出，在这一很不确定的交易中，我可必须得到更为可靠的保证，而不能凭他口头几句话和布奥尔手写的保密的几行字为根据。他不想就提供书面承诺同我取得谅解，但把报酬增加至每年三万塔勒尔。当我确信不会获得任何书面的证明材料之后，我就请求莱文施泰因离开我这里，随即我便向房门走去。他跟着我下楼梯，用各种不同的说法谈论这个话题："请您多加考虑，与'帝国政府'为敌，是不可取的"。只是在我请他注意到楼梯很陡而且我的体质很好，他才急忙下楼离我而去。

这个中间人我个人早就认识，因为多年来他在外交部取得了一个颇受信任的地位，还因为在曼托伊费尔时期他常受外交部的委托来找我。他用大笔赏钱来维护他和下层官员的关系。

当我做了大臣并切断了莱文施泰因和外交部的这种关系后，还有人一再地试图恢复这种关系，其中就有驻巴黎的领事巴姆贝克，他曾多次找我并且指责我对像莱文施泰因那样在欧洲各国宫廷都享有这种"杰出人士"的地位的人态度如此粗暴。

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使我感到必须改变外交部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积习。部办公楼多年的守门人是一个老酒鬼，不能作为一个职员简单地解雇。我通过威胁要审查他，迫使他退职，因为他为了酒钱而让任何人来见我，这样他就"为金钱"而把我展览出去。他提出抗议，我做了说明使他哑口无言："我当公使的时候，您不是为了一个塔勒尔，当禁令特别严格时您不是为了两个塔勒尔就让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在任何时候都能来见我吗?"关于我自己的随从人员，也常有人告诉我说，莱文施泰因曾在他们身上花费过多的赏钱。在这方面特别积极的代理人和受贿者是曼托伊费尔和施莱尼茨留下的一些秘书厅职员，其中有一个官职不高却是 157

杰出的共济会会员。伯恩施托尔夫伯爵在其短暂的任职期间未能消除外交机构的腐败现象，大概是因为事务繁忙，又碍于伯爵的地位，对此类事情不能深察。我和莱文施泰因的会面，我对他的看法，他与外交部的关系等，在过了几个月之后，当口头禀报的机会到来，我便详尽地告知了摄政王。如果用书面报告的形式，我保证不会有结果，因为冯·施莱尼茨对莱文施泰因的庇护不仅影响到摄政王，而且还影响到亲王妃的左右[①]；亲王妃在阐明事实情况时并不认为应当客观地检查证据，而是倾心于为我的对手辩护。

① 参看1891年10月枢密顾问芒舍审判案所述。——德文本注

第十章　彼　得　堡

(一)

在欧洲各国历史上，一个大国君主为一个邻国效劳，像尼古拉皇帝对奥地利君主国那样，是很难再见到的。奥地利君主国于1849年处于危急之中时，尼古拉派遣十五万人的军队支援它，平定了匈牙利，在那里重建了国王的权力，并且既不要求任何利益或补偿，也不提两国间有争议的东方问题和波兰问题就撤军。尼古拉皇帝在奥尔缪茨时期[1]，在外交政策方面以牺牲普鲁士为代价而继续给予奥匈帝国的援助，并不比他在内政方面给予奥匈帝国的无私利的友好效劳少。即使他不是由友谊，而是由俄罗斯帝国的政策所指使，这种效劳也已经超过了一个君主对另一个君主通常所做的，这只有用非常专擅的和具有过分的骑士精神的专制君主才能解释。尼古拉当时把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看作是他在领导保守的三国同盟[2]方面的后任和继承人。他认为三国同盟十分巩固，足以对抗革命，而且他在谋虑维持这个同盟的领导权方面，对于弗朗茨·约瑟夫的信赖，胜过信赖他自己本国的后任[3]。他认为我们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现实政治方面担负领导作用的才能很低；他认为这位国王正如他自己的儿子和后任一样，不适

合去领导君主制的三国同盟。他在匈牙利和奥尔缪茨的行动是由于深信，他按照神的意志，负有使命成为君主国的领导人来对抗从西方迫近的革命。他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本性，但是与世隔绝
159 的俄国专制政治使他心如铁石，很奇怪的是，他尽管经历了十二月党人[①]以后的种种事件，他竟能保持住他这种理想主义的激情。

他如何感觉他和他的臣民之间的关系，有一件事实可以说明；这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亲自对我讲的。尼古拉皇帝请他派遣两名普鲁士近卫军低级军官来，以便照医生的处方进行背部按摩，按摩时病人应俯卧床上。同时他说："对于我的俄罗斯人，只要我能盯着他们的脸，就不愁对付不了他们，可是背上没长眼睛，所以我不能让他们到我身旁来。"谨慎地指派了两个低级军官，效力之后得到了丰厚的酬劳。这就说明，尽管俄国人民对于他们的沙皇怀着宗教式的献身精神，但尼古拉皇帝和他的臣民中间的普通人单独在一起时，对他本人的安全并不是放心无虑的；他的性格倔强，一直到生命终结，也没有让自己被这些忧虑弄得神志颓丧。如果当时我国王位上是一个像年轻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那样同他意气相投的人，那么，在当时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斗争中，他很可能会像偏袒奥地利那样偏袒普鲁士。为此，先决条件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本应巩固并利用1848年3月他的军队获得的胜利[4]；而这本不用像奥地利急需在布拉格和维也纳通过文迪施格雷茨、在匈牙利通过俄国人的援助采取进一步镇压那样就完全可以办到的。

---

① 指1825年12月6日在圣·彼得堡发生的密谋的参加者。——德文本注

我出使期间彼得堡社会可以分为三代人。其中最尊贵的是受过欧洲式和古典教育的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间的达官贵人，他们已经凋谢殆尽。属于这一类人的有缅施科夫、沃龙佐夫、勃卢多夫、涅谢尔罗迭，就精神和教育而论，还有哥尔查科夫，他由于过度的虚荣心而与上列人士相比则较为逊色。他们都受过古典式教育，他们不仅能够流利地说法语，还能流利地讲德语，属于欧洲文明的精华。

第二代人和尼古拉皇帝年龄相若，或受到他的影响，在他们的言谈中通常只有宫廷事件、戏剧、升迁和军事见闻。在这些人中作为例外而在精神上与老一代相近的有老奥尔洛夫公爵，他的性情、礼让和对我们的信赖都很突出；阿德列尔贝格伯爵和他的后来成为宫廷大臣的儿子，彼得·舒瓦洛夫是我与之交往的人士中间最有见识的人，但是他缺乏勤奋精神，难起领导作用；苏沃 160
洛夫公爵，他对我们德国人最具善意，在他身上，德意志大学的活泼的回忆强烈地但并不是不相称地取代了尼古拉时代俄国将军的传统；铁道将军切夫金[5]，机智锐敏，正如具有特殊聪慧头脑的畸形人所常有的那样，他和苏沃洛夫公爵经常争吵不休却又同他保持着真诚友谊；最后还有彼得·冯·美延多尔夫男爵，在老一辈政治家中间他对我最为意气相投，他早年担任过驻柏林公使，就其所受教育和儒雅风度而论，更是属于亚历山大时代类型；他凭了机智勇敢从一个参加过对法远征[6]军团的青年军官，飞黄腾达成为一个国务活动家，他的意见颇受尼古拉皇帝重视。他在柏林的家和在彼得堡的一样殷勤好客，令人喜爱，这主要由于他夫人的作用；她具有男人般的智慧，优雅，端庄，和蔼可亲，比她的姊妹、法兰克福的冯·布林茨夫人更明显地证实了一件事实：布

奥尔伯爵家族遗传的聪明才智是按母系继承下来的一种采邑[7]①。她的弟弟，奥地利大臣布奥尔伯爵，却没有继承能领导一个强大君主国的政治所必要的才能。姊弟二人相互对立，有如俄国政策和奥地利政策之不相接近。1852 年我以特殊使命出使维也纳[8]时，姊弟之间的关系还是这样的：冯·美延多尔夫夫人有意协助我完成对奥地利的友好使命，无疑，这里她丈夫的指教是起决定作用的。当时，尼古拉皇帝希望我们和奥地利达成和解。一两年以后，在克里木战争期间，一次谈到我被任命出使维也纳的时候，美延多尔夫夫人对她弟弟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来表明：她希望我到维也纳去“好让查理气得肝痛”。美延多尔夫夫人作为丈夫的妻子算得是俄国的一位爱国者，而且从她个人情感来说，不用说也不会赞同布奥尔伯爵推动奥地利奉行的那种敌意的、不知感恩的政策的。

年轻的第三代人在社交上表现得最缺乏礼貌，时常表现出恶劣的举止，对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事物通常比上两代人怀有
161 更强烈的反感。如果因为不懂俄语而用德语向他们讲话，他们便佯装不懂德语，出言不逊，或者根本不回答；他们对文职官员也缺乏在穿军服戴勋章的人士中间通常应有的礼节。根据警察局的有意安排，外国政府的代表的仆从都要佩戴金银丝带并穿为他们特制的衣服以资识别。这一做法实属必要。如若外交使团人员因为不习惯于穿制服戴勋章上街，就会与警察当局和上流社会人士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以致导致冲突；一个没有勋章、别人不知其贵人身份的文官，在街上或船上就常常遇到这种不愉快事情。

---

① 俄文本改为财产。——译者注

在拿破仑时代的巴黎，我也见到过同样的景象[9]。如果我在那里居住的时间更长一点，那么我一定会习惯于法国的习俗，不佩戴勋章就不上街。我曾经看到，在一个节日里，几百人拥挤在巴黎的一条林荫道上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因为他们由于调度不当而处在两支从不同方向开来的军队之间；警察不明拥塞的原因，便挥拳扑向群众，又施展了巴黎人惯用的脚踢，直到劈面碰到一位佩戴勋章的先生才住手。红色的绶带至少使警察倾听佩戴绶带者的抗议，并使他们终于明白，骚动不安的人群是因为被两支军队所夹住，走投无路。警察很激动，警长便开了个玩笑来摆脱自己的困境，他指着那些起初他没有注意的跑步列队前进的文森射手说："真是这样，得把他们赶走"。包括被殴打过的人在内的人群中发出了笑声，幸免拳打脚踢的人在散去时对这位佩戴勋章的人表示感谢，多亏他在场才拯救了他们。

在彼得堡，如果不是因为往来距离很远，人们上街必需乘马车带上穿金银丝边制服的仆人而不能步行的话，那么我认为上街时佩戴一枚俄国比较高级的勋章也是需要的。如果穿便服骑马出游而没有马夫伺候，就有受到那些豪门显贵的服饰鲜艳的马车夫（如果免不了要同他们接触）的詈骂或冲撞的危险。谁能驾驭 162
马匹而手里又有一条鞭子的话，在遇到这类冲突时，他要求享有与马车主人有同等的权利是合理的。彼得堡近郊为数不多的骑马人，可以设想通常都是德国或英国商人，他们处于自己的这种地位都尽可能地避免这类不愉快的接触，并且宁愿忍受屈辱，而不向当局申诉。军官中只有很少数人使用城市内外的优良的跑马驰道，而且他们大都是德意志人出身。上级机关曾作过努力，想培养军官们增强对骑马的爱好，但效果并不持久，结果只是在每次

鼓励之后的几天之内，皇帝的华丽马车比平时多遇到一些骑马人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军官中间公认的最佳骑手是两位海军上将康斯坦丁大公和缅施科夫公爵。

除了骑马术之外，在良好举止和社交风格方面，当时的青年一代不如尼古拉皇帝时期的上一代人，这两代人从他们的欧洲式教育和整个教养方面看又不如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老一辈的达官贵人。尽管如此，在宫廷圈子和“交际场合”以及在由女士们统治的贵族宅第中，依然保持着完美和良好的风范。但是，在宫廷或主要是妇女的影响不能控制的环境中所遇到的青年人，在礼仪作风方面则大为降低。我并不想作出判断，我的这种觉察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用青年一代对往日有力的德国影响的一种社会反应来说明，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自从皇帝亚历山大一世时代以来俄国的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准的降低来说明，或许可以用巴黎社会的发展对俄国上流社会的感染来说明。良好的举止和完美的礼节如今在圣日耳曼近郊区[10]以外的法国统治阶层中已不像以前那样普遍了，也不像我和老一辈法国人、法国女士的交往中以及在各种年龄的俄国女士那里还讨人喜欢所看到的那样了。此外，我在彼得堡所处的地位不驱使我去和年轻一代密切交往，所以，我在那里的逗留给我留下的都是愉快的回忆，这我要感谢宫廷和老一辈先生和女士们的盛情好意。

163 不久以后，青年一代的反德情绪甚至在与我们的政治关系这方面也使我和其他人察觉得到。随着我的同行哥尔查科夫公爵对我越来越表现出控制着他的那种虚荣心，这种反德情绪就越来越增强了。他把我视作一位年轻的同行，并且要求对我的政治教育发挥作用，他对我的好意无微不至，他对我充分信任，其表现出

来的方式已超过外交官所允许的界限；他这样做或许是出于某种估计，或许是为了要在一个同行面前炫耀自己，使我相信这种令人惊羡的了解。尽管他的这种感情保持多久，一旦我作为普鲁士大臣使他的个人的和国家的优越感的幻想不再可能存在的时候，这种关系就保持不下去了。Hinc irae（愤怒由此而来）。[11]一旦我独立地作为德国人或普鲁士人或对手在欧洲和在历史政论界开始赢得声望，他的好意就转变成了敌意。

这个变化是1870年之后开始的，还是在这一年之前开始而我没有发觉，我且不论。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么我可以引证值得尊敬的和对于俄国宰相来说有理由的动机，即认为在1866年之后[12]我们和奥地利之间的疏远也将依然会长期存在下去这个错误的估计。1870年，我们乐意地支持了俄国的政策，使它摆脱巴黎协定[13]强加给它的在黑海上的限制。这种限制不合情理，长久地禁止沿本国的海岸自由航行对于像俄国这样的强国来说是不堪忍受的，因为这是凌辱。而且，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阻止俄国将其过剩的力量用于东方，从来就不符合我国的利益；如果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下和在欧洲列强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同这些国家不存在政治利益方面某种竞争像迄今为止我们和俄国之间的状况那样，那么我们是应当高兴的。如果不是自由派蠢货或王朝的失误把形势搞乱，我们和法国将决不会和平相处，我们和俄国则决没有必要打仗。

（二）

当我在彼得堡皇村或彼得霍夫宫逗留的时候，即使只是为了

同夏季在那里居住的哥尔查科夫公爵举行会议，我发现在我住的
164 宫中寓所里为我和我的随员准备着有很多道菜的早餐，还有三四种品味极佳的酒；有的酒是我在皇帝餐桌上从未见过的。在御膳管理中肯定盗窃现象严重，不过皇帝的宾客并不因此受损；相反，宾客的膳食故意做得能有大量剩余，好让“仆人”享用。贮藏室和厨房是绝对无可指摘的，即使偶然无人监督，也仍然如此。宫廷侍从们可能由于经常品尝宴席剩余美酒，积多年之经验而获得了高度的品尝能力，因而不能容忍胡乱烹调，影响食品质量。就我所知，宴席的费用的确很高。在我的保护人、寡居的夏洛特皇后[14]、我们国王的妹妹招待我时，我得到了宫廷殷勤好客的印象。后来御膳房为与我一起被邀的使馆官员准备了两次午宴，为我则准备了三次午宴。在我的寓所里，为我和我的随员准备了早餐和午餐，估计我们可能会吃尽喝光，好像我和我的随员没有得到皇后的宴请似的。给我使用的那一套餐具及其附属物曾摆在我住的房间里又被收走，又和我随员的餐具一道摆在皇后的筵席上，不过在这里我也没有动用，因为我是在皇后病床前没有随员陪伴而和很少数的人进餐的。在这种场合代替祖母欢迎宾客的通常是洛伊希滕贝格公主①（后来是巴登的威廉亲王的夫人），她正当青春年华，美丽动人，幽娴贞静，欢愉开朗。我还回想起，在另一场合四岁的幼小的女大公绕着有四位宾客的桌子跑，不肯对一位高级将军表示像对我那样的礼节。这个幼小的女大公对祖母的责备的回答是：对于我说他可爱，可是对于将军竟天真地说：他讨厌。我真是受宠若惊。这个幼小的怪僻的大公立即被带

① 玛丽娅·马克西米里安诺芙娜。——德文本注

走了。

一些友好的俄国朋友曾经亲密地向久住在一座皇宫里的普鲁士军官们询问：他们是否真的吃掉了他们所要求的那么多酒和食品；如果真是这样，他们的胃口可真值得羡慕，而且将继续满足他们的需求。从亲密的询问中得知，他们的食量也属中常；在他们同意下，检查了他们所住的房间：发现在他们所不知道的壁橱 165
中贮藏了大量价值昂贵的酒和其他食品。

大家知道，有一次皇帝对于普鲁士亲王每次来访所耗费的大量脂油感到惊奇，最后查明，亲王第一次来访时骑马擦伤，在晚上要求提供一些脂油。可是在以后多次来访时，那十克脂油变成了一普特脂油了。在上层统治集团之间私下做了解释并引起哄笑，才算原谅了参与此事的有过错的人。

1859 年我第一次来到彼得堡时，看到了俄国人的另一个特性的事例。早春时节，当时宫廷里的人都到保罗宫和涅瓦河之间的夏苑散步。在那里，皇帝吃惊地发现在草地中间站着一个哨兵。当询问那个士兵为什么在那里站岗时，他只回答："这是命令。"于是皇帝命副官去询问警卫室，得到的解释也只是说，这个岗哨冬夏都有，谁最初下的命令已不得而知。在宫里，这件事成了日常的话题，也为仆役们所知。他们中间有一位领退职金的老人说，他父亲和他在夏苑中偶尔从岗哨旁走过时对他说过："他还一直站在那里，看守花卉。叶卡特林娜女皇曾经得知在这里一棵雪花开得不寻常地早，便下令说，注意别让人把它摘走。"为了执行这一命令，派了一个哨兵，从此哨兵年复一年地站在那里。诸如此类的事引起我们的批评和哄笑，但是，这里反映出了一种基本的力量和坚持不渝的精神，与欧洲其余各国相对立的俄罗斯的本

质的力量就植根于此。这使人想起，1825 年[①]彼得堡水灾期间的岗哨和 1877 年在席普卡山口[15]的岗哨没有被替换，前者在岗位上被淹没，后者在岗位上冻死。

（三）

在意大利战争[16]期间，我还相信作为驻彼得堡的公使有可能影响柏林的各种决定，正如我在法兰克福时尽力这样做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绩那样；使我不明白的是，我为此目的而在写报告时
166 付出的巨大精力竟不得不完全成为徒劳，因为我向皇帝呈送的报告和以亲笔信传达的消息或者完全没有被摄政王收到，或者被加上评注，使之失去任何印象。我的辛劳除了使我的由于药物中毒引起的疾病复杂化外，只得到这样一种后果：我准确地报道了皇帝的情绪反而引起怀疑，竟派来了以前任过彼得堡武官的明斯特伯爵来监视我。我可以向跟我友好的监视者证明，我的报告的根据是哥尔查科夫给我看过的皇帝在俄国外交官报告边白上所作的亲笔批注，此外，还根据我在内阁和宫廷中的一些私人朋友的口头通知。让我看皇帝的亲笔批注可能是有意泄露，以便让它的内容以不太使人恼怒的方式传到柏林去。

使我得悉特别重要报告的各种各样的方式表明了当时政治棋盘上走棋的特征。有位信任地向我提供了这类情报的先生在门口告别时又转过身来说："我第一次透露机密还会迫使我做第二次。您自然会把情况报告柏林，不过请您不要使用您的某某号密码，

① 彼得堡被水淹没发生在 1824 年 11 月 19 日。——德文本注

这号密码我们多年前就已破译了，并且根据事物的情况，我们的人会断定是我走漏消息。此外您还要为我做一些合心意的事，即不要突然把已被破译的密码弃置不用，在几个月以内还要用它来发无关紧要的电报。”当时这件事使我安心，我相信俄国人可能仅仅掌握了我们的一套密码。在彼得堡保护密码是特别困难的，因为任何一个使馆在自己的馆内也不能不使用俄国下级僚属和仆役，而秘密警察在他们中间安插代理人很容易。

在奥法战争[17]期间，亚历山大皇帝在和我的一次亲密谈话中抱怨德国各邦君主在同皇帝家族的通信中批评俄国政策的激烈而又伤人的语调。他以愤慨的语言结束了他对自己亲戚的抱怨：“使我不快的是，德意志各邦君主、我的表兄弟们把他们的粗鲁无礼的话通过邮递寄来，为的是确能让我亲自听到他们的话[18]。”皇帝在做这番表白时并无恶意，他坦率地认为：即使通过通信这样的 167
途径，了解俄国邮局递交的信件的内容，这是他的君主的权力。

在维也纳，从前也有类似的安排。在铁路建成以前有一段时间，普鲁士信使刚刚越过奥地利国界，就有一个奥地利官员跳上车来，在信使的协助下以职业上的熟练打开电报，作出摘要，重新封好，然后送交驻维也纳的使团。甚至在这种做法已经终止的时候，以普通邮件寄给普鲁士驻外公使的信件还被当作是寄给维也纳或彼得堡从一个内阁给一个内阁的公文的一种谨慎方式。内容被双方看作一种暗示，当根据社交用语的利益，需要削弱这种不愉快的消息的作用时，人们就有时利用这种暗示的形式。图尔恩和塔克西斯[19]的邮政是怎样对待书信秘密的，可见于我 1858 年 1 月 11 日致曼托伊费尔大臣的书信：

我已经打电报紧急请求不要通过邮局把我的有关布卢姆菲尔德勋爵对本廷克事件有怨言的秘密报告寄给在卡尔斯卢厄的弗莱明伯爵，因为这样会使奥地利了解到它的内容。如果我的请求为时过晚，那么我在许多方面就会陷入一种不愉快的窘境，其解脱办法除了在莱希贝克和我之间发生个人冲突之外几乎别无他途。正如我对他的判断和奥地利有关书信秘密的一般观念那样，即使证据是从被打开的信件中夺取来的，这也不能阻止他利用这些证据。我宁可相信他所作的明确表示：电报之有意送交邮局，只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帝国政府收悉。

1852 年我领导驻维也纳使馆时，就在那里碰到这样的习惯：一位公使编写报告时，必须把柏林方面命令他编写报告的指示原件送交奥地利外交大臣过目。这种对工作无疑有害的习惯实际上使公使沟通情况的作用变为多余，但它却是根深蒂固的。当时几十年来在维也纳长大的使馆办公厅长官得知我下令禁止这一做法
168 时特来见我，并对我指出，我们突然改变多年的惯例，会引起帝国官厅极大的不信任；特别是将会对我产生怀疑：我对布奥尔伯爵施加的影响是否真正符合给予我的指示的精神和柏林政策的意图。

为了防止外交部官员的不忠实，维也纳有时采取了十分暴烈的措施。我曾经得到一份奥地利秘密文件，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一句话：

考尼茨查不清楚四个官员中究竟是谁背叛了他，便下令

用一艘装有活塞的船只把四个人全都淹死在多瑙河里。

关于淹死官员的事情，我在1853年或1854年与俄国驻柏林公使布德贝尔格男爵的一次笑谈中也曾涉及。我提到一个官员，说我怀疑他在执行委托给他的任务时，是在代表另一个国家的利益。布德贝尔格说："如果这个人不合您的心意，那么您可以把他送到爱琴海上，我们在那儿有办法使他消失。"我有点不安地问道："您们要把他淹死?"他笑着继续说："不，他将在俄国内地消失，如果这个人看来很能干，过些日子他就会作为一个心满意足的俄国官员再度出现。"

(四)

1859年6月上半月我去莫斯科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旅行。对这个古老京城的访问正值意大利战争时期，我成了当时俄国人仇恨奥地利的值得注意的事例的见证人。当总督多尔哥鲁基公爵引我参观一个图书馆时，我在一个下级官吏胸前佩戴的许多军功勋章中看到了一枚铁十字勋章。我询问他铁十字勋章是怎样得来的，他提到库尔姆战役。[20]这个战役之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向俄国士兵颁发了一批样式略加改变的铁十字勋章，即所谓库尔姆铁十字勋章。我向这位老兵祝贺说，时过四十六年他依然精力充沛。他回答说，只要皇帝允许，就是现在他也会参战的。我问，他准备和谁打仗——和意大利还是和奥地利？他挺直腰杆声调激昂地回答说："永远反对奥地利。"随即我使他注意到，在库尔姆战役时奥地利毕竟是我们和俄国的朋友，而意大利是我们的敌

人。此时他一直保持军人挺直的姿势并以俄国士兵对军官谈话时
169 的高声和清晰的语调回答说："诚实的敌人比虚伪的朋友好。"这个直截了当的回答使多尔哥鲁基公爵欣喜若狂，转瞬间将军和下级军官互相拥抱起来，热烈地互亲面颊。这就是当时在将军和下级军官中间的俄国的反对奥地利的情绪。

下面我和奥博连斯基公爵的通信是对我的莫斯科之行的纪念。

莫斯科，1859 年 6 月 2 日

最近阁下参观莫斯科古迹时，对我国古代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文物古迹极为注意。克里姆林宫的古老建筑、历代沙皇宫廷生活的实物、总主教图书馆[21]的希腊文珍贵手稿，这一切都激起了您的求知欲。阁下对这些文物古遗迹的有学识的评议证明您不仅富于外交方面的知识，而且对考古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一位外国人对我国古迹能予以如此重视，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俄国人和闲暇时间从事考古研究的人来说，倍加亲切。作为对您在莫斯科的短暂逗留和我有幸与您的愉快结识的纪念，请允许我向阁下奉送一本《选举沙皇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及其登基记略》。本书虽然并不甚精美，但因其古老而罕见，您可在插图中看到引起阁下兴趣的克里姆林宫的建筑物及其他事物。

顺致敬意

米·奥博连斯基公爵[22]

彼得堡（1859 年 7 月）①

在莫斯科承蒙殷勤接待，又蒙阁下惠书，如无重大原因而拖延四个星期之久不作答复，那我将是极为忘恩。我回来后即得了一种类似风湿病的重病，剧烈的关节性风湿病的疼痛使我几乎一个月足不出户，间或有所好转，就得处理积压的事务。至今我还不能行走，但总的来说，感觉稍有好转，因之我试图遵从我国政府的指令，返回柏林。公爵大人，请原谅我谈到这些细节，不过为说明我久未复信的苦衷，实属必要。

我曾希望，由于复信延迟，我可以随信奉告柏林对您殷 170
勤地托付我转致国王陛下的信件的答复。但我还未收到这一答复。不过，公爵大人，在我起程之前，我不能不向您说，我深为您在您所领导的部门和您所居住的京城接待我的敬重和友好情谊所感动，您向一个外国人显示了民族的好客精神的高尚范例。您惠赠我的精美著作，将永远成为我的图书室中的珍品和使人回忆起善于集学者的贤明和显贵的尊严于一身的一位俄罗斯贵族的实物。

顺致敬意

冯·俾斯麦[23]

（五）

1859 年 6 月，我对彼得堡的气候还没有习惯，在很热的跑马

① 根据草稿。——德文本注

场持续骑马奔驰之后，没穿皮大衣便上路回寓所，半路上还停下来观看了新兵操练。第二天便感到周身关节风湿性疼痛，后来我不得不与这种疾病作长期的斗争。当临近我起程把妻子接到彼得堡来时，已大致痊愈，只感觉左腿轻微疼痛；这条腿于1857年去瑞典打猎时由于撞在岩石上而受到损伤，[①]又由于治疗不经心而成了抵抗力较弱的部位。在我出发之前，以前的巴登大公夫人[②]给我推荐的瓦尔茨大夫向我开了一种治病药方，我因觉得疼痛很轻微，便表示没有必要使用这种药。他保证说，旅途中病痛可能变得严重起来，应该防患于未然。药对人毫无伤害：在膝腘敷上一贴膏药，不会引起任何不适，几天之后会自行脱落，只留下一个小红点。我对于这位海得尔堡[③]的医生以前的经历一无所知，因而不幸听从了他的劝告。我贴上膏药并熟睡后四个小时，一阵剧痛把我惊醒，我立即把膏药揭掉，却无法把膏药的残余部分从已被腐蚀伤害的膝腘处清除干净。几小时后，瓦尔茨来了，试图用一个金属片从手掌大小的受伤面上刮下黑色的药膏。疼痛难
171 忍，而效果也不能完满，毒药的腐蚀性作用依然存在。尽管那些使我决定选择了他的评价很高的推荐，但是我终于明白了瓦尔茨大夫的不学无术和极不诚实。他本人带着歉意的微笑，使人相信地说，是膏药的配料过猛了，这是药剂师的过失。我派人向药剂师索取药方，回答说瓦尔茨已取走；而按他本人的说法，药方已不在他那里。谁是掺毒者，我不得而知，只从药剂师得知，膏药的主要成分是用于配制所谓长效斑蝥硬膏的，而且据他记忆，这

① 参看本书第一卷第223页（中文本第159页）。——德文本注

② 史丹方妮，巴登大公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的夫人。——德文本注

③ 应是卡尔斯卢厄。——德文本注

种东西确实都是用大剂量。事后有人问我，这是不是预谋要毒害我；我说这不过是江湖庸医的愚昧无知和厚颜无耻而已。

由于守寡的巴登大公夫人索菲娅的荐举，他成了彼得堡所有儿童医院的院长。我后来查明，他是海得尔堡的一个大学创办人[①]的儿子，上学时很不用功，考试一次也不及格。他的膏药损伤了我的一根静脉，为此使我遭受多年痛苦。

我一心想就诊于德国医生，便于7月走海路经施德丁去柏林；剧烈的疼痛使我求助于同船的著名外科医生皮罗戈夫；他想把我的腿截去，我问他从膝盖上方还是下方，他指了指离膝盖上方很远的地方。我谢绝了他，在柏林遍试各种治疗均无效果之后，便在诺海姆接受了马尔堡的贝内克教授指导下的浴疗法，效果显著，恢复到可以走路和骑马，在10月还陪同摄政王前往华沙去会见沙皇。在返回彼得堡途中，我于11月访问霍亨道夫的毕洛夫先生，这时在受伤静脉中产生并形成的血栓，根据医生的见解已裂散，已进入血液循环系统，并引起了肺炎，医生认为这是不治之症，可是经过几个月的病痛以后，我居然康复。一个濒临死亡的普鲁士人当时对于委托监护人的职责的印象，我至今还很强烈。在医生对我做了判决之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书面留下我临终的遗嘱，这个遗嘱不允许法庭干涉我的委托监护人的职责。对这事放下心来之后，我就甘心地等待生命的终结，忍受不堪忍受的痛苦。1860年3月初我的病已好转，可以到柏林去，在那里我一面静待康复，一面参加了贵族院会议，一直停留到5月。[24]

---

① 应是卡尔斯卢厄的内阁参事瓦尔茨。——德文本注

172

第十一章　过渡状态

(一)

这几个星期之内，冯·霍亨索伦公爵和鲁道尔夫·冯·奥尔斯瓦尔德向摄政王提议任命我为外交大臣。由此在宫中形成了一种枢密院式的机构，由霍亨索伦公爵、奥尔斯瓦尔德、施莱尼茨和我组成。摄政王主持会议，以要求我阐明我所提出的纲领开始。我根据后来我作为大臣所遵循的方针陈述了这一纲领，而且说得极为坦率，指出我国政策最软弱的方面就是对奥地利软弱无能；我们的政策，从奥尔缪茨协定[1]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即在意大利危机[2]期间，是被这种软弱所支配。如果我们能和奥地利协商一致解决德意志的任务，那当然最好不过。但是，这只有使维也纳确信，在相反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惧怕决裂和战争，才有可能。保持为我国政策所希望的与俄国的联系，在和奥地利对抗的情况下比在和奥地利合作的情况下反而容易。但是据我对彼得堡宫廷及其中各派主要势力了解的情况看，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也并非决不可能。由于克里木战争[3]和波兰骚乱[4]，我们在那里有他们的欠账，只要巧妙地加以利用，我们就可能既和奥地利达成谅解，又不致和俄国决裂；我所担心的只是，与奥地利的谅

解由于那里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过低估计普鲁士的力量而将会归于失败，至少只要奥地利不相信我们对可能的决裂和战争已作好充分准备，是不会成功的。鉴于近十年来我国执行的那种政策，维也纳已不相信有可能出现这种前景；在那里，人们已习惯于奥尔缪茨协定所造成的状况，把它视为持久不变的状况，而没有看到，或者早已忘记，奥尔缪茨协定之所以产生，主要因为当 173
时基干人员分散而造成了一时不利于我们的情势，还因为在奥尔缪茨协定时期俄国实力的全部重量都加在天平盘上的奥地利一边这一事实，而在克里木战争以后，俄国的力量就不再加在那里了。但是1856年以后奥地利针对我们的政策依然苛求无餍，和过去尼古拉皇帝站在他们一边反对我们的时候完全一样。如果我们屈从于奥地利的妄想，倒使人想起用粉笔画圈子把公鸡圈起来的实验。奥地利的自信、善于巧妙地利用舆论和一大笔秘密基金，这一切使布奥尔伯爵坚持奥地利的幻想，只要普鲁士准备冲破粉笔线的魔术，他也无视普鲁士所处的强有力的地位。至于为什么要提起奥地利的秘密基金，摄政王是知道的[5]。

在我阐明我的观点之后，施莱尼茨便说出他的观点来与我对抗。他在发言中联系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6]的遗嘱，因而巧妙地拨动了在摄政王的情感中总能得到反响的那根琴弦，大肆渲染说，如果我们不同奥地利保持关系（虽然这种关系使我们有正当理由感到痛苦），我们就会遭遇到来自西方（巴黎）和我国内部的疑虑和危险的威胁。他还描绘了引起当时舆论界关心的俄法结盟的危险将会发展，而普俄结盟的可能性据说是受到舆论的谴责的。具有特征性的是，施莱尼茨口若悬河地刚一讲完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陈述后，摄政王便又发言，明确声明，为遵从祖辈传

统，他决定赞同施莱尼茨大臣的观点，讨论便就此结束。

大臣话音方落，摄政王立即作出决定，其行动之敏捷使我设想，整个这出戏都是事先准备好并按照亲王妃的旨意串演的，为的是礼节性地听取一下冯·霍亨索伦公爵和奥尔斯瓦尔德的意见，虽然她当时并不同意这两个人的见解，也不同意他们通过吸收我参加以加强内阁的意图。

亲王妃对她的丈夫和大臣都具有巨大的影响，不过我认为，她的政策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她个人的反感情绪，而不是确定的目的。她的反感情绪是针对俄国、路易·拿破仑（我和他的关系受
174 到怀疑）的，因为我倾向于保持独立见解，并屡次拒绝在摄政王面前把他尊贵夫人的观点作为我自己的观点加以辩护，她的反感也针对我。她对别人的好感也能起同样的作用。冯·施莱尼茨先生在政治上是她的工具，是对她唯命是从的宫廷侍从，没有自己的政治信念。

（二）

冯·霍亨索伦公爵通过这件事确信，亲王妃和施莱尼茨比他势力大，不久以后事实上便放弃了他的职责，虽然他在1862年9月以前名义上还是内阁首相。领导权即使从表面上看，也转移到了奥尔斯瓦尔德手中；我在柏林期间，与他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他为人十分和蔼可亲，具有突出的政治才干；两年后我担任内阁首相时，他给予我友好的支持：例如他批驳了王储对我国前途的疑虑和忧心；这些疑虑和忧心都是英国灌输给他来反对我这

个所谓的亲俄派的，后来竟导致了但泽宣言[7]。在他弥留之际①曾请求王储来看他，明确地向王储提醒说，他的反对派可能给君主政权造成莫大危险，并说服亲王坚持站在我一边。

1861 年夏天，内阁内部发生激烈争执[8]，这可见于军政大臣罗昂 6 月 27 日的信中：

柏林，1861 年 6 月 27 日

关于目前严重的忠诚宣誓问题，整个情况你大概已经了解。事情已激化到了决裂的程度。国王不把自己以及王位永远毁掉是不会让步的。大多数大臣同样也不会让步；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是不道德的剖腹自杀，在政治上毁灭自己。除依然保持不服从之外，他们不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在这个燃眉之急的问题上，我采取了完全对立的立场，时至今日，我和（爱德温·）曼托伊费尔竭尽心力阻止国王屈服。如果我这样劝谏他，他是会接受的；我希望上帝，在我表示同意之前，麻痹我的舌头。可是我很孤立，完全孤立；爱德温·曼托伊费尔今天到城堡[9]中去了。昨天国王终于允许我为他物色其他的大臣。他的看法令人不安，他认为除了施塔尔和某公外，再没有人同意在国王登基时举行忠诚宣誓。请 175
问，您是不是认为可以把历来的对君主的忠诚宣誓视作对宪法的攻击呢？如果您对此的答复是肯定的，那么我就自认错了，因为我设想您的看法和我是一致的。如果您赞同这一看

① 奥尔斯瓦尔德死于 1866 年 1 月 15 日。——德文本注

法，并且认为，我亲爱的伙伴们①认为自己不能[10]云云，是一种教义上的狂热，是遵循一种政治义务和一种党派的政治立场的结果，那么您也将没有犹疑地向国王进谏并且以适当的方式解决忠诚宣誓问题了。那样您就有办法毫不迟疑地开始已计划好的休假旅行，并请及时电告我。写上“是，我来”即可，当然能附上到达日期就更好了。不管忠诚宣誓问题怎样解决，施莱尼茨是无论如何要走的。这已成定局！不过成为问题的是，您接替他的职位还是接替施韦林的职位。看陛下的意愿，很可能是后者的职位，而不是前者的职位。不过这已是以后操心的事了。关键是要使国王相信，他可以组成他所需要的内阁而无需显示体制上的变动。此外，我向冯·默勒尔市长和冯·泽尔霍夫提出同样的问题，但还没有得到答复。时局令人担忧！国王苦恼不堪。他家族中最亲近的人都反对他，劝他委屈求和。上帝保佑，不要使他退让。只要他一退让，我们就会扬帆驶入议会主义统治的泥泞之海。

由于事务上的激动我战栗不安，因为日益增多的负担连同这种政治上的困境加在一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把我压垮。——但是良马虽然可以累死，但决不会拒绝服役。公务急迫，信文简短，尚请海涵。总之，意思是：我已破釜沉舟；如果国王退让，我决意离去，虽然这是不言自明的。

如施利芬所答应的，此信由英国信使交付给您。请即电复。

---

① 就是说那些自由派大臣。——德文本注

我于7月2日答复如下：

昨天正值风雨交加之时收到您托英国人送来的信，并且搅乱了我的愉快遐想，因为当时我本打算先到莱茵费尔德[11]啜饮基辛根酒，然后再去施托普明德度过安闲的时光。去打小山鸡呢，还是去见妻儿，我正在静静地考虑而犹豫不决之际传来了您的尖锐的不和谐的命令："上马出发！"自从病魔 176
使我身体元气遭到损伤之后，我变得懒散、委靡、心情沮丧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有关忠诚宣誓问题的争议，我不太理解它对于双方怎么竟会这样重要。如果国王按照传统的形式接受忠诚宣誓，那么我毫不怀疑，国王的行动决不与宪法抵触。国王有权在他所喜欢的时间和地点让他的任何一个臣民、王国的任何一个团体作忠诚宣誓；但是如果有人对我们的国王想要行使并可以行使的权力有争议，那么我就义不容辞，要来捍卫这项权利，虽然我本身并没有意识到举行这种仪式的实际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打电报给施利芬说，我认为新内阁应该赖以为基础的"所有权"是正确的，另一个政党的拒绝并就预防宣誓法案而大作文章，都不过是教义上的顽固不化而已。当我补充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势力地位时，我的意思是指我们能够完成职责所依凭的不是人选或才能，而是作为我们行动依据的纲领。我认为全部困难就在于此。根据我的印象，迄今我国政策的主要缺陷就在于：我们在普鲁士是自由主义的，而在国外却是保守的，廉价地看待我们国王的权利，而过高看待外国君主们的权利。大臣们所主张的立宪方针和陛下个人意志赋予我国外交

政策的正统主义方针这两者的二元领导的必然后果就是如此。我不能轻易地下决心继承施韦林[12]的职位，更不用说我眼下的健康状况也不允许去担任此职。但如果我继承施韦林的话，那么从内政方面看，我也觉得需要实行另一种色彩的对外政策。我认为只有我国“对外”政策的立场发生改变，国内的王权才能摆脱它事实上否则不能长期抗拒的压力，虽然我并不怀疑现有的抵抗办法也足够应付。内部的气压想必确实很强，不然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生活竟被施梯伯、施瓦尔克、麦克唐纳、帕茨克、特韦斯顿之类的平庸之辈搅得如此激动不安；国外也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忠诚宣誓问题会使内阁垮台。人们可能认为，似乎由于政府长期管理不善，人民对政权已恨之入骨，所以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
177 会燃起熊熊大火。我们之所以顾虑重重，趑趄不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政治上不成熟。可是十四年来，我们培育了国民对于政治的兴趣，但未能满足他们的胃口，所以他们只好在污水沟中寻求食物。我们几乎像法国人一样好虚荣；当我们自以为在国外颇孚声望时，那么我们在国内也便有许多事情能够容忍；而当我们感觉到似乎每个维茨堡会议与会者[13]都在嘲弄和鄙视我们，可是我们则由于胆怯并希望帝国的大军来保卫我们以防范法国人而忍受这一切的时候，那么我们在每个角落里都可看到种种内部流弊，而对政府破口大骂的任何一个报界恶棍，倒有理了。从那不勒斯到汉诺威的每一个诸侯王室对我们向他们表示的友爱决不会报以谢忱，而我们对他们表现出的真正基督教式的对敌人的友爱，却是以损害本国王位的安全为代价的。我对我的国王忠贞不渝，

直至采取旺代[14]方式也在所不惜，可是对其他君主我感到没有一丝一毫的义务为他们做出举手之劳。我担心我与我的至尊君王的见解相去甚远，他未必会认为我适合于参加王室会议。所以，如果他要使用我，也宁可是在内政方面。其实这对我是无所谓的，因为如果我们的对外政策的立场不更为强硬些，不更为独立于由于我们缺乏自信心而指望的各王朝的同情（虽然他们的同情并不能给予我们以支持，而且我们也并不需要他们的同情）的话，那么我对于这整个政府并不期待会有什么有益的成果。在选举问题上，可惜裂痕就是这样发生的；对王室怀有好意的选民不理解有关忠诚宣誓的争执，而民主派又曲解了它。在军事问题上对甘纳[15]采取严厉的态度，与议会决裂，把它解散，以此来向国民表明国王对这一伙人采取什么态度，这会是比较好的。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国王在冬天是否愿意采取这种措施呢？我不相信这次选举会顺利，虽然忠诚宣誓可能向国王提供某种对选举施加影响的手段。但是在大多数人强烈的越轨行为之后，适时解散议会仍不失为能使正常的血液循环得到恢复的十分完善的、也许是最正确的一种办法。

我不能用文字把我本来了解不足的形势阐述得充分详尽，即使某些不能写在纸上的事我也可能说了。今天我请假获准后，将于星期六乘船出发，可望星期二早晨到达吕贝克，晚上到达柏林。提前出发不可能了，因为皇帝还要召见我。此信仍 178
由英国信使递交。详情面叙。请向您的夫人转达衷心的问候。

您的忠实朋友 冯·俾斯麦

7月9日早晨五点钟我到达吕贝克，已整整五天没有看报，从车站上唯一能读到的一家瑞典《于斯塔特报》上才知道，国王和各位大臣已离开柏林，看来危机定已消除。7月3日，国王发布公告说，他坚持历来的对世袭君主的忠诚宣誓，但是考虑到他的哥哥执政期间给君主政体的宪法带来的变化，便决定恢复庄严的由此确立世袭国王尊严的加冕典礼以代替对世袭君主的效忠宣誓。罗昂于7月24日从布鲁南（施维茨州）给我写信谈到了这次危机的经过：

我已暗下决心，一遇雨天便写信作答，因此不凑巧今天就得动笔，而且所用的墨水瓶已近干涸，因别无他法，只得放在窗下几分钟接取雨水救急。——我们总是不能如愿相逢，如果不是天意，大概也是由于命运乖蹇吧。发自法兰克福的电报，由于服务人员的笨拙，迟至17日早晨八点钟之后才交到我手里来，而我立即寄发的复信，几小时以后作为无法投递的信又被退了回来。因为我行将出发，所以心中尤为烦乱。但推后行期，也不可能。施莱尼茨因为给奥古斯塔王后效劳，所以能够加害于我们。脓疮快破了。施莱尼茨本人深信现今制度不稳定，已呈请辞职，正如一只破船上的老鼠通常要窜下船去一样。不过，他和冯·德·海特一致同意的是，不能用所谓的殉道的电流使那些死去的已被利用尽了的人起死回生的，于是便一致反对我。施莱尼茨在奥古斯塔王后和叶列娜大公妃[16]的支持下，借助重又出现的加冕想法而得势，加冕礼服早在2月份就已经订做了。隐蔽得很拙劣的退却开始了，连几乎拟好的大臣名单也已归档。不过，我倒

十分倾向于相信施莱尼茨，正如奥古斯塔王后甚至霍亨索伦公爵一样，认为现今靠谎言支撑的制度行将没落并愿意促使其早日没落。施莱尼茨的辞职，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种进步，虽然他并没有站在帕托夫、奥尔斯瓦尔德以及施韦林的 179
教义的立场上。尽管他在行动方面的无能，但有他在场可以在对上关系方面支持内阁。宠臣不可倒；好！如今他又走马上任了[17]！如果伯恩施托尔夫伯爵只有一半像许多人对他描绘的那种样子的话，那么这第二个楔子就会比第一个更为有效，或者他在其职位上连四个月也维持不了。在忠诚宣誓问题上我同自己的同伴的意见是永远对立的，甚至已趋表面化，这您可以从曼托伊费尔或阿尔文斯累本那里知道。如果说我还竟然留在“这个班底”之中，那么这是因为国王的坚持，在现今的情况下我已经没有任何顾虑，今后便可以公开出面继续战斗了。如果这些先生们确知我反对他们的处方，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还只是臆测的话，这就更适合我的性格。愿上帝继续保佑！除了做一个正直不阿的人，在我所管辖的部门中为实现理性的事情尽心竭力之外，我几乎不能再有所作为了。一切灾祸中最大的不幸在于我们国王的委靡不振。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听从王后及其追随者的支配。如果他不能振作起精神来，那么一切都会丧失，而我们只得套着议会主义、共和国和帕托夫执政的枷锁一直滑下去。如果上帝不来拯救我们，那么我看就没有、没有救了。在普遍分崩离析的过程中，我认为只有一个机构还有抵抗力，这就是军队。保持军队不腐化这个任务我认为可以完成，但自然只能保持若干时候。如果不令军队投入行动，不从上面吹入一股

健康的空气，军队也会感染时疫；但是甚至连这种办法也变得日益困难了。如果我在这里是有道理的话（我认为是这样），那就不应谴责我继续在这个班底中供职。然而，我并不是说其他人不能以同样的、甚至更大的预见性和毅力来管理我这个部，但即使是最有才干的人也得耗费一年时光才能熟悉情况，——“死人骑得快”。[18]我无需对深刻了解我的人说明，我是多么愿意引退。更正确地说，我的性格更喜好安逸和舒适，在上帝面前这是有权利的，而我应得的数量可观的退休金，倒也不难保障我的一切需要，因为我既不恣意纵欲，也不追求荣誉。当我像一匹供人驱赶的拉车驽马一旦被解除了缰辔而放生到牧场去之后，我当时才感觉到，我是多么喜爱懒散。如果不发生意外，我想在9月初才回到我的车轭中去。然后我想我们不会再度失去会面良机了。虽然，9月9
180 日我还要到莱茵地区参加演习，不过也只有十到十一天。国王是否要在9月初去柏林几天，他作何打算，还不得而知。我认为，如果在普鲁士还谈得上国王统治的话，这就是必要的了。

根据您的来信，允许我希望，您在加冕仪式以前不会返回彼得堡。我认为，《十字报》[19]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20]有关加冕的公告实为重大的政治错误。如果该报的拥护者不参加这一典礼，那错误也同样不小。请把这转告摩里茨[21]。由于这篇不幸的文章我们失去的阵地相当多；必须夺回。

最后还要对您采用的各种医疗办法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愿您康复之后精神焕发！您为祖国的昌盛贡献一切力量的时

---

* 国王从这篇文章之后再也不看《十字报》。

日即将到来。——向您的夫人转达我以及我们大家的最崇高、最诚挚的问候！

这封信我通过齐默豪森以挂号寄出；千万不要让此信落入旁人手中！

冯·罗昂

按照冯·施莱尼茨大臣的愿望，我于7月10日前往巴登—巴登去谒见国王。对于我的到来，他似乎感到惊奇和不快，以为我是由于内阁危机而来的。我谈到，我已听说内阁危机早已消除，还说，我来只是请求国王准予将我原定三个月的假期延长到秋天举行的加冕典礼之前为止。国王友好地表示同意，并邀请我共进午餐。

我在莱茵费尔德和施托尔普明德度过8月和9月之后，于10月13日来到科尼斯堡，18日在那里举行了加冕典礼。

在庆典期间，我察觉到王后的情绪发生了某种变化，这大概与在此期间施莱尼茨的辞职有关。她主动和我谈话，谈到了德意志民族政策问题。在科尼斯堡我第一次遇见当了大臣的伯恩斯托尔夫伯爵，他对于规定自己的政治方针看来还踌躇不决，在谈话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似乎他在为争取一种主张而奋斗。王后已多年没有对我这样亲切了，她对我的关注十分引人注意，甚至超过了国王于此刻所希望的那个限度。在典礼几乎不允许谈话的场合，我站在人群里，她却仍然站在我面前和我谈论有关德意志政策的 181
问题。而用手搀着她的国王虽然也曾想让她停止这样的谈话，但却有一段长时间未获成功。国王陛下和王后陛下在这一次和其他

场合的做法表明，当时他们在处理德国问题的见解上存在着分歧；我心里揣测，王后陛下是不同情伯恩斯托尔夫伯爵的。国王则避免和我谈论政治，大概担心由于和我发生联系而带上反动派的色彩。还在1862年5月，甚至还在9月[22]，这种担心还控制了他。他把我看得比我在实际上更为狂热。不是没有影响的大概是他想起了我在赴彼得堡[23]之前同他的谈话中曾对新内阁做过批评之事吧。

（三）

1862年3月，任命阿道夫·冯·霍亨洛埃·英格尔芬根亲王代理霍亨索伦公爵首相，是一种打算短期内兑现的内阁变更的支票。亲王头脑灵敏，待人亲切，无条件忠于国王，对于我国内政，他虽非本行，却比大多数和他地位相当的执政的贵族名流要关心得多。可是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智力上他都不能胜任在动乱岁月中的首相职位；1862年5月我会见他时，他有意突出这个印象，恳请我尽快接管内阁，以便让他摆脱令人身心疲惫的重担。

当时我还不能满足他的愿望，而且对此也没有热心。当我从彼得堡被召回柏林时，我根据议会政治所经历的曲折变化中便已感到，这个问题即将提到我的面前。我不能说这种前景会使我情绪愉快、乐于尽力，我不相信国王能够长久地顶住他的家庭的影响；我想起，我在爱德库宁跨过国境的木桩回到祖国时，心情不如通常在这种时刻[24]那样欢快。想到我面临一项艰难而又责任重大的职务，同时得放弃胜任愉快、不是必须负责又颇有影响的公使职位，我便感到忧愁。同时，在和日益高涨的议会统治的浪潮
182 所作的斗争中，我从国王、王后以及国内同僚那里将得到多大程

度、什么性质的支持，还不能确知。我在柏林旅馆中停留在追名逐利的人看来就像曼托伊费尔时代专事阴谋策划的一位公使的处境，是很伤我的自尊心的。我请求伯恩斯托尔夫伯爵，或者给我一个职位，或者批准我辞职。他还没有放弃保持自己的职位的希望，便提议并在几小时以后便得到了派我去巴黎的任命。

1862 年 5 月 22 日我接到任命，6 月 1 日在杜伊勒里宫[25]呈递了国书。翌日我便写信给罗昂：

> 我已平安到达，像空荡荡的谷仓里的一只老鼠似地住在这里，由于阴冷多雨，只好待在屋子里。昨天我被隆重接见，是乘坐皇家马车去的，仪式隆重，显贵大臣成行出迎。仪式进行得简短明快，未谈政治，这要推迟到最近某天私人接见时再谈。皇后像往常一样，容貌秀丽。昨天晚间，信使来了，从柏林带来的只有一些关于丹麦问题的令人厌倦的电报。我切望您的来信。从伯恩斯托尔夫致罗伊斯①的一封信中我察觉，发信人一心指望着我长期待在巴黎，而他则留在柏林；我还察觉，如果国王以为伯恩斯托尔夫想返回伦敦，而且越快越好，[26]那国王也错了。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他不开诚布公地说明是想留还是想去，留也好，去也好，都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想要同时兼任两个职务，那就是咎有应得了。一俟我有什么消息，即一旦我和这位皇帝单独谈过后，便会立即亲笔写信给国王。我还一直希望，如果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不在国王眼前，陛下就不会把我看作是不可缺少的

① 当时普鲁士驻巴黎公使馆参赞。——德文本注

人，但愿他能找到一个胜过我的迄今未被认识的政治家，这样，我就能够在这里增长见识。我静候是否对我有什么安排。如果几周之内还没有什么结果，我就要请假去接我的妻子，那也必须事先了解清楚我将在此地任职多久。在等候消息的这一周期间，我还不能在这里作出长期安排。

希望皇上不考虑委任我当一个有职无权的大臣；最近一
183 次接见我时倒也没有谈到这方面的事，这样的职位不切实用：什么也不能说，却要承担一切，到哪儿也是不被邀请的不受欢迎的人，一旦真要表达自己的见解，便会遭到恶语围攻。我认为大臣职位比首相职位好，后者不过是一个储备的职位，而且我也不愿意有一个一半时间在伦敦居住的同事。如果他还不愿意完全定居在那里，那我情愿让他留在目前所在的地方，不过我认为，强加于人总是不友好的。

向您全家人衷心致意。如果斗争是不可免的话，我作为您的忠实朋友，虽然不好惹是生非，却定然是您的战友；不过宁愿斗争出现在冬天，不要在这炎热的夏天！

6月4日，罗昂从柏林写信给我：

……星期天，施莱尼茨和我谈起接替霍亨洛埃的事，他认为您的时运尚未到来。当我问他谁将主持内阁时，他耸了耸肩。我又说，在此情势下，除了他怜悯自己，别无他法，他却搪塞支吾，不置可否。这很使我忐忑不安，对此您不会觉得奇怪的。昨天我乘机在决定性的场合提起内阁首相问题，大家依然是倾心于您，却又依然踌躇不决。这里谁能作

出帮助？结局会怎样？——没有一个长于治国的党！民主派当然是排除在外，但是大多数人是民主派和想成为民主派的人，虽然他们的请愿书[27]草案中满篇都是保证忠顺的词句。除了他们，还有立宪派，也就是说，原来的立宪派不过二十来人，以芬克为首；还有保守派约有十五人，天主教派约有三十人，波兰人二十几名。一个可能组成的政府从什么地方能得到必要的支持呢？除了民主派以外，哪个党能够在这种党派组合的情况下执政呢？民主派能够这样做，但绝不允许它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逻辑告诉我，不管如何困难，现今的政府也必须继续执政。正因为如此，这个政府才必须得到加强，而且越快越好。——我认为，伯恩施托尔夫伯爵身兼两个重要职位，这未必是普鲁士利益所要求的。因此，不久之后您如能被任命为首相，我将十分高兴，虽然我深信，那时伯恩施托尔夫很快将结束他那身兼双重职位的权势，不能再扮演一脚在柏林、一脚在伦敦的巨人角色。我要请求您的良知，千万不可作反对举动，因为这可能并且将会 184
把国王推到民主派的怀抱中去。——本月 11 日，霍亨洛埃休假期满。他本人不会回来的，送来的将是他的辞职申请书。我希望，到那时您将被电召回国。所有爱国人士都在渴望此举。您怎么能够犹疑不决和运用手腕呢？

我的复信如下：

巴黎，1862 年圣灵降临节

亲爱的罗昂：

我通过施泰因（当时的武官）完好地收到了您的信，未经启封，我打开时不免撕坏了一点。请您放心，我决不会作反对举动，也不会运用手腕；如果我没有从种种迹象看出，伯恩施托尔夫根本就不考虑离任的话，那么我可能就会安心期待在几天之内离开巴黎，途经伦敦返回柏林；我本不会动一动手指来反对这件事情。我也的确并未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毕竟不能劝阻国王把伯恩施托尔夫的职位让给我；如果我被任命为有职无权的大臣，那么把施莱尼茨计算在内，我们就有了三位外交大臣：遇到任何须负责的事，其中一位便会立即龟缩到官廷内阁里去，另一位则回到伦敦[28]。我知道我和您见解一致，相信和雅戈夫①也会一致的，政府各部也不会给我设置障碍；对于外交事务，我的确抱有相当确定的看法；伯恩施托尔夫或许也有，不过我并不了解，而且我未必能同意他的方法和形式；我不信任他对政治事务有正确的眼力，可以想像他也不信任我的眼力。此外，心中无数的状况不会继续太久，待到11日，便知国王是仍然保留上月26日[29]的意见，还是另有安排。如果到那时仍然不见动静，我就要上书陛下：假定我在这里的关系已经决定，接着我要安排家庭事务，至少准备在此逗留到冬天或更长的时间。我的什物和车辆还在彼得堡，总要安置在某个地方；而且，我还有一种值得重视的一家之主的习惯，要找一个固定的住所；从去年7月施莱尼茨首次告诉我，我将要调动时起，就已经没有固定住所了。您认为我会抵制，那是不公正的；恰恰相反，我具有某种精明动物的气质，在对它有利时

① 内务大臣。——德文本注

会马上到冰上跳起舞来。

我相当细致地观察了有关请愿的讨论，我的印象是，在 185
委员会里、可能也在全会里，政府的让步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其实，一份糟糕的请愿书里有些什么呢？人们都以为如能实现这种请愿书他们就算获得了胜利。在请愿书中议会是以假想的敌人和空炮弹表演一种诈骗术。如果人们把假想的战斗看作重大的胜利，在王家法制基础上四处抢劫掠夺，那么假想的敌人便会把炮队的假面具拉下，而后猛烈地射击的时候大概就到来了。我感觉到我们的观感中缺乏某种和善；您的信中透露出战士的义愤、渴求战斗的热望和激情。我并非有意奉承，您回答得的确高明，但因此也更令人遗憾——因为这些人不懂德语。我发觉，我们这里的友好邻居[30]安静而满足，对我们怀有好感，很愿意讨论困难的“德国问题”；他对任何一个现存王朝都给予同情，但他希望普鲁士能够卓有成效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即德国问题，这样，政府才能在国内也获得信任。这些仅仅是美好的言词而已。至于问到我为什么不在此将家事安排妥当，我的解释是，我考虑于近期休假数月，之后即挈妻返任。

6 月 10 日。陛下对请愿书的答复因其含蓄适中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答复很冷静，没有显出一点激动。关于施莱尼茨接替霍亨洛埃的流言已见于许多家报纸。我为他衷心高兴，同时他还是宫廷大臣。

此信我明天交信使发送，他要留在亚琛直到从柏林来的邮件到来。向您那里诸位女士致意；我这里人人安好。

一向忠于您的 冯·俾

6月27日，皇帝邀请我到枫丹白露去，和我一起做了一次长时间散步。在谈论当前的和最近几年的政治问题时，他突如其来地问我，我是否认为国王有意同他缔结同盟。我回答说，国王对他怀有最真挚的友好情谊，早些时候在我国舆论中流行的对法国的偏见，已经几乎消除；不过，缔结同盟则要取决于形势，根据形势可以判断缔结同盟的必要性和有用性。每个同盟都以一种动
186 机和一定的目标为前提。皇帝对这种前提表示异议；他认为，有些大国之间关系良好，有些则不尽然。面对捉摸不定的未来，人们必须把他的信任寄于某一方。他谈结盟之事，并不怀有什么冒险性的图谋；但他认为在普鲁士和法国之间有共同的利益，正是在这里他看到了一种亲密而持久的协调一致的因素。如果想要制造事端，那就会是大错；这种事端的方向和规模不能预料，但是却可加以防备，事先采取必要措施对付它并利用它。皇帝进一步发挥他的“外交同盟”的思想，认为在这种同盟中互相信任便是习惯，并在困难形势中学会互相依靠。随后皇帝忽然止步问道：“您不能想像，奥地利在几天前向我作出了多么奇特的表白。看来，您的任命和冯·布德贝格先生来到巴黎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引起了维也纳的惊惶。梅特涅公爵告诉我说，他得到的那些指示走得如此远，连他自己也感到震惊；他被赋予昔日君主对他的特使才赋予的那种无限全权，在涉及所有我提到的问题上，他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同我达成协议。这种表白倒使我有点不安了，因为除了两国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外，我还怀有一种几乎是迷信的反感，厌恶把我和奥地利的命运连结起来。”

皇帝的这些话并非完全没有根据，虽然他也可以指望，我不

会利用我同梅特涅的社会关系来破坏他对我的信任。不过无论如何，向一位普鲁士公使说话这样坦率，不论是真的还是夸大其辞，总是不够谨慎的。在法兰克福时我就深信，维也纳的政策在一定情况下是不怕要弄阴谋诡计的；它可能会牺牲威尼斯或莱茵河左岸[31]，以换取在右岸能保证奥地利对普鲁士占有优势的邦联宪法[32]。只要有人把关于德国问题的空话拿出来当作对付我们或维茨堡会议与会国的牵引绳索，那么这种空话就会在维也纳宫城里流传不息。如果针对我们的法奥同盟尚未建立起来，则我们应当 187
感谢的不是奥地利，而是法国；这倒不是因为拿破仑对我们有所偏爱，而是他不信任奥地利能够驾驭当时已趋强劲的民族愿望之风。在我呈送给国王的报告中作出的结论并不是我们应该同法国谋求建立某种同盟，而是强调指出，我们不允许把奥地利当作反对法国的忠实的同盟军，也不能够希望求得奥地利会心甘情愿地同意改善我们在德国的地位。

由于没有任何政治委托和事务，我便去英国作短期逗留，7月25日又开始在法国南部做了一次稍长时间的旅行。在此期间的来往书信如下：

巴黎，1862年7月15日

亲爱的罗昂：

我百思不解，为什么您打电报问我是否收到您（上月）26日的来信。我没有回信，因为我在主要问题上不能提出什么新的意见，而只能等候消息。自那时以后，曾有一位公使到这里来，两周前我就接到电报说他要来，我便提前一星期从英国返回等候他。他带来了伯恩施托尔夫对我休假要求的复

信。现时我在这里无所事事，因为皇帝、大臣、使节都不在这里。我的健康状况也不怎么好，而这种临时性的生活，对于“是否和怎样”的焦急不安的期待，又无正经事可做，真是令人心神不定。我原来打算到这里来十天到两周，可是七个星期过去了，我还不知道二十四小时之后究竟何去何从。我不愿意住在柏林硬去打搅国王，也不愿意回家去，担心途经柏林时无定期地困在旅馆里。从伯恩施托尔夫的信中可以看出，国王现在并不想把外交事务委托给我，陛下还没有最后决定是否应由我来取代霍亨洛埃的职位，可是又不想通过给予6周休假来未经详细审查就否定这个问题。正如伯恩施托尔夫写给我的那样，国王怀疑我在目前议会开会期间是否有用，我的任命是否不会拖延到冬天。在这种情况下，我今天又申请6周假期，理由如下：首先，我的确需要呼吸点山间或海上的空气以增强体质；如果我注定要从事苦役，那必须把身体事先弄好，而巴黎现时对我是不利的，我过着光棍似的野狗生活。第二，国王应该有时间根据自己的考虑来平心静气地决定问题，不然陛下会把对后果应负的责任推卸到催促他的那些人身上去。第三，伯恩施托尔夫现在也不愿意离去，国王一再要求他留下，还声明他和我根本没有谈及外交部的事务；可是有职无权的大臣职位我当然不能接受。第四，我如果参加一个现在看来既无目标又是临时性质的内阁，以后会被人看作是明显的玩弄计谋。

188

我想像，内阁会平静而明确地反对一切军事上的删减，但也不至造成关于这种削减的危机，而是使议院将有可能全面地讨论这个预算。我预料，此事将在9月结束。我还预

计，政府所不能接受的预算然后被提交贵族院审议，不过得有把握使这项残缺不全的预算提案在那里遭到否决。于是，或者在相反的情况下就在贵族院讨论预算之前，人们有可能以国王的旨意（这个旨意以客观的理由说明国王拒绝批准这种预算法），将其退回众议院，要求重新审议。这时，或更早一些时候，邦议会可能在这一点上被推后一个月。事情拖延得越久，议院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便会越加低落，因为它对无意义的细节纠缠不休，它已经犯过这种错误而且还会继续犯下去，还因为它的演说家没有一个不使听众一听便徒增厌烦。如果能使议院纠缠在诸如贵族院的连续性[33]这类琐事上，并为这些琐事而打起仗来，又要解决固有的事务，那是很大的幸运。议院将会厌倦，希望政府精疲力竭，而地方法官不得不为他们自己的代理人的代价而忧愁[34]。如果议院软化下来并感觉到全国对它望而生厌，迫切希望得到政府方面的让步，以便摆脱不妙的境况，那么依我看，这样的时刻来到了，即以通过对我的任命向议院表明：问题不是放弃斗争，而是要聚集新的力量把斗争进行下去。在内阁的战斗序列里出现一支新的队伍，或许会造成现在无法达到的一种印象；特别是如果有人事先唠叨起钦赐宪章和政变那样的话题，那么过去我那轻率强暴的名声则会对我有所帮助，人们会想："瞧，还是发生了。"到那时候，一切集中派和半截子派才会愿意谈判。

这一切都不过是以我的本能感觉为根据的，我不能证明 189
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会做得过分，以致由于要自己负责而拒绝国王命令我做的任何事情。但是如果征求我的意见的

话，那我主张，再躲在丛林后面几个月。

或许这一切都是失算，或许陛下从未决定任命我，因为我看不出：既然六周以来没任命，为什么现在要任命呢？可是，在这里吞食巴黎灼热的灰尘，在咖啡馆和剧院里打哈欠，或者像一个客串政客那样重又在柏林皇家旅馆中下榻，都是缺乏理由的，不如在海滨沐浴以度这段时光为好。

对于我们两院在政治上的无能我则深感惊异；我们的国家毕竟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国家，无疑是太有教养了。别人肯定并不比我们三级选举出来的优秀分子更为聪明，但人家没有他们那种幼稚的自信，我们的人以这种幼稚的自信把他们的可耻的无能完全赤裸裸地当作楷模来当众显示。我们德国人究竟是怎么得到胆怯谦虚的名声的呢？我们当中有谁不是以为自己对从打仗到捉狗蚤这一切比所有经过训练的专家都要高明呢？而在其他国家则有许多人承认自己对许多事物的了解比别人差，因而安分守己，沉默寡言。

16 日，我今天必须赶快写完，因为其他事务还要占用我的时间。

向您全家人致以衷心问候。

对您忠诚不渝的　冯·俾

罗昂于 1862 年 8 月 31 日复信说：

亲爱的俾斯麦：

您大概会想我为什么至今还没回信，我一直期待着一种

决定或者哪怕是能够促使问题尽快解决的一种时机。遗憾的是，我的，确切地说，我们的痛苦具有完全慢性的性质。现在又有一种新的情况：诽谤冯·德·海特的人已得到开释；可是连这种事也将湮没于勃兰登堡边区的沙地之中。趁国王前往多贝兰[35]之际，我到这里（齐默豪森）来打打山鸡野鸟，已有几天避开这种共同的不幸了。据我看，三、四周以前伯恩施托尔夫已决定离开他的职位，因为这一职位使他感到太沉重和太艰难了。一周以前他告诉我说，他还不知道在 190
议会例会结束后他是否必须迁就国王的意愿（如果国王果真这样示意的话）而留下来，虽然他对摆脱的渴望并未消失，换句话说变成现实，议会例会要旷日持久地开下去，预料其结束日期将与伯爵夫人分娩的日期大致相合；由此而来的在冬季的辗转旅行还不如原来方便。更早些时候他就对我说过，调动他去伦敦任职，如果这对他是合适的话，应至迟在九月份进行。一方面是这种或许该诅咒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又是国王的犹疑不决，结合冯·德尔·海特的观点（他虽可容忍一位首相，但不应出自比较年轻的同事之列），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回到早些时候的主张，即您应该出任首相，暂时无大臣职位也无妨；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到手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认为，我们参加迄今为止的那种人员不齐的冬季会议，是不可能和没有意义的。我的这种见解已经不止一次地得到过国王的赞赏。我们必须战斗，我们也会战斗。关于让步和妥协，全然不加考虑，国王尤其无意于此。因此，即使完全不顾及我们外交政策方面的错综复杂情况（现在外交政策的确显示出某些很有利害关系的纠纷），也可以确有把握地

预见到危险的灾祸。我能够想像得到，我的老朋友，您对此是厌烦的；我根据自己的厌恶心情就可以推想到您的心情了。但是我依然希望您不要因此而不高兴，相反，您要铭记古代骑士的职责是：冲锋陷阵救护国王，即使他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轻率地陷身于危境。但是您是一个男子汉，而且还不止此，您还是一位大丈夫和一家之主。除了公职外，您还要享受家庭的舒适和天伦之乐。您当然有权享受这些，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您应该知道，而且很快知道，您的卧床和书桌应该安置在哪里，是在巴黎抑或在柏林。国王说的您不应该在巴黎定居这句话，就我所知，至今并未收回。您必须心中有数。我愿意全力协助您使之最快确定下来，这不仅是出于利己主义的动机，也是出于爱国主义的利益。因此我将以您私人委托我的方式行事，以便导致事情确定下来。只要您不禁止我，我就继续下去。最近和陛下进行过几次关于您
191 的谈话之后，我个人本来对您就怀有的特殊兴趣更加强烈了。因此我可以就您目前不堪忍受的处境说一句话，这种处境是因为有人毫不含糊地阻拦您在巴黎长久居住引起的。类似的动机会得到理解，而且或许比政治上的考虑更有影响。正因为如此，我才犹如征得您的同意一样行事，并建议暂时任命您担任没有大臣职位的首相；我一直避免这样做；但是没有其他办法！如果您绝对不同意这样做，那么请宣布不同意我的意见或命我沉默。我在7日完全私下的谒见中与陛下交谈，他允许在出发去卡尔斯卢厄参加洗礼仪式（9月9日）途中，于这一天召见我。所以，您还有时间提出反驳。

关于一般局势今天我就不谈了。我估计，内部的灾祸不

会在现在，而是将在来年春天爆发，到那个时候，您必须在场。您将最终决定我们的未来……

您的 冯·罗昂

我答复如下：

图卢兹，1862 年 9 月 12 日

因为我在比利牛斯山周游旅行，所以迟至今日才收到您（8月）31 日的来信。我同时也在期待伯恩施托尔夫的来信，因为他在四周以前就写信给我说，到 9 月人事调动问题无论如何应当决定了。遗憾的是，您的来信只能令我推测：这种不确定的状况到圣诞节前后会依然如此。我的什物还在彼得堡并将在那里挨冻，我的马车在斯德丁，我的马匹在柏林近郊的庄园，我的一家人在波美拉尼亚，我自己正在旅途之中。现在我要返回巴黎，虽然我在那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无事可做，但是我的假期已满。我的计划就是建议伯恩施托尔夫：我来柏林，对以后的事进行一次面谈。在我从 5 月 8 日[36]起一直没有见到家里的人之后，我还需要在莱茵菲尔德停留几天。我必须相机澄清情况。我的愿望莫过于留在巴黎，只是我必须懂得，迁徙和安顿不应只为几周或几个月，因为我家室累累，迁居不便。只要国王下令，我从不拒绝没有大臣职位的内阁首相职位。我仅仅说过，我认为这个安排是不合目的的。我现在还准备进入无大臣职位的内阁，不过我认为这样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如果陛下想要告诉我：将于

192

11月1日，或者1月1日，或者4月1日任命我，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办了，而且我确实不是制造困难的人，我只要求得到慷慨给予伯恩施托尔夫的尊重的百分之一。由于这种不确定状况，我对种种事务的兴味都已丧失，对于您为解决这种不确定状况而给予的一切友好协助，我表示衷心感谢。如果这一点在最近不能成功，那么对局势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也只得对自己说，我不过是国王派驻巴黎的一位公使，并于10月1日把一家老小搬来安家。任期一满，国王便可解除我的职务，但不应强令我立即再次转到他处；我宁愿回到故乡的田园，该定居何处，到那时我就会知道。我于孤独之中，谢谢上帝的保佑，恢复了往日的健康，如今的状况是近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但是关于政界情况，却未曾听到片言只语；国王曾去多贝兰，我是今天从妻子的信中得知的，否则我怎么也不明白您信中的“多”字的含义。同样，我也没有听说他在13日要前往卡尔斯卢厄。即使我想去那个地方，也不会见到陛下，我还凭经验知道，不召而至是不受欢迎的；国王会因此认为我追逐个人名誉地位，其实上帝知道，我同那种追逐功名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在巴黎充当陛下一名公使，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别无他求，但愿能够确定下来，至少直到1875年以前。不论有什么样的确实消息，请您告知，我会在您的照片上画上天使的翅膀。

您写的“本届例会结束”是什么意思？是否可以准确预计，这次例会会不停地一直开成冬季例会？关于预算问题没有个结果以前两院可能解散吗？我当然并不想否定这些问题，问题在于作战计划了。

我即将动身前往蒙彼利埃，从那里经里昂去巴黎。写信请寄到那里，衷心向您全家致意。

您忠实的友人 冯·俾

在巴黎我收到了一封电报（署名是约定的）：

柏林，9月18日。延宕危险。速来。摩里茨·亨宁的叔叔。

亨宁是摩里茨·布兰肯堡，即罗昂侄子的第二个名字。虽然 193
电文措辞令人怀疑这一召唤是罗昂提出的还是国王提出的，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起程了。

9月20日早晨我到达柏林后便接到王储的邀请。当他问我对形势的看法时，我只能十分审慎地回答，因为近几个星期我没有看过德国报纸，而且由于某种抑郁情绪，也没有考察国内的事务。我的不满的原因在于，国王曾经答应我可望在至迟六个星期以内确定我的未来，即确定我是在柏林、还是在巴黎或伦敦定居，可是三个月过去了，到了秋天我还不知道将在哪里过冬。我对时局的了解很不详尽，不能对王储发表自己的纲领性的见解；而且我认为在向国王报告之前就向他谈论我的意见，是不妥当的。我这次谒见所造成的印象，我最早还是从罗昂的话里知道的，国王在谈到我时曾对他说："这人也不怎么样，他已经去过我儿子那里。"这句话的含义我没有立即领会，因为我不知道国王已有退位的念头，而他却推断，我已知道或者猜到他的念头，因而

努力与他的继位人处好。

事实上9月22日我在巴贝尔斯贝格被接见时，我不知道他有退位的念头；陛下说了大意如下的话以后，我才对局势有了清楚了解："如果我对上帝、对我的良心和对我的臣民不能负责的话，我就不想执政了。但我又不能这么办，因为我应当根据现今议会大多数人的意愿而执政；而我找不到不使我和他们自己屈从于议会大多数人而准备领导我的政府的大臣。因此我已决定退位，并且根据上述理由，已起草了退位诏书。"国王指给我看放在桌子上的他亲手起草的文件，是否已经签字，我不得而知。谈话结束时，国王重申，没有一批合适的大臣，他是不能执政的。

我回答道，陛下从5月以来就已经知道我准备参加内阁；我相信，罗昂也会和我一起留下，而且我不怀疑，如果内阁其他成员由于我参加内阁而引退，我们是有办法把人员进一步充实起来
194 的。经过一番考虑和讨论之后，国王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担任内阁大臣，是否主张对军队进行改组？我表示同意后，他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是否也反对邦议会多数派及其决议？对于我的肯定的答复，他最后表示："那么，我的责职就是和您一起努力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我不退位了。"桌上放着的文件他是销毁了呢，还是留作纪念了，我就不知道了。

国王请我陪同他到花园去。在散步时他让我阅读一份提纲，写得密密麻麻，共八大页，包括了当时政府政策的全部设想，而在诸如改革县议会[37]等问题上谈得颇为详细。我姑且不论，这份文件是否已经用作同我的前任讨论的基础，还是应当用来作为反对人们相信我为十足保守派的一种保证。毫无疑问，在他考虑召我入阁时，他的夫人唤醒了他的某种担心；对于夫人的政治才

能，他起初评价甚高，这种评价还是在陛下作为王储对他兄长的政府提出批评而无需自己做出更好的贡献的时代就形成的。在批评方面，亲王妃胜过她的丈夫。当国王不仅要进行批评，而且还得亲自去处理并对努力改善政事的措施承担官方责任的时候，他首次对夫人的这种才智上的优越发生了怀疑。当国王和夫人这两位君后的任务具有了实际性质的时候，国王的健康的理智才逐渐从女人能言善辩的影响下摆脱出来。

我成功地使他相信，对他来说，问题并不在于这种或那种色彩的保守派或自由派，而在于君主统治还是要议会统治；而且要无条件地避免议会统治，甚至不妨施行一个时期的独裁。我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陛下命令我做我认为不正确的事情，我也将把自己的这种见解和盘托出；但是如果您坚持己见，那么我将宁可和您一道毁灭，也不能够在同议会统治进行的斗争中抛弃陛下。"当时我内心的这种情感颇为强烈，而且对我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我认为当时反对派简单的否定态度和陈词滥调对于普鲁士民族任务来说在政治上十分有害，也因为我对威廉一世个人 195
怀有深厚的爱戴和极大的忠心，所以，与他一道毁灭的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我看来就是生命的自然而令人羡慕的归宿了。

国王把提纲撕成碎片，还想把碎片扔到花园桥下涸谷中去，我提醒他说，他的笔迹人所共知，文件可能误落不合适的人手中。他觉得我说的有理，便把碎片塞入衣袋以便付之一炬，就在当天便任命我为国务大臣和内阁临时主席，并于23日公布于众。任命我为内阁首相之事，推延到他和当时在国家法上还占有这个职位[38]的冯·霍亨索伦公爵进行了与此有关的通信联系之后才宣布的。

196

第十二章　普鲁士政策的回顾

由于我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我国的德意志政策缺乏独立性和能量，王国的权威蒙受到损害。公众对于军队和军官的不公正意见，他们对于军事措施和军费开支的反对，其根源就在于此。议会党团中各派领袖、演说家和大臣候选人的野心，正是在国民的不满情绪中得到了滋长和庇护。自从弗里德里希大帝逝世之后我国的政策要么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目标，要么就是目标选择不当，实施不力；从1786年到1806年就是后面这种情况，在这时期我们的政策以无计划开始而以悲惨[1]告终。直到法国革命完全爆发[2]之时，人们从这一政策中还丝毫看不到民族—德意志的方针的迹象。这样一种方针的初步迹象可以从各邦诸侯的同盟、从建立普鲁士帝国的思想、从划定分界线[3]、从获得德意志地区[4]中找到，这些并不是民族努力的结果，而是普鲁士分立主义努力的结果。在1786年，人们的强烈的兴趣并不在德意志—民族的地区上，而在夺取波兰国土这种思想上；直至1792年[5]战争爆发，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互不信任与其说起因于这两大邦国在德意志事务中的敌对，不如说起因于在波兰事务中的敌对。在图古特·勒尔巴赫时期[6]的争吵中，由于夺取波兰领土、尤其是夺取克拉科夫[7]而进行的斗争，比本世纪后半期占突出地位的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所起的作用要明显得多。

当时民族问题还处在靠后的位置上；普鲁士邦国以像夺取德意志臣民一样的（即使说不是更大的）热心夺取新的波兰臣民，只要是臣民就好；一旦奥地利想把军队投入法国边境，如果担心为了保卫它在波兰的利益而缺少必要的军队以对抗普鲁士时，它 197
便毫不犹豫地怀疑起联合对法作战的结果来了。根据在奥地利和俄国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士的意见和能力来衡量，很难说当时的形势给普鲁士提供这种可能性，即走上比抵制它的两个东方邻国的东方政策更为有利的道路，如同在1790年7月27日赖兴巴赫协定[8]中的情况那样。我不禁有这种印象：这种抵制不过是一种对于法国式威望的没有成果的自信举动，这一举动把从弗里德里希大帝留传下来的威望毫无目的地化为乌有，普鲁士从这种力量支出中得到的除了向两大帝国显示自己的大国地位，即炫耀实力以满足它的虚荣心之外，没有其他好处。

如果奥地利和俄国忙于东方事务，那么我认为，为了当时它们较弱的邻国的利益，便不应妨碍，而应鼓励和巩固它们向东方伸手的方针，以此来减轻它们对我国边境的压力。普鲁士根据它的军事机构的情况，在当时能比它的邻国更快地做好参战的准备，而且如果普鲁士能避免过早地袒护某一方，并宁可根据自己当时相对弱的实情而保持警惕，不在奥地利、俄国和普福尔塔[9]之间捞取仲裁者的威望，那么它就能使这种准备作战的机动性像在后来的许多场合那样成为有利的东西。

在这种局势中的过失通常在于使用和利用这种情况时缺乏目的和优柔寡断。大选帝侯[10]和弗里德里希大帝都很清楚，在必须站在某一方或加以威胁时，采取姑息措施是极为有害的。只要普鲁士还没有获得大致符合德意志民族精神的那种国家形象，只要

它还不属于我从梅特涅公爵那里听说的那种“富足”国家之列，它就必须按照弗里德里希大帝所说的那种警惕的精神来制定自己
198 的政策。但是，一种警惕状态必须有一支可随时作战的军队作为后盾才有存在的权利；没有这样一支军队，没有主动使用这支军队去支持或反对敌对双方之一的决心，普鲁士的政策在比如签订赖兴巴赫协定时那样投入自己在欧洲的威望，既不能在波兰、也不能在德国获得任何物质上的利益，而只能引起它的两个邻国的不满和不信任。人们在具有沙文主义情绪的同胞所作的历史判断中，今天还能觉察到那种由柏林对于在东方问题的斗争中扮演的仲裁者角色而使普鲁士的自信得到满足的满意。在他们看来，赖兴巴赫协定是弗里德里希的政策水平上的顶点，从那以后，经历了皮尔尼茨谈判[11]和巴塞尔和约[12]直到提尔西特和约[13]，处境每况愈下。

假如当时我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大臣，那么我就会劝他支持奥地利和俄国面向东方的野心，而作为代价，则要求物质上的让步，即便是仅仅在波兰问题上的让步，这个问题正合当时人们的口味，而且只要人们还没占有但泽和托伦[14]和还没有考虑德国问题，这也是有道理的。如果率领十万或更多的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士兵，以在必要时使之行动起来和听任奥地利在对法战争中陷于孤军作战相威胁，那么在当时的形势下，普鲁士政策怎么也会获得比赖兴巴赫的外交胜利更好的成果。

人们发现自从查理五世[15]以来，奥地利王室的历史记载了一系列误失良机的事例；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把责任归之于听取君王忏语的长老；而普鲁士的历史，仅就最近一百年而言，也是不乏这类误失良机的事例的。如果说赖兴巴赫协定时代的机会得

到了正确的利用，在普鲁士的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即使是并不令人满意的、但毕竟是前进的一步，那么在1805年就有可能取得更大规模的进步，那时普鲁士政策本可以从军事上而不是外交上反对法国、支持奥地利与俄国，但不是不要代价的。普鲁士向这些国家应该提供或已经提供援助所需要的这些条件，像豪格维茨[16]那样的大臣是不能实现的，只有在波希米亚或巴伐利亚统帅十五万士兵的将领才能实现。1806年宴席后发生的事情，如在1805年就会造成决定性的影响。造成坐失良机的，在奥地利是听取忏语的长 199
老，在普鲁士则应当是内阁的顾问们和诚实的但浅薄的武官将军们。

而且，普鲁士政策在签订1829年亚德里亚诺波尔和约[17]和1831年镇压波兰起义[18]时给俄国人的无偿援助，这是完全没有缘由的，当不久以前尼古拉皇帝和查理十世之间耍弄的那些对普鲁士不友好的阴谋诡计[19]，柏林内阁并不是不知道时，尤其是这样。君主家族[20]关系的亲热在我们这里通常足够掩盖俄国的罪孽，但是这缺乏相互性。1813年，俄国无疑获得了一项要求普鲁士感激的权利；从1813年2月起直到维也纳会议之前，亚历山大一世大体上是遵守了恢复普鲁士战前状态这一诺言[21]的；他当然并没有忘记俄国的利益，但仍然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对他自然地怀有感激的回忆。在我的童年时代，直到1825年亚历山大逝世为止，这种回忆还在我们的公众中间广为流传；俄国的大公、将军以及偶尔来到柏林的士兵分队，还继续享受到1813年我们迎接第一批哥萨克时的那种盛情接待。

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私人生活中，像施瓦尔岑贝格公爵所宣告的那种臭名远扬的忘恩负义[22]不仅是不光彩的，而且也是不聪

明的。但是我们是补偿了我们的债务的，这不仅在1829年俄国人在阿德里亚诺波尔处于困境时和通过在1831年我们在波兰的行动，而且在尼古拉一世整个执政时期。尼古拉一世对德国人的热情和和善了解得还不如亚历山大一世，虽然他和他的普鲁士亲戚以及普鲁士军官都保持了友好的交往。在他统治期间，我们生活得像是俄国的藩属，1831年，当时如果没有我们，俄国几乎对付不了波兰人，但特别是从1831年到1850年欧洲市场行情波动期间，我们总是接受俄国的期票并为之付款，直到1848年后年轻的奥地利皇帝[23]比普鲁士国王更加见爱于俄国皇帝时，那时俄国仲裁者冷酷无情地作出决断来反对普鲁士，反对它在德国的企图，并
200 通过把奥尔缪茨协定的耻辱[24]强加给我们，作为自己的1813年的友好的效劳的报酬。后来在克里木战争[25]和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我们又预先给予俄国以大力支持，而当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年代里没有听命于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提出的参战要求[26]，他对此和在丹麦问题上就表现得恼怒不已，这只表明，俄国人的要求已经超过平等的界线，而是要求他人从属于自己了。

我们方面的失算，首先由于亲戚感，由于软弱者对于较强者的习惯性依赖，其次还由于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尼古拉一世对我们也怀有和亚历山大一世同样的情感，并且对于从解放战争时期产生的感激有同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在尼古拉皇帝统治时期，德国人心目中并没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动机：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俄国保持友好，至少（不）①从这种友好关系中得到像俄国从我们的效力中得到的那样的好处。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自信和更多地

① 出版者所加。——这句话的意思同前面的文字联系起来是否定的。——德文本注

意识到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就会使彼得堡承认我们有要求对等的权利，尤其是在1830年七月革命[27]之后，普鲁士的防卫体系虽然笨重不灵，但面对这一惊人事件，它在整整一年之内无疑是欧洲一个最强的、或许是唯一能够参战的军事国家。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为对付弱小的华沙王国[28]，在准备战争时的软弱和缓慢程度足以证明，不仅在奥地利，而且在俄国，在十五年的和平岁月中军事组织被荒废得多么严重，属于例外的或许只有皇帝的近卫军和康斯坦丁大公[29]的波兰军队了。

当时的法国军队、特别是奥地利军队的境况与此相似。七月革命以后，奥地利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来整饬已经腐败了的军队组织，也只能保护其在意大利的利益[30]。在梅特涅执政期间，奥地利的政策是很巧妙的，足以拖延三个东方大国的任何决议，直到奥地利感觉自己已装备停当，能够取得共同发言权时为止。只有在普鲁士，军事机器虽然笨重，却以高度的准确性转动着，如果普鲁士政策能够采取独立自主的决定，那么它就有足够的力量根据自己的估计来判断1830年的德国和荷兰[31]的形势。但是，从 201
1806年到四十年代这一期间，一般来说不存在独立自主的普鲁士政策；我们的政策是交替地在维也纳和彼得堡制定的。就这种政策在1786年至1806年和1842年至1862年期间在柏林也试图寻求过独立自主的道路而言，那么从一个热心的普鲁士人的立场来加以评论时，这种道路也很难得到承认。

在1866年以前，我们只能够有限度地称自己为大国，在克里木战争以后，我们认为必须在巴黎会议[32]上通过谄媚奉承来获取外国对这一资格的承认。我们承认，为了自觉是大国，就需要其他大国的证明书。对于哥尔查科夫关于意大利所说的“一个强国无

需他人承认，它自己显示出是这样一个强国”这一标准，我们感觉到自己并未达到。表明普鲁士是一个大国，这在欧洲早就得到了承认（参阅第五章），但是由于多年来执行一种怯懦的政策，致使普鲁士遭到削弱，这种削弱最终在曼托伊费尔在巴黎扮演的那种可怜角色表现出来。他被推迟参加会议并不能动摇这个真理：一个大国要别人承认自己的大国地位，首先需要深信并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大国。我们在受尽奥地利和西方强国的轻蔑之后，居然还感到需要被允许参加会议和在其决议上签字，我把这看作是可悲地缺乏自尊心。普鲁士倘若没有以不体面的方式挤进巴黎会议的话，那么1870年在关于黑海问题[33]的伦敦谈判中我们的地位本来会证实这种见解的正确性。当曼托伊费尔从巴黎归来并于4月20日和21日在法兰克福我的寓所做客时，我冒昧地向他表示遗憾，因为他并没有把失败者的事业令卡托欢喜[34]这句话作为他的行动指南，也没有为可以预见到的俄法相互接近的情况[35]确立我们正确的独立自主的态度。拿破仑皇帝那时就已希望同俄国友好，英国有决定性影响的集团认为签署和约过早，这些对柏林外交部来说都是毫无疑义的。如果我们不是以屈辱的方式挤进巴黎会议，而是由于邀请不及时而拒绝参加会议的话，那么我们的地位会是多么尊严和独立。如果我们采取合适的审慎态度，那么在大国重
202 新组合时我们就会受到多方追求；如果我们不依赖于由外交上的对手来承认我们是欧洲大国，而是完全依靠我们的自觉，而不要求参与各种欧洲的协定（因为这些协定对普鲁士没有益处，最多不过是类似赖兴巴赫协定那种东西，只可得到空虚的威望和参与讨论与我国利益无关的事务），那么即使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的地位也会尊严得多了。

从1786年至1806年和从1842年至1862年这两段时期内所错过的种种机遇，当时人很少理解，当然更谈不到及时正确地追究责任了。只有在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后公布了档案和参与者以及目击者的回忆录才能使公众认出某些错误的最初误解和走上歧途的岔口所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留下了一笔丰富遗产——威望和相信普鲁士的政策和国力。他的继承人就像今天的新方针[36]依靠老方针的遗产而生存那样，依靠他的遗产达二十年之久，而对于自己依葫芦画瓢的治理办法的缺陷和错误却一无所知；直到耶拿战役[37]中他们还过高地估价自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才能。只是下周的崩溃使宫廷和人民才意识到，在国家的治理方针中充满了过失和错误。但究竟是谁的过失和谁的错误，对于这样巨大而出乎意料的崩溃谁应负责任，这些问题至今还在争论之中。

普鲁士当时为绝对专制主义君主国。在这种国家里，除君主之外，任何人对政策都不负有明确的责任；君主如采取或赞同某些极其不幸的决定，则任何人也不能判断这些决定是出自他个人的精神意志，还是那些各式各样的男男女女、副官、宫廷侍臣、政治阴谋家、阿谀奉承者、饶舌的说客和告密者对君主施加影响的结果。陛下的签字最后掩盖了一切；字是怎么签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把事件的责任推到执事大臣身上，从君主观点来看是最近便的出路。但是即使立宪的形式取代了绝对专制主义的形式，所谓的大臣责任制也决不是不依赖于不负责任的君主的意志。一位大臣如果不能获得国王在他认为必要的文件上的签字的话，他 203
当然可以离去；但是，他就要因此而对离职后果承担责任，而此后果对其他方面产生的影响比起对直接争执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深刻得多。

除此之外，由于国务内阁的集体议事形式连同它的多数表决制，天天迫使大臣按照普鲁士的大臣制度向他的同僚妥协和让步。然而，对于重大政策的实际责任又只能由一位居于领导地位的大臣担负，而不能由采用多数表决制的匿名的阁僚担负。决定正确方针和错误方针常常在于最细微的、然而是有决定意义的转变，有时还在于一个国际文件用语的语调和选词。稍一偏离正确路线，偏离的距离就会迅速扩大，以致要返回到原来轨道已做不到，就是返回到误入迷途的岔口也是无望的。流行的公务保密掩盖着造成脱轨的状况，达几代人之久；对于事物间实际联系的无知的结果又使处于领导地位的大臣们——就像我的几位前任那样——感到，既然事务在形式上能得到国王的签字或议会的表决来掩护，那么他们对事务的实质方面也就可以漠不关心了。在另外一些人身上，个人野心和职权关系的纠纷之间的斗争，则可导致致命的神经热症，例如勃兰登堡伯爵[38]；或者引起神智失常的症状，例如他的几位前任。

很难说，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期间对我们的政策担负的责任应该怎样分摊才是公正的。纯粹从人事观点来看，主要责任仍应由国王来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过善于引导他和善于处理事务的优秀的顾问。他为自己保留了不仅在每一个大臣的建议之中进行选择的权利，而且还为自己保留了在那些多少有几分才智的副官、内阁顾问、学者、恬不知耻的野心家、诚实的空想家和宫廷侍臣的建议中进行选择的权利。他常常对这种选择保留很久。做些错事比无所事事的害处有时要小一点。在 1852 年至 1856 年期间，这位在个性上非常可爱的君主曾多次地、有时口气非常坚决地、甚至态度严厉地要求我做他的大臣，但我从来没有

勇气利用这种机会，或者促使这种机会变为现实。[39]从他对我的 204
态度来看，我在他眼里并没有威信，他那丰富的想像力，一旦进入实际解决问题的场合，就断翅折翼了。我缺乏驯服的顺从性格，因而不能接受和以大臣的身份来维护我不相信的那些政治方针，或者在将其付诸实施时我不信任国王的决定和彻底性。国王维护和鼓励他的各个大臣之间那些不和的因素；曼托费伊尔、博德尔施文格和海特之间构成的三角斗争的相互倾轧很适合国王的心意，并且成为国王势力和大臣势力之间细小冲突中的政治工具。曼托费伊尔完全有意识地容忍了格尔拉赫、劳赫、尼布尔、本生、爱德温·曼托伊费尔等人的宫廷奸党的活动；他所实行的政策更多的是防御性的，并不企图达到一定的目的，如塔菲伯爵所说，是因循守旧，如果他能得到国王签字的庇护，也就心安理得了；没有议会的纯粹的绝对专制制度还保持着它的一个长处，就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意识到要负责任。绝对专制制度如果有驯顺的议会的支持，除了利用多数派的支持就不再需要任何其他辩护时，它是更为危险的。

克里木战争[40]之后，紧接着出现的有利于我国政策的形势是由于意大利战争[41]而形成的。我当然不相信威廉国王在1859年当摄政王时就倾向于突然下决心跨过把他当时的政策同后来导致建立德意志帝国的那种政策区分开的鸿沟。如果依据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后来不久与奥地利签订特普里茨保障条约[42]和拒绝承认意大利这两件事的尺度来衡量当时的局势，那么就有理由怀疑，当时是否可能推动摄政王执行这样一种政策：使运用普鲁士军事力量取决于德意志联盟政策中的让步。观察形势不是从进取的普鲁士政策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一种人们所习惯的企图出发，

205 即：博得各德意志君主、奥地利皇帝以及德国舆论的赞赏；还从一种模糊的企望出发，即凭借对德国的忠诚获取一种理想的道德上的酬谢，而对于目的的轮廓、达到目的的方针和方法却全无明确的认识。

在夫人和《周报》党[43]的影响下，摄政王于1859年接近于同意参加意大利战争。如果真的参战，那么基本上是奥法之间的战争就会变成一场莱茵河畔的普法战争了。当时俄国对奥地利正恨之入骨，至少会表示反对我们；而处于政治杠杆较长一端的奥地利，只要我们一卷入对法战争，就会考虑，我们的胜利允许达到什么程度。那时德国在欧洲棋盘上的角色如同图古特时代[44]的波兰。我的想法是，继续进行武装，但同时应向奥地利提出最后通牒；或者接受我们关于解决德意志问题的条件，或者等着我们进攻。但是只是在言论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宣称永远奋不顾身地忠于“德意志”的假定，亲王妃及其忠于奥地利利益的大臣冯·施莱尼茨的影响，以及议会、协会和报界的陈词滥调，都妨碍了摄政王以自己的明晰而正常的理解来判断形势；但是在他周围的政界人物和非政界人物中，没有一人向他指明过这些花言巧语的毫无价值，并在他面前维护谋求德国正当利益的事业。摄政王及其当时的大臣都相信这样一句话是有理由的：有人比塔莱朗先生更有头脑，这就是民众。但是，为了让民众认识真理，事实上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当民众真正理解应该干什么的时候，通常可以利用这种认识的时机已经过去。

只有这位摄政王和后来的国王所经历的内心斗争，只有对于“新纪元”时期的大臣们不仅不能使他的臣民幸福和满意，或者使他的臣民俯首贴耳并在选举和议会中表现出他所希望、所追

求的满意这种深信，只有在1862年迫使国王决心退位[45]的那些困难——才能对国王的情绪、对他的健全的判断能力予以必要的影响，使他从1859年的君主专制思想、经过丹麦问题[46]的桥梁过渡到1866年的观点，从言论过渡到行动，从空话过渡到实际。

在本身已经十分困难的欧洲形势下，一个愿意破除王朝的多 206
愁善感和宫廷的谄媚作风而实行冷静和切合实际的政策的大臣，由于互相交错的各种影响，要领导对外政策是很困难的；这种横逆的影响最强烈和最有效的来自奥古斯塔王后及其大臣施莱尼茨，以及其他君王和家族书信；除此之外，宫廷中敌对分子的谗言也起作用，起同样作用的还有耶稣会机关报（涅谢尔罗迭①、施梯尔弗里德等人）、各种阴谋家和精明强干的对手如哥尔茨和哈利·阿尔宁，以及无能的对手如以前的大臣和想当大臣的议员等人的谗言。因此国王必须对自己的第一仆人倾注全部真挚而高尚的忠诚，才能不动摇地信任我。

国王在9月30日王后生日这一天来到巴登—巴登，我于10月初乘车去到尤特博克迎接，在尚未竣工的挤满了乘三等车的乘客和手工业者的火车站上等候他，我在黑暗中坐在一辆翻倒的手推车上。我在寻找机会和陛下见面，我的意图是就9月30日我在预算委员会上所做的发言所引起的轰动一事安定他的心，这一发言虽然没有速记下来，却被报纸相当忠实地刊载了。

对于并非心怀恶意和没有被野心迷住心窍的人来说，我说的话已很清楚地表明了我追求的是什么。我的演说的意思就是，一看地图就可明了，普鲁士以它狭长的躯体，不能够长久地单独负

① 奥古斯塔王后的侍从长官。——德文本注

担为保证德国安全所需要的军事装备；这个军事装备应该平均地分配给全体德国人。我们要达到这一目的，不能通过演说、协会、多数派决议，这不可避免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一场只有通过铁和血才能完成的斗争。为了保证我们在这一斗争中的成功，议员们应该把尽可能多的铁和血放到普鲁士国王手里，以便国王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把它投向这个或那个天平秤盘上去。早在1849年众议院关于大赦讨论时，我在讲坛上反驳施拉姆的演说中就表述过这一思想。

罗昂当时在场，在回家途中表示不同意我所说的话，认为类似的“俏皮的离题话”对我们的事业并无裨益。我自己的思想活
207 动在争取议员们赞同一项有力的民族政策的愿望和引起国王不信任我和我的主张（因为从气质上来讲，他是谨慎小心，畏惧暴力措施的）的担心之间。为了对付新闻界随时可能对他产生的影响，我便到尤特博克迎接他。

我费了一番周折，才从班车上性急孟浪的列车员那儿打听到国王所在的车厢。国王独自一人坐在一等普通包厢内。看样子，由于和夫人会见的影响，他显得心绪颓丧，当我请求他允许我报告他不在时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他打断我的话说：

> 这一切将会怎样结束，我完全精确地预料到了。有朝一日，在歌剧院广场，在我的窗户下面，有人先把您的头砍下来，稍后就轮到我了。

我猜测到（后来有目击者证实）他在巴登停留八天期间有人不断向他讲述有关波林尼雅克、斯特拉福、路易十六[47]的种种故

事。当他沉默时，我就简短地问道："后来呢，陛下?"国王回答说："后来吗？后来咱们都得死!"我接着说："是呀，我们都得死，可是我们迟早得死，难道我们不能死得更庄严些吗？我本人在为我王陛下的事业的斗争中，和陛下（您将用您的鲜血保证上帝恩赐的您的君权）是在断头台上还是在战场上，为上帝恩赐的权利而英勇地献身，不同样是光荣的吗？陛下不必考虑路易十六，他是在软弱的情绪中生存和死去的，在历史上没留下好印象。相反，查理一世[48]拔出刀剑保卫自己的权力，斗争失败之后他不屈地用自己的鲜血巩固了自己的王权信念，这难道不会作为一种高尚的行动永留史册吗？陛下必须战斗，决不能投降，必须反击暴力，虽然这样做会有生命危险。"

本着这种精神，我说得愈多，国王就愈振奋，从而进入了为王权和祖国而手执武器战斗的军官的角色。无论在战场上还是遭到谋刺[49]时，对于个人所遇险境，他都表现了少见的、在他也是很自然的无畏精神。在遇到外部危险时，他的态度可以振奋精神和鼓舞人心。他身上高度体现了一位理想的普鲁士军官的典型：在履行职责时，只要一声"命令"，便会毫无畏惧、奋不顾身地迎着必然的死亡之路前进。可是，当他必须为采取行动而自负责任时，他惧怕上级和世人的批评胜过死亡；以至由于惧怕受到训斥 208
和听到谴责，而损害了他作出决定的能力和正确性。同我会见之前，他一路上自己问自己，他是否能够顶住王后的非议和公众舆论，坚持在和我一起选择的道路上走下去。我们在幽暗的包厢中的谈话的作用与此相反，他主要从一个军官的立场出发，领悟了在目前局势下他应该起的作用。他感觉到自己身佩武装带，像是一名军官，负有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守住某一阵地的任务。这种感

觉使他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思路，在几分钟之内重新恢复了在巴登失去的信心甚至他的愉快心情。为了国王和祖国而献出生命，是每个普鲁士军官的职责，尤其是作为国家的第一军官的国王的职责。一旦他从一个军官的荣誉感来看自己的地位，他就像任何一个标准的普鲁士军官那样毫不犹豫地接受训令去保卫一个或许已经失去的阵地。他对于可能来自舆论、历史以及他夫人对他的政治谋略所进行的“谋略批评”的担心，他已置之度外。他已深刻体验到捍卫普鲁士君主国的第一军官的任务；他认为，以身殉职就是光荣地完成了托付给他的任务。我的判断的正确性的证据是：我在尤特博克会见国王时，他疲乏无力、意志沮丧、精神忧郁，而在抵达柏林之前已经精神振作，可以说，处于一种兴高采烈和渴望战斗的情绪之中，他的这种情绪在迎接他的大臣和官员们面前毫不令人怀疑地表露了出来。

即使说人们在巴登向国王劝诫的作为狭隘愚蠢的证据的对可怕历史事件的回忆，如果应用于我们现代的局势，是不恰当的，或者说是荒诞无稽的，然而我们的处境的确是相当严重的。有些进步报纸希望看到我能为了国家的利益去纺羊毛[50]；1863 年 2 月 17 日众议院以二百七十四票对四十五票宣称大臣应当以他们的个人和他们的财产对违反宪法的支出负责。为了挽救我的地产，把它移交给我兄弟这种计划曾向我暗示过；但是，为了保住在王位更迭时可能被没收的财产而将其转移给我的兄弟的做法会给人造成我懦怯和贪财的印象，此乃非我所愿。何况我在贵族院的地位与克尼普霍夫[51]庄园是有关系的。

第十三章　王朝与族

209

我从来没有（包括我在法兰克福那一时期）怀疑过，解决德国政治问题的钥匙在各邦诸侯和各王朝那里，而不在议会和报刊的政论那里或街垒那里。议会中和报刊上有教养人士的舆论，对各王朝的决议起着遏止或鼓励的作用，但同时更经常的是加剧了各王朝的反抗，而不是在坚持民族方针上给他们施加了压力。比较弱的王朝在以民族事业为支持方面寻求保护；而自认为有力量进行反抗的君主和王室，则不相信这个运动，因为促进德国的统一就将要限制他们的独立性以有利于中央集权或人民代议制度。普鲁士王朝可以预料，随着其实力和威望的增长，在未来的德意志帝国中的霸权最终会属于它。还可以预料，其他王朝所惧怕的权力限制对普鲁士王朝是有益处的，只要它没有通过国民议会被吸尽。自从在法兰克福邦联议会上奥地利—普鲁士二元政治制度（我到那里时就处于这种制度影响下）让位给了必须保卫我们的地位以防备主持者[1]的进攻和奸计这种感觉之后，我认识到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相互依靠不过是解放战争[2]和学校教育的影响造成的青年梦想；在我所相信的对于普鲁士来说，我到那时寄予期望的奥地利并不存在之后，我形成了一种信念：依靠邦联议会的权 210
威，普鲁士决不能恢复三月事件以前在邦联中的地位，更不用说改革邦联宪法了；通过这项改革，德国人民本可以有希望实现他

们的根据国际法作为欧洲大国之一而生存的要求。

我还记得，当我在法兰克福读到了以前我所不知道的施瓦尔岑贝格公爵1850年12月7日的电报时，我的见解发生的变化；他在电报里叙述奥尔缪茨协定[3]的结果，似乎是“凌辱”普鲁士还是宽大地原谅它，完全取决于他。梅克伦堡公使冯·厄尔岑先生是一个诚实的保守派人士，和我一样具有二元政治的思想，我和他谈起此事时，他试图安抚我那由于施瓦尔岑贝格的电报而受到损伤的这普鲁士人的感情。虽然我们在奥尔缪茨和德累斯顿[4]的举止卑微，使普鲁士人的感情蒙受耻辱，但我来到法兰克福时对奥地利依然抱着善意；可是我在那里官方文件中明了施瓦尔岑贝格“先削弱之，后消灭之”的政策之后，我青年时期的幻想便破灭了。德意志诸邦相互关系间的戈尔迪之结[5]不能用脉脉含情的二元办法解开，只有用军刀斩开；关键就在于争取普鲁士国王（不论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从而也争取普鲁士军队来为民族事业服务，而不管人们是从普鲁士观点出发把普鲁士的领导地位视为主要问题，抑或从民族观点出发把德国的统一视为主要问题。两个目的是互相契合的。这一点我明白，当我在预算委员会（1862年9月30日）作了被多方曲解的关于铁和血[6]的讲话时，就指出了这一点。

在名义上，普鲁士是一个大国，至少是第五号大国；普鲁士是由于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精神上的优越得到这一地位的，并且由于1813年[7]民众力量的巨大成就而恢复这一地位。如果没有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的这种骑士般的作风（他从1812年起直到维也纳会议之时在施泰因的影响下，无论如何也可说是在德国的影响下，而遵循着这种骑士作风），那么提尔西特和约[8]规定的四百万普鲁

士人和旧普鲁士或其他德意志诸邦大约同等数量的同情者的民族精神的振奋，是否足以被当时洪堡和哈尔登贝格的外交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胆怯怕事利用来使人工地重建普鲁士，像1815 211
年那样，成为现实，还是成问题的。普鲁士体重当时和它的精神上的重要性[9]以及解放战争中的成就不相称。

为了使德意志爱国主义有活力和有效用，通常需要以对王朝的忠诚为媒介，这种爱国主义不依赖于这种忠诚也可以促进，虽然理论上在议会、报刊和集会上每天都在这样讲，但实际上是罕见的；实际上德国人需要一个他所归心的王朝，或者说需要一种能激起他愤怒、激励他行动的刺激。但这种刺激就其性质而言，是不可能持久的。一个人作为普鲁士人、汉诺威人、符腾堡人、巴伐利亚人、黑森人比作为德意志人已更早地证实了他的爱国主义；在下层等级和议会党团中，要改变这种情况，还需要漫长岁月。人们不能说汉诺威王朝、黑森王朝或其他的王朝都特别致力争取自己臣民的善意，但是臣民的德意志爱国主义，本质上仍然取决于对他们自称为其臣民的那个王朝的忠诚。不是族的区别，而是王朝的关系成为离心因素的原始基础。日见加强的不是对于士瓦本、下萨克森、图林根[10]等族的特性的忠诚，而是一个诸侯王室的统治的分立部分（不伦瑞克王朝、布拉班特王朝、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对于民族实体的形成的作用。巴伐利亚王国的结合不仅仅依靠居住在巴伐利亚南部和奥地利的巴尤瓦尔族人，也依靠血统纷杂的奥格斯堡的士瓦本人、普法尔茨的阿勒曼人和美因河的法兰克人[11]，他们仅仅因为同慕尼黑与兰兹胡特的老巴伐利亚人在一个王朝治下生活过三代，就同后者一样心满意足地称自己是巴伐利亚人。最鲜明地表现出族的特性，如北德意志人、萨

克森人，王朝的影响要比其他族更为尖锐和深刻。德意志人的祖国之爱就需要一位君王，以便把他们的忠诚集中在他身上。如果设想出现这种状况：各个德意志王朝骤然全部消失，那么在欧洲政治动乱的情况下，德意志民族情感不可能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把全部德国人联合起来，甚至连汉萨城市同盟[12]和帝国乡
212 村[13]这种的联合形式也不可能。如果各邦君主共同意识中的结合纽带丧失的话，那么德国人就会成为结合得更为牢固的民族的虏获物。

从德国历史上看，具有最明显的族的特性的大概是普鲁士人了，但是没有人能够有把握地回答这一问题：如果想像霍亨索伦王朝和任何一个合法地继承它的王朝消失的话，普鲁士的国家结合是否还会保持下去？是否可以肯定，联合成不可分割的普鲁士民族国家的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波美拉尼亚人、汉诺威人、霍尔施坦人和西里西亚人、亚琛和科尼斯堡[14]，如果没有王朝，也还能照旧生存下去？单独看来，如果维特尔斯巴赫[15]王朝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巴伐利亚还能保持它巩固的结合吗？某些王朝的一些往事，并不恰好适合对那些历史上形成这些邦的不同部分报以忠心。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地区就完全没有这种王朝的回忆，特别是不在反戈托尔普的意义上[16]，但它却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有大臣、宫廷官长和勋章的独立的小朝廷，以牺牲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同盟成就为代价，来过小邦的生活和在易北河公国[17]中唤起极为强烈的小邦分立运动。巴登大公国自贝尔格莱德的[18]路德维希边疆侯的时代起就几乎没有什么王朝的回忆；这个小公国在法国保护下在莱茵联邦中的迅速扩展[19]，最后一代长系公爵的宫廷生活，与鲍哈奈家族的联姻，卡斯帕尔·豪泽尔[20]的故事，1832 年的革命

事件[21]，市民之友列奥波特大公的被逐①，1849 年执政家族[22]的被逐——所有这一切都未能打破国内对王室的服从；1866 年巴登进行了反对普鲁士[23]和反对德意志思想的战争，因为执政家族的王朝利益不可扭转地要求这样做。

欧洲其他各民族并不需要这种媒介来表达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波兰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在任何一个王朝的统治下，或者在完全没有王朝的情况下，也会作为一个民族来保持他们的统一的结合。北方的各日耳曼族、瑞典人和丹麦人显示出他们已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王朝情感；在英国，对王冠的表面崇敬属于上流社会的需要，而且迄今参政的所有党派 213
都认为形式上保存王权是有益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当历史的进程表明，改朝换代或向共和制过渡对于不列颠人民是必要的或者是有益的时候，则民众便会瓦解，或者类似于雅可布党人[24]时代那样的情感会发生实际作用。

重视对于王朝的感情，把王朝的不可或缺当作联系手段，并以王朝的名义来维持民族内的一定部分，是帝国德意志人的特征。在王朝的家族统治的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特殊的民族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包含各种不同成分，它们的组合既不是以族的相同也不是以历史发展的相同为基础，而完全是以这样一种大可争议的事实为基础：即由王朝借助亲属关系、共同继承关系或在选举皇帝时从皇室获取继承权等来达到加强和继承的权利。无论这种小邦分立的组合的起源是什么，它的后果总是：各个德意志人随时准备用火与剑同自己的德意志邻居和同族人搏斗，如果发生连

① 1849 年 5 月。——德文本注

他本人也不理解的纠纷，只要王朝有令，就亲自把对方置于死地。在证实这种特性很有力量，可以予以考虑的时候，那检验这一特性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就不是德国政治家的任务。难以摧毁或忽视这种特性，或者难以在理论上促进统一而不顾及这种实际障碍，对于争取统一的先驱来说往往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在利用1848年至1850年民族运动的有利形势的时机。我完全理解今天韦尔芬党[25]对旧王朝的依恋之情，而且我不知道，如果我生为老汉诺威人的话，是否不加入这个党。但是即使处在这种情况，我也不能避开德意志民族情感的影响，而且如果全民族意识的更为强大的力量无情地消除了我对王朝的男子汉般忠诚和个人的偏爱，那我也不会感到惊异。在政治生活中，而且不仅是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光荣殉职的任务也落到了其他的和更有价值的精神动机上；不伦瑞克选帝侯家族[26]没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削
214 弱了它的陪臣的忠心在我心中引起的同情。在德意志民族情感与分立主义相斗争的一切地方，我一向认为前者是一支更强的力量，因为分立主义，包括普鲁士分立主义在内，只是产生于对全德意志的共同体的对抗，对皇帝和帝国的对抗，它背离这二者，依靠教皇的支持，后来依靠法国人的支持，总的来说是依靠了对于德意志的共同体同样有害和危险的所有那种支持。对于韦尔芬人的企图来说，他们历史发展道路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即楞雅诺战役[27]之前狮子亨利的背离，在最艰苦最危险的斗争时刻为了个人和王朝的利益而对皇帝和帝国的背弃，永远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德国，王朝的利益只要它与帝国的民族共同利益相符合，它就是有正当理由的；它能够同这一民族利益很好地携手并进，一个古老意义上的忠于帝国的大公，在特定条件下会比皇帝对大

公臣下的直接关系更有益于整个事业。但是当王朝的利益以对民族进行新的分裂和使民族的无力相威胁的时候，那就必须把王朝利益限制到合适的范围内。德国人民及其民族生存不能由诸侯当作私人财产来瓜分。我任何时候都认为，这个思想既适用于勃兰登堡选帝侯王朝，也适用于巴伐利亚王朝、韦尔芬王朝和其他王朝；如果为了实现我的德意志民族感情，我不得不与勃兰登堡王室决裂并与之对抗的话，那我面对这个王朝将会是赤手空拳的，但是历史的定数就是我的为朝廷效力的才能足以为德意志事业而争得国王和最后争得他的军队的支持。我为了反对普鲁士分立主义，也许经历了比反对其他德意志邦国和王朝的分立主义更加艰巨的斗争，而且我对威廉一世皇帝的天生的关系使这场斗争对我更为困难了。不过，不顾皇帝的强烈的王朝的目的，但是由于皇帝的王朝正当的和在决定性时刻日益强烈的民族的目的，我最后总能够使皇帝赞成我国向德意志方向发展的方针，即使各方面要求实现一种更为王朝的和分立主义的发展方针。在尼科尔斯堡[28]的形势下，只有靠了当时王储[29]的支持，我才达到这个目的。在 215
德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个诸侯的领土主权[30]发展到了不合自然的顶点；各个王朝本身，普鲁士也不例外，比之霍亨施陶芬[31]和查理五世的统治时代，面对德意志人民决没有更大的历史权利来分裂他们以满足自己的私利，和在主权上占有民族机体的各别部分。王朝、帝国骑士[32]、帝国[33]、帝国乡村[34]的无限邦国主权是以损害民族和民族统一为代价的一种革命的结果。我一直认为不合自然的事实是：在沼泽和林莽中不可辨认的一条边界把萨尔茨威德尔的下萨克森的古老边区居民和吕霍夫的不伦瑞克选帝侯管辖内的下萨克森人分隔开来，使住在边界两侧都说北德意志方言的

下萨克森人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而相互敌对的国家法制机构；其中的一个由柏林管理，另一个先由伦敦、后由汉诺威[35]管理。一方的目光盯着东方，另一方的目光盯着西方；这个地区彼此有亲戚关系的完全一样的和平农民有时却必须互相射击，一方为了韦尔芬·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另一方为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36]。整个说来，这种现象之可能出现，证明了忠于王朝的思想对德意志人影响之强大和深刻。王朝在任何时候比舆论和议会的作用大，这已为这样的事实所证实：在1866年，那些处在奥地利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邦联各邦王朝不顾民族意愿而追随了奥地利，只有那些处在“普鲁士炮口下”的邦国，才追随了普鲁士。确实在后者这些邦国中要排除汉诺威、黑森和拿骚[37]，因为它们认为奥地利十分强大，胜利在握，足以挫败普鲁士的所有奢望。它们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没有人能说服威廉国王同意下述思想：身为北德意志联邦[38]首领的普鲁士不需要扩展疆域。但是可以肯定，在1866年，德意志联邦各邦的物质力量也都掌握在各王朝手中，而不在议会手中，而萨克森人、汉诺威人和黑森人的流血不是为了德国统一，而是为了反对这种统一。

各地王朝到处都成了把德国推向分立而结为狭小团体的愿望所体现的中心。

第十四章　冲突内阁[1]

(一)

在分配内阁职务时，候选的人数不多，任命财政大臣花的时间最少，因为这个职位安排给了卡尔·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他是1848年退职的内务大臣恩斯特·冯·博德尔施文格的弟弟，曾于1851至1858年期间在曼托伊费尔领导下担任此职。可是，不久就表明，他和担任贸易大臣的伊岑普利茨伯爵都没有能力领导各自的部。他们两人的工作只限于在专家顾问们所作的决定上签字和调和国王和内阁政策同这些顾问的决定之间的分歧，因为顾问中一部分人是自由派，一部分人则受到本部门狭隘观点的束缚。财政部中大多数很熟悉情况的官员都属于反对冲突内阁的反对派，认为这个内阁不过是政府官僚机器在向自由主义方向发展中的一个短暂插曲而已；虽然他们之中那些最能干的人心地善良，不至于阻碍政府的工作，但是只要感情和责任允许，他们也会对政府进行消极的、并非微不足道的反抗。这种状况造成了一种奇特现象：冯·博德尔施文格先生在我们这些大臣中间，就其个人的见解来说，是最右的，而在投票时却往往采取极左的立场。

贸易大臣伊岑普利茨伯爵同样也不能独立自主地驾驶好他那超载的贸易部大船，而是顺着他的下级给他开辟的河道随波逐流。也许为当时下设单位如此之多的贸易部本来就不可能找到一
217 个在他所管辖的一切部门里都能领导下属的长官；那么伊岑普利茨伯爵对于应由他完成的任务也比例如冯·德·海特要外行得多，而在技术问题上又一筹莫展，不得不受内行的像德尔布吕克那样的局长的指导。此外，他为人性格软弱，缺乏领导规模如此之大的部门所必备的能力；这位爱好名誉的长官最为不安而又难以对付的是当时贸易部门里某些个别有才干的同僚所干的不正当行为，因为他认为在技术方面离开这些使他疑虑重重的官员是不行的。我个人并不指望这里谈及的两位同僚支持我的政策，因为他们不理解我的政策，而且也因为他们对我所表示的一番好意只不过是向一个原来并未参与这一事业的较为年轻的首相所表示的善意而已。

我发现作为内务部大臣的冯·雅戈夫先生由于说话语调激烈，辩论时又废话连篇，自以为是，很快便招致同僚们的极大反感，以至不得不由弗里德里希·欧伦堡伯爵来替换他。有一件事情能说明他的特性，那是在他被调出内阁到波茨坦当省长[2]以后我们同他一起经历的事。当时就柏林市的重大事项正进行着谈判，雅戈夫在谈判中充当政府和市政当局之间职权范围内的中间人。情况十分紧急，内阁要求市长前往波茨坦，就一项重要问题去口头征求省长的意见，并在内阁晚间为此目的召集的会议上就此作出报告。市长得到了两个小时的接见；但是，要在会议上作报告时，他竟宣称他不能作这样的报告，因为在两趟列车之间的两小时之内，面对省长先生竟没有能够说上话。他多次设法提出问

题，甚至不怕失礼，但总是被他的上司越来越起劲地加以制止地说："请允许我把话讲完，我还没有讲完呢。"市长的这个报告在公务上引起了不快，但是当人们回忆起自己以前的经历时，也就令人觉得有点好笑了。

我的同僚农业大臣泽尔霍夫的能力也和他在管理省政府中所享有的威望不相符合。国王曾想任命他为最重要的内务部大臣。 218
我同冯·泽尔霍夫先生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对他有所了解。我请求国王取消任命他的打算，因为我认为，泽尔霍夫不能胜任此项任务，我建议任命弗里德里希·欧伦堡伯爵来代替他。这两位先生都以共济会会员[3]身份和国王建立了联系；他们由于充实内阁发生困难，才于12月被邀进入内阁的。国王怀疑欧伦堡在内务部领域的专业知识，想把贸易部交给他、农业部交给伊岑普利茨、内务部交给泽尔霍夫。我对他阐明我的论点说，就充任贸易大臣的专业知识来看，欧伦堡和泽尔霍夫是差不多的，两者在专业知识上都不如他们的顾问；在这种情况下，我更看重的是个人的才干、机智和知人善任的能力，而不是业务知识。我承认，欧伦堡不很勤奋，贪图享乐；但是他为人精明果断，如果于最近期间让他担任内务部大臣从而不得不走上第一线，那么他就必需保卫自己和驳斥对他的打击，这样就能够使他从无所作为的状态中猛醒过来。最后国王对我让步。我至今依然认为，根据当时的情况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诚然，我有时也会因我的朋友欧伦堡缺乏勤奋和责任感而感到为难，但他在工作情绪高涨之时的确是个优秀的助手，而且思维缜密，只不过不免有点虚荣心，甚至对我也不免有点抱怨叫屈。由于克制自己和紧张劳作的时间比通常的要长久，他患了精神衰弱症。无论如何，他和罗昂在冲突内阁中

都是最为卓越的大臣。

在我以后的同僚中间，罗昂是我进入内阁时唯一能够理解我入阁的作用、目的以及我们的共同计划（他和我讨论过这个计划）的人。他在忠诚、勇敢和工作能力方面均是无与伦比的，在我进入内阁的前后，他帮助克服新纪元[4]实验给国家造成的危机。罗昂熟知并能掌握他所管辖的部门，又是我们中间最好的演说家，他富于才智，信仰坚定，是一位珍视自己荣誉的普鲁士军官。在政治问题上他和欧伦堡一样精明，但比后者更为始终如
219 一、更为可靠、更为缜密。他的私生活是无可指摘的。我个人和他的友谊始自童年，他当时住在我的父母家中（1833 年），从事地形测图工作，我只是偶尔也为他那急躁脾气而忧虑，因为那种性格很容易损害他的健康。1873 年我由于患病而把内阁首相职务托付给他时，像哈里·阿尔宁和一些比较年轻的军人那样的追名逐利分子便使劲拉拢他，并试图离间他和我的关系；这些年轻军人及其同伙曾在《十字报》[5]和《帝国之钟报》[6]上反对过我。由于我的其他同僚的主动，他的首相职位在与我毫不相干的情况下被结束了。由于年事见长，他的性情变得越来越急躁了，文职同僚对他也不再敬重了，所以这些人也就不遵守同事交往的礼仪了；他们向我，也通过欧伦堡私下向国王提出要我重新主持内阁的建议。我感到遗憾和出乎我意料的是，主要由于中间挑拨，上述情况使罗昂在晚年时对我即使不是冷淡，那也是有所保留了；而我则对于我的最好的朋友和同志对于针对我的系统的谣言和中伤竟没有加以坚决反击感到痛苦；我相信，反过来我如果处在他那种地位，一定会坚决地予以反击的。

宗教事务大臣冯·缪勒在对待公务上和他以后的继任者弋斯

勒有许多共同之处，区别仅在于他那活泼和（她愿意时）讨人喜欢的夫人的毅力和对事业的爱好影响了他，他是往往屈服于她那较为强烈的意志的。的确，我起初并非通过直接观察得知这种情况，而是根据和这两个人的交往而获得的印象所作的判断。我记得，1865 年 8 月在加施泰因[7]有一次我在说服这位大臣夫人离开我们之前曾不顾礼节，坚持让我和冯·缪勒先生单独地就国王的一项命令进行商谈。这种迫不得已的事情引起他的不满，但由于他有工作经验，此事最初并没有影响我和他在事务上的关系，但在我们的私交却受到了损害。冯·缪勒夫人的政治方针并不是来自她的丈夫，而是来自王后，她最为关心的是努力保持与王后陛下的联系。宫廷的气氛、官阶问题、陛下的亲切表示，往往对大臣的夫人们产生着可以在政策中感觉出来的影响；奥古斯塔王后的 220
通常与国家利益相抵触的个人政策，在冯·缪勒夫人身上找到了一位自愿的仆从；而冯·缪勒先生尽管是一位有见识和正直的官员，但在信念上却不够坚定，为保持家庭和睦，如果不是过于明显地有损于国家政策的话，常常会作出某些让步。

司法大臣楚尔·利佩伯爵从或许担任检察官时起，便养成了一种习惯，常常带着微笑和嘲弄的神情，显示出优越感，说些最刺人的事情，由此引起议会和同僚们的不满。在我们之中，他仅次于博德尔施文格是极右的，而且比后者更激烈地维护自己的立场，因为他在他所管辖的部里是个相当精明的人物，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而博德尔施文格如果没有他的精通业务的顾问们的热心协助，就不能掌握好财政部的工作进程，但这些顾问在政治见解上比他们的上司和整个部要左得多。

（二）

在冲突中所涉及的国家法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的赢得内阁采纳和国王赞同的观点，已经见诸于陛下致在格罗特考的奥尔本多夫的陆军中校冯·芬克男爵的书信；这封信在当时报纸上虽有所提及，但是根据我的回忆，此信并未全文公布，然而它是特别值得全文公布的，因为信中说明了国王对责任豁免法[8]的立场。

冯·芬克先生在1863年元旦致国王贺信的结尾中说："人民忠于陛下，但人民更加维护宪法第99条[9]明确赋予他们的权利。但愿上帝保佑，防止由于严重误解而造成的不幸后果。"

国王于1863年元月2日回信答道：

非常感谢您的友好的新年祝贺。展望新的一年，并不喜人，这无需证明。我不理解的是：您也敲起警钟，好像我不了解绝大多数人民的情绪似的；您一定没有阅读过我对许多忠于王室的代表团所作的答词。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
221 过，我对我的人民的信任是不可动摇的，因为我深知人民信任我；但是，对于那些想要盗劫人民对我的爱戴和信任的人，我则要加以诅咒，因为只有动摇了人民对我的信任，他们的计划才能实现。他们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是尽人皆知的，因为只有谎言、虚伪和欺诈才能使他们的计划能够完成。

您还说：人民要求实施宪法第99条。我倒想知道，人民中间究竟有多少人知道或者曾经听说过第99条!!! 不过反

正都一样，这改变不了什么事情，因为对于政府来说，既有这一节就必须遵守。然而究竟是谁使得这一节不能得到实施呢？难道不是我在冬季例会和夏季例会作出四百万的让步并据此——可惜！——修改了军事预算吗？难道我没有作出其他许多让步——可惜！为的是证明政府迎合新的议院吗？后果又是什么呢？下议院的所作所为，似乎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为了迎合它，为了只是要求做出越来越多和新的让步，而这种让步最后将会导致政府不可能存在。谁这样使用权力，即减少预算，致使国家的一切事务停顿下来，谁就应该进疯人院！宪法上什么地方说，只有政府才应该作出让步，而下议员们却从来不应作出让步呢??? 在我作出空前规模的让步之后，下议院也该作出让步。但是下议院无论如何不肯，所谓的“插曲”[10]犹如白昼那样清楚地证实，有人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陷阱，甚至连您的堂兄弟帕托夫和施韦林由于博库姆·多耳富斯的卑鄙行为也落入了陷阱。还在1862年度就已预定缩减二十三万四千帝国塔勒尔，目的是能够通过预算，尽管问题的核心应该在1863年才讨论；这一点已登报公布；当我对此表示同意时，博库姆·多耳富斯才宣称，从他们方面，即从他的政治上的朋友方面来说，只有立即在委员会中宣布同意，并于另一天在全会上提出两年服役期的法案，这一让步才能接受。当我表示不能同意时，博库姆·多耳富斯便在他的报纸上嘲笑我们：“请想一想政府无耻到何种地步，竟然以二十三万四千塔勒尔换取议院提供和平！”而提出这一建议的却正是来自议院方面！辱骂政府，愚弄人民，几曾有过比这更为无耻的行径呢？

222

下议院行使了自己的权力，削减了预算。

上议院行使自己的权力，完全拒绝被削减的预算。

在这种情况下，宪法规定了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

如上所述，正因为下议院要利用它的权力来消灭军队和国家，所以我就必须代替这个“什么也没有”并且像一个善良的家长那样继续进行管理，到后来再对这一切作出解释。由此可见，究竟是谁使第99条不可能实施??? 的确不是我！

威廉

第十五章　阿尔文斯累本协定

与意大利的变革[1]同时发生而且与其并非没有联系的波兰运动，开始时是以国丧①、教会庆祝祖国纪念日和农业协会的宣传鼓动等活动[2]表现出来的；面对这一运动，彼得堡在波兰化和绝对专制主义二者之间长期举棋不定。对波兰人表示友好的思潮与俄国上层社会对于宪法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相关联。俄国人毕竟也是有教养的人，却不能享有欧洲各国人民都享有的制度，不能够参预讨论自己的事情，这种状况令人感到是一种屈辱。在对波兰问题的判断中的争论一直扩展到最高军界人士中间，而且造成华沙行政区长官拉姆贝特伯爵将军和总督盖尔斯滕茨韦格将军之间的激烈争辩；争辩以后者原因不详[3]的骤然死亡而结束（1862 年 1 月）。在彼得堡一个福音教派教堂里，我参加了死者的葬礼。那些要求宪法的俄国人有时辩白说，波兰人不能由俄国人来管理，他们作为文明的人民，有权提出参加他们的政府的更高要求。

这也是哥尔查科夫公爵赞同过的意见；议会机构本来会给他的演说才能在欧洲提供一个用武之地的，而他对声誉的渴求使他不能对抗俄国“社会”中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宣布维拉·查苏利奇无罪开释时（1878 年 4 月 11 日）[4]，他第一个向听众发出鼓掌

---

① 为了在 1860 年 11 月 1 日去世的夏洛蒂皇后。——德文本注

的信号。

224 1862 年 4 月我离开彼得堡时，不同意见的争论甚为激烈，而且在我担任大臣的第一年里仍然如此。我接管外交部时的印象是，1863 年元月 1 日[5]爆发的起义不仅关系到我们东部各省的利益，而且还关系到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这就是：统治俄国内阁的是一条对波兰友好的还是反对波兰的方针，是追求俄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结成泛斯拉夫的、反德意志的同盟，还是一种俄国和普鲁士互相支持的政策。在谋求同盟的活动中，俄国人比较坦率；而波兰贵族和教会则很难相信这种企图的结果，或者很难把这种企图当作既定的目标来加以注意。几乎没有一个波兰人认为这种同盟政策不是一个策略上的进化，其目的就是在必要或有利时用来欺骗虔诚的俄国人。波兰贵族及其教会即使不是完全像、但也差不多像反对同德国人结盟那样坚决地反对这种同盟，同德国人同盟则是他们无论如何更要避免的，这不仅是因为种族上的反感，还因为他们有一种看法：在国家的共同体中，俄国人有可能会受波兰人领导，而德国人却不会。

对于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前途来说，俄国的态度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一种俄国对波兰友好的方针会有助于鼓励从巴黎和约甚至更早时期起就有时企求的俄法联系；而这种在七月革命[6]以前就一直酝酿着的对波兰友好的俄法同盟会使当时的普鲁士陷入困境。为了我们的利益，就必须为反对俄国内阁中同情波兰（即使是按照亚历山大一世精神的那种同情）的一派而斗争。我有时同哥尔查科夫公爵，有时同皇帝本人的亲切谈话中了解到，俄国本身不能保证不同波兰结成同盟。当时亚历山大皇帝并不反对部分地放弃波兰；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了这样的话，至少

涉及维斯拉河左岸地区，同时，他并没有强调要排除华沙，而华沙作为军队驻扎地总是对军队具有吸引力的，并且在战略上还是维斯拉河畔的三角要塞[7]。对于俄国来说，波兰是一个不安和引来 225
欧洲危险的源泉，使它俄罗斯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信仰不同和俄国机构缺乏行政能力。他认为，我们德国人，则能使波兰地区日耳曼化（?），我们有办法这样作，因为德国人比波兰人文化水平高。俄国人没有统治波兰人的这种必需的优越感；俄国的行政不得不限于这些最低数量的地理形势所允许的波兰居民，也就是说限于维斯拉河一线和作为桥头堡的华沙。

我不能判断，皇帝的这些言论在多大程度上是考虑成熟的。这些意见大概和官员们讨论过，因为我从未听到皇帝对我说过完全独自的、个人的政治创见。这次谈话是已经确定我将被召回国去的时候进行的；我说我对离任表示惋惜，还愿在彼得堡继续留下来，我说此话不仅是为了礼貌，而且也符合实际，但却使皇帝对我产生误解，便提出我是否愿意在俄国任事的问题。我婉言谢绝了，强调说我的愿望只不过是作为一名普鲁士公使留在陛下身边。如果皇帝为此目的而采取步骤的话，当时我不见得会感到不愉快；因为考虑到，当大臣也好，当驻巴黎或伦敦的公使也好，为新纪元政策服务而又没有参预我国政治的希望，这本身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假如我在伦敦或巴黎，对国家、对自己的信仰究竟会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而我对亚历山大皇帝及其杰出官员的影响，则对我国的利益是不会没有意义的。一想到去当外交大臣，我就不痛快，就好像大冷天去洗海水浴一样；但这种感觉也还不至于强烈得使我只顾个人前途，或者为此目的而去请求亚历山大皇帝。

我就任大臣之后，内政问题起先比外交问题来得更为突出；在外交方面，由于我不久前的经历，我对同俄国的关系感到特别亲近，我努力使我们的政策在彼得堡像以往那样尽可能保持住影
226 响。显而易见，普鲁士在德意志方针中的政策在当时不能期待得到奥地利的任何支持。法国不可能长期对我国的强大和德意志的统一抱有真诚的良好愿望，但是这种信念不应该阻碍我们实用主义地接受暂时的、拿破仑由于错误的考虑而给予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和俄国的关系如同和英国的关系一样，因为我们同这两国都没有根本不同的利益，而且同它们都具有多年的友好联系。从英国那里，我们除了能得到柏拉图式的良好祝愿和教训式的书信、报刊文章外，未必还能指望别的什么东西。沙皇的援助，正如尼古拉皇帝对匈牙利的远征[8]所表明的那样，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超越善意的中立。不应指望他会为我们的利益而有所作为，但是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在法国企图干涉德国问题时，亚历山大皇帝为了制止这种企图，至少会在外交上给予我们支持。我有理由假定的这位君主的情绪在 1870 年[9]已让人们认清楚了，而当时那个中立、友好的英国连同它的同情是在法国一方。因此，根据我的见解，我们有一切理由去培育亚历山大二世不顾其许多臣民和高级官员的反对而对我们所怀有的任何同情，至少为了尽可能防止俄国加入反对我们的阵营，这种培育也是必要的。当时不可能有把握地预见：沙皇的友谊这笔政治资本在实际上能否使用，如果能使用，那么究竟能使用多长时间。但是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让这笔政治资本落到我们认为是对手的波兰人、波兰化的俄国人、最后大概还有法国人的手中这一单纯想法则是合乎人类健康理智的。在德意志领域，当时首先和普鲁士敌对的

是奥地利，它能够比我们或俄国更容易地对付波兰的运动，因为这个天主教帝国[10]虽然有过1846年[11]的往事并悬赏过波兰贵族的头颅，但它在波兰贵族和教会中仍旧得到比普鲁士和俄国多得多的同情。

把奥波同盟计划和俄波同盟计划协调起来总是困难的；但是 227
奥地利1863年的态度是执行一种与西方大国结成有利于波兰运动的联盟政策，这表明，奥地利不怕在复兴波兰中与俄国敌对。毕竟奥地利于4月、6月和8月12日三次在彼得堡为了波兰的利益与法国和英国采取过共同步骤。6月18日①的奥地利照会写道："我们研究了在波兰王国恢复安宁与和平的条件，并把这些条件归结为以下六点，提供给圣彼得堡内阁考虑：1.普遍的、全面的大赦；2.在国内参与立法并拥有有效监督手段的国民代表机构；3.任命波兰人担任公职，以建立受到全国信任的特殊的民族行政机构；4.不受限制的充分的信仰自由，取消有关天主教宗教仪式的一切限制；5.只把波兰语作为行政、法律和教学上的官方语言；6.实行经过整饬的法定的新兵招募制度。"哥尔查科夫提出的由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取得协议来确定它们所管辖的波兰臣民的命运这一建议，遭到了奥地利政府的拒绝，它声称说："由维也纳、伦敦和巴黎三个内阁之间达成的协议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约束关系，奥地利不能背离这种约束关系而去单独地与俄国进行谈判。"亚历山大皇帝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才亲笔写信，给在加施泰因的陛下说明自己拔剑出鞘的决心并要求与普鲁士结盟[12]。

---

① 1846年的波兰起义是由波兰流亡者发动，由于密洛斯拉夫斯基被捕而失去领导人，并被迅速镇压下去。由于这一起义的结果，迄今的克拉科夫共和国为奥地利所占有。——德文本注

毫无疑问，与两个西方大国的亲密关系促使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决定于8月2日借助于君王会议[13]来反对普鲁士。这时他无疑是犯了一个错误，他不知道拿破仑皇帝对波兰事务已经厌烦，而在考虑体面地退出。哥尔茨伯爵于8月31日给我写信说道：

从我今天的邮件中您可以看出，我和恺撒[14]是同心同德的（事实上即使在我的使命开始时，他也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对我这样友好、这样开诚布公），奥地利通过它的牵涉到我们同法国的关系的君王会议给我们帮了大忙，只需要和平地
228 将有关波兰问题的争论调停好，就会由于梅特涅和他的高贵女友[15]今天外出同时不在而重新回到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迎接未来事件的那种政治局面。

我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在赞成皇帝对波兰事务的指示方面走得那么远。在我看来，他是在期待我提出从中调停的建议；但皇帝的声明却令我欲言又止。无论如何，我认为必须趁热打铁；现在，皇帝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克制，但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奥地利努力在波兰问题上以高度的热心来弥补在法兰克福[16]表现出来的笨拙做法的话，他又可能回到那些更为强烈的要求上去。现在他只想光荣地摆脱这件事，自己也承认这六点要求不合理，因而对于其实际执行情况也将乐于闭目不视，他如果不是由于一个有约束力的形式而不得不去监视这六点要求的严格执行的话，这对他来说或许甚至是完全合适的。我只担心，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往的办法处理这件事，那么俄国人就会抹杀我们从中斡旋的功劳，就会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去做我们（?）想要劝说他们去

做（?）①的事。大公[17]外出旅行显然没有被召回，使我在这方面疑虑重重。如果亚历山大皇帝现在公布一项宪法，又用负责的亲笔信将此事告知拿破仑皇帝，那将会怎么样呢？这总会比继续保持争论要好，但对我们不利，不如我们事先对拿破仑皇帝说："这是我们准备建议的，你对此满意不满意？"

弗略里将军在十四天以前直截了当地对普鲁士使团的一个成员建议过，要他劝告亚历山大皇帝采取上述步骤，对此我们没有听从，因而三大国的外交战役陷入困境。哥尔茨伯爵的全部计划在我看来在政治上既不正确又无价值，与其说符合我们的精神，不如说符合巴黎的精神。

在波兰问题上，奥地利没有那种对我们来说同恢复波兰独立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波兰和德国双方对波兹南和西普鲁士的要求以及东普鲁士的地位等困难。我国的地理位置和包括西里西亚在内的东部各省中两个民族的混合，都迫使我们尽可能拖 229
延提出波兰问题，这使我们在1863年也不鼓励，相反，而是尽可能防止俄国提出这个问题，看来这是明智的。1863年之前，彼得堡曾有一度根据维洛波尔斯基[18]的理论拟任命康斯坦丁大公及其美丽的夫人为波兰的副王——当时大公夫人身穿波兰服装——可能还要恢复亚历山大一世颁布的、在老康斯坦丁大公时期形式上依然有效的波兰宪法[19]。

古斯达夫·冯·阿尔文斯累本将军1863年2月在彼得堡签订

① 问号是俾斯麦附加在原稿上的。——德文本注

的军事协定[20]，对普鲁士政策来说，外交上的目的高于军事上的目的[21]。在俄国沙皇的内阁中，这项协定表明了普鲁士的政策战胜了以哥尔查科夫、康斯坦丁大公、维洛波尔斯基和其他有影响人士为代表的波兰的政策。这一结果全靠皇帝不顾大臣们的意图而直接作出决定。俄国同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日耳曼对于签订针对波兰“同胞之族”的这项政治军事性质的条约，对于俄国宫廷内亲波兰派的前途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在这个意义上，这次在军事上无足轻重的协定却大大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那时，在军事上并不需要这样一个条约；俄国的军队是足够强大的，叛乱者[22]的胜利大部分只是些荒诞不经的报告，从巴黎传出，在梅斯洛维策[23]加工制造，一会儿发自边境，一会儿发自战场，一会儿发自华沙，最初出现在柏林一家报纸上，后来便传遍欧洲报刊。协定是成功的一着棋，决定了俄国内阁内部反波兰的君主专制主义势力和亲波兰的泛斯拉夫主义势力之间互相对垒着的这盘棋的结局。

在波兰问题上，哥尔查科夫公爵时而抱有绝对君主专制的观点，时而抱有——不能说是自由派的，但可说是——议会派的观点。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大演说家，事实上也的确是，他喜欢想像整个欧洲对他在华沙或俄国讲坛上所显示的极其慷慨激昂的演说才能会表示惊叹。可以设想，对波兰人的自由主义的让步，不可能不扩及到俄国人身上；所以怀有立宪情绪的俄国人确是波兰人的朋友了。

230 在波兰问题吸引了社会舆论，而阿尔文斯累本协定又在议会中激起自由派的不可理解的愤怒时，有人在王储举办的一次晚会上向我介绍了欣茨佩特。因为他每天和当权人物来往，并且对我自称自己是一个具有保守思想的人，于是我便和他进行了交谈，

阐述了我对波兰问题的见解，以期他以后时常有机会按照我的见解去讲。几天以后他写信给我说，王储夫人问他，我和他谈什么问题用了那么长的时间。他把一切都告诉了她，还把他的叙述做了记录，并送来请我核正。我回答说，我不得不拒绝这一请求；我如果满足这一请求，那么我将会是按照他的陈述，不是向他，而是向王储夫人书面谈论这个问题了；然而我只准备在口头上这样作。

231

第十六章　但泽事件

(一)

弗里德里希皇帝，一位君主的儿子，我主要称他为我的国君。他通过他的善意和信任很快就做到了使我把我对他的父王的感情转给到他身上。通常，他比他的父亲更公开地承认宪法的观点：我作为大臣要对他的决定负责。在适应内政和外交的需要方面，他更少受家族传统的妨碍。关于弗里德里希皇帝和我之间长时期存在不协调的种种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由于但泽事件曾有过暂时的不协调，至于这个事件，自马克斯·敦克尔* 的遗著发表后，我谈起来便不会像往常那样拘谨审慎了。1863 年 5 月 31 日，王储出发到普鲁士省[1] 进行军事视察，事先曾书面请求国王避免颁布任何法令。在他所乘坐的列车上，还有但泽市长冯·文特尔先生，行车中亲王邀请他到自己的包厢中来，几天以后亲王又访问了他在库尔姆的庄园。6 月 2 日，王储夫人又跟随亲王来到格劳登茨；在前一天，根据内阁的一个报告提出并同时公布了有关报刊的国王的敕令[2]。6 月 4 日，殿下[3] 写信给国王，表示他不

---

* R·海伊姆：《马克斯·敦克尔传》(柏林，1891 年)，第 292 页及以下各页。

赞同颁布的法令，抱怨没有邀请他参加内阁的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并谈到了他作为王位继承人有责任发表自己的见解。6月5日，在但泽市政厅举行市政当局的欢迎会，冯·文特尔先生在会上表示歉意说，情况不允许该城充分地表达出他们的愉快。王储在答词中说： 232

> 我同样感到遗憾的是，在我到这里来的时刻，政府和人民之间产生了不和，这个消息使我十分震惊。导致这种事态的种种安排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并不在场。我也没有提过导致这种情况的建议。但是我们大家，特别是我，是最为熟知国王陛下的崇高的、慈父般的意向和豁达的心胸的，我们大家都确信，在国王陛下的统治下，普鲁士正满怀信心地走向天意赐予它的那种宏伟境界。

载有这一事件的消息的《但泽报》分别发给了柏林的和其他报纸的编辑部。这些报纸的编辑部往常因《但泽报》主要属地方性质而从未收到过它。因此，王储的话立即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国内外引起了可以理解的轰动。他从格劳登茨给我寄来了一份对出版法令的正式抗议书，要求我把抗议书转交内阁[4]，但由于国王的命令而压了下来。7日，国王就他4日书面抱怨给予了严厉的答复[5]。对此，王储请求他父亲原谅他为了他本人和他的孩子的前途而不得不采取的一项步骤，并听任解除他的一切职务[6]。他在11日收到的复信中得到了谅解，但信中没有提及他对内阁的怨言和辞职请求，而使他以后有责任保持沉默。

我必须承认国王的愤怒是合理的，同时我努力使他不至于采

用官方步骤或会被公众知道的方式来发泄这种愤怒。为了王朝的利益，我面临的任务是安抚国王，防止他采取使人回忆起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和屈斯特林[7]①的步骤。6月10日，在国王陛下从巴贝尔斯贝格到新宫去视察训导队的旅途中这项任务已基本上完成。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因为包厢中有仆人们在座。事实上我成功地以国家利益为由缓和了父亲的愤怒，我说，在当前的王权和议会之间的斗争中，王室内部的纷争要加以缓和，置之不问，
233 绝对保持沉默，他作为国王和父亲首先要关心的是，不使这两者的利益受到损害。“请您对押沙龙这孩子谨慎小心些吧！”我这样说是暗示乡下神父关于撒姆耳记下第15章第3和4节[8]所作的布道；“陛下，请避免在愤怒的影响下作出决定，只有考虑国家利益的理由才是衡量的准则。”我提醒他说，在弗里德里希一世和他儿子之间的冲突中，当时的人们以及后世的同情心都在他儿子一方，因此，把王储当成牺牲品的做法是不明智的。看来此话给他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

在这件事通过父子交换上述信件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调停之后，我收到了王储寄自斯德丁的、日期标明为6月30日的来信，他对我的全部政策提出了措辞严厉的谴责：这种政策对人民缺乏善意和尊重，是以对于宪法的十分可疑的解释为根据的，它使得宪法在人民眼中变得毫无价值，促使人民走上脱离宪法的道路。另一方面，内阁从对宪法的随意的解释进一步走向更加随意的解释，最终会主张国王同宪法决裂。他还打算请求国王同意，只要

① 王储弗里德里希在他的一次失败的逃跑尝试之后被关押在屈斯特林（1730年）。——德文本注

这个内阁在当政，他就不参加内阁会议。

我在收到王位继承人的这项声明之后，依然坚持走我自己选择的道路，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我并不关心在王位更迭之后——这可能很快就会发生——能否保持自己的大臣的职位。虽然王储还迫使我在以后将要叙述的一次谈话[9]中把这一点明确地告诉了他。

令国王震惊的是，6月16日或17日的《泰晤士报》[10]刊登了一条消息："亲王在军务旅行时机竟然同君主的政策发生了冲突，并对他的各种措施提出疑问。为了弥补这种严重的过失，他最低限度能够做到的便是收回他的言论。国王在一封信中要求他这样作，还说如果他拒绝，就取消他的一切称号和职务。据人说，亲王取得了亲王妃殿下的同意，写信对这个要求作出坚定的答复。他拒绝收回所说过的话，提出放弃他的指挥权和称号并要求允许他偕同夫人和家人搬到一个他可以避免被怀疑以某种方式干预国 234
事的地方去。人们说，这封信写得很出色，而且亲王幸运地被赞扬有这样一位夫人，她不仅赞同他的自由派观点，而且还能在他一生中如此重大、如此紧急的时刻给予他这样大的支持。很难想像出有比亲王夫妇的处境更为艰难的处境了，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顾问，一方面既要应付执拗的君王和腐败的内阁，另一方面又要应付激情的人民。"

对于这篇文章的居间人的调查没有得到什么确实的结果。许多情况表明，对公使馆顾问迈耶尔大可怀疑。议员布拉特向《边境使者报》和《南德邮报》提供的更为详尽的消息，看来是通过一个德国的小外交官[11]获得的，此人得到亲王夫妇的信任，保存了托付给他的亲王手稿，而在二十五年之后又辜负了这种信任，竟轻率地把手稿公诸于世。

我对亲王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保证毫不怀疑，甚至在我谈到他7月14日* 致马克斯·敦克尔的信后，仍然不怀疑，他在这封信中说，有人如果从俾斯麦那里获取他和国王交换信件的副本，他不会感到一点惊奇。

我认为，调查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从我相信能够决定亲王态度的那个方面着手。在对法战争[12]时期察觉的情况和不久前公布敦克尔的文件，证实了我当时的看法。既然在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时间内整整一个学派的政论作家把他们称之为英国宪法、而又对之没有深入了解的东西奉献给大陆各国人民并推荐作为仿效的样板，那么这就说明，王储妃和她的母亲误解了普鲁士国家的特有的本质，误解了这种通过交替的议会集团治理普鲁士的不可能性。这说明，由这种错误又造成了另一种错误，即：如果我们这里不实施使那种斗争终结的制度[13]的话，那么在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就会重演英国在十七世纪[14]所经历的那种内部斗争和灾难。我
235 不能够确定，当时我收到的消息是否真实：似乎在1863年4月，奥古斯塔王后通过路道尔夫·康普豪森议长，王储妃通过冯·施托克马尔男爵编制了批评普鲁士内部状况的各种备忘录并送交国王知悉，但是奥古斯塔王后（公使馆顾问迈耶尔是她的亲信之一）当时非常担忧可能发生斯图亚特式的灾难[15]；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并且早在1862年这种担忧就已经表现在国王低沉压抑的情绪之中，当时他参加了夫人生日[16]庆典后从巴登返回。和王权进行斗争并天天盼望胜利的进步党[17]，对于当时的情况当然没有放过机会在报刊上、并通过个别领导人进行必然对女人的感情起着特别

---

* R.海伊姆：《马克斯·敦克尔传》（柏林1891）第308页及以下各页。

有效作用的说明。

(二)

在加施泰因，王储于8月份访问了我。由于在那里更多地摆脱了英国的影响，所以他解释他的行为是在原来缺乏独立见解和出于尊重父亲的意义上，谦虚而郑重地认为由于自己政治修养不够和脱离事务的缘故；他讲话时毫不拘束，像一个认识到自己过失的男子汉那样，并抱歉地说自己是受到了外界的影响。

9月，在国王和我经由巴登回到柏林，王储也直接从加施泰因返回柏林之后，那种促使王储在6月采取那种态度的影响和担忧又占了上风。在决定解散众议院之后的一天，他写信给我：

柏林，1863年9月3日

我今天已经向陛下陈述了我在从普特布斯（应为斯德丁）[①]致您的信中所阐述的观点，我曾请求您不要在我自己向国王说明之前告诉他。昨天在枢密会通过了一项后果严重的决议；因为大臣们在场，我没有反驳陛下；今天我反驳了，我叙述了我的疑虑，阐明了我对前途的严重担心。国王现在已经知道*，我是内阁的坚决的敌手。

弗里德里希·威廉

① 这封信是从普特布斯送出的。——德文本注

* 俾斯麦铅笔批注：我们也知道。

现在应该谈谈王储在6月30日的信中提出的不再参加内阁会
236 议的请求。当时两位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见于冯·博德尔施文格大臣1863年9月11日的下面信中：

> 我不知道您何时从由于如此悲痛的原因*而导致的外出中回来，也不知道您回来后我是否能够很快和您面谈，现在我书面向您报告：遵照副官传达给我的陛下的指令，我已按照您的委托将您的匆匆起程及其理由转告了王储殿下的副官，并请告知殿下：您希望晋见的请求可能已呈报陛下，或者晋见已经安排妥当。霍亨洛埃亲王告诉我说，陛下方面认为和王储谈论您的起程和晋见问题是不适当的。

国王已作出决定，王储应该像1861年以来那样，继续参加内阁会议，并且委托我说服王储。我设想，为此目的而请求的晋见并未举行；因为我记得，我曾利用王储由于误解而去参加的一次于当日并未举行的内阁会议和他交谈。我问他为什么对政府这样疏远，几年之后这个政府将是他的政府；如果他遵从的是某些别的原则，那他也不应该持反对的态度，而应该力图促成过渡。他断然地拒绝了这番建议，好像揣测我是在替自己开辟门径想过渡到为他效劳。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他那充满敌意的表情和天神般威严的神气，至今他那向后仰着的头、涨红的脸和从左肩上方向我射来的目光依然历历在目。我强压下自己的愤怒心

---

* 我岳母的逝世。我在6日至11日离开柏林。

情，想到了卡洛斯和阿尔巴（第二幕第五场）[18]，便回答说，我是凭着对王朝的满腔情感说话的，是为了国家和王朝的利益而希望他与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重归于好，因为他们互相疏远会使国家和王朝的利益受到危害。在6月我竭力设法使他父王陛下不要在愤怒的影响下作出决定，因为，为了国家的利益，在反对议会统治的斗争中，我希望王室内部能够保持团结。我是他的父王的忠实仆人，并祝愿他在登上王位之后能够找到一位像我对他父亲那样的忠实仆人，来代替我。我还希望他不要认为似乎 237
我在想方设法充当他的一名大臣；我从来没有这样去想。他像一下子激动起来一样，又一下子缓和下来了，并以友好的言辞结束了谈话。

他坚持自己的愿望，不再参加内阁会议；在9月期间他还向国王送交了一份大概不无外来影响的报告，既陈述他的理由，同时也像是对6月的行为进行辩解。为此，陛下和我之间又有过一番私人通信，最后我收到的是如下一纸便笺：

巴贝尔斯贝格，1863年11月7日

我随函附上我对儿子——王储9月份报告的答复。为使您更好地了解情况，我同时寄上附有您的批语的该备忘录，而您作的批语我在作答时已使用过。

这个报告我没有留副本，但从我所作的边页批语可以看出它的内容。批语如下：

第一页。用殿下提出的警告来抵挡陛下经过严肃和周密

的考虑而作出的决定这种要求，会给他的地位和经历（同君王和父亲的地位和经历相比）以不恰当的分量。

没有人会认为殿下“参预了颁布钦赐法令”，因为任何人都知道，王储在内阁中不参加投票，王位继承人的在过去时代流行的那种官方地位按照宪法就不复存在了。因此，但泽的更正是多余的。

第二页。殿下出席会议，在参预国家事务的过程中，听取别人意见，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每个继位者的义务，这无损于殿下作出决定的自由。如果履行这种义务一经报界公布周知，就只会在各地给王储造成一种良好的舆论，说王储正在为崇高而庄严的使命诚挚地进行准备。

“被束缚的双手”云云，这种字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238 第二页。“国家”决不会想到把殿下和内阁等同起来，因为全国都知道，王储在职责上对作决议不能起官方的作用。遗憾的是殿下反对国王的态度已为全国知悉，并且受到任何一个家长（不管他属于哪一党派）的公开谴责，认为这是对于父亲权威的否定，而不尊重这种权威是有损于情感和习俗的。在舆论上给殿下带来危害更大的将是公布这一报告了。神父已在国内关于撒姆耳记下第15章第3和第4节进行布道了。

第二页。殿下的状况无论如何也是“极为错误的”，因为王位继承人的使命不是举起反对派的旗帜来反对国王和父亲；而他的“职责”只是摆脱这种状况，而这只有通过回到正常地位的方法才能完成。

第三页。一种职责和另一种职责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因

为第一种职责是自封的；对于普鲁士前途的关切是国王的事情，而不是王储的事情；是否已铸成“错误”，是哪一方铸成的，将来自有分晓。陛下的“观点”和王储的“观点”发生矛盾的地方，那么前者总是决定性的，因而不存在冲突。殿下自己也承认，在我国宪法中是“没有为王位继承人的反对派留下余地的。”

第四页。事情一旦决定，枢密院内部的反对派就不能不听命于陛下。大臣如有不同观点，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然而必须服从* 国王的决定，虽然他们有责任执行他们反对的决定。

第四页。如果殿下知道大臣们是遵照国王的旨意行事的，那么殿下就不要弄错：王位继承人的反对态度就是针对执政国王本人的。

第五页。王储完全没有对国王的旨意进行“斗争”的职责和权力，因为他没有任何官方资格。否则王族中任何一位亲王就会像王储那样自命有权在观点不一致时公开反对国王，以便以此来保卫“自己的和自己孩子的”可能的世袭权 239
利不致受到国王政府的所谓的错误的损害，这就是说，在国王可能被革命所推翻时，保证自己可以像路易·菲力普[19]那样继位。

第五页。首相应就其在加施泰因的言论予以更加详细的说明。

第七页。王储不是以国王“顾问”的资格，而是遵照陛

---

* 页边有国王批语：如果不违背他们的良心。

下的建议，为了他自己熟悉情况和准备完成未来使命，而参加会议的。

第七页。使政府措施“中立化”的企图，就会是反对国王和同国王作斗争。

第七页。比一切民主派和所有“咬啮者”向君主政权根基的攻击更为危险的是削弱依然联系人民和王朝的纽带，而王位继承人公然宣布反对态度和故意宣扬王朝宫廷内部的不团结，就会削弱这种联系。如果儿子和王位继承人尚且反对父亲和国王的权威，那么这种权威对谁还是神圣的呢？如果对于野心家来说，为了将来有希望得到奖赏，而在现在背离国王，那么这种纽带的削弱也在损害未来的国王，而且破坏现政府的威信也将是为未来政府播下了罪恶的种子。任何一个政府都要比内部分裂和麻痹不灵的政府好，现今王储可能造成的震撼已打击了他将来成为国王时所居住的大厦的根基。

第七页。根据迄今的宪法规定的权利，统治普鲁士的是国王，而不是大臣。议院参预的是立法而不是行政，大臣在两院面前是国王的代表。因此完全合乎法律的是，像在制定宪法以前一样，内阁大臣是国王的仆人，也是陛下的负有职责的顾问，而不是普鲁士国家的统治者。就是在颁布宪法以后，普鲁士王国也不能和比利时或英国同日而语；在我们这里是国王个人统治国家、按照自己的判断发号施令，因为宪法没有规定别的，仅仅涉及到立法才有所规定。

第八页。泄露国家机密就是触犯刑法。凡属国王命令应保守的公务机密，均应作为国家机密处理。

第八页。为什么让“全国”知道了就会有那么大的价值呢？如果殿下在枢密院遵照自己的义务和信念表达自己的见解，那也是够对得起良心的了。王储没有官方地位和国家事务发生关系，也就没有职责要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任何一个即使只是表面地了解我们国家机构的人，从王储听取枢密院讨论，但没有表决权，因而不可能有效地抵抗这一事实中，也不会得出结论说，王储赞同政府的决定。

第八页。“显得并不较好”；形势的缺点正在于太注重“显得”了；重要的是实在和可能，而这又只能是严肃而耗费心血的劳动的结果。

第九页。殿下参加枢密院不是一种“积极的地位”，因为他没有表决权。

第九页。没有陛下的授权向“应邀”(?)* 人士通报消息将会触犯刑法。王储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并没有受到限制，相反，是所希望的；但是只能是在枢密院里，因为在那里这种意见只可能对即将通过的决议产生影响。“向全国公开”这一相对立的要求，其目的只能是满足自尊心，后果必然是助长不满和不服从，由此给革命开辟道路。 240

第十页。毫无疑问，殿下给大臣们的工作造成了困难，如果殿下不参加会议，他们完成任务也许会容易些。但是陛下能否放弃自己的责任而不去尽力让王储熟悉国家事务和法律呢？让未来的国王对于国家事务一无所知，而几百万人的福利则又取决于他对国家事务的了解，这岂不是一个最危险

---

* 问号是俾斯麦加的。——俄文本注

的实验吗？这份报告书表明，殿下并不了解：王储参加枢密院会议从来不是对事情负有责任的性质，而只是熟悉情况的性质，也从来不要求殿下投票表决。他的全部议论的依据就在于他不了解这一情况。

241 如果王储熟悉国家事务，那么就不可能发生在国王没有同意王储殿下的愿望时，他就用公布枢密院讨论情况，亦即用破坏法律、首先是破坏刑法来威胁国王的事件。而这是发生在殿下对公布他与陛下的往来信件进行严厉谴责之后几周的事。

第十一页。上述谴责无论如何将为全体人民所理解；谁也不会抱怨王储的这种意图，但是人们会说，其他怀有这种意图的人希望其意图在王储无意识的协助下得以实现，而邪恶的谋刺现在比以往给其策划者提供更多的改变制度的希望。

第十二页。及时了解将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的要求，一直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且也总是予以满足；还有人不断提出，殿下应尽可能比以往更深入事务的全过程。为此目的，殿下的住地随时都应为人知晓和做到使大臣们得以接触王储本人，并保证保密。但是，特别应当使那些可单独与殿下有权利讨论应受审理的国家事务的顾问不是政府的敌人而应是政府的朋友，或者使他们在判断上没有偏袒，与议会和舆论界的反对派没有密切的关系。最为困难的一点还是保密，特别是对外国的保密，因为殿下以及殿下夫人王储妃都还没有深刻意识到，在各执政的王室中最亲近的亲属并不都是本国人，由于需要和义务感他们代表的却是别国的而不是普鲁士

的利益。在母女兄妹之间存在着一条作为利益分界线的国籍界限是严酷的事实；但是忘了这一点，对国家则永远是危险的。

第十二页。“最后一次枢密院会议”（3日）并非枢密院会议，只是大臣们事先不知道应召去见国王陛下。

第十三页。向大臣们通报会给报告书以一种官方文件的性质，而王位继承人的言论并不具有这种性质。

242

第十七章　法兰克福各邦君主大会[1]

(一)

在导致1879年与奥地利结盟[2]的道路上迈出的最初几步是发生于莱希贝格伯爵担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59年5月17日至1864年10月27日）之时。我和他在邦联会议供职期间建立的私人关系可能对这最初几步起了促进作用，而且有一段时期也曾起到了促进作用，所以在这里我要叙述两件我和他在法兰克福经历的事情。

在一次会议上我触怒了莱希贝格，会后他和我单独留在大厅里，他激烈地谴责我不好相处，说我是个难于共事和爱争吵的人；他并提到我曾保卫自己反对会议主席的侵犯作为例子。我回答他说，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发怒呢，或者仅仅是外交上的一着棋；但是他那生气的表示无论如何是带有个人性质的。我说："我们毕竟不能在博根海姆小树林里用手枪来解决我们两国的外交问题。"他暴跳如雷地说："我们立刻上那儿去；我愿马上奉陪。"这样，对我来说，事情已经越出外交范围，我镇静地回答道："我们为什么要走呢；邦联大厦花园里有的是地方，对面住着普鲁士军官，奥地利军官也住在附近。十五分钟就能安排好，我仅仅请您允许我把争吵的起因用三言两语写在纸上，并希望您和我一起

在这张记录上签字，因为我不愿意在我的国王面前显得是一个用比剑来进行君主的外交工作的好争吵的人[3]。”于是我便开始写，这时我这位同行在我身后急步走来走去。他的火气渐渐平息下来，便冷静地考虑起由他造成的这种情况。我离开他时告诉他 243
说，我要派梅克伦堡公使冯·厄尔岑先生作我的见证人到他那里来商量下一步。厄尔岑后来排解了这次争端。

同样有意思的值得提到的是当我们都当了大臣之后我是怎样获得了这位脾气急躁、却又追求荣誉的先生的信任和友谊的。在一次我因公事去拜访他时，他正走出房间去换衣服，离开时给了我一份他刚刚收到的本国政府的电报，并请我阅读。根据内容我相信，莱希贝格弄错了，他交给我的是一份文件，虽然涉及的是讨论中的事情，但却是只供他一人阅读的文件，显然还附有另一份可以公开的文件。他回来时，我把电报还给了他并说明他弄错了，而我将会忘掉电报的内容；事实上对于他的疏忽我的确做到了守口如瓶，无论在我的报告还是谈话中对这份机密文件的内容以及莱希贝格的疏忽从来没有即使间接地加以利用过。从此以后他便信任我了。

在莱希贝格内阁时期的努力如果卓有成效，就能在二元政治[4]的基础上建立全德同盟，在中欧建立起双头统治的七千万人的帝国，而施瓦尔岑贝格的政策的出发点与此类似，但要由奥地利为统一的首脑和把普鲁士降低到一个中等邦国的地位。1863 年的各邦君主大会便是这种企图的最后一次行动。如果施瓦尔岑贝格的政策终于以君主大会这种身后遗留的形式获得成功，那么可以预料首先放在前面的就是按照邦联在汉诺威、黑森、卢森堡，里佩、汉堡等地已着手进行的宪法修改的标准，利用邦联会议在德

国内政方面进行镇压。如果国王考虑得不周密，那么普鲁士宪法也会遭到类似的命运。

在本来可以达到的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为首的两国权利平等的二元政治——如同作为我接近莱希贝格所努力争取的可能的结果——下，我国内部合乎宪法规定的发展也就不一定受到邦联会议中的反动泥潭和个别邦国单方面追求绝对专制主义的威胁；两大国的猜忌本可成为对宪法的保护。在二元领导的情况下，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中等邦国本应从事于争取整个民族和个别邦国
244 舆论的竞争，而由此产生的摩擦将可能防止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类似美因茨侦讯委员会[5]时期以来的那种停滞状态。奥地利自由派新闻工作同普鲁士的新闻工作相竞争之时，即使仅仅是在措辞方面，在五十年代初期就表明，尚未决定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对于活跃我们的民族情感和促进合乎宪法规定的发展是有益的。

但是，奥地利借助于1863年各邦君主大会想要争得的邦联改革会给普鲁士、奥地利和议会制之间的竞争留下狭小的余地。凭借各王朝对于普鲁士和对于议会斗争的恐惧，奥地利在当时有意设计的邦联改革中将会获得统治地位，利用的是它在邦联中有保证的持久和有组织地建立起来的多数。

在二元领导和奥地利领导的两种制度下，德国对外的威望取决于两种制度之中哪一种会使整个民族达到巩固的统一的程度。丹麦纠纷[6]的全部过程表明：只要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起来，在欧洲就没有一个强国敢于轻率地向它发动进攻。只要普鲁士单枪匹马地处理这个问题，尽管有包括中等邦国在内的德国人民舆论的强烈支持，也不能把事业推向前进，而只能导致如马尔摩[7]停战协定和奥尔缪茨协定[8]那种的结局。只要莱希贝格领导下的奥地利

能够和普鲁士采取一致同意的行动，那么这两个德意志大国的分量就具有足够的威力来制止其他国家可能的干涉企图。在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英国一直需要和某一个大陆军事强国结成同盟，英国根据自己的利益，时而在维也纳，时而在柏林力图达到这一目的，像在七年战争[9]期间那样从一个支柱突然转向另一个支柱，并不在乎由于抛弃老朋友而招致谴责。如果我们这两个宫廷联合起来并结成同盟，那么英国的政策就未必认为和两个对自己来说是危险的国家——法国和俄国——之一结盟来反对我们两国是明智的。但是，只要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友谊遭到破坏，那么接踵而来的便是当时那种以英国为首的欧洲首脑会议[10]对丹麦问题的干涉。因此，为避免我国政策重又出轨，至为紧要的就是要保持同维也纳的协调一致；这可以成为我们抵御英国—欧洲干涉的保障。 245

1862 年 12 月 4 日，我向和我关系密切的卡罗利伊伯爵摊了牌。我告诉他说：

> 我们两国的关系应该变得或者比现在更好，或者比现在更糟。我准备作出共同的努力来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此举由于您的拒绝而遭到失败的话，那么您就别指望我们会被友好同盟之类的词句所束缚住。您必须要像对待一个欧洲大国那样来对待我们；维也纳最后文件的条文不能阻碍德国历史的发展。

卡罗利伊伯爵是一位正直的、有独立性格的人，毫无疑问他把我们单独恳谈的一切情况作了十分准确的汇报。但是，在维也纳，从奥尔缪茨协定和德累斯顿会议[11]时期以及施瓦尔岑贝格的显

赫权势起就有了一种错误观念；他们已经习惯于把我们看得比实际更为软弱，特别是更为胆小怕事，而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就过分看重各君主的亲戚关系和亲属之情。以往的军事上的推测确实是，假定1866年的战争已在1850年[12]进行，那么我们的前途就值得怀疑。但是在六十年代还指望我们软弱可欺，那就错了，因为没有考虑到王位[13]变更了。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许会像在1850年那样和像他的继位者在1859年那样轻易地决定发布动员会，但他很难决定去进行战争。在他统治下存在类似1805年像在豪格维茨[14]领导下那样的巧妙借口把我们引入一种错误处境的危险。就是在真正破裂之后，奥地利也会不顾我们的犹豫和寻求调解的努力，而决心付诸议事日程。威廉国王就像他的哥哥一样，不愿同他父亲的传统和沿袭下来的家庭关系决裂；但是如果他一经在他的荣誉感的支配下（这种荣誉感的感觉存在于普鲁士的刀剑上的缨带和君主的意识中），认为不得不作出良心上很困难的决定的话，那么追随他的人就可以放心，决不会有国王抛弃他们的危险。对于最高领导方面性质上的这种变化，维也纳估计不足，而过多估计了那种影响，即人们通过报界的代理人和给报界的津贴而造成的所谓舆论能够更早地对柏林的决定所施加的影响和通过君主亲属的调解和王室的通信更进一步对柏林决议所施加的影响。

246 此外，维也纳还过高估计了我们的内部冲突[15]对我国对外政策和军事上的领导能力所起的正在日益减弱的作用。在各界人士中间，厌恶用刀剑劈开德国政治的戈尔迪之结[16]的情绪十分强烈，这种情绪在1866年有过多种征兆，从布林德的行刺[17]和进步党的

传单* 对这种行刺的评价直到巨大的自治团体的公开游行集会和选举揭晓就是证明。但是，这些潮流并没有波及到我们的团队及其在战场上的战斗，而问题的最终解决则正是在战场上。在第一次波希米亚战争期间，前外交大臣和当时的宫廷大臣冯·施莱尼茨曾同各宫廷之间进行了许多外交活动，这一有征兆意义的事实也仍然没有影响军事行动的进程。

如果奥地利内阁对于我在1862年对卡罗利伊伯爵作的推心置腹的谈话不作错误的评价，而是正确地认识其现实的价值，如果它相应地改变自己的政策，与普鲁士协调一致，而不是通过多数派[18]和其他势力来压制普鲁士，那么在德国我们本来是很可能经历或试行一段时期二元政治的。当然，如果没有1866年和1870年[19]使我们得到启发的经验的影响，这种二元政治是否能够以一种德意志民族感情可以接受的精神，持久地防止内部的分裂，和平地发展下去，这是值得怀疑的。在维也纳和一些中等邦国的宫廷中，相信奥地利的军事优势十分强烈，以致和普鲁士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一种生存方式成为不可能。在维也纳方面，对此之证明就是奥地利士兵背包中除了准备进入柏林时穿的新的军装之外，还发现了宣言，这些宣言的内容泄露出他们有把握胜利地占领普鲁士的省份。拒绝由冯·加布伦茨将军的兄弟提出的普鲁士的最后和平提议，以财政大臣需要普鲁士的赔款[20]作为拒绝的理由以及当时宣布愿意在第一次战役之后进行谈判[21]——凡此种种都证明他们对于在战役中取胜是有把握的。

---

* 柏林的画店中挂着一幅石印画，画中把行刺事件描绘成：魔鬼拿着射向我的枪弹说："它是属于我的！"——德文本注

247

（二）

这些向同一个方向发生影响的观念所带来的总的结果是与维也纳内阁准备允许的二元政治倾向相反的东西；奥地利不顾普鲁士 1862 年的提议便把发起召开法兰克福各邦君主大会这种截然相反的建议提上议事日程；8 月初在加施泰因，威廉国王及其内阁才吃惊地突然得知此事。

弗吕贝尔* 自称是君主大会的倡议者，毫无疑问参与了会议的准备工作，根据他的说法，其余德意志各邦君主在接到日期为 7 月 31 日的请柬之前，根本不知道奥地利的计划。不过人们可能在一定程度向后来任符腾堡大臣的冯·万毕勒透露了秘密。这位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在 1863 年夏天表示愿意和我恢复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先前通过共同的友人冯·毕洛夫·霍亨道夫的介绍而建立起来的。他要求我和他会见一次，会见是按他的愿望于 7 月 12 日在卡尔斯巴德以西的波希米亚一个小地方秘密进行的；从这次会见中我得到的印象不过是他想试探我的想法，而不是就德国问题向我提出什么建议。1878 年他以他的知识和才干曾协助我解决过经济和财政问题，当时在他的观点中这些问题已占突出的地位，确实是以有相应的统一关税的大德意志政策为支持的。

1863 年 8 月 2 日，在加施泰因我坐在位于小河河谷尽头的施瓦尔岑贝格的庭园的枞树下。上面有一个山雀窝，我手里拿着

---

* 弗吕贝尔：《一生》，斯图加特，1891 年，第二部，第 252、255 页。（根据莱希贝格的说法，宫廷顾问冯·皮格莱本是这一想法的倡始者。——德文本注）

表，观察那鸟儿一分钟给小鸟叼回几条毛虫或其他害虫来。我在观看这个小动物的哺育活动时，发现在河谷对岸威廉国王一个人独自坐在席勒广场*的长凳上。去国王处共进午餐的时刻到了，我回到寓所，看到陛下留下的便条，内容是说他准备在席勒广场上等我商谈会见皇帝的事。我尽快地急忙赶去，可是当我到达国王寓所时，两位国君的谈话已经开始了。如果我观察大自然少耽 248
搁一点时间并能早点见到国王的话，那么皇帝的建议给国王的最初印象就可能会不同。

起初他并没有察觉到在这次突然袭击的邀请或者可以说期限短促的邀请中所包藏的贬抑。他喜欢奥地利的建议可能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君主们团结起来同议会自由派进行斗争这一因素；因为他本人当时在柏林正受到议会自由派的逼迫。在从加施泰因到巴登途中我们在毕尔巴德遇见了伊丽莎白王后，她也切望我前往法兰克福。我回答说："如果国王不改变决定，那么我就去，并在那里料理好他的事务，但是我不再作为大臣回柏林了。"这种前景使王后感到不安，就停止了在国王面前反对我的见解。

如果我放弃反对国王前往法兰克福的意向，顺从他的愿望陪同前往，在各邦君主大会上把普奥间的竞争转变为反对革命和立宪主义的共同斗争，那么普鲁士在外表上会依然一如既往，自然有可能通过邦联会议的决议在奥地利主持下，以类似汉诺威、黑森、梅克伦堡以及里佩、汉堡、卢森堡已实行过的方式修改自己的宪法；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关闭了民族德意志的道路。

我费了不少力气，才说服国王不去法兰克福。我是在从毕尔

---

* 应读作"席勒高地"。——德文本注

巴德到巴登的途中说服他的，当时我们坐在一辆小敞篷车上用法语商谈德国问题，因为有好几个人在我们前面坐在马夫座上。到达巴登时，我相信已经说服了国王。可是在巴登我们见到了萨克森国王，他受全体君主的委托再次邀请国王前往法兰克福（8月19日）。他好不容易才抵制了这步棋。他多次说重复这一想法："三十位执政君主和一位国王当了信使!"他既喜爱又敬重萨克森国王，这位国王在君主之中是最适合完成这一使命的人选。直到午夜，我才成功地请国王签字拒绝萨克森国王的邀请。当我离开国王时，我们两人都因为情况急迫而神经紧张、疲惫不堪，在我随即对萨克森大臣冯·博伊斯特所作的口头通知中尚带有这种激动心情的迹象。危机总算克服了，萨克森国王没有再次会见
249 我们的国王（这是我担心的）便起程了。

在国王从巴登—巴登返回柏林途中（8月31日），尽管多么靠近法兰克福但是不顾而去，不参加会议的坚强意志已十分明显之后，大多数或者至少是最强大的君主们被一种不愉快的心情所笼罩，他们会想到，在普鲁士拒绝的情况下，改革方案就会把他们单单和奥地利联合起来，两大强国的敌对就再也不能为他们提供掩护了。看来维也纳内阁一定认为，其他的邦联君主即使在改革后的邦联关系中最终单单与奥地利站在一起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同意8月17日向大会提交的提案。否则，就不会向留在法兰克福的君主们提出在即使没有普鲁士的同意的情况下也要接受奥地利的提案并付诸实施的过高要求。但是，中等邦国在法兰克福既不想要普鲁士的单方面的领导也不想要奥地利的单方面的领导，而是想按照三位一体[22]的精神获得影响尽可能大的仲裁人的地位，使两大国都要争取中等邦国的支持。对奥地利的没有普鲁士也结

盟的奢求所作的回答是：必须和普鲁士重新进行谈判，并声称他们自己就准备进行这种谈判。对奥地利的愿望的回答的形式不够得体，因而不可能不引起维也纳的恼怒。由于我和莱希贝格伯爵在法兰克福担任外交职务而建立了良好关系，由此而有所准备，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是：他说，通往柏林的道路对于奥地利并不比对于中等邦国更遥远更艰难。

维也纳内阁不顾邦联议会的意见而去和普鲁士达成协议，依我看主要是由于奥地利提案被否决而产生的恼怒所引起的。这个新方针假如也能保持更长的时间，是符合奥地利的利益的。为此，至关紧要的就是莱希贝格继续当政。如果从而确立了对德意志邦联的二元领导（只要其他邦国深信这两个强国之间的协议是公正而持久的，它们就不会拒绝），那么个别南德意志的大臣组织莱茵同盟[23]的欲望面对奥普协议也就会烟消云散（不管博伊斯特在回忆录里说什么，这种欲望在达姆施塔特表现得最为强烈）。

（三）

250

法兰克福大会之后几个月，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逝世（1863年11月15日）[24]。奥地利的突然袭击的失败，其他邦联中的国家在普鲁士拒绝之后不愿意单单和奥地利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加上由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发生和继位问题，这一切都促使维也纳对一种两个德意志大国的二元统治的政策加以深思，而且与1862年12月相比，实现的前景要大得多。莱希贝格伯爵由于邦联伙伴表示没有普鲁士就要拒绝承担义务而恼

怒，便简单地转个弯说，同普鲁士达成协议对于奥地利比对于中等邦国更为容易。就当时来说他是正确的，但从长远看，如果也要保持正确的话，那么，只有奥地利准备把普鲁士当作是德国范围内的一个具有同等权利的大邦，而且要允许普鲁士的势力至少能在北德意志自由地行动，以作为它支持奥地利在意大利和东方的欧洲利益的酬谢。二元政治的开头就在石累河畔的联合斗争中、在联合进攻日德兰和在同丹麦缔结共同的和约[25]中提供了辉煌的证实。普奥同盟即使在由于其他邦国的不满而削弱的情况下，也依然显示出可以作为重要力量，足以遏制其他大国的反对和不满；正是由于这些大国的压力，丹麦才敢于向整个德意志世界发出挑战的。

我们同奥地利的进一步合作最初由于军界人士对国王的强烈压力而受到威胁，他们想鼓动国王即使没有奥地利也要越过日德兰边界。我的老朋友陆军元帅弗兰格尔向国王发出一份不用密码的电报，充斥着对我的最粗暴的诽谤，在这些涉及到我的诽谤中说外交官们都应该送上绞刑架*。

251 当时，我还是成功地说服了国王，我们丝毫也不超过奥地利，特别不给维也纳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由于我们的牵扯而使奥地利违背自己的意志。我与莱希贝格、卡罗列伊的良好关系使我能够达成共同进军日德兰的协议。

尽管有这项成就，二元政治的尝试在有两国大臣莱希贝格和我参加的1864年8月22日于舍恩布伦召开的两国君主的一次会

---

* 由于这一插曲，多年来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处于怨恨状态，在宫中互不理睬，在许多场合我们是餐桌上的近邻，有一次陆军元帅难为情地微笑着对我说："我的孩子，你还完全没有忘记吗？"我回答说："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怎么能忘记呢？"他沉默了好长一阵说："你也不能宽恕吗？"我回答说："衷心愿意。"我们握了手，重新友好如初。

谈上达到了极点和转折点。在这次会谈期间我曾对奥地利皇帝说：

历史赋予了我们在政治上合作的使命，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担负起领导德国的重任（只要我们协调一致，这一领导就归于我们），我们就能更好地处理双方王朝的和政治的事务。如果普鲁士和奥地利认为自己的任务不仅仅是促进它们共同的利益，而且还互相促进对方的利益，那么两个德意志大邦的结盟就将不仅在德意志而且在欧洲产生广泛的作用。奥地利国家对于建立丹麦的公国不发生兴趣，反而对于它同普鲁士的关系极感兴趣。从这一确凿无疑的事实中，难道不应得出结论说，对于普鲁士怀有善意的政策是合乎目的的吗？而正是这样一种政策巩固了两个德意志大邦的同盟并唤起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感激之情。如果我们共同的收获不是在霍尔施坦而是在意大利，如果我们进行的战争使我们两国得以支配的不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是伦巴第，那么我就不会想到去促使我国国王反对盟邦的愿望或者在当时没有现存的对等补偿物的条件下要求盟邦给予这种补偿物。但是，为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把普鲁士一个古老地区让给盟邦，这种做法即使当地居民愿意，恐怕也未必能行得通，在格拉茨[26]，就连定居在那里的奥地利人也表示反对。我觉得，德意志大邦友好关系的有益成果并不以霍尔施坦问题而告终；如果说这些成果现在远远离开奥地利的利益范围，那么在另一情况下这些成果又可能大大靠近奥地利的利益范围；所以，奥地利这次如果对普鲁士表示慷慨和殷勤，则对奥地利

来说也会是有利的。

252 在我看来，我所描绘的前景对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不是没有影响的。虽然他谈到面对奥地利的社会舆论，如果普鲁士获得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这样的巨大战利品，完全没有同等补偿物是难以摆脱目前的局势的；然而，最后他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正决定要求和合并这一领土。我得到的印象是，如果今后同普鲁士的巩固团结及普鲁士支持奥地利的类似愿望的前景得到保证，那么他终究认为，把他对于从丹麦割让土地的这一要求转让给我们，不是不可能的。他建议继续首先讨论这一问题：普鲁士是否严格决定要把这两个公国变为普鲁士的省份，还是我们将满足于（像后来制定的所谓二月条件[27]中规定的那样）在这两个公国中获得某些权利。国王沉默不语，我打破了这种沉默，对皇帝说："陛下当着我的最尊贵的君主的面对我提出这个问题，正是我所非常希望的；我希望趁此机会聆听我王陛下的见解。"这是因为直到那时，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我都没有从国王那里得到过有关他对这些公国的意图的直截了当的说明。

在皇帝的坚持要求下，国王踌躇不决，有点窘迫地说：他对这两个公国没有什么权力，因而也不可能对之有什么要求。这一声明使我在皇帝面前丧失了战斗力，从这一声明中我感到国王是受了王亲国戚和宫廷自由派的影响。此后我还是保证要坚持两个德意志大国的团结，我并且同莱希贝格一起拟订了一个与这一方针相符合的简短文件，其中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前途仍然没有决定，这份文件得到了两位君主的赞同。

（四）

我所设想的二元政治本是同现成状况相似的，其区别则在于奥地利对现在同普鲁士一起组成德意志帝国的那些邦国将会保持与邦联规则相适应的影响。莱希贝格赞成通过两国达成这类协议的办法来加强中欧的重要地位。这种结构与过去相比较并且正如当时的状况那样，无疑是向好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但是要期望这种结构保持长久，则只有对双方的领导人坚信不移才行。我从维也纳起程（1864 年 8 月 26 日）时，莱希贝格伯爵告诉我说，他的 253
地位受到了攻击；内阁的辩论和皇帝对于内阁的态度都使他不得不但心，如果他不能为奥地利的同时也是皇帝特别关切的追求关税同盟[28]的企图至少提供保证：我们同意在一定期限中进行谈判的话，那么他的同事，特别是施梅林，就会抛弃他。我并不反对这类关于将来进行谈判的协议，因为我确信，这样的协议并不能从我身上获得超越我认为可能限度的让步，还因为这个问题的政治意义是首位的。由于双方[29]经济和行政状况存在差别，我认为和奥地利的关税统一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构成关税同盟北部的财政基础的物资，在奥匈帝国大部分地区是完全不用的。在关税同盟范围内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之间由于生活习惯和消费的差别已经造成了困难，如果把这两个区域同奥匈帝国东部地区包括在同一关税界限之内，那么这种困难就会是不可克服的了。对于一个与征税商品实际消费情况相符合的合理分配税收的尺度也是不可能取得协商一致的意见的；任何一个尺度或者对关税同盟不合理，或者为奥匈帝国的社会舆论所不容。以俭朴的斯洛伐克人和

加里西亚人为一方，以莱茵人和下萨克森人为另一方[30]，从征税的角度来看简直不能相比。除此之外，大部分奥地利边境上的官员是否可靠，我也缺乏信心。

尽管我深信不可能同奥地利实行关税统一，但是我毫不迟疑地准备完成莱希贝格提出的请求，以保住他的职位。我相信在前往比阿利茨时（10 月 5 日）时可以肯定国王会赞同我的抉择；我至今不明白的是，我的同事财政大臣卡尔·冯·博德尔施文格和贸易大臣伊岑普列茨伯爵以及他们的自由贸易派[31]的思想领导者德尔布吕克出于什么动机，当我不在场时那样坚决地在一个国王相当生疏的领域去诱劝国王，使得莱希贝格的地位，正如他所预
254 言的，由于我们的拒绝而动摇；在外交部，他将被门斯多尔夫[32]所代替，此人起先是施梅林[33]的候补人，直至施梅林被反动的和天主教的势力排挤掉为止。国王尽管在内政问题上十分坚定，却还是受到他夫人所主张的学说的影响：人望是解决德国问题的工具。

关于外交部和贸易部官员于 1864 年 10 月 10 日举行的一次会议，冯·梯勒先生寄信到比阿利茨告诉我说：

> 今天的会议再次证实了一个早已众所周知的事实：专家先生们尽管在处理专门业务方面具有高深造诣，为我钦佩，但是他们太不注意政治方面，例如把维也纳内阁更迭的可能性当作琐事。伊岑普利茨对他自己的观点还十分动摇不定。我曾不止一次地使他认识到，第 25 款[34]最终地和事实上不会让我们承担任何义务。但后来德尔布吕克的责备眼色又总是使他退回到专家们的立场上去了。

两天以后，10 月 12 日，陪同国王在巴登—巴登的阿贝肯告诉我说，他没能够说服国王同意第 25 款；陛下害怕对奥地利作出这样的让步会引起“叫嚣”，而且陛下还说：“我们或许会避免维也纳的内阁危机，可是由此会在柏林引起一场这样的危机；如果我们接受第 25 款，那么博德尔施文格和德尔布吕克大概就要请求辞职了。”

又是两天以后，哥尔茨伯爵从巴黎写信给我：

> 如果莱希贝格的地位确定地动摇了（我十分怀疑皇帝是否也认为这样），那么我们就必须预料这里会出现清一色的施梅林内阁。

（五）

在评价二元政治的时候，估计一下我们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指望奥地利坚持这条路线的问题，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只要想一想，莱希贝格由于不满意于中等邦国的不够顺从，便和它们突然决裂并在没有它们参与、甚至反对它们的情况下与我们结盟，便不能不考虑到，由于在个别问题上与普鲁士之间的不一致也可能会意料不到地导致新的转折的可能性。我从来没有抱怨莱希贝格 255
伯爵缺乏诚意，但是，他是——正如哈姆莱特所说的那样——异乎寻常地容易发怒和鲁莽[35]；如果说布奥尔伯爵的个人不满情绪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分歧，不如说是由于尼古拉皇帝的不友好的方式，就足以使奥地利长期执行一种众所周知的施瓦尔岑贝格的

忘恩负义的政策（我们将要通过忘恩负义使欧洲大吃一惊）[36]，那么人们不允许排除这种可能性：莱希贝格和我之间很脆弱的纽带，可能会被某一个浪头所冲断。与我们在丹麦战争[37]时相比，尼古拉皇帝有更为有力的依据相信他与奥地利的关系是可靠的。他向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效劳过，几乎从来没有一位君主向他的邻国[38]这样效劳过。为了君主的利益，面对着革命——不管是反对意大利革命、匈牙利革命还是1846年波兰革命[39]，互相支持的好处对于奥地利来说，同俄国结盟比1864年同普鲁士的可能的结盟要重要得多。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本性诚实，但是奥匈帝国这条国家航船的结构如此奇特，以至君主必须站在甲板上适应它的这种颠簸却是几乎不能预测的。个别民族的离心力量，奥地利必须同时向德国、意大利、东方和波兰方面加以保护的错综交织的生命攸关的利益，匈牙利人桀骜不驯的民族精神，主要还有与政治决定交织在一起的教会势力造成的不可预测性，这一切都使得奥地利的任何一个同盟国必须小心谨慎，防止将其臣民的利益完全取决于奥地利的政策。在梅特涅[40]多年领导下所获得的政治稳定的声誉，根据哈布斯堡王朝现有人选和王朝内部运动着的势力来看，不可能维持下去了。这种声誉既根本不符合梅特涅时期以前的维也纳内阁的政策，也不完全符合梅特涅时期以后的维也纳内阁的政策。但是，如果变幻莫测的事件和形势对于维也纳内阁的决定所起的作用从长远来说是不可预测的，那么对于奥地利的任何一个同盟者来说也绝对不应放弃保护这种关系，在必要的情况下从这种关系可以产生出另外的组合来。

第十八章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

在从加施泰因到巴登—巴登的途中，我们顺路来到慕尼黑[1]，马克斯国王已经离开这里前往法兰克福，他把接待来宾的事情交给了夫人。我并不相信，玛丽王后那样囿于个人琐事而不关心政治的人能对威廉国王及其当时正在筹划的决议施加强烈的影响。1863 年 8 月 16 日和 17 日我们在尼姆芬堡[2] 停留期间，在例行的宴会上，王储[3] ——即后来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总是坐在我的邻座上，面对着他的母亲。我得到的印象是，他的心不在宴席上，只是偶尔才想起和我谈话，话题也不超越通常的宫廷会话。虽然如此，我认为从他的话里却看出一种天才的生动流露和一种被他的未来所充满的意识。谈话间隙，他的目光越过他母亲，直望着天花板，漫不经心地一次又一次地喝干杯中的香槟酒。看来是按照母亲的命令，酒添得很慢，所以王储多次把空杯向侧后方递去，才有仆人犹犹豫豫地给他斟满。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王储都是饮酒有度的；可是我觉得，他周围的环境使他感到厌倦，便借酒来为自己的幻想开辟摆脱环境的方向。虽然我不得不颇为烦恼地说，我想充当他的合意的同席谈话者的努力未获成功，可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是值得同情的。这是我同路德维希国王唯一的一次直

接见面，但是从他后来不久（1864 年 3 月 10 日）便登上王位之后，直到他逝世为止，我和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且还维持着相当频繁的通信往来；我总是有这样一种印象，他是一位精通事务的执政者，具有德意志民族的意识，虽然他首先关心的是
257 保存帝国宪法的邦联原则和他本国的符合宪法的特权。我记得，他在凡尔赛谈判期间形成一种从政治领域看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想法，即主张德意志的皇位以及邦联议会的主席应在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王室之间世世代代地交替承袭。究竟如何实现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疑虑，在同巴伐利亚全权代表于凡尔赛进行的谈判中消失了，谈判的结果是在主要方面赋予了邦联主席、即当时尚未提及皇帝称号的普鲁士国王以在对待巴伐利亚盟友关系上今天所享有的那些权力。

在这里我引用几封我和路德维希国王交换的信件，这几封信件有助于去正确刻画这位不幸的君主[4] 的性格，并且能够又一次获得现实的兴趣。只在前几封信中引用公文程式。

凡尔赛，1870 年 11 月 27 日

睿智圣武的国王陛下：

霍尔恩施泰因伯爵遵照陛下命令向我传达了旨意，对此，恭请陛下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我对陛下的感激之情，具有比单纯的个人感情更深更广的根源，因为我所担负的职务使我能够评价陛下睿智豁达的决定，而陛下在这次伟大的民族战争[5] 的开始和面临结束之时正是通过这些决定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和强盛。但是为了陛下的德意志政策以及陛下

军队的英勇气概而应向巴伐利亚王室表示感激之情这个任务，不是我个人的任务，而是德意志人民和历史的任务。我只能保证，只要我活着，就将对陛下忠贞不渝并表诚挚的谢忱，如果我被允许能够为陛下效劳则任何时候将感到荣幸。

关于德意志皇帝问题，按照我的忖度，至为紧要的是不应由别人，只应由陛下提出倡议，特别是不应由国民代议机构首先提出。如果倡议不是由参加联邦的君主中最强大的一位经过自由而缜密的考虑之后主动发起的，那么这种地位就 258
会被弄坏。我已冒昧地请霍尔恩施泰因伯爵将一份草稿转呈陛下，并在作出必要的文字上的修改后，再转交给其他联邦成员，按照陛下的愿望去进行说明。这个草稿的思想事实上已经在德意志各族中生根，即：德意志皇帝是他们的同胞，普鲁士国王是他们的邻居，德意志的称号仅仅表明着与这一称号相联系的权力来自德意志各邦君主和各族的自由委托。包括普鲁士在内的德国各大王室，在欧洲的崇高地位不会因为它们选出了一位德意志皇帝而遭受损伤，历史正是这样教导的。

恭请圣安

您的最恭顺的忠实仆人　冯·俾斯麦

亲爱的伯爵[6]！

我极为满意地注意到，虽然您公事繁重而紧急，却依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向我表达了您的感情。

因此，我向您表示我的最热烈的谢忱；我高度评价整个德国都高兴而自豪地注视着的一位人士的忠诚精神。

我致贵国国王、我最敬爱的舅父的信件，将于明天送到他的手上。我衷心希望我的提议能得到贵国国王、得到那些我已致函的联邦其他成员以及全民的完全赞同，我还愉快地意识到，由于我在德国所处的地位，我能在这次光荣的战争开始和终结之际，为了民族的利益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但我还明确地希望巴伐利亚能继续保持它的地位，因为它完全同意公正而坦率的同盟政策，并且坚定不移地防止不幸的中央集权。

您为德意志民族所作的一切是伟大的和不朽的，我可以毫不牵承地说，在我们这个世纪的伟人行列中，您占据着最崇高的位置。愿上帝赐您健康、长寿，以便您能为我们共同祖国的幸福和繁荣继续作出贡献。亲爱的伯爵，请接受我最好的祝愿。

您的始终不渝的真诚朋友　路德维希

霍亨施万郜，1870 年 12 月 2 日

259

凡尔赛，1870 年 12 月 24 日

睿智的国王，仁慈的君主：

陛下惠书已由霍尔恩施泰因伯爵转交给我，这使我敢于在感谢这封书信的恩泽的同时，敬向陛下为即将到来的新年致以最崇高的祝贺。德国从未像即将来临的新年那样如此信心百倍地期望在新的一年中实现其民族愿望。如果夙愿化为现实，如果统一的德国能以自己的力量保证自己在可靠的国界内部享受和平，同时又不损害联邦各成员的自由发展，那么陛下在改造我们共同祖国的事业中所获得的决定性地位，将永远得到德国人民的感激并将永载史册。

陛下有理由假定，我也不对中央集权期待什么好处，而是恰恰把维护联邦宪法向每一个联邦成员保证的权利视作符合德意志精神的发展形式，同时又视作是反对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的自由运动中权利和秩序可能承受的危险的最可靠保证。陛下和联邦君主们倡议恢复皇帝称号促进了君主制—保守党的利益，这从整个德国的共和党对同一事物所持的敌对态度中便可得到证明。

敬请陛下相信，如果我能够获得最为仁慈的陛下对我的恩宠，我将认为是莫大的荣幸。

冯·俾斯麦

亲爱的伯爵！

为表彰您在完成德意志的联邦条约一事中所建立的卓越功勋，除您已获得的我王室的圣胡贝尔图斯勋章外，我再授予您宝石星勋章。

首先要感谢您的是由于您的协助巴伐利亚的正当利益才能在这些协定中得到照顾，所以，亲爱的伯爵，您不要把这次授勋视为通常的敬重之举，而要看作是我对您友好情谊的表示，而您有充分的权利得到这种情谊。勋章上的题词“忠贞不渝”也是我的格言，遵循这一格言的巴伐利亚将是普鲁士的一位真挚盟友和帝国中的一位和睦的成员。我再一次向您表示我一直对 260
您怀有特殊的友好情谊，我亲爱的伯爵，向您致最良好的祝愿。

您的永远忠实的朋友　路德维希

慕尼黑，1871 年 3 月 22 日

亲爱的侯爵：

和您谈话并且亲口向您表述我对您深为敬重的情感，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高尚的情趣，而且也是最大的喜悦。我甚为惋惜地得知，那如此可恶的谋刺[7]（对于这一谋刺没有得逞，我要永远感谢上帝。）既影响了您的对我来说也是十分珍贵的健康，也影响了您的疗程，以至我敢大胆地邀请您到我现在居住的山区来。衷心感谢您最近给我的来信，这封信使我感到了由衷的愉快。我坚定地信赖您！并且相信，正如您对我的大臣冯·普夫雷茨纳尔所说的那样，您可以发挥您的政治影响，促使联邦的原则成为德国新秩序的基础。愿上天为我们大家保佑您健康长寿！您若去世，就会像我所尊敬的威廉皇帝的去世一样，对于德国和巴伐利亚都将会是巨大的不幸。亲爱的侯爵，我衷心向您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我永远对您怀有高度的敬意和深切的信任。

您真挚的朋友　路德维希

霍亨施万郜，1874 年 7 月 31 日

基辛根，1874 年 8 月 10 日

睿智的国王，

仁慈的君主：

正处在结束医疗、离开基辛根[8]之时，我不能不对陛下在这里给予我的一切关怀、特别是对陛下上月 31 日的惠书再次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陛下来信中对我表示的信任，使我深感荣幸，我将永远

努力不辜负这一信任；但是除了我个人的保证外，陛下还可以完全可靠地指望帝国宪法基础本身中的保证。帝国宪法是建立在联邦的基础之上的，宪法是通过联邦条约而确立这个联邦基础的，不背弃条约就不可能损害宪法。我们帝国宪法与任何其他国家宪法的区别就在这里。陛下的权力构成了帝国宪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陛下的权力正像帝国的一切机构一样，是以巩固的法制原则为基础的。现在，德国有联 261
邦会议[9]、而巴伐利亚有联邦会议中的它的尊贵和机智的代表来作为防止蜕化或夸张统一企图的坚强保证。陛下可以充分相信，符合条约精神的宪法权力，即使在我不再有幸以宰相[10]身份为帝国效劳时，依然会得到严格的遵守。

致衷心的敬意

陛下

最恭顺的仆人　冯·俾斯麦

弗里德里希斯卢合，1876 年 6 月 2 日

威尔特恩男爵写信告诉我，陛下有意在我今年访问基辛根时恩赐我使用陛下王家的车具。我希望，我能遵医嘱于今年夏天到我两年以前疗养的地方去疗养，正如陛下在 4 月 29 日的指示中所恩准的那样。

土耳其的事态看来很危险[11]，可能需要紧急的外交活动；但是在所有欧洲的国家中，为了能够长期地或至少比其他国家更长久地远离错综复杂的紊乱形势（东方问题以这种紊乱形势威胁到欧洲和平），只有德国总是处于最有利的地

位。因此我并不放弃几周后访问基辛根的希望，敬请陛下接受我对陛下赐予的仁慈关怀表示由衷谢意。

冯·俾斯麦

您本月2日来信中表示要访问基辛根的愿望能够实现，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衷心欢迎您到我国来，并满心希望您的对整个帝国都甚为重要的健康由于巴伐利亚有益的矿泉水而得以恢复。

但愿所有德意志君主的保持和平的共同愿望能够得到实现，但愿您，亲爱的侯爵，能够因此而从繁重的工作和心神
262 不安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享受您所必需的休息。

吻侯爵夫人的手，并向您，亲爱的侯爵，致以衷心的问候。永远对您怀着深情厚意。

您的忠实的朋友　路德维希

贝尔格，1876年6月18日

基辛根，1876年7月5日

……很遗憾，目前的政局不允许我进行矿泉水疗养时所需要的充分安宁；至少对于德国来说，促使外交家们从事没有成效的活动的与其说是由于存在着威胁和平的真正危险，不如说是由于存在着普遍的紧张和不安。只要土耳其境内的斗争得不到解决，他们的活动便必然是徒劳的。不论这种斗争的结局如何，只要俄国不企图占有君士坦丁堡，那么俄国

和英国之间的谅解在双方具备诚意的情况下总是有可能达成的。而要持久地协调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利益，则要困难得多；但是至今这两个帝国官廷还是保持着一致，如果我把保持这种一致看作是德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我深信会得到陛下的赞同。对于德国来说，最为棘手的莫过于在这两个如此亲密友好的邻国中进行选择。我毫不怀疑，如果我在我们的政策中维护这样一个原则，即：德国只有为了保卫不可争辩的德意志利益才自愿参加一场战争，那么我是在遵从陛下和其他德意志君主的意旨行事。依我愚见，只要土耳其问题还未超出土耳其境内，它就不会触动德国利益，不值得为之进行战争。俄国和一个或两个西方强国之间的斗争，不把德国牵连进去，也可以激烈起来。但是，如果奥地利和俄国之间出现分歧，情况就要困难得多；我希望，两位君主在莱希施塔特[12]的会晤能为巩固他们的友谊结出丰硕的果实。幸而亚历山大皇帝希望和平，并且承认由于南部斯拉夫人的运动，奥地利的处境比俄国的处境更困难和更急迫。对俄国来说，所涉及的不过是外交的利益，而对奥地利来说，那就是内政的和生命有关的利益了。

冯·俾斯麦

我甚为高兴地获悉有关您疗养方面的良好情况。多谢您 263
这一令人愉快的消息，衷心希望令人疲劳地使用基辛根矿泉水所造成的不适后果迅速消失。

您对我如此清晰地分析了目前政局，亲爱的侯爵，使我

尤为感激。您所表达的关于德国对于国外的目前事态以及大约还具有威胁性的纠纷所持的观点，充满着远见卓识和政治家的眼光，对此我甚表钦佩；大约不需要我来保证，您为维持和平所作的巨大努力早已得到了我最热烈的同情和无限的信任了。亲爱的侯爵，值此德意志政策成功和德意志各邦君主以及各族对您感佩之际，祝愿您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在表达这一真挚愿望的同时，亲爱的侯爵，我顺致最衷心的问候，崇高的致意和对您最深刻的信任。

您真挚的友人　路德维希

霍亨施万郜，1876 年 7 月 16 日

基辛根，1877 年 6 月 29 日

……

有许多事务在治疗期间都不可免，因为帝国议会就我的代表问题制造了许多困难，而我这时的健康状况又不能起来加以反对，因此在休假期间我还不得不副署[13]文件。这就是帝国议会多数派力图为建立他们称之为“帝国大臣责任制”体制而采用的手段之一；我对此一直加以抵制，目的不是为了仍然保持独一无二的大臣，而是为了维护联邦会议及其高级全权代表[14]的符合宪法的权力。只有以牺牲后者为代价，这里努力要建立的帝国各部在事务上才能够获得全权，从而就会走上集权化的道路。我认为，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将会徒劳地寻求德意志未来的幸福。依我愚见，不仅宪法的权力，而且联邦会议内部我的非普鲁士同事们的政治任务，应当在

反对设置这类的帝国各部的斗争中公开地支持我，从而表明我迄今捍卫的不是宰相的内阁独裁权，而是在捍卫联邦成员的权力以及联邦会议各部的权限。我可以设想，我这样做是符合陛下的旨意的——我已经按这种精神对普夫雷茨纳尔表示了意见；我深信，陛下在联邦会议中的代表本人和同其他 264
同事联合起来，通过他们的支持，就可以有助于我为反对帝国议会要坚持建立帝国责任内阁而进行的斗争。

如果如我听说的那样，陛下选择了冯·鲁德哈特先生，那么我通过霍亨洛埃而知道的他的全部情况，我要由衷地感谢陛下的任命，我预料我同他不仅可以推心置腹地讨论帝国的内政事务，还可以讨论帝国的外交事务，这一点在我同陛下的代表进行交往时，无论从公务上还是从个人方面来说，对我都是极为必要的。目前我们的地位对外国来说依然如同在整个冬季时期一样，对战争不要波及我们的希望没有减弱。俄国增长了对我国睦邻政策的可靠性的信任，同时，奥地利为其切身利益而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反对的那种事态发展，我们可以有希望加以防止。我们一直努力保持两个帝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而且此种努力颇见成效。我们同英国的友谊至今并没因此受到损害；政治阴谋家们在那里的官廷中散布的谣言：似乎德国想吞并荷兰，这只有在贵妇人的圈子里才得到暂时的响应；造谣者还没有厌倦，但听信者看来已经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外交政策就能够毫不松懈地将注意力集中到西方[15]的火山上去，因为三百年来这座火山的爆发经常震撼着德国。我不相信我们从那里得到的诺言，我能够提供给帝国的忠告就是很好地武装起来，以防可能来

到的新的突然袭击……

冯·俾斯麦

……借此机会，亲爱的侯爵，我要迫切地告诉您，前些时候有关您可能退职的消息真是令我忧心如焚。我个人对您愈是尊重，对您在国务活动中所依凭的联邦原则愈是信赖，这类事件对于我和我的国家来说就愈是感到痛心。

令我深感欣慰的是，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我衷心希望，您的聪明才智和充沛精力还能长期为帝国和忠于帝国的巴伐利亚服务！亲爱的侯爵，请您接受我内心的谢意，感谢您告知有关维持和平的令人高兴的前景，感谢您保证我任命
265 前赴柏林的公使冯·鲁德哈特将受到您的厚意接待和充分信任。您对于那个一再出现的关于建立帝国责任内阁的问题的态度表明您是维护联邦君主的权力的坚强堡垒；亲爱的侯爵，您说：德意志未来的幸福不在于要建立帝国责任内阁才可能实现的集权制，这句话真正感动了我。请您相信，在维护帝国宪法的基础的斗争中，我将不遗余力地保证在未来任何时候我在联邦会议中的代表将公开地、最充分地支持您，毫无疑问，其他君主在那里的全权代表们也会共同支持*。

路德维希

贝尔格，1877 年 7 月 7 日

---

* 鲁德哈特并未加以证实。

基辛根，1878 年 8 月 12 日

恭请陛下允许我表示最尊敬的感谢，感谢在我今年到达此地时陛下命令给我提供王室车具这样的恩典，感谢冯·普夫雷茨纳尔遵照陛下旨意传达给我的赞许。会议[16]已经通过了陛下在高贵的信件中认为适用于德国的那项政策。真正的和平有了保证，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破裂的危险已经消除，我们同这两个友好邻邦的关系得到了维持和巩固。我特别高兴的是，我们成功地在奥地利帝国的内阁和人民中间加强了帝国对我国的政策的还是不久之前才建立起来的信任。请允许我在我今后按上述方针主持帝国对外政策时，相信能够得到陛下的赞许，并相应地我目前要在土耳其和其他地方施加影响，以便通过外交上的声援去减轻奥地利的确实接受得稍许晚了点的困难任务。

目前内政方面的任务要困难得多。我和罗马教皇使节[17]的谈判，自从弗朗奇红衣主教逝世以来完全停顿下来，等待罗马的指示。诺沃凯萨里的大主教带来的指示却要求在普鲁士即使不以条约形式，也要事实上恢复 1870 年以前的状况。这种原则性的让步从双方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教皇并不掌握可以给我们以必要的对等补偿物的手段；中央党[18]、敌视政府的报刊、波兰的鼓动，都不听从教皇，即使教皇陛下[19]想 266
命令他们支持政府的话。联合在中央党内的力量现在虽然打着教皇的旗号进行斗争，但他们本身是敌视国家的，即使信仰天主教的旗号不再掩护他们的话；他们同进步党[20]和社会党人的联系以敌视国家为基础，是不依赖于教会纠纷的。在普鲁士，至少在那些中央党得到了补充的选区，在教会纠纷

发生之前[21]就根据民主思想对政府持反对态度，还有受耶稣会士领导并被故意引入歧途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上西里西亚的贵族。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教廷就没有可能为它向我们要求的让步提供相等的补偿，特别是因为它目前不再支配影响德国事务的耶稣会士的势力。在补充选举中教皇得不到他们的支持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教皇的软弱无力，当时天主教徒违背教皇的意志投了社会党候选人的票，穆方博士在美因茨公开承担了这方面的义务。同罗马教皇使节在这里进行的谈判还没有超出双方试探的阶段；我从中得到的印象是，现在还不可能完成谈判；但是，我认为，应当避免使谈判完全破裂，而教皇使节似乎也有同样的愿望。看来，罗马认为我们需要比我们实际需要的更多的帮助，而且也夸大了（从最善良的愿望来看）人们在议会中能够给予我们的援助。帝国议会的选举[22]使议会的重心比人们设想的更向右移动了。自由派的优势削弱了，而且比数字所显示的要更严重些。我在提议解散议会时就不怀疑，选民比众议员们对政府更怀有友好感情；其结果是，许多议员，尽管对政府持反对态度，只是由于他们许诺做有利于政府的事，才再次当选的。如果他们不坚持自己的诺言而议会再次解散的话，他们就将得不到选民的信赖而不会再次当选。同自由派和中央党议员关系松弛的结果，以我愚见，将会导致联邦各政府之间更牢固的团结。社会民主主义的危险的增长，同我们一起住在我们大城市里
267 的威胁人的强盗集团的逐年增多，帝国议会中多数人拒绝支持政府反对这种危险，所有这一切最终将会使各邦君主、他们的政府和恪守国家秩序的人不得不自卫地团结起来；只要

各个政府还像现在这样团结坚定，演说家和报刊的蛊惑就不能胜过这种团结。德意志帝国的目的是维护法制；而议会的活动在创立现存的君主和城市的联盟方面当作是达到联盟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我希望，帝国议会的活动能使联邦各政府不必于有朝一日从这一法制状况中做出实际的结论。但是我并不确信，现今选举出的帝国议会中的多数派真正表达了德国选民中的无疑是忠贞的和具有君主主义意识的多数。情况如果不是这样，则又一次解散帝国议会的问题便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过我并不认为作出这一决定的适当时机在今年秋天已经来到。在再一次向选民呼吁时，经济和财政改革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受到人民的正确理解，就会成为联邦各政府手中的同盟者；为此，就必须在帝国议会中对此问题进行讨论，而这不能在冬天例会之前进行。通过间接税以增加收入的必要性已为联邦各邦国感觉到了，并且它们的大臣在海得尔堡[23]一致承认了。议会理论家们对此的反对态度，从长久来看得不到从事生产的多数居民的同情。

恭请陛下明鉴关于局势的这一简要说明，并愿继续蒙受陛下的恩泽……

冯·俾斯麦

承蒙从基辛根写信给我，信中极为有趣地描述了目前的政治状况，并拟定了您近期的伟大政策所提出的一些目标，为此我向您表示衷心感谢。我真诚地希望，基辛根以及病后

疗养能使您保持住您的巨大精力，这是实现您的计划所需要的，也是下一届帝国议会例会所迫切要求的。祝愿您强有力的活动一如既往像人们所祈祷的那样能为德意志国家的幸福作
268 出贡献，凡心中珍惜德意志的幸福的人都愿您和我们大家还长年在一起。我也坚定地希望，在需要发誓消除社会民主党的危险时，联邦各政府始终保持一致，坚定地站在一起。

我请您向侯爵夫人转致我特别的敬意，并请向您的儿子，赫伯特伯爵，转致我热烈的问候。

再次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亲爱的侯爵，感谢您那使我十分欣喜的、迷人的书信，请相信我始终对您十分尊重、敬佩和信任。

您的忠实的友人　路德维希

贝尔格，1878 年 8 月 31 日

（电报）

帕尔滕基尔辛，1878 年 9 月 30 日

值此府上喜庆之日[①]，亲爱的侯爵，请接受我最热烈和最诚挚的祝贺和祝福。这一喜庆事件就像您以及府上有关的一切庆祝活动一样，我一定最积极地参加。

路德维希

① 玛丽娅·冯·俾斯麦伯爵夫人同伦骚的库诺伯爵订婚（1878 年 9 月 22 日）。——德文本注

亲爱的冯·俾斯麦侯爵：

帝国议会就您的宏伟的财政计划草案[24]进行的辩论以有利的结果告终，趁此机会我极为满意地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为了战胜阻挠实现您的计划的对抗意见和千百种利己主义的利益，需要有您那种非常的精力和毅力。德意志大地有责任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并满怀重新焕发的希望奋力奔向物质福利的目标，这乃是国家生活不可缺少的基础。

但愿您在基辛根的停留能完全解除您近期工作造成的紧张和疲倦，这是我的衷心的愿望，并重申对您的特殊敬重。

您的诚挚的友人　路德维希

霍亨施万郜，1879 年 7 月 29 日

基辛根，1879 年 8 月 4 日

陛下上月 29 日惠书中所用的殷勤赞辞，使我不胜荣幸之至。我特别感激的是，陛下以同情的心情评价了结合在一起的党派狂热和私利在联邦政府计划的改革的道路上造成的种种困难。 269

在经济方面，在涉及保护德国的劳动和产品方面，依我之见，近期内将不可能超过已获得的成就，毋宁说在期待实际的效果；而这样的效果在下一年也还不能可靠地觉察到，因为帝国议会决定的延期执行进口税法案给外国造成了以不纳税商品充斥德国市场的机会。我们所期望的对于提高物质福利的有益作用，要等过了明年才可能显示出来。

但是在财政方面，我认为，在最近的一次帝国议会会议上要重新探讨为联邦各政府开辟新的收入来源的问题，因为迄今的收入或许填补了我们预算中的赤字，但是不足以实现直接税的改革和支持贫困的村社管理机构。

在政治方面，联邦各政府的活动的结果，就通过有关的谈判看来使我们的政党和集团的有缺陷的聚合和组成遭受了沉重持久的打击而言，是与我的期望相符合的。中央党第一次从积极的意义上参预了帝国的立法工作。这种成就能否持久，只有经验才能说明。这种可能性仍然不能排除：如果这个党与罗马教廷达不成协议，就会重新回到它以前的否定的和反对派的立场上去。同罗马达成协议的前景，从表面现象来看，从去年以来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也许我抱某种希望是联系到这一事实，即：教皇使节雅科比尼曾对大使罗伊斯亲王正式表示过进行谈判的愿望（对此谈判罗马授予他全权）。他的全权有多大范围我不得而知，但是按照使节的愿望，我已宣布：准备于本月在加施泰因同他会见并进行讨论。

通过帝国议会最近一次会议，我希望民族自由党[25]分裂为一个君主派和一个进步派（亦即共和派）两部分。前议长冯·福尔肯贝克把帝国立法权置于德意志城市同盟[26]直接监督之下的尝试，拉斯克尔和李希特尔对无产者阶级的请愿的煽动性言辞，都明显地暴露出这些议员的革命倾向，以至主张君主制统治方式的人与他们在政治上再也不可能有共同之处了。城市同盟及其在帝国议会设置常委会的计划，是模仿1792年法国各省城市组成的“同盟军”[27]的做法。这项尝试

270

在德国人民中间没有得到响应，但是表明，在我们的进步党议员中间也存在着赞成国民议会[28]代表的材料。在我们这里，革命的带头人几乎全都来自有学识的无产者，这类人在德国北部比南部多。这些有学识、受过高等教育的先生们，他们没有财产，没有实业，没有赢利，他们或者靠在政府以及市政机构供职的薪水生活，或者靠在报界而生活，经常是靠这两者为生；在帝国议会中，他们占了半数以上的议员席位，而他们的人数在选民中间却不超过一个微乎其微的百分比。这些先生们提供革命的酵母，并领导着进步党和民族自由党及其刊物。依我愚见，摧毁这一派别是保守派政治的基本任务，而经济利益的改革则构成了政府逐步接近达到这一目标的基础。

我以最崇敬的心情感谢陛下对于我在这里疗养的良好愿望，从一切征兆来看，这次疗养可望像往年一样，治愈我去年冬天受到损害的健康。承蒙陛下仁慈的关注，使我能够方便地享受周围树林中的良好空气，这极大地促进了疗养效果。陛下马厩中的骏马使我能方便地游览基辛根美丽的四郊的任何地点。由于年事日增，精力日减，这种方便就特别令人更感到愉快。敬请陛下恩准我对所享受的愉快和褒奖表示诚挚的谢意。

冯·俾斯麦

基辛根，1879 年 8 月 7 日

敬悉陛下对于同罗马谈判的进程感到兴趣，冒昧呈上下

列文件副本：

(1) 教皇5月30日致皇帝陛下的书信，

(2) 6月21日对上述这封信的复信，

(3) 教皇7月9日致皇帝陛下的信，此信尚未见复。

冯·俾斯麦

271 亲爱的侯爵！

热烈感谢您本月4日和7日两封令人十分愉快的信，信中您向我作了关于各党派的态度和关于罗马事件状况的十分有趣的说明。——现时您同罗马的谈判确是富有成果的，我们同罗马教廷的关系的明显改善，对中央党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影响到您的财政改革获得成功。此外，祝您创建一个强大保守党的坚毅努力幸运地获得成功。亲爱的侯爵，我衷心希望您的健康和精力仍然允许您完成伟大而极为重要的使命，因此我极欣慰地从您的信中得知，您在基辛根的停留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亲爱的侯爵，请您相信我对您特殊的钦佩、尊敬和信任。我将永远是您的

诚挚的朋友　路德维希

贝尔格，1879年8月18日

亲爱的冯·俾斯麦侯爵！

承您费神在4月28日信中把您于本月20日就教会问题

对罗伊斯亲王所作的指示告诉了我。我以巨大的兴趣获悉了它的内容，热烈感谢您的我特别予以重视的来函。

您的忠实朋友　路德维希

慕尼黑，1880 年 5 月 2 日

亲爱的冯·俾斯麦侯爵！

我以极大的兴趣了解了要向普鲁士邦议会提出的提案，最热烈地感谢您寄来了这份提案及对时局作了透彻说明的附件。使我深感不安的是，亲爱的侯爵，其中还附带着说了您打算从事务中引退的想法。您知道，我内心对您怀有的诚挚的敬重和无条件的信任的程度，因而您可以理解，您的这一愿望如果实现，这对我必然是何等的难以忍受。即使帝国议会内部的状况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亲爱的侯爵，那么联邦议会毕竟根据帝国宪法的联邦制基础始终不变地站在您的方面。我的政府在任何时刻也不会偏离这个基础，渗透着支 272
持这个基础的意识，深知它是和一位伟人联系在一起的；德国感谢这位伟人的崇高的政治远见和活动德国，因为德国不是通过废除或者麻痹各邦的必要的自主和力量、而是通过在联邦的统一的道路而重新恢复了自己的伟大。继续维护这类原则，就能保证我们共同的祖国享有和平和强大的前景。我对此的愿望越是强烈，为此而奋斗的决心越是大，我和整个德国但愿更长久地得到您对德国事务的不可替代的领导的希望就越难放弃。

亲爱的侯爵，请您接受我再次保证的对您怀有的特殊

的敬佩之情。

您的忠实的朋友　路德维希

贝尔格官，1880 年 5 月 17 日

亲爱的冯·俾斯麦侯爵！

我以最热烈的感谢的心情来回复您本月 9 日的来信[①]，信中的附件使我极感兴趣。由于您的报告内容重要并表明了您的友好关注，我懂得应予以高度评价，我愿意继续看到这种报道。听说您很快要到基辛根来。亲爱的侯爵，您知道我心中对于您的幸福怀有多么真诚而热切的祝愿；实现这些祝愿对我是最衷心的愉快，因为我对您怀有真诚的敬意和仰慕。

永远忠于您的朋友　路德维希

贝尔格堡，1880 年 6 月 15 日

亲爱的侯爵！

在我的双重节日和我的家族七百周年庆典之时，承蒙盛情祝贺[②]，不胜喜悦之至。衷心感谢您那对我和我的国家来说都是甚为珍贵的、经过考验的忠诚感情，而今后我还将一如既往地寄以信赖。——在您作为光荣伟大的宰相和我之间现存的真挚关系的同时，我又特别高兴地得知，我的祖先也

① 内容不详。——德文本注

② 可惜在副本中没有这封信。——德文本注

曾高度赞扬和表彰过您的家族。——您告诉我的有关您的健康状况的好消息，亲爱的侯爵，使我甚为欣慰，我要再说一遍，巴伐利亚的矿泉水恢复了您那用以造福于德意志各邦的令人钦佩的精力，我感到多么高兴。我极为满意地从您的信中得知您坚信可以确保和平，感谢您许诺将寄来关于政治形 273
势的报告。

亲爱的侯爵，请您和您的家属接受我真挚的同情和对您的崇高的敬意的保证。

您的诚挚的友人　路德维希

贝尔格，1880 年 9 月 1 日

亲爱的侯爵！

您在基辛根进行疗养的良好效果实现了我真挚的愿望，我希望必要的休息也将治好您的神经疼痛症，因为我极为惋惜地从您信中得知，这一疾病尚未消除。——我怀着无比浓厚的兴致阅读了您在给我的令人欢迎的宝贵信中对国内外局势的阐述。在这两方面您所成就的有多么伟大，使我赞叹不已。使我感到快慰的还有您对和平的展望以及您对谋求议会多数派统治的意图的坚决抵制，这种意图如今在巴伐利亚也有所表现，虽然它是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来。我要尽力使他们那与君主制原则不相容的、只能招致无穷不安和不满的目标永远不能达到。——我正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即将来临的选举。即使选举结果不符合愿望，我也坚决相信，凭着您的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在财政方面和经济方面为保证德意志诸

邦的幸福、特别是为把工人的处境提高到一种满意的水平，创造必要的基础；您完全可以指望得到我的政府的真诚的合作。——另一方面，我坚信，亲爱的侯爵，在实施您的宏伟理想的同时，您将从联邦制原则出发，而帝国和各邦国的独立自主性正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

知道您还在巴伐利亚境内，我衷心感到高兴。望您以后将年年来我国访问，亲爱的侯爵，向您致以对未来最真诚的祝愿，并向您保证我对您的特殊信任和高度钦佩。

您的永远真挚的友人　路德维希

霍亨施万郜，1881 年 8 月 10 日

274

亲爱的侯爵！

您对我生日的祝贺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愉快，对此我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您的祝贺和您那宝贵的信件的全部内容一样，又一次证实了您对我的忠贞情谊，这种情谊使我深感欢快并且是我始终充分信赖的。祝愿您在瓦尔辛能得到良好的休息并享受到美好的天气，以便您能以健康的身体如愿以偿地完成您的伟大使命。

亲爱的侯爵，我对您表示特别的钦佩并向您和您的家属致以最好的问候。

您的真挚的友人　路德维希

贝尔格，1881 年 8 月 27 日

亲爱的侯爵！

承您盛情从基辛根寄给我的珍贵信件，给我带来巨大的喜悦。亲爱的公爵，对您在信中对我的双重节日所表达的祝愿，我表示深切谢意，我还要借此机会告诉您，亲爱的公爵，我以多么巨大兴趣研读了信中附来的对政治局势的描述。——我极为满意的是，从信中我可以断定，现在还没有严重的迹象使人担心欧洲的和平面临危险。虽然俄国国内的状况以及俄国军队在其西部边界的不寻常的集结可能引起人们的忧虑，但我依然怀有希望，由于德国和奥地利之间幸运的协议[29]为欧洲大陆的和平提供强大保证，而您的英明和富有远见的政策将能够防止战争的纠纷；不久之前在莫斯科盛大加冕典礼上大声而公开宣告的俄国皇帝①的和平意图最终将占上风。——亲爱的侯爵，在请接受我对您始终给我带来愉快的报告表示热烈感谢的同时，还要向您表示我真正的喜悦，因为长期以来您那令我深感惋惜的遭受损害的健康，在基辛根矿泉水的有益作用和高明的医治下业已开始好转。我诚挚地祝愿您很快完全恢复精力和健康，以便德国由于对它的伟大政治家的精力和远见的信任而更长久地享有安全。在 275
这封信中我再次申明我对您，亲爱的侯爵，所怀有的真诚赞赏和经久不渝的情意！致以诚挚的问候。

您的永远诚挚的朋友　路德维希

贝尔格宫，1883 年 9 月 2 日

① 亚历山大三世。——德文本注

亲爱的冯·俾斯麦侯爵！

我愉快地收到了您本月19日的来信，对于您的通报以及附上的来自圣彼得堡的文件，亲爱的侯爵，向您表示最热烈的感谢。来信及附件，我都以浓厚的兴趣研读了，来自您那里的一切，我都是如此对待的。但是最令我欣慰的，是您信中告诉我的关于您逐渐康复的消息，我衷心祝愿您的健康能够完全得到恢复。我有理由希望，您能够重新强有力地和精力充沛地继续献身于您那政治家的崇高使命，使我能够更为安心地注视着政局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德国对俄国的关系，那么从冯·施魏尼茨将军[①]的报告中我可以满意地推断，至少对于俄国皇帝及其处于领导地位的大臣[②]的爱好和平意愿不应有所疑虑。德国和奥地利之间十分幸运地形成的和谐团结这一令人安心的事实，从您的通报中证实是完全可靠的，这一事实使我十分愉快，看来很可以加强我对进一步保持和平的希望。

亲爱的侯爵，请您接受我再次表示的对您完全康复的最衷心祝愿，并保证我对您的特殊敬佩的情谊。

您的忠实的友人　路德维希

埃尔茂，1883年9月27日

---

① 汉斯·洛塔·冯·施魏尼茨从1876年起是德意志帝国驻彼得堡的大使。——德文本注

② 尼古拉·卡洛维奇·冯·基尔斯从1882年4月9日起，作为哥尔查科夫公爵的继承人，任外交事务大臣。——德文本注

注　释

第一章

1 联合省议会是1847年4月11日在普鲁士召集的封建等级会议，是把八个省议会合并之后组成的。分为两个组：一组由上层贵族组成，另一组由贵族、城市和农村的各阶层的代表组成。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通过召集联合省议会企图在1848年革命前夕取代人民代议制，以便获得政府所必需的钱款。联合省议会由于拒绝批准借贷，于1847年6月26日被解散。第二次联合省议会于1848年4月2日召集，通过了选举立宪会议的选举法。

2 泛神论者是泛神论（来自希腊语nalt“泛”和meoc“神”）哲学学说的拥护者。泛神论者把神和自然等同起来，从而否定自然之外有神的存在。在俾斯麦看来，泛神论意味着和宗教决裂，是向无神论迈出的一步。

3 普拉曼学校是柏林的一所私人学校，开办于1805—1827年。学校培养升入中学三年级的学生。雅恩是德意志民族运动参加者、教育家，在1813—1815年反抗拿破仑战争中制定了一种学制，以期用爱国主义精神对儿童进行斯巴达克式的教

育。雅恩为达到目的的基本手段是体操。俾斯麦在十二岁时转入普通中学，于1832年毕业。

4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天主教德意志诸邦和新教德意志诸邦之间的战争，参加战争的还有一些非德意志国家（瑞典、法国、丹麦等）。当时德国分裂为几百个独立的小邦，即联合成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各公国和城市。从十五世纪起，选上帝国皇位的一般总是奥地利哈布斯堡执政王朝的代表。新教诸邦在三十年战争中的行动首先旨在反对支持天主教反动派的皇帝权力。战争以缔结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告终。战争的主要后果是德国遭受了极严重破坏，长时期地阻碍了它的经济发展。战争削弱了德意志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加深了德国的政治分裂，提高了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的地位。

5 选帝侯——指中世纪德意志罗马帝国内有参加选举皇帝权利的诸侯。大选帝侯指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他是勃兰登堡—普鲁士邦事实上的奠基人。在他执政期间普鲁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6 七年战争（1756—1763年）是以普鲁士和英国为一方，以奥地利、萨克森，俄国、法国和瑞典（后来还有西班牙）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普鲁士同奥地利是为了争夺在德意志诸邦中的势力。战争结果之一是西里西亚归并于普鲁士；因此有时称七年战争为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参看第八章注30）。

7 大学生协会（Burschenschaft）是大学生团体的一种组织名称；俾斯麦在这里所指的是属于大学生团体中的一种。

8 俾斯麦在这里所描述的时期，即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依然处

于封建割据的状态。在中世纪的德意志帝国消灭以前（1806年），德国领土上曾存在过几百个独立的小邦。由于十九世纪初进行过多次改革，其数目已大为减少。根据维也纳会议（参看第八章注34）的决议，有三十八个独立的邦国于1815年形式上联合成德意志邦联，实际上这个邦联没有任何真实的权力。邦联的唯一中心机构是邦联议会，会址设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主持。邦联议会并不是普通的代议机构，而仅仅是德意志邦联成员国的代表会议。其表决权是这样分配的：在一般表决（小范围的会议）时，只有最大的邦各有一票表决权（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符腾堡、巴登、库尔黑森、黑森大公国、霍尔施坦、卢森堡）；其余邦国分成六个组，每组可投一票，因此共有十七票。德意志邦联的建立绝不意味着德意志统一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反而可以说邦联是统一的障碍。它曾于1848年革命期间中止过活动，1850年又恢复活动（参阅第三章），最终于1866年解散。

9 汉巴赫节是1832年5月27日于汉巴赫城堡（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举行的政治示威游行，聚集了约三万人。汉巴赫节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德国民族自由主义运动高涨的表现之一。

10 俾斯麦所称的法兰克福暴动就是1833年4月3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共和党人的武装起义。起义是由手工业者、大学生等组成的秘密团体策划的。在萌芽状态就被军队镇压下去了。

11 解放战争是指争取解放的战争，在德国文献中通常这样称呼1813—1815年反对在德国确立了统治地位的拿破仑的战争。

12 俾斯麦谈的是德国西部诸地区，在拿破仑时代一部分与法国合并，一部分则受到法国改革的强烈影响。

13 陪审员是通过国家考试才开始供职的官员，他应该经过一段见习期，这里是指在上诉审法院见习。陪审员不论是在法庭或行政机构见习，均称政府法官。

14 德国的关税同盟建立于 1834 年。加入同盟的有普鲁士、黑森、巴伐利亚、符腾堡等，它们组成了统一的关税地区；后来多数德意志邦国都加入了，奥地利除外，因为同盟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奥地利的。迟至 1853—1854 年奥地利才得以同普鲁士签订关税条约。普鲁士在关税同盟中起主导作用。

15 费利克斯·利赫诺夫斯基公爵（1814—1848）是波兰籍的普鲁士贵族，曾在普鲁士供过职，后来为西班牙王位觊觎者唐·卡洛斯效劳，很快发迹。他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在第一次联合省议会期间极负盛名。1848 年法兰克福起义期间被起义者杀死。俾斯麦这里显然指的是 1841 年公爵在柏林进行的轰动一时的决斗。

16 候补人——此处是指外交部职位候补人。

17 在 1859—1862 年期间，俾斯麦任普鲁士驻彼得堡公使。参看第十章。

18 1851 年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驻联邦议会公使（参看上文注 8），议会会址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俾斯麦在被任命出使彼得堡之前即 1859 年之前，一直在此岗位。

19 1806 年，普鲁士军队被法国人击溃（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1807 年，夏恩霍尔斯特将军对普鲁士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俾斯麦这里所指的 1806 年以前普鲁士军队的特征肇始于弗里德里希二世；这位统帅始终贯彻一条原则，即：将军及其军官，自上而下，都不准“议论，只能执行”国王的命令。由

此而来的便是俾斯麦指出的惧怕独创精神、怕负责任。

20 俾斯麦指的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执政时期。

21 政府陪审官是指行政机构的小官。

22 海因策夫妇案件指 1891 年 10 月在柏林就海因策夫妇被控告撮合男女私通以及类似罪行而举行的丑闻审判。

23 根据 1817 年法律，普鲁士的枢密院是国王驾前最高谘议机构。一切法律草案都必须通过枢密院审查。参加枢密院的有诸亲王、王国最高官吏以及国王特别指定的人士。后来，枢密院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参看第二卷，第三十一章及其注释。

24 民法在德国是指国内个别历史地区的法。1794 年确立的普遍民法是全普鲁士民法，有别于普鲁士个别地区从中世纪起存在的特殊系统的地方法。颁发过普遍民法的省份有东普鲁士、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省。

25 为了弄清俾斯麦回忆中所说的他的行政工作，有必要了解下列情况。1815 年以后，普鲁士分为九个省（东普鲁士、西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波兹南、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省）；省又分区（Bezirke），区又分县（Kreise）。地方政权机构（行政当局）为首者在省一级称省长（Ober-Präsident）区一级称地区长官（Regierungs-Präsident）或简称区长（Präsident）。掌管县的称县长（Landrat），他由国王任命；县长候选人由地方贵族推荐；所以，县长同时又是国王的官吏、又是代表贵族阶层的人士。

26 普鲁士莱茵省是由在 1815 年割让给普鲁士的沿莱茵河的地区

组成的，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原来属于为数众多的小公国，而在1801年曾部分地合并给法国。行政体系的建立和行政机构的组成在这里是在稍许特殊的情况下形成的。拿破仑在莱茵地区进行统治期间完成的根本性改革（在经济方面这一地区是当时德国最发达的地区）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此同旧普鲁士地区的体系发生激烈矛盾。法国人被赶走以后，德国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特征表现出的某些拿破仑的改造痕迹都未能消除掉。这种情况使莱茵省同普鲁士其他省份比较起来处于特殊地位。

27 阿尔萨斯和洛林由于法普战争根据1871年5月10日法兰克福和约划归德国。

28 行政区——管理各部事务的中央行政机构的地方机关，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主要的行政区域单位；1800年拿破仑实行了行政区制。后来归并给普鲁士的莱茵地区，在法国统治期间也存在过类似的划分法。

29 尸位素餐——原字为拉丁语（sine cura—不必操心），表示薪金很高但不必工作的闲差。

30 区长，准确地应为地区长官，见前面注释25。

31 发辫和假发在这里象征旧官僚。

32 俾斯麦于1839年10月22日离职。

33 见前面注释25。

34 参看 G. V. Wilmowski, Meine Erinnerungen an Bismarck (Breslau, 1900), 〔G.冯·维尔莫夫斯基：《我对俾斯麦的回忆》（布勒斯劳，1900）〕181页；作者引用了1868年11月俾斯麦的声明："如果做了什么错事，那么休想找到肯负责任或

承认应负责任的人。你找不到做错事的人，就得挨无形的手打来的耳光。”

35 参看俾斯麦1845年1月9日给沙拉赫的信（Vom jungen Bismarck，Weimar，1912，S，87〔《青年时期的俾斯麦》，魏玛，1912，87页〕）：“接着我在波茨坦担任公职，为了消遣而饮酒赌博，还不起债，便当了军人以尽义务，又同上司发生争吵，在这种情况下我便怀着一种人们处于绝望的境况中遇到有进入新的环境的出路时所怀有的渴望和喜悦心情，抓住了我父亲的提议，接受了他在这里的庄园——庄园很大，债台高筑，管理不善，不仅得不到收入，反而还得赔钱。”

36 俾斯麦休假期间，于1839年复活节接受了父亲三个庄园，即：克尼普霍夫、屈尔茨和雅尔和林；但他任职一直到10月。父亲去世后（1845年11月2日）他便迁往舍恩豪森。

37 后备军是指1807—1813年普鲁士军事改革之后各县征集的后备军。

38 姓氏前的“冯”字标志着是属于贵族。

39 这里指的是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初到1806年这一期间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的反贵族情绪。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的溃败把反拿破仑统治斗争的任务提到了首位。

40 奥托·特奥多尔·曼托伊费尔男爵从1848年9月起在勃兰登堡将军内阁中任内务部大臣。勃兰登堡死后（1850年），曼托伊费尔任首相（1858年以前）。

41 诺恩堡公国，或纳沙泰耳（1815年前后普鲁士国王曾是这个公国的公爵），同时又作为一个州加入了瑞士联邦。1848年在

这里建立了共和国。1856 年 9 月，保皇党人发动起义，试图把诺恩堡归还给普鲁士国王。起义于翌日就被镇压下去了。

42 地区军曹是后备军指挥人员的官衔（见上面注释 37）。

43 屈尔茨是俾斯麦的庄园之一。

44 塔勒尔是二十世纪以前的德国银币。

45 一般通称于 1858 年威廉亲王摄政（参看第九章注释 22）时上台的、以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公爵为首的内阁为“新纪元”政府。这个政府执政到 1862 年，即所谓“宪法冲突”时为止（参看第 14 章）。

46 在反拿破仑统治的战争期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致居民书中许诺在战胜敌人之后在普鲁士颁布宪法。这一诺言没有实现。在 1840 年代，自由派要求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实现他父亲的诺言，其中包括召开国民代表会议。类似的要求也遭到俾斯麦的反对。

47 普鲁士亲王妃是普鲁士亲王夫人的称号。这里指的是未来国王威廉一世的夫人奥古斯塔。

48 俾斯麦和约翰娜·冯·普特卡默尔的婚礼于 1847 年 7 月 28 日举行；1847 年 9 月 6 日—9 日俾斯麦同妻子在威尼斯逗留。

第 二 章

1 1848 年 3 月 18—19 日在柏林爆发了起义，这是 1848 年普鲁士三月革命的开始。

2 黑红金三色旗是十九世纪初统一的德国采用的标志。1848 年该三色旗被用来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

3 枪骑兵指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普鲁士军队中骑兵部队中的精锐。骑兵司务长是骑兵的中下级军官衔。

4 “德意志之家”是柏林的一家旅馆。

5 普鲁士亲王是普鲁士王位最有可能的继承人的称号。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具有这种称号的是国王的兄弟，即：未来的国王和皇帝威廉一世与卡尔·弗里德里希亲王二人。俾斯麦在说到普鲁士亲王时，一般是指威廉。

6 孔雀岛——在哈费尔河上（易北河支流）。

7 指联合省议会（参看第一章注释1）。

8 参看第一卷、第二章，第27—28页。

9 市民卫队是1848年3月19日柏林资产阶级建立的志愿军事组织。其成员为资产阶级、大学生和手工业工人。市民卫队表面的任务是保卫已经争得的自由；实际上在革命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市民卫队不止一次地反对过革命的无产阶级。

10 “牛蹄子”（Kuhfuss）是对武器的戏谑称呼。

11 警察总监是警察的长官。

12 公告《致我亲爱的柏林同胞》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宣言，签署于1848年3月18日深夜柏林革命起义时刻。在这篇公告中，国王企图把他对起义者采取镇压行动的责任推托给引起居民不满的“一群暴徒”，“一伙多半是外国人的恶棍”身上。他号召“看在至圣的份上”，拆除街垒，并各自回家，保证“一切街道和广场立即撤走军队，仅对宫廷某些建筑物、军械库以及某些房舍加以军事保护，而且为时将甚短”。

13 俾斯麦所用的谚语相当于俄国谚语“事后聪明，贼走关门”

（等于汉语的“事后诸葛亮”——译者注）。

14 参看歌德悲剧《葛兹·冯·伯里欣根》，第3幕，第17场。葛兹是十六世纪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期间领导一支农民队伍的骑士，后来成为叛徒。对于皇帝使者提出的招安建议葛兹回答说：“让我投降？凭着你们的愤怒和慈悲？你在和谁讲话？我难道是强盗吗？告诉你们的长官，我对皇帝陛下一如既往保持应有的尊敬。你告诉他，他可以把我……”（砰地关上窗户）。

15 请愿书是1848年4月2日召开的普鲁士第二次联合省议会致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呼吁书。在请愿书中提出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方面极为温和的要求。

16 暗示1890年5月23日推荐卡普里维接任俾斯麦的帝国宰相职位。详见第三卷，第八章及其注释。

17 俾斯麦说他“签名不写‘冯’”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在俾斯麦青年时期的书信中几乎都在姓氏前面写有“冯”。

18 磨粉税（Mahlsteuer）或者直接在磨面时征收，或者以运面粉进城时抽税的方式征收。1820年宣布：面粉入城税在普鲁士全部大城市都要征收。只是到了1873年这种税才最后取消；在物价昂贵的年代，这种税曾暂时停止过征收一段时期。等级税（Klassensteuer）在普鲁士指这样一种直接税，其数额不是按收入多少来规定，而是看纳税人属于哪类居民。根据1820年颁布的法律，纳税人分为四等，每一等又分为若干级（Klassen），按级规定税收数额。——海岸战争指由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引起的普鲁士与丹麦之间的战争，战争断断续续地从1848年4月延续到1849年7月。

19　在1924年德语版《思考与回忆》中此处有方括号，根据手稿刊出了1898年第一版中所缺的一句话，即："甚至极端保守分子冯·塔登先生也把为倒退到过去而斗争的人比作那位同风车搏斗而被风车打断了骨头的荒唐的骑士。"

接着，在"不完全补偿"之后又根据手稿补了下面几句：不考虑这些地租和抵押贷款中往往包含了某些寡妇积蓄的分尼，也不考虑，依据这种可以取消利息的法律，最后就应该要求收回农民私有者从调整以来为了赎买以资金或土地支付的一切，于是，由于掠夺法令一个接着一个，最后就会把有契约为依据的一切财产变为不牢靠的东西。然而，如上所述，采取这种手段的目的就在于使农村居民丧失维护其利益的昔日贵族中的干练的成员这种有力的代表。

20　指依附的农民为解除封建劳役并对因此而得到的田地——数量非常之小——向地主交纳的赎金。这些赎金是由1811年调整法、1816年宣言和1821年赎买条例规定的。这些成文法律使普鲁士农民摆脱封建劳役的过程变成了极为痛苦的手术。

21　应该指出，"党"、"派"这些字俾斯麦不仅用于一般通用的意义，也用于宫廷宗派或其他派别的意义上。在这里，"冯·芬克党"指的是接近亲王妃的人。

22　威廉得到"炮弹亲王"这一绰号是因为他在1848年3月采取的立场，当时他要求用军队坚决镇压起义。

23　四年冲突（1862—1866年）一般称为"宪法冲突"，发生在普鲁士政府和普鲁士议会之间。参看第十四章及其注释。

24　奥地利战争指1866年的奥普战争。参看第二卷，第二十章。

25　"文化斗争"指俾斯麦在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国家同德国天主

教会斗争时所确定下来的名称。“文化斗争”涉及到：消除教会对帝国政治的影响、同德国各天主教区分离主义的斗争，消除奥地利和法国由于天主教的关系而相互接近的危险。关于“文化斗争”的事件参看第二卷第二十四章及其注释。

26 巴贝尔斯贝格是普鲁士国王在波茨坦近郊的城堡。

27 参看第二卷第二十章。

28 国王在这里使用了旧式词“teutsches”，该词来源于古代日耳曼部族之一的条顿族（teutones）的名称。

29 在德国，1848 年革命于 1848 年 2 月底 3 月初在南德一些中、小邦开始。3 月 13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发生了革命起义。

30 1789 年 8 月 3 日深夜，法国立宪议会成员在群众性农民起义的紧张局势下“自愿地”放弃了他们对农民所要求的封建贡赋。这种放弃所涉及的不过是一部分贡赋，而且还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俾斯麦所谈及的“在祖国的祭坛上的自愿的牺牲”，是被迫的。

31 指奥里缪茨事件。参看下章。

32 1848 年三月起义开始后三天，国王在柏林演了一幕戏剧性的出走，以便显示“同人民团结一致”。国王在市政管理局和大学面前宣称他愿意挽救德国的统一和自由，他希望领导立宪制德国，云云。

33 在俾斯麦所提及的 1840 年 9 月 10 日和 1842 年 9 月 4 日的演说中，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纲领。他在 1840 年的演说中说：“我记得，我是从全能的上帝那里得到王冠的，面对上帝，我要为自己每一天和每一小时的政事负责。谁要求我对未来岁月作出保证，我都要对他说

这样的话。无论是我或是其他什么人都不能作出比此更好的保证。这种保证要比一切誓言、比一切记录在羊皮纸上的许诺都更为牢固，因为它来源于生活本身并根植其中……谁想安于淳朴的、父亲般的古日耳曼式和基督教式的安邦治国，那就请以信任的心情来看待我吧。”

34 从1848—1866年，即：从“巷战”（俾斯麦这样称呼1848年的革命战斗）到1866年奥普战争中的战场。

35 1866年的奥普战争和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

36 无忧宫是波茨坦市附近的宫殿，普鲁士国王的住所。

37 投石党运动是1648—1653年法国贵族反对国王绝对君权的运动。一般把表面的、不深入的反对派比喻为投石党运动。

38 柏林议会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于1848年5月22日在柏林开幕，同年12月5日解散。

39 参看上文注释2。

40 袭击军械库是1848年6月14—15日由工人和手工业者在柏林发动的，这是1848年德国革命中最重大的群众性行动之一。

41 法兰克福议会是德国国民会议（1848年5月18日至1849年6月18日）。这次会议是1848年3月革命后召集的，目的在于把德意志统一为独立的国家。法兰克福议会大多数由自由派资产阶级分子组成，惧怕一切人民运动。议会不下决心把权力夺取到手中，却纠缠于未来的统一德国的宪法草案这种毫无成果的争执中。1849年3月初议会提出的帝国宪法没有得到德意志各邦政府的承认；会议提议赋予普鲁士国王的皇冠被普鲁士国王当作“没有法律根据”的皇冠而轻蔑地拒绝了（1849年4月3日）。为维护议会所制定的宪法而举行的起

义，也没有得到它的领导。1849 年 6 月 18 日，法兰克福议会在没有表示任何反抗的情况下被驱散。

42 宫廷党（来自西班牙语 camarilla ——“小房间”一词）是一个接近君主又有势力的宫廷官员组成的不负责任的集团。

43 “红土”人指威斯特伐利亚人；威斯特伐利亚人以固执和任性闻名。

44 牵象人是指印度的牵象人。

45 普鲁士国民议会（柏林议会）是在一座剧院之内召开的。由于议会对于 11 月 1 日执政的新的反动的勃兰登堡内阁表示不信任，弗兰格尔将军的军队被调进了柏林；11 月 9 日，议会被迫离开柏林迁往勃兰登堡。会议没有胆量向人民群众发出呼吁，而仅限于提出抗议，事实上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正式解散是在 1848 年 12 月 5 日。

46 参看第一卷第三章第 48—49 页。

第 三 章

1 王朝正统主义原则是法国全权代表塔莱朗伯爵在 1814—1815 年维也纳会议上（参看第八章注释 34）提出的。正统主义应成为在战胜拿破仑之后决定欧洲命运的指导原则。在提出这条原则之后，事实上塔莱朗仅仅致力于缓和战败国法国在会议上的处境和获取参加决定基本问题的权利。他的努力得到了辉煌的成果。后来，“正统主义”一语进而发展到具有政治和法律学说意义，根据这种学说只有王朝“法定”的继位人才有权登基；任何其他登上王位的办法（例如选举，像当时议会

把统一德国的皇冠加给普鲁士国王那样），从正统主义观点来看，都不能为“正统主义”法律所承认。正统主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乃是绝对君权理论，它表现了在反对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环境中诞生的封建主义反动派的政治观点。1830 年七月革命之后，在法国正统主义分子是指那些在 1830 年被推翻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们。

2 参看第二章注释 33。

3 1849 年春天德国南部和西部掀起了一阵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起义浪潮，其口号是为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而斗争（参看第二章注释 41）。第一个起义于 5 月发生在德累斯顿（萨克森）；但最重大的是同月发生在巴登的起义。各方起义均于 1849 年 7 月中旬被镇压下去。

4 后备军——参看第一章注释 37。

5 钦赐是一种赏赐；钦赐宪法（来自法语 Octroyer 赏赐），是君主御赐的宪法。此处指的国民议会于 1848 年通过的宪法是与国王可能赏赐给臣民的宪法相对比。

6 “比利时的宪法法式”在这里是指 1831 年比利时自由资产阶级宪法，该宪法后来成为十九世纪许多国家制定自由主义宪法的样板。

7 “新纪元”——参看第一章注释 45。

8 德国国民议会是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召开的（参看第二章注 42）。无忧宫——参看第二章注释 37。

9 费阿基式的政府——不真实的政府；费阿基人是荷马古希腊传说中的虚构民族。在这里，俾斯麦是嘲讽地指许多小的和中等的德意志邦。在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本国革命浪潮高涨的影响下，这些政府早在严重的革命战争开始以前，便已经

开始让步了。

10 指1850年普鲁士宪法，该宪法总归还算限制了国王的权力，虽然程度不怎样大。

11 指任命勃兰登堡将军内阁（参看上文第二章）。

12 参看第二章注释42。

13 俾斯麦所指的是德意志中小邦国的君主。

14 指普鲁士1864年同丹麦的战争、1866年同奥地利的战争、1870—1871年同法国的战争。

15 指普鲁士未来的国王和统一后的德国第一任皇帝威廉一世。

16 参看上文注释3。

17 奥地利1848年革命始于3月13日维也纳起义。起义者的要求之一是立即撤除奥地利宰相梅特涅，他不仅是奥地利反动派的后台，而且也是全欧洲反动派的后台。当天，梅特涅公爵被迫辞职并逃出维也纳。俾斯麦所说的从这一事件到军队撤离柏林的空隙时间，是3月13日—19日。

18 参看上文注释3。

19 三王同盟是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三个邦的国王的同盟，根据普鲁士的计划，这三个邦应该成为未来以普鲁士为首领的德意志帝国的核心；1849年5月26日缔结了为期一年的同盟；设立同盟是为了联合其他德意志邦国。1850年3月20日至4月29日在埃尔富特城举行了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各政府的代表会议，目的是制定共同的宪法。但是由于奥地利采取了坚决的反对态度，萨克森和汉诺威退出同盟，而被称为埃尔富特议会的会议，便随之解散。

20 萨克森和德国西南部保卫帝国宪法的起义（参看上文注释3）

遭到普鲁士、黑森、梅克伦堡及其他邦国军队镇压。这些军队表面上是以（法兰克福议会建立的）全德政府的名义，作为“帝国军队”采取行动的，“帝国军队”的总指挥是普鲁士亲王。

21 参看席勒的悲剧《华伦斯坦之死》（第 2 幕第 3 场）。主人公说：

> 世界是狭隘，头脑是宽广。
> 思想虽然容易同居，
> 而在空间则实物与实物必然相撞；
> 一个占了一个地方，
> 别个便必须退让，
> 要想不排斥于人，必须排斥人。
> 这儿支配着的是斗争，只有强者战胜。（郭沫若译）

22 科里奥兰——罗马贵族，莎士比亚同名悲剧的主人公。他以轻蔑和侮辱性的言辞对待起义人民，责备他们在情绪和爱好上变化不定（第一幕第一场）。

23 俾斯麦讽刺在中世纪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存在的为数繁多的贵族等级，他们享有各种具备繁琐的法律性质的权利。这些贵族等级的差别甚至在十九世纪依然能够感觉出来。附庸小公爵——从直接附庸于皇帝转而附庸于其他公爵的小公爵，当然，就不再是独立进行统治的国君。显贵人士是享有皇帝赐予的尊贵称号的人士；他们与实际人士的区别仅在于他们享有称号而已。世袭伯爵（即“继承的”伯爵）

是列入帝国公爵等级的爵位，其称号得到皇帝的承认（有别于非世袭的，即没有得到承认的）。

24 1850 年 11 月 29 日，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在奥尔缪茨城（摩拉维亚）签订了一项协定。依据这一协定，普鲁士在俄国的压力下，放弃了以自己为首统一德国的意图，而同意恢复旧的、亦即奥地利事实上占上风的德意志邦联（参见第一章注 8）。这个协定是普鲁士的一次严重失败。俾斯麦在以后不止一次地提到普鲁士在奥尔缪茨的“耻辱”、“卑躬屈节”。在签署奥尔缪茨协定以前，在华沙就举行了普鲁士首相勃兰登堡和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贝格同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会见。尼古拉要求普鲁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对奥地利让步。

25 迟钝犹豫意即极端缓慢。罗马统帅费比·马克辛（公元前 3 世纪）被称为“迟钝犹豫的人”，因为他使用慢慢地使敌人疲惫的战略。

26 博鲁士是普鲁士的拉丁文称呼。俾斯麦用“博鲁士人”一词代替“普鲁士人”，正如在俄国有人用“罗斯人”代替“俄国人”一样。

27 加格恩男爵是德国的政治活动家。在法兰克福议会中曾为黑森的代表并领导过帝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他的纲领归结为以帝国宪法为基础把德国统一为联邦国家，并把奥地利从德意志联邦中排除出去，而联邦应同奥地利建立同盟关系。后来他背离普鲁士而为奥地利出谋划策。

28 这里引用的拉丁语句摘自生活于四至五世纪的基督教作家奥古斯丁著述（《忏悔录》131，10）。其含意为：在罗马教皇采取权威决定之后，一切纷争都应消弭。

29 根据1850年的宪法，在普鲁士存在由两院组成的议会，即上议院和众议院。参加上议院的有：(1) 亲王；(2) 国王予以终身任命的人士；(3) 最大的纳税人中的120名选举成员。在1854—1855年，这种制度有所改变，整个上议院改名为贵族院，由国王任命终身的人士组成。众议院则按照著名的三级选举制（存在到1918年之前）推选，这一制度保证使大多数席位归于最大的纳税人（参看第四章注释8）。

30 德文本编者科尔教授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根据页边的注脚，俾斯麦公爵是想在这里插入一段遭遇，这一遭遇他在宴客时一再谈起。我凭记忆叙述：当俾斯麦衣袋里带着征召令前往柏林时，邮车上上来一位波美拉尼亚长老，姓施特兰茨克。谈话自然很快涉及到政治事件。当施特兰茨克听说到征召令时，他十分天真地问道："法国人在哪里?"当冯·俾斯麦先生告诉他说这一次不是反对法国人而是反对奥地利人时，他毫不掩饰地表示失望。"啊，如果我们要对着白上衣（奥地利士兵穿的白呢子制服）开枪，而不对法国人这些狗东西开枪，那我真感到可惜。"可见他对耶拿失败之后普鲁士的艰难时日以及1813—181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斗情谊仍然记忆犹新。

31 附庸化——取消直接臣服于中世纪德意志罗马帝国皇帝的德意志各小邦的独立生存，并将其合并于大的邦国。拿破仑第一于1803年在德国大规模地采取了这种措施。

32 柏林的"卡西诺"是柏林的一个贵族军官俱乐部。在它周围聚集了1848—1849年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保守分子。

33 德意志各邦君主德累斯顿会议从1850年12月23日开到1851年5月15日。会议是奥地利政府设计出来的，用以巩固它在

奥尔缪茨所获得的成果（参看上文注 24）和稳定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充分的霸权。会议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

第 四 章

1 邦联议会是德意志邦联的机构（参看第一章注释 8）。于 1848 年 5 月停止活动。1850 年 9 月 1 日得到恢复。普鲁士因为不希望恢复以奥地利为首的议会，迟至 1851 年 3 月才参加议会。

2 达姆施塔特和拿骚是德意志公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是“自由市”，一个参加了德意志邦联的独立的城市共和国。普鲁士像其他邦国一样，为了俭省，委派一个使者代表它在几个小邦国的利益。

3 临时协定（暂时的协议）是指 1849 年 9 月 30 日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签订的条约，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全权联邦委员会，以便在最后解决德国宪法中的各种问题之前处理德意志邦联事务。这里提到的伯蒂歇尔和波伊克代表普鲁士参加了委员会。

4 普鲁士将军约克·冯·瓦腾堡军团是 1812 年拿破仑军队在普鲁士的辅助军团。根据 1812 年 2 月 24 日的巴黎条约，普鲁士有义务把武装力量提供拿破仑使用。

5 俾斯麦在 1842 年 6 月 24 日冒着被淹死的生命危险救起了跌入利普纳湖中的自己的马夫希尔德勃兰特。

6 参看第一卷第十章第 161 页。

7 枢密顾问是高级官衔之一。

8 1848 年 12 月 5 日，即正式宣布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那一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普鲁士颁布了钦定宪法，其性质比普鲁士国民议会拟定的宪法性质更加温和。为了赋予宪法必不可少的力量，1849 年 2 月 26 日成立了两议院，但很快又解散了。后来，根据 1849 年 5 月 30 日颁布的三级选举制度，选出了新的议院（俾斯麦谈到了这些议院），以制定 1850 年普鲁士宪法。普鲁士三级选举制度可归结如下。全部选民划分为三组。列入第一组的有为数不多的纳税数额大的人，其纳税额为总额的三分之一。列入第二组的是纳税额次之的纳税人，纳税额也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最后，列入第三组、即选民数量最大一组的是其余全部纳税人和由于无力支付而不纳税的人。每组选出和其他两组一样多的复选人。可见，三级选举制保证了纳税最多的前两组人占优势。

9 1852 年 12 月 2 日拿破仑第三在法国称帝。

10 马尔克是指中世纪德国的边疆地区。此处所指的勃兰登堡马尔克是历史上普鲁士国家的核心。

11 莱茵同盟是 1806 年由拿破仑建立的，参加同盟的有巴登、维尔腾堡、巴伐利亚以及南部和西部许多其他中小德意志邦国。1807 年参加同盟的有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以及其他六个邦国。莱茵同盟的保护人是拿破仑。许多德意志小邦被同盟中的成员国瓜分。完全被法国控制的莱茵同盟实质上是法国在德意志的藩属，在拿破仑失败后解散。

12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叔叔。他称后者为兄弟，是遵从了君主对君主的习惯称呼。

13 “单音节”内阁是一种戏谑称呼，因为三个主要大臣的姓

氏（在德语中——译者）都只有一个音节。

14 参看第一卷第十七章第253页。

15 关税同盟——参看第一章注释14。匈牙利和加里西亚因为是奥地利帝国的组成部分，所以同奥地利一样被关闭于关税同盟大门之外。

16 莱塔河此岸——莱塔河以北的奥地利土地，广义上指奥地利本身；莱塔河彼岸地区——莱塔河以南的奥地利土地，广义上指当时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匈牙利。

17 引自霍拉斯，讽刺诗，1，2，第1—2行。

18 诺德奈是德国海上的诺德奈岛上的疗养所，为汉诺威王国的组成部分。

19 在汉诺威王国1848年革命前数年内，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就宪法问题和王国政府展开了斗争。政府曾被迫作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在1848—1849年革命遭到镇压后，国王开始寻求办法废除原来宣布的资产阶级的自由。邦联议会不止一次地干涉中小邦国的内部事务，一般都是竭力阻挡那里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因此，汉诺威国王在这种情况下也求助于议会。在汉诺威，关于宪法的争论以1855年国王钦定的反动宪法而告终，这部宪法取消了大部分早先所作的让步。

第 五 章

1 恩斯特·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喜欢和温和自由派进行勾搭而闻名。在他的公国境内隐藏着许多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自由派活动家，这些人还得到了

支持。他拥护以1849年法兰克福宪法精神来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思想。

2 以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主要城市哥达而得名；1849年6月，普鲁士亲王的拥护者曾聚集于此。

3 参看第三章注释24。

4 有关摄政，参看第九章注释22。

5 “Preussisches Wochenblatt zur Besprechung politischer Tagesfragen”（《普鲁士政治时事评论周报》）是极为温和的自由派刊物，于1851—1861年在柏林出版。

6 这里谈到的是阿·夏米索的《安塞尔莫堂兄》一诗。安塞尔莫曾以忘恩负义来报答伊格兰诺的效劳——俾斯麦指下文中还要提到的合作者背离了他。

7 参看第九章注释22。

8 俏皮话，指曼托伊费尔在1848年11月被任命为内务大臣，而在1850年11月又被任命为外交大臣。

9 克里木战争或东方战争（1853—1856年），是以俄国为一方，以英国、法国、撒丁和土耳其为另一方的战争。克里木战争以俄国的失败和1856年巴黎和约告终（参看下文注释20）。

10 指1866年的奥普战争。这次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在波希米亚展开。在这里，1866年7月3日在凯尼希格勒茨（萨多瓦）附近进行了著名的击败奥地利人的战役。

11 在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期间，尽管普鲁士和俄国关系友好，普鲁士却没有给予俄国积极支持。奥地利强迫普鲁士签订了旨在反对俄国的条约；虽然普鲁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以使该条约旨在反对奥地利（参看下面注释13），但条约依然

使奥地利在多瑙河诸公国问题上易于采取行动（参看下面注释17）。结果，俄国被迫从这些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中撤走军队。

12 列波累洛是唐璜的仆人，唐璜是广泛流传的关于一位成功的美男子诱惑者传说中的主人公；这位仆人帮助他的主人安排了各种事务。

13 1854年4月20日在柏林签订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同盟条约，以便在遭到俄国进攻时互相援助。奥地利提出签订这项条约时，事先就设想把它变为对付俄国的武器，因为它对俄国采取了激烈的敌对态度。但是普鲁士不愿意支持奥地利反对俄国，起初拖延签订条约，后来把它变为纯粹防御性质的条约，声明说只有在“全德利益”受到触动时，它才予以援助，因为在东方事务中就不可能找到给予援助的借口。它还坚持邀请德意志小邦参加条约。这些邦国的情绪有利于俄国，俾斯麦也有意用它们来抗衡奥地利，因为它不希望奥地利国力增强。迟至7月27日，在班贝格举行长时间会谈之后，德意志各小邦才参加了条约（参看下面注释15）。最后，条约不仅没有被用来反对俄国并促进奥地利采取反对俄国的行动，反而用于反对和俄国交战的国家了。这种情况随之妨碍了法国让军队经由德国土地渡过多瑙河的军事计划。

14 关于符腾堡国王威廉的这一讲话，也可参看俾斯麦1860年2月9日的信件（Bismarck’s Briefwechsel mit dem Minister von Schleinitz（1905）［《俾斯麦与冯·施莱尼茨大臣通信集》（1905年）］第60页）：“在对待它们大多数的关系上，即使我们更为顺从，在战争时期我们依然不会得到它们忠贞

不渝的爱情：‘对他们来说衬衣比外套更贴身’，‘符腾堡比邦联亲’，五年前聪明的年迈国王在斯图加特对我这样说过。”

15 班贝格会议于1854年5月25日举行。与会的邦国有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汉诺威、黑森和拿骚。在5月26日送交给柏林和维也纳两宫廷的同样的呼吁书中，这些邦国要求：(1) 向邦联提交4月20日条约并让德国各小邦参加条约；(2) 除要求俄国退出两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以外，还补充要求停止双方敌对行动，撤退西方大国军事力量（这种力量的集结引起了德意志各邦的不安）；(3) 在以后的谈判中，要有德意志邦联的独立自主的代表。

16 参看上文注13。

17 俄国军队于1853年夏天进入位于多瑙河上的摩尔达维亚公国和瓦拉几亚公国。随后于1854年8月—9月撤退，因为奥地利在这两个公国边界上集结了强大的兵力，出现了直接的战争危险。

18 1854年12月2日，奥地利同法国和英国签订了一项条约。三个强国都保证，未经事先互相协商不得同俄国达成任何单独的协议。在俄国再次发起进攻的情况下，奥地利有义务保卫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英国和法国则应该全力支持奥地利。

19 由奥地利外交大臣布奥尔伯爵于1854年8月召集的维也纳大国会议（普鲁士没有出席）制定了同俄国议和的四项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后来于1856年签订了巴黎和约。这四项先决条件是：(1) 拒绝俄国对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保护；(2) 多瑙河河口通航自由；(3) 黑海中立化，同时从那里撤出俄国舰队；(4) 拒绝俄国对土耳其基督教徒的保护，因为

这种保护招致了俄国沙皇对土耳其内部事务的干涉。

20 巴黎和约是1856年2—3月在巴黎召开的大国会议上签署的，该和约结束了1853—1856年的东方战争（参看上文注释9）。参加会议的有俄国、英国、法国、撒丁、土耳其、奥地利和普鲁士。和约的基础是“维也纳会议的四项保证”（参看上一条注释）。

21 炮兵总监，确切些说是炮兵总监将军，炮兵首长，奥地利高级将领军衔之一。

22 不使奥地利参加东方战争，参看上文注释9。

23 三位一体指德国的组成部分：（1）普鲁士；（2）奥地利；和（3）其他德意志各邦。奥地利于1850年实施的政策就在于以三位一体中其他两个组成部分的集团与觊觎德意志霸权的普鲁士对抗。

24 参看上文注释16。

25 参看第十二章注释1。

26 英法联合舰队于1853年10月30日进入海峡。

27 欧洲音乐会通常被理解为欧洲大国的总和。

28 指竭力把奥地利和普鲁士拉进反俄战争的英国和法国的建议。

29 在德意志邦联议会中，通过决议要求不少于总票数三分之二的多数。在这里，格尔拉赫认为议会有可能通过奥地利倡议的由德意志邦联在东方战争中支持反俄联盟的决议。

30 匈牙利和意大利北部当时受奥地利的统治，在这些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很炽烈。

31 教皇权力至上论是天主教会中的一个流派，该流派不仅在教会事务上，而且也在世俗事务中维护罗马教皇的无限权力。

教皇权力至上论者认为，教皇的权力应该高于君主和政府的权力。应该指出，俾斯麦一般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把天主教徒统称为教皇权力至上论者。

32 大公是奥地利帝国皇族亲王的称号。

33 指奥地利在1853—1856年东方战争中对于俄国的态度。

34 格尔拉赫想要说“还是国王”。

35 指普鲁士军队在欧洲大国反拿破仑同盟中的成功行动。

36 参看第八章注释52。

37 《罗马书》第三章第八节。

38 波拿巴分子，这里是指拿破仑第三的拥护者，拿破仑第三曾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政变结果，拿破仑第三成为法国皇帝。

39 参看上文注释18。

40 参看《列王纪》上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

41 拿破仑第三。

42 拿破仑第一。

43 阿尔文斯勒本伯爵的庄园。

44 参看第一卷第七章第100页。

45 参看第一卷第七章第99页。

46 参看上文注释5。

47 东海沿海地区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各省，即毗连东海的沿海各省，在德国有时称波罗的海为东海。

48 奥古斯特·哈克斯特豪森－阿本堡男爵是德国学者，研究普鲁士和俄国土地关系问题。俾斯麦在这里提及的是他的三卷本著作：《关于俄国内部状况、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机构的

研究》。在这一著作中，哈克斯特豪森维护了农奴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仅需某种改革，他把俄国公社和地主“老爹”一同理想化了。

49 参看上文注释 2。

50 1851 年 11 月 18 日，伦敦郊区芬斯贝利和艾灵顿二工业区代表团求见当时已不在职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向他表示谢意，因为他曾对遭到迫害并在英国避难的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科苏特予以援助。

51 旧时化学术语，表示蒸馏时余下的不发挥的、稳定的沉淀物（“死脑袋”）。

52 彼得一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彼得大帝遗嘱》看来是指在拿破仑第一时期编制的文件，其中包括了俄国征服欧洲的纲领。《遗嘱》起源及其作者的问题，至今仍是历史学家们探索的对象。

53 埃内斯特族系是萨克森王朝古老的公爵族系，来源于 15 世纪萨克森选帝侯恩斯特。埃内斯特二世——萨克森－科堡－哥达属于这个族系，于 1844 年登基，推行有节制的自由派政策。1859 年他力图把普鲁士拉进对法国的战争。

54 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

55 看来，这里是把彼此有相当一段时间间隔的两次谈话连接起来了。“被战胜”之后和“全部”之前的引号，正如其间的破折号一样说明了这一点。法国人和英国人于 1854 年 9 月 28 日出现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10 月 9 日开始围城，但 11 个月以后才被攻克。

56 参看第四章注释 4。

57 参看第二章注释 11。

58 《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八节。

59 德意志邦联——参看第一章注释 8。

第 六 章

1 参看第二章注释 21。哥尔茨如下文提到的贝特曼·霍尔维克一样，是聚集在《周报》周围的政治活动家之一。

2 参看第一卷第五章第 79 页。

3 魏玛是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的主要城市，德国文化和历史中心之一。歌德、席勒以及德国文学、科学、艺术界的其他许多伟大代表人物都曾在魏玛生活和工作过。极乐净土是希腊神话中的“极乐世界”。

4 保罗皇帝由于 1801 年 3 月 23 日发生宫廷阴谋而被杀死。他的女儿玛丽亚·巴甫洛芙娜公爵夫人，即奥古斯塔王后的母亲，嫁给卡尔－弗里德里希·萨克森－魏玛大公。

5 参看上文注释 1。

6 施莱尼茨于 1858 年 11 月 6 日至 1861 年 10 月任大臣。关于“新纪元”参看第一章注释 45。

7 科布伦茨是莱茵河上的古城，普鲁士莱茵省的主要城市。关于“无忧宫”，参看第二章注释 37。

8 伊丽莎白王后与奥地利、巴伐利亚和萨克森执政王朝均有亲属关系。

9 教区总监是路德教会中的最高级负责人。

10 在这里谈到的德国西部各地区以及莱茵省，大多数居民属于

天主教会。在十九世纪初合并于普鲁士之前，这些地区大部分隶属于各教会诸侯——各主教。

11 在这一时期，毕洛夫任外交部帝国国务大臣职务。

12 在此之前不久，1876 年 7 月，在马尔品根村（特里尔州），据说农民的孩子们在海尔特尔森林中看到了“显圣”。

13 指罗马教皇庇乌九世。

14 意大利国王翁伯托（1878 年至 1900 年）登上王位后与罗马教廷处于敌对关系之中。敌对的根源在于 1870 年的事件，当时意大利国王剥夺了罗马教皇的世俗权力。后来，在罗马教皇利奥八世（1878—1903）时期，罗马王室对意大利世俗权力所持的不妥协的立场才逐渐转变。“年高望重的教皇”指庇乌九世（1846—1878），即利奥十三世的先辈。

15 “参谋总部”，在这里不应从字面上理解。

16 宫廷党——参看第二章注释 43。

17 在普法战争期间，1870 年 8 月底法国军队在麦克马洪指挥下试图解救被围困在麦茨要塞里的巴赞的军队，未获成功，在法国人失利的波蒙战役（8 月 30 日）之后，退到色当。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法国军队，在这里投降（9 月 2 日）。在维昂维尔和马斯－拉－图尔发生的战斗（8 月 16 日），在颇大程度上保证了普鲁士人围攻麦茨的成功。

第 七 章

1 参看第一卷第四章第 62 页。

2 耶拿——参看第一章注释 39。

3 1813 年 10 月 16—19 日，欧洲各国联军在莱比锡城下击溃了拿破仑的军队。

4 七年战争（参看第一章注 6）期间，1757 年 11 月 5 日，在普鲁士罗斯巴赫村附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击溃了法国和罗马—德意志皇帝的联军。

5 参看第四章注释 1。

6 《Kreuzzeitung》（《十字报》）是普鲁士极端保守派的机关报，创办于 1848 年，当时称为《Neue Preussische Zeitung》（《新普鲁士报》）。

7 联合省议会的恢复可能意味着返回等级代议制度。不仅 1848 年的普鲁士宪法，而且 1850 年在反动势力猖獗时期制定的宪法，在这一意义上讲，都标志着向前进了一步，因为尽管这些宪法有许多局限性，还是确立了没有等级的、采用选举办法的人民代议制制度。恢复联合省议会可以说是一种极为反动的措施。

8 参看第一章注释 26。

9 1848 年 12 月 5 日普鲁士宪法。

10 指旨在建立普鲁士与奥地利在德国问题上的“联盟”的政策，亦即在统一的德国它们二者平分霸权。

11 为发展 1850 年宪法，于 1850 年 3 月 11 日通过的关于村社条例的最终目的是实行地方自治。格尔拉赫写信（1852 年 5 月 17 日）后不久，1852 年 6 月，反动政府颁布了制止 3 月 11 日法令生效的法令，而且下一年即 1853 年，则完全废除了这项法令。

12 关于农民赎免封建劳役的法令是当时普鲁士内务部大臣曼托

伊费尔于1850年3月2日制定的。

13 1832年在英国按照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了议会改革。改革略为增加了选入议会的人数，具有十分局限的民主性质。改革是大资产阶级和拥有土地的贵族之间的政治妥协。

14 这里谈到的是1823年在普鲁士召集省议会和1847年召集联合省议会的问题。这不过是以残缺不全的等级会议来代替已经许诺的人民代议制的极可鄙的尝试；然而就连这样的尝试在写信人看来也是“革命的”行动。

15 尼古拉一世。

16 《Zeit》（《时代报》）是温和自由派的报纸。

17 瓦盖纳是《十字报》的创办者和领导人（参看上文注释6）。

18 参看第五章注释5。

19 伊罗德是犹太国王；彼拉多是罗马驻犹太国总督。依据基督教传说，伊罗德听说耶稣诞生后，便下令杀死全部男婴儿；是彼拉多处耶稣以死刑的。

20 《约翰福音》第18章第38节。

21 参看第一卷第五章第78页。

22 参看第一卷第五章第78页。

23 帝国塔勒即塔勒（参看第一章注释44）。

24 参看第一卷第四章第63页。

25 1851—1859年，俾斯麦任普鲁士驻邦联议会公使。

26 反动势力在普鲁士采取的旨在恢复1850年宪法颁布以前旧秩序的措施中包括把上议院改为贵族院（1854年10月12日敕令）。关于这次改变的实质，参看下面注释27。

27 这里“贵族体制”意味着英国类型的上议院体制。根据1854年10月12日国王敕令，由1850年宪法建立的普鲁士邦议会上议院被改组。过去，参加上议院的除世袭的和指定的人员外，还有一百二十个选举出来的人士；自此以后，上议院仅仅由国王任命的终生或世袭的人士构成。

28 指关于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冯·奥古斯滕堡公爵放弃他的丹麦继承权的问题。参看第二卷第十九章。

29 指“宪法冲突”，参看第十四章注释1。

30 查封决议权。

31 众议院即根据1850年宪法组成的普鲁士邦议会下院。在“宪法冲突”期间（参看第十四章注释1），众议院多次否决了拨款改组军队的提案。俾斯麦掌握政权（1862年）后，众议院示威性地宣布：不经它的批准，政府的任何开支都是非法的。上议院无条件地批准了俾斯麦提出的预算。

32 1850年1月31日通过的普鲁士国家宪法第99款的内容可归纳如下：国家一切收支每年应提前预算并报国家备案，逐年依法批准。

33 市政局是城市管理机构，市参议会。

34 换句话说，俾斯麦认为必须把一定数量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送进贵族院。

35 参看上文注释20。

36 普特布斯是波罗的海吕根岛上的疗养所。

37 参看第五章注释17。

38 指1853—1856年东方战争事件。

39 参看下章。

第 八 章

1 8月15日是拿破仑第一的生日（1769年）。

2 阿尔伯特亲王和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维多利亚·阿德尔海达·玛丽亚·路易丝（1840—1901）于1858年和普鲁士亲王弗里德里希结婚，他是未来的王储，后来成为国王，尔后又称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

3 瓦列夫斯卡伯爵夫人的丈夫从1855年起为法国外交大臣。

4 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为1804—1814／15年，其间拿破仑第一·波拿巴为法国皇帝。

5 第二帝国即拿破仑第三的帝国（1852—1870）。

6 拿破仑第三。

7 即在1853—1856年反俄东方战争中站在英国和法国一边（参看第五章注释9、11和13）。

8 雷马根是莱茵河上的一个德国古城，在科布伦茨附近。

9 参看第三章注释1。

10 亨利五世是波旁王朝时法国皇位觊觎者山勃尔伯爵（波尔多公爵）的命名。波旁家族皇位被1830年七月革命所推翻。

11 从七年战争（参见第一章注6）时期到1848年革命。

12 指1807年提尔西特和约以后普鲁士完全依附于法国的年代。法国和普鲁士之间于1807年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的军队在军事上击溃普鲁士的后果。

13 俾斯麦引用歌德诗《牧童怨》。

14 在德意志邦联的邦联会议的核心会议中，普鲁士在总票数十

七票中只占有一票（参看第一章注释 8）。

15 法兰克福市图尔恩和塔克西斯公爵宫殿为德意志邦联议会会址。

16 布奥尔于 1852—1859 年期间为奥地利政府首相和外交大臣；巴赫为布奥尔内阁大臣中有名的活动家。

17 列昂尼德一世是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国王。据传说，他和他的队伍在战斗中于费尔莫庇尔山山谷中阵亡，他曾以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保卫国家反对波斯人的侵略。

18 枫丹白露是巴黎附近的宫殿，法国皇帝的行宫。“麦克斯国王”指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

19 普鲁士和瑞士之间由于诺恩堡（纳沙泰尔）（参阅第一章注释 41）引起的冲突，以在 1857 年巴黎会议上由拿破仑第三调解达成的妥协而告终。奥地利曾阻碍普鲁士军队于 1849 年通过巴登到瑞士去镇压诺恩堡共和党人起义。

20 参阅第三章注释 19。

21 指在北海亚得湾建筑军港一事，所建地点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 1853 年 7 月 20 日从奥尔登堡大公那里夺取的领土。建筑工程于 1855 年开始。现在是著名的威廉港海军基地，得名于 1869 年港口建成投产使用之时。

22 查理大帝（768—814）是法兰克人的国王，在 800 年加冕为皇帝。他扩大了法兰克王国的领土，同时还和非基督教部落作过战。萨拉森人是指在八世纪征服比里牛斯半岛的伊斯兰民族。萨克森人是古日耳曼部落。阿瓦尔人是从亚洲来到欧洲定居在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即现代匈牙利土地上的民族。

23 勃兰登堡边疆侯国是普鲁士王国的历史核心。德意志骑士团

是教会骑士团，自十三世纪起打着替天主教传教的旗号用火与剑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实行殖民化。后来，骑士团领地归属于勃兰登堡边疆侯爵。教会牧师即地方长官。

24 “领土分立主义”指十二世纪开始的德国分裂过程，即分裂为许多很小的、多少有点独立性的区域，亦即教会的和世俗的公国、城市等的过程。格尔拉赫认为教会、天主教信仰是德意志民族历史上的联结因素和指导原则，便把教会的衰落归结为各个区域的形成的原因。领土分立主义的统治使中央集权的皇帝权力大为削弱，造成帝国衰落。作为现实的政治力量的帝国遭到决定性的打击是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在那两个世纪内，由于宗教的分歧在诸侯和皇帝之间发生了许多战争，最后消灭了皇帝权力的现实政治意义。

25 指1778—1779年以普鲁士和萨克森为一方、奥地利为另一方（当时普鲁士决心不把事态扩大到军事行动）而进行的所谓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为开始、以普鲁士伙同奥地利出面反对法国大革命为结束的那一段时期。

26 1764年4月11日俄国和普鲁士，在彼得堡签订并于1769年10月23日续订的防御条约，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在双方任何一方遭到第三国进攻时互相提供援助。人力援助可以用补助费代替（一年四十万卢布）。1768年土耳其对俄国宣战后，在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二世付给了俄国以条约所规定的补助费。

27 1787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即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侄子为恢复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姊妹的丈夫威廉五世这位总督的权力而对荷兰进行了军事干涉。

28　1790 年 7 月 27 日奥地利为一方和普鲁士、英国、荷兰、波兰为一方在赖兴巴赫城（西里西亚）签订的协定。格尔拉赫认为和约中确立了对土耳其欧洲领地的保证就是从基督教君主与土耳其帝国进行斗争的原则倒退。

29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参加了 1806 年和 1813—1815 年欧洲各国联盟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从格尔拉赫的观点来看，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就是反对革命的战争。

30　西里西亚战争是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为占有西里西亚而对奥地利女皇玛丽娅·特莱萨及其盟国于 1740—1742 年、1744—1745 年以及 1756—1763 年进行的战争。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亦即七年战争（参看第一章注释 6）以西里西亚归于普鲁士而告终。

31　指把君主制欧洲联合起来反对革命的原则，在正统主义（参看第三章注释 1）的政治学说中可见到对这一原则的阐述。

32　巴塞尔和约是法兰西共和国和普鲁士两国由于普鲁士军队被打败在 1795 年 4 月 5 日签订的。莱茵河左岸普鲁士领地划归法国。

33　指 1795 年 7 月 22 日法兰西共和国和西班牙之间在巴塞尔签订的和约。

34　欧洲各国维也纳会议在拿破仑法国失败以后于 1814 年 11 月到 1815 年 6 月召开。会议事实上的命运主宰者是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在维也纳会议上确立的反动政治制度原则，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一直统治了欧洲；在会议上建立了欧洲最反动的国家的同盟——神圣同盟，同盟的任务就是保卫这种制度。在对待德国方面，会议用德意志邦联（参看第一

章注释 8）组织加深了德国领土的和政治的分裂，把邦联法令的基本条款全部列入会议的决议案中。

35 1713 年（西班牙继位战争之后），比利时归属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直到 1792 年革命的法国的军队才使它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力求在法国西北边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便把比利时合并于荷兰。按照格尔拉赫的观点，把安斯巴赫（1806 年）和拜雷特（1810 年）两个法兰克诸侯国交付给巴伐利亚也是对正统主义原则的破坏，因为安斯巴赫和拜雷特曾一度属于勃兰登堡选帝侯，而在 1791 年 12 月，安斯巴赫·拜雷特边疆侯把这两个公国让给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1806 年，普鲁士被迫把这些侯国移交给拿破仑，他又将其交付巴伐利亚。按 1815 年维也纳会议规定，这两个侯国归巴伐利亚国王掌管。

36 扩展巴伐利亚、符腾堡（拿破仑把它们变为王国——因而有“畸形怪胎”之称）和达姆施塔特大公国的领土一事与维也纳会议决议有关。

37 德绍是安哈尔特公国主要城市，临近易北河，位于德国中心部分。格尔拉赫想要强调拿破仑第三对德意志中小邦的影响是何其深远。

38 参阅第一章注释 41 和第八章注释 19。

39 1852 年各大国伦敦备忘录确认了普鲁士国王对诺恩堡（纳沙泰尔）的权力，1848 年纳沙泰尔的革命起义曾剥夺了他的这些权力（参看第一章注释 41）。

40 指 1856 年纳沙泰尔暴动期间逮捕的保皇党人（参阅第一章注释 41）。根据 1857 年解决纳沙泰尔冲突的妥协条件，瑞士对

参加暴动的保皇党人予以大赦。

41 共济会会员——“自由的石匠”宗教哲学运动的参加者。这个运动产生于十八世纪，当时旨在反对天主教和宗教的偏执，同时提出了平等、消除等级特权等思想。后来共济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本来的性质。对于反动分子来说，“共济会会员”一语变成了“自由思想者”的同义语。

42 12 月 2 日条约——参阅第五章注释 18。

43 巴黎和约——参看第五章注释 20。

44 奥地利和英国的同盟本该导致帕麦斯顿对撒丁和意大利其他地区的政策的改变。帕麦斯顿本该拒绝为了英国的利益而利用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因为这一运动是直接反对奥地利的。

45 这里主要指瑞士曾为政治移民提供避难所这一事实。

46 是由于 1856 年巴黎和约之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有些恶化而造成的。

47 参看上文注释 44。

48 普隆—普隆是拿破仑·波拿巴堂弟约瑟夫－夏尔－波尔－拿破仑·波拿巴（1822—1891 年）的戏谑称号。

49 二十二个德意志教会公国的还俗是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签订的 1801 年吕内维尔条约所规定的。根据这个条约，莱茵河左岸让给了法国。条约第一条申明，世袭公侯可在帝国范围内得到土地以补偿他们失去的领地。为此目的，许多主教的土地都被还俗，大部分皇城的领地被收回。1802 年，俄国和法国之间达成了“还俗和奖偿德意志帝国中的一些邦国和成员的共同计划”协议。上述计划被专门为此目的于 1803 年在雷根

斯堡召集的帝国特别代表团最终拟就。普鲁士得到吉尔德斯海姆和帕德勃恩两个主教管区的领地、明斯特主教管区的部分领地和6个帝国修道院的部分领地。

50 暗指当时流行的剧本《柏林的维也纳人》。

51 拉施塔特是巴登一城市，当时为城堡。

52 虽然一般公认拿破仑第三被选上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职位（1848年12月10日）只获得七百多万选民中的五百五十万票，他却始终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七百万人的当选人”。

53 参阅上文注释49。

54 1794年，普鲁士外交大臣豪格维茨同英国签订了向普鲁士提供补助金以便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条约。但是在下一年，1795年，他又签订了不利于普鲁士的巴塞尔和约（参看上文注释32）。1805年，在拿破仑于奥斯特利茨城下战胜之前，他一直制止向拿破仑提出最后通牒。在那次战役后，普鲁士同拿破仑缔结了同盟。

55 参阅第四章注释4。

56 指1813年6月在没有给双方任何一方造成优势的吕岑和鲍岑战役之后，同法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57 引自琉坎的史诗《论内战》，I卷，128行。

58 格尔拉赫注意到，1799年雾月18日（11月9日）政变之后政权便立即集中到波拿巴手里，而不是仅在1804年宣告帝国成立之后才集中到他手里。

59 俾斯麦列举的一系列国家破坏了“正统的”继位制度或改变了统治方式。

60 “光荣革命”是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1688年第二次英国

革命的称呼。“光荣革命”把威廉·奥伦治推上了英国王位。

61 引自拜占廷皇帝尤斯蒂尼安法典（六世纪）《古代各种法典摘录》50，17，29片断。

62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

送我一杯，让我好好品尝。
但是分量不可太少，
因为要教我品尝，
我也要图个醉饱。

63 联合邦是十六世纪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尼德兰联合省的等级议会。

64 威廉三世（奥伦治的）（1650—1702年）从1672年起为尼德兰共和国总督；1688年起（参阅第八章注释60）被推上英国王位。

65 指1786年美国国会批准的普鲁士和美国友好通商条约。美国是在18世纪末由于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反抗宗主国取得胜利而建国的（美国革命，即所谓1775—1783年的独立战争）。因而有美国的“革命起源”的说法。

66 佩得罗五世国王（1837—1861年）是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和费迪南·萨克森－科堡－哥达的儿子。王位转入他母亲玛丽亚二世手中，和反对王位觊觎者唐·米盖尔的长期斗争有关。

67 1810年，由于瑞典国王没有儿子，便选拿破仑手下元帅贝尔纳多特为王位继承人，改名查理·约翰（查理十四世）。

68 1640—166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69 俾斯麦形容丹麦为“彻底革命的”，是指从1849年起在丹麦实行限制王权的宪法。

70 “把罗马法引入日耳曼世界”在这里可以理解为袭用罗马法，这是一个于十二世纪在欧洲开始的借罗马法的影响而对法律标准加以改造的过程。

71 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幼年时的摄政。摄政王是他的叔叔，以放荡不羁而出名的奥尔良的菲力普公爵。

72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年）在许多年之内一直推行夺取属于德意志各诸侯的土地的政策。路易十四对德意志领地肆无忌惮的政策特别明显地见于所谓的“合并议会”：议会的决议在路易十四看来就是夺取莱茵河邻近领地的充分依据。

73 拿破仑第三是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74 参阅上文注释10。

75 俾斯麦注意到，甚至在施瓦尔岑贝格公爵死（1852年）后，奥地利也依然坚持他那力求在德意志诸邦中确立奥地利优势的政策。

76 在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由于普鲁士要求把整个萨克森合并给它而造成普鲁士和大国的冲突。俄国支持普鲁士，但是奥地利、英国和法国的坚决反对使普鲁士政策未能实现。

77 参阅上文注释54。

78 参阅上文注释32。

79 1805年组成了欧洲国家反对拿破仑的第二次联盟（英国、奥地利、俄国、瑞典和那不勒斯王国）。普鲁士动摇不定，不能

下决心加入联盟。拿破仑对联盟取得辉煌胜利之后，普鲁士被迫于1805年12月同拿破仑结成同盟。次年，于1806年普鲁士还是向拿破仑宣了战，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城下（10月14日）军事上遭到惨败。

80 参看第一卷第九章第141页。

81 参阅第一章注释8。

82 参阅上文注释79。

83 参阅上文注释57。

84 格尔拉赫指1853—1856年东方战争期间奥地利所采取的立场。这种立场促进了西方国家同盟对俄国的胜利。

85 格尔拉赫所指的事实是：按照1856年巴黎和约（参看第五章注释20），俄国被迫让出比萨拉比亚的南部（伊兹马伊尔县），“以便更好地保证多瑙河通航自由”。巴黎和约还取消了俄国对多瑙河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保护，这种保护事实上俄国从1774年起便开始实行了。

86 参阅第一章注释41。

87 拉多维茨在1850年为普鲁士外交大臣，因为他的政策在奥尔缪茨惨遭失败（第三章注24）所以他只得辞职。

88 参阅第四章注释3。

89 参阅第一卷第八章第136页。

90 这里谈到的关于押沙龙、卢本、大卫的圣经神话，见于《创世记》（第四十九章）和《列王记》下（第十一至十八章）。

91 奥斯卡尔一世（1797—1859年）是瑞典和挪威国王，查理十四、原法国元帅贝尔纳多特（参看上文注释67）的儿子。

92 长子继承权是由家中长子完整地继承不动产的制度。这种制

度在法国曾被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取消，但又被拿破仑第三部分地恢复。长子继承权是一种巧妙地保持贵族地产、防止在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条件下这种地产被分割的手段。

93 哈布斯堡—洛林王室是1918年以前在奥地利统治的王室。在哈布斯堡王室的玛丽娅·特莱萨（1740—1780年）女皇和弗朗茨－斯蒂芬·洛林结婚后，王室改为现名。

94 约瑟夫二世是1780年至1790年间罗马—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他执行了坚决的集权政策，并为此目的把教会财产还俗。在约瑟夫二世的改革活动中解除农民的个人封建劳役也占有重要地位。

95 巴赫男爵曾参加1848年维也纳革命，甚至还领导了3月13日要求梅特涅辞职的代表团。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反动分子，在当大臣的时候，无情地镇压隶属于奥地利的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

96 引自贺拉斯《书简》，第一卷第10行第24行。

97 昂吉安公爵（1772—1804年）是法国波旁王朝亲王。1789年革命后即移居国外，成为侨民军队的指挥官。由于追究保皇党组织的乔治·卡杜达尔对拿破仑第一未遂的谋杀责任，昂吉安公爵在巴登被捕并押送巴黎，在那里被判刑并于1804年3月20日被枪毙。

98 关于诺恩堡谈判，参看上文注释39。

99 大卫赞美诗，第115页第5行；第135页第16行。

100 1857年11月，比利时天主教内阁只得让位于自由派内阁。驱逐教士是在许多比利时城市暴风雨般群众游行的影响下在

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进行的。

101　格尔拉赫在这里把霸王专制和波拿巴主义同正统主义的绝对君主制度对立起来了。

102　Autocrat——独裁君主——原为希腊语词汇 autokrate，auto——独自，kratos——权力，意思是专制制度的政权。

103　亨利五世——参看上文注释 10。

104　神圣同盟是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在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于 1815 年 9 月 26 日在巴黎签订的协议。盟员国在各自的内政和外交问题上必须遵从“神圣的宗教、正义与和平”的预定方针。盟员国以共同力量对一切革命运动的无情镇压构成了神圣同盟实际活动的基础，因而把同盟变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虽然几乎全部欧洲国家都加入了神圣同盟，但同盟的鼓动者和领导者依然是上述三个国家。神圣同盟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105　指神圣同盟参加者普鲁士承认路易·菲力普为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是由于 1830 年七月革命掌权的。

106　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改革的准备工作。

第　九　章

1　教长是伦敦圣彼得西敏寺教堂教会首领。教堂最初属于十七世纪建立的修道院，所以还保留了修道院教长的名称。

2　参看第一卷第四章和第七章第 63 页和第 100 页。

3　指由于诺恩堡（纳沙泰尔）引起的冲突，参看第一章注释 41

和第八章注释 39—40。

4 指根据 1856 年巴黎和约（参看第五章注释 20）禁止俄国在黑海保留舰队一事。

5 帕麦斯顿勋爵。

6 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

7 克里斯蒂安八世。

8 马里安温泉是奥地利领土上的疗养地。

9 舍恩布鲁恩是维也纳近郊的奥地利皇宫。

10 皮尔尼茨是萨克森国王的夏宫。

11 亚历山大二世。

12 1857 年。

13 关于柏林 1848 年三月革命参看第二章。

14 指 1850 年普鲁士宪法。这一宪法虽然是在镇压了 1848 年革命之后的反动时期颁布的，但很久以来在统治集团看来仍然是太“民主”了。这个宪法曾按照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诏命重审过。

15 采邑制是确定领主与家臣，即上级与下级封建主之间关系的各种法制规则的总体。采邑指封给家臣使用的可以带来收入的地段。采邑的继承规定有某些条件的限制。俾斯麦这里是向亲王指出，根据采邑制，他仅受到他父亲而不是兄弟承担的义务约束（大家记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威廉的哥哥）。

16 豁免责任法是指豁免某负责人因违反法律而应负的责任。这里指普鲁士议会的决议，决议规定在 1866 年对奥地利的胜利战争之后豁免俾斯麦内阁对四年“内阁冲突”（参看第十四章

注释 1）期间未经法律手续批准花费资财应负的责任。

17 参看第二卷第二十一章。

18 即事实上政权将落入伊丽莎白王后手中。

19 巴登—巴登是德国西南部的著名疗养地。

20 主权指最高权力，此处指普鲁士国王的主权。

21 参看下条注释。

22 摄政制度是一个人或几个人代替君主执政。在君主由于未成年、疾病——此处即是——及其他情况下不能亲自完成自己职责时实行摄政。普鲁士威廉亲王由于他的哥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患重病，从 1857 年开始代行执政，从 1858 年起成为王国摄政王。作为国王的代理人，他对国王负责，但作为摄政王，他则一如君主，并不对谁负责。

23 即邦议会两院。

24 即 1858 年 10 月 9 日。

25 副署即大臣在君主颁布的文书上签字证实。这里是要求作为内务大臣的威斯特华伦的签字。

26 弗洛特韦尔被任命为内务部大臣；在此之前他曾任勃兰登堡市长。

27 “新纪元”——参看第一章注释 45。

28 侍从长官是宫廷中受尊敬的一种头衔。

29 俾斯麦影射他同天主教教会及其首领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七十年代“文化斗争”时期变得特别紧张了。

30 文牍官是为解决某事务提供材料的官吏，此处指外交部。

31 乌泽多姆曾为普鲁士派驻意大利国王宫廷的公使。国王宫廷在 1865 年迁往佛罗伦萨，以前原在都灵。

32 参看第八章注释 41。

33 威廉一世于 1849 年接受了普鲁士各共济会团体总会长称号。

34 根据 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被承认为自由市，是德意志邦联的独立成员。1866 年，在奥普战争之后，合并于普鲁士。1869 年 2 月 1 日，政府向议会提交了普鲁士王国政府和法兰克福市之间的协议法案。但是在对法案的讨论结束之前，法兰克福市政府便已取得国王的同意，从国库拨给法兰克福市二百万古尔登，友善地满足法兰克福市宣布的要求。这样一来，又不得不修改法案。

35 即乌泽多姆事件，见俾斯麦上文所述。

36 劳恩堡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地区的一个公国，从 1815 年起加入丹麦。根据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一方同以丹麦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结束后于 1864 年 10 月 30 日签订的维也纳和约，丹麦国王放弃了对于劳恩堡的权力。按照 1865 年的加施泰因条约，奥地利取得了二百五十万丹麦塔勒尔而把自己占有的那部分劳恩堡土地让给了普鲁士。随后，威廉一世把劳恩堡的土地封给了俾斯麦。在 1890 年俾斯麦离开宰相职位时，得到了劳恩堡公爵的终身称号。

37 拉·马尔摩拉是意大利政治家和军事家，在 1866 年同奥地利进行战争期间指挥过意大利军队。他的军队在库斯托查覆没之后，被迫退休。1868 年他出版了一部招致满城风雨的书，激烈地谴责了战争时期的普鲁士政策。这里涉及的正是这一“情节”。

38 施韦林伯爵的祖先，普鲁士的陆军元帅库尔特—克里斯托夫·施韦林在七年战争期间于 1757 年 5 月 6 日在布拉格城下

手持旗帜阵亡。

39 颅相学是一种伪科学理论，研究头盖骨外形与其主人智力和心理状态之间的联系。颅相学家即从事此种研究的人。

40 市长是大城市的城市首脑。

第十章

1 在签订奥尔缪茨协定（参看第三章注释 24）时，奥地利主要由于沙皇俄国的支持才得到了普鲁士的让步。

2 保守的三国同盟指神圣同盟的三大强国（参看第八章注释 104）——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

3 尼古拉一世的继承人为亚历山大二世。虽然亚历山大二世因玩弄自由主义而使资产阶级传说他温良和善、人道博爱，但他基本上继承了他父亲的政治路线，在所有最重要的问题上他们父子之间是全然一致的。

4 在反动的政论界有过一种见解，认为在 1848 年 3 月 18—19 日柏林革命时期，胜利是在国王军队一方的，由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国王下令撤军而毁灭了他们的成果。这种观点具有倾向性，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撤退军队是迫不得已的措施。

5 康斯坦丁·弗拉基米罗维奇·切夫金（1802—1875 年）在 1853—1862 年间曾主管交通事务。

6 指 1813—1814 年反拿破仑法国的战役。

7 原文用采邑一语（参看第九章注释 15），在无男性继承人时，可按女性传给后代，此处用于转义。

8 参看第四章。

9 参看第一卷第四章第 58 页。

10 巴黎近郊区，当时为贵族居住区之一。

11 参看朱文纳尔著《讽刺诗》I，168．“Inde irae et lacrimae”（“愤怒和泪水由此而来”）；泰仑斯著《安德里安卡》，I J：“Hinc illae irae”（“愤怒由此而来”）。

12 1866 年之后，亦即 1866 年奥普战争之后。

13 根据 1856 年巴黎和平条约（参看第五章注释 20），禁止俄国在黑海保持海军，并宣布黑海中立。俄国曾不止一次地试图修改这个条约有关的条文。1870 年 10 月 31 日，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公爵利用由于当时发生的普法战争而造成的时局，向参加巴黎会议的所有参加国通电。电报说，俄国不再受巴黎条约中限制它在黑海上的权利的那些条文的约束。

14 夏洛特在俄国得名亚历山大·费多罗芙娜，是尼古拉一世的遗孀。

15 席普卡山口是通过巴尔干山脉的山口之一。在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期间开始出名。俄国军队英勇地保卫了这个战略要地。在反击敌人进攻时，许多士兵在凛冽严冬的深山中牺牲。

16 意大利战争（1859 年奥地利意大利战争）发生在奥地利和撒丁王国之间；曾以撒丁王国为中心，意大利各地区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战争从 1859 年 4 月 29 日进行到 7 月 11 日；法国积极参战，站在意大利一边。战争结果是法国获得萨伏依和尼斯，而意大利伦巴第地区则摆脱了奥地利的统治。

17 奥地利法国战争，参看上条注释。

18　参看俾斯麦1859年5月20日致冯·施莱尼茨大臣的信："陛下对于他那些在德国的尊贵亲戚涉及俄国政策的许多劝告和他们提出劝告的语调使他恼怒。他们总是说：'俄国应该做到'，'皇帝应该看到'，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见解，随即而来的便是令人不快的二者择一。但是特别令人不愉快的是那些寄给皇族成员的信件，例如，叶莲娜大公主兄弟们给她的信和从拿骚致奥尔登堡公主的信；信都是邮寄，为的是被人看到，而这些信的内容有对皇帝的极粗鲁的话语。"

19　奥地利帝国的邮政一直世袭垄断在图尔恩和塔克西斯两公爵家族手中。他们的祖先曾于1512年组织了最初的定期邮务，从十六世纪末起经营国家邮务的特权便保留给这个家族。1867年，塔克西斯家族的邮政系统已遍及十七个德意志邦，但他们拒绝从自己的垄断资本中拨出三百万塔勒尔捐献给国家。

20　在库尔姆（捷克一村庄）附近，欧洲国家联军于1813年8月29—30日击溃拿破仑法国的军队，其指挥官万达姆元帅被俘。

21　莫斯科东正教总主教图书馆。该馆的创办基础大概就是从君士坦丁堡带来希腊文和斯拉夫文字手稿的总主教的藏书。后来图书馆转归莫斯科主教所有。十六世纪在非拉列特总主教时期，图书馆内存有五百多部希腊文和斯拉夫文字手抄本书籍。

22　原文为法文。

23　原文为法文。

24　俾斯麦于1860年3月15日来到柏林，5月23日离开。

第十一章

1 参看第三章注释 24。

2 参看第十章注释 16。

3 关于普鲁士在 1853—1856 年东方战争期间的立场，参看第五章注释 11 和 13。

4 关于普鲁士在 1863 年波兰起义期间的立场，参看第十五章及其注释。

5 参看上文第 154 页及下页。

6 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遗嘱”的话，不应该从字面理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从 1813 年到他皇位终结时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可归结为同奥地利采取完全一致行动的原则；这一原则既适用于德意志事务（共同维护反动势力），也适用于欧洲政策（神圣同盟）。这里谈的“遗嘱”，正是这个意思。

7 宣言——原为西班牙语，通常指南美洲国家经常发生的政变；后来该词带有几分讽刺的意味。“但泽宣言”指王储弗里德里希 1863 年 6 月在但泽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抗议他父亲威廉一世国王采取镇压反对派报刊的措施。关于这一点，详见本书第十六章“但泽事件”。

8 这里和以下所谈的都是 1861 年国王和内阁之间由于宣誓问题引起的冲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 1861 年 1 月 2 日去世。他在 1840 年登基时，曾举行忠诚宣誓典礼。新国王威廉一世希望保持臣民忠于国王的古老宣誓仪式。但是当时掌权的“新纪元”内阁中大多数人都坚决反对这一要求，他们认

为，1850 年通过的宪法已经排除了举行类似宣誓仪式的可能性。站在国王一面的只有罗昂。国王不想退让，但因为怕损伤自己威望，几经踌躇之后，才托付罗昂同俾斯麦会谈，请他加入内阁，指望着他的支持。但是早在俾斯麦到达柏林之前，国王事实上就已经退让了：7 月 3 日，他发表了公告，宣布以盛大加冕仪式代替宣誓。

9 因为和特维斯登决斗。特维斯登在《什么还能挽救我们》一文中称他为在不幸处境下的不幸的人。

10 这句话没有完，在原文中也不很明确；看来，罗昂的意思是说，他的阁僚们都和他（罗昂）一样，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谈论宣誓仪式问题。

11 莱茵费尔德是俾斯麦岳父普特卡默尔的庄园。

12 施韦林伯爵为“新纪元”内阁的内务部大臣。

13 这里和下文俾斯麦所称之为维茨堡会议与会者的乃是德意志各中小邦，它们派代表参加了 1859 年 11 月 24—27 日在维茨堡市召开的旨在反对普鲁士的会议。

14 旺代是法国西南部的一个省，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反革命保皇党的叛乱中心，俾斯麦意思是说他准备用任何办法直到手持武器参加战斗来保卫君主权力。

15 1861 年邦议会决定根据众议院议员甘纳的提议，批准政府要求的对军队的拨款，但只作为“额外”拨款。这样一来，邦议会便向“宪法冲突”迈出了严重的一步，而到下一年，冲突便激烈展开了。

16 叶列娜·巴甫洛夫娜大公妃是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的遗孀，符腾堡的保罗亲王的女儿。

17 施莱尼茨获得了宫廷大臣职位。

18 引自诗人毕格尔歌谣《雷诺位》。

19 参看第七章注释 6。

20 参看上文注释 8。

21 冯·布兰肯堡。

22 1862 年 5 月召开了具有反对派情绪的新的议会。同年 9 月底俾斯麦被任命为大臣，10 月 8 日被任命为首相。

23 参看第一卷第九章第 153—154 页。

24 俾斯麦于 5 月 8 日离开彼得堡，5 月 10 日回到柏林。

25 巴黎杜伊勒里宫是拿破仑第三的宫殿。

26 伯恩施托尔夫伯爵从 1854 年起为驻伦敦公使；1861 年 10 月至 1862 年 10 月间同时又兼任普鲁士外交大臣；1862 年 10 月又赴伦敦任职。

27 请愿书——此处指议会代表给国王的庄严呈辞；一般在议会开始时接纳。

28 参看上文注释 17 和 26。

29 这天在巴贝尔斯贝格宫举行了俾斯麦赴巴黎前的最后一次接见。

30 指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

31 俾斯麦想要说明的是，奥地利将要迎合拿破仑第三的利益把威尼斯（在 1866 年以前由它控制）归还给意大利或者把莱茵河左岸属于德意志各邦的全部土地割给法国。

32 最后一句话（由“它可能会牺牲……”开始）已经不是指俾斯麦在法兰克福的时期了，因为这句话与后来很久发生的事件（1862年）有联系。这句话之前应该补充“我现在（1862

年）不得不认为”。

33 在普鲁士议会中，贵族院（参看第三章注释 29）由世袭的和国王任命的终生的成员组成。因此，它的构成成分是连续的。俾斯麦说贵族院的“连续性”，指的正是这一层意思。

34 暗指邦议会议员应该付款给议会开会期间代理他的人士（如果他还在职）；议会拖延的时间越长，这种花费便越大。

35 多贝兰是梅克林堡·施威林公国的疗养地。

36 俾斯麦从彼得堡起程的日期。

37 指多年内一直酝酿的普鲁士省体制的改革。根据 1872 年刚通过的法令，在每个县里都应该设县议会，县议会应以较高的条件选举产生。

38 俾斯麦最终被任命为首相兼外交大臣是在 10 月 8 日。

第十二章

1 1786 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逝世。在他统治的最后一年，即 1785 年，他成功地建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诸侯同盟，旨在反对奥地利要确立它在德意志的霸权的企图。在俾斯麦看来，由于弗里德里希的逝世，普鲁士改革中这一富有成果的方针也随之消失；最为突出的是关于波兰国土的问题。由于普鲁士的政策错误，它后来遭到了 1806 年的打击并于 1807 年签订了代价沉重的提尔西特和约（参看第八章注释 12）。

2 依据俾斯麦的观点，拿破仑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人。因此，他把同拿破仑的掠夺进行斗争时开始形成全德意志的民族自觉这一事实，同欧洲各国反对法国革命的斗争直

接联系了起来。

3 根据普鲁士和法国 1795 年签订的巴塞尔和约的条款规定，随同普鲁士退出对法战争并从帝国军队中撤回了本国军队（奥地利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北德意志和中德意志各邦，应该用一条“分界线”同继续作战的帝国脱离，并求得普鲁士的保护。

4 俾斯麦所说的获得德意志地区，指的是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除并吞波兰土地之外，还把西部德意志和西南部德意志许多地区合并于普鲁士。

5 1792 年，普鲁士伙同奥地利开始了反对革命的法国的战争。

6 图古特和勒尔巴赫（参看第三卷人名索引）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奥地利对外政策中起过重要作用。

7 根据所谓 1795 年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协议规定克拉科夫为奥地利所有，一直到 1809 年。

8 参看第八章注释 28。

9 普福尔塔，土耳其苏丹政府名称。

10 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 年）。参看第一章注释 5。

11 皮尔尼茨（萨克森国王夏宫）谈判于 1791 年 8 月 25—27 日举行，一方为德意志皇帝列奥波特二世，一方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同时有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兄弟达尔杜亚伯爵为首的法国侨民代表参加。皮尔尼茨会晤是奥普接近的尝试，这种尝试是在赖兴巴赫和约（参看第八章注释 28）之后，酝酿第二次瓜分波兰和面对法国革命的条件下采取的步骤。皮尔尼茨谈判结果通过的宣言是一项维护前不久由于试图逃离革命的法国而在发棱被拘捕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文件；宣言酝酿了对于法国的武装入侵。

12　巴塞尔和约——参看第八章注释 32。

13　参看第八章注释 12。

14　但泽和托伦均为要塞，位于把普鲁士邦国历史上的核心部分——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与普鲁士公国（东普鲁士）隔开的分界地带。在获得这些于后来构成西普鲁士省的地区以前，普鲁士的基本领土是互相分离的。但泽和托伦于 1793 年根据所谓第二次瓜分波兰协议合并于普鲁士。

15　关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参看第八章注释 93。在查理五世（1519—1555 年）在位时，帝国实力达到最高峰。

16　豪格维茨伯爵，外交大臣，任职至耶拿战役（这一战役发生在 1806 年 10 月 14 日）之后，他同内阁顾问卢姆巴德一起在普鲁士被认为是 1806 年灾难的罪人。冯·施泰因男爵在他的 1806 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形容他是一个“没有性格和神经衰弱”的人。为了替他和他在拿破仑于奥斯特利茨取得胜利后的行动说句公道话，应该指出，虽然在舆论面前他是向拿破仑传递最后通牒的人，但他是接受了国王的秘密指示的，即：无论如何要保持和平。

17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以俄土两国于 1829 年 9 月 14 日在亚德里亚诺波尔签订和约而告终。1829 年夏天，俄国军队在季比奇的指挥下因为一次大胆而无谋的部署而陷入相当危险的境地。尼古拉一世求助于自己的岳父普鲁士国王。国王便向苏丹派遣了特使米夫林男爵；在普鲁士全权代表的协助下，加速签订了条件对俄国特别有利的和约。

18　普鲁士像奥地利一样，在 1831 年波兰起义期间保证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援助波兰人的武装力量过境。普鲁士甚至准备给俄

国以直接的军事协助。

19 指 1828—1829 年俄国越过普鲁士同法国进行的旨在缔结同盟的谈判。

20 霍亨索伦王室和罗曼诺夫王室早从十八世纪起就以互相联姻的方式亲密联系起来。例如，在十九世纪，尼古拉一世皇帝娶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女儿亚历山大·费多罗芙娜；而威廉一世的夫人奥古斯塔王后，则是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大公夫人的女儿。

21 在 1814—1815 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俄国曾支持普鲁士对领土的要求：有关的诺言写入了 1813 年 2 月 26 日的布勒斯劳协定之中。

22 沙皇俄国在 1849 年帮助奥地利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俾斯麦说奥地利忘恩负义是指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所持的反俄立场。当时人认为“我们就是要忘恩负义，使欧洲大吃一惊”这句话是奥地利首相和外交大臣施瓦尔岑贝格公爵说的，是他指俄国而说的。参看第一卷第十七章第 255 页。

23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于 1848 年十八岁时登上奥地利皇位。

24 参看第三章注释 24。

25 参看第五章注释 9 和 11。

26 参看第一卷第十五章第 227 页。详见第二卷第二十一章。

27 由于 1830 年 7 月 27—30 日的巴黎革命，1814—1815 年复辟的波旁王朝被推翻，以路易·菲力普为代表的奥尔良王朝复辟。革命后最初的几个月，神圣同盟各大国认定七月革命破坏了它们所维护的体制，因而在它们面前便出现了积极干预法国事务的问题，因为它们惧怕法国向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转

化。然而，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妨碍了反法同盟的建立。

28 俾斯麦在这里把波兰王国称为华沙王国，实际上是指以华沙为首都的隶属于俄国的波兰领土。

29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为保罗一世皇帝的长子，1816—1831 年为驻华沙俄国军队司令。

30 1831 年初，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为革命浪潮所席卷。虽然革命浪潮发生于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之外，但还是被奥地利军队镇压下去了（1831 年 3 月）。当时的借口是被浪潮席卷的帕尔马和莫德纳二公国，根据维也纳会议决议，以后应该归属奥地利。

31 在法国 1830 年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同年秋天在德国（不伦瑞克、黑森—卡塞尔及其他邦）发生了一系列革命运动；在比利时，于 1830 年 8 月开始了反对荷兰统治的起义（比利时于 1815 年合并于荷兰）。法国同比利时的分离有直接利益关系，而其他大国此时此刻则没有可能援助荷兰。只有普鲁士宣布自己有所准备；但是法国保卫比利时的威胁迫使普鲁士放弃了计划。在德国，革命运动在 1832—1833 年之前便被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镇压下去了。

32 普鲁士虽然没有参加 1853—1856 年东方战争，却争得参加 1856 年大国巴黎会议（参看第五章注释 20）的权利。但是普鲁士没有能够成为会议的全权代表。它的代表曼托伊费尔不是立即、而是在会议开幕之后才被批准参加会议工作的。当时大国已经就全部基本问题达成了协议。

33 指在 1871 年 3 月 13 日签订关于修订 1856 年巴黎条约某些条款的条约之前进行的谈判。这个条约取消了特别限制俄国利

益的第13条，该条禁止俄国在黑海拥有舰队。参看第十章注释13。

34 参看第一卷第八章第126页。

35 在1856年巴黎会议上，曾在1853—1856年间的东方战争中起过主要作用的法国对俄国表示了明显友善的态度。这是因为拿破仑第三想在由于意大利问题而日益迫近的法奥冲突中得到俄国的支持。

36 “新方针”指俾斯麦退职（1890年）之后威廉二世皇帝的政策。

37 参看第一章注释39。

38 参看第一卷第三章第48页。

39 参看第一卷第四、七、九章，第63、100、139—140页。

40 参看第五章注释9。

41 参看第十章注释16。

42 1860年7月26日在特普里茨举行了奥地利皇帝同普鲁士摄政王的会晤。谈判的内容是意大利问题。俾斯麦这里所说的条约的内容没有公布于众。看来，普鲁士承担了在任何一个非意大利大国进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时援助奥地利的义务。

43 参看第五章注释5。

44 图古特参加了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奥地利对外政策的制定工作。这个时期即所谓“瓜分波兰”的时期，因为当时在关于波兰各地区的命运问题上，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利益是互相抵触的。

45 参看第一卷第十一章第193页。

46 在俾斯麦看来，丹麦问题是奥普争取德国统一斗争史上的转折点。如果说在这一问题发展的第一阶段（1864 年对丹麦的战争）中普鲁士曾和奥地利共同行动，那么两年之后，过去的同盟者便手持武器互相对抗起来了；丹麦在战争中失去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省的问题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47 波林尼雅克公爵是法国国王查理十世于 1829 年授权的政府首脑。他的反动措施招致了 1830 年 7 月的革命爆发。查理十世被推翻，而波林尼雅克则被判处终生监禁和剥夺公民权终生。斯特拉福伯爵为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宠臣，查理一世专制统治制度的鼓吹者；于 1641 年 5 月 12 日被革命的“长期国会”处决。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推翻并于 1793 年 1 月 21 日根据革命的国民议会的决议被处决。

48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和起义的臣民长期斗争之后，于 1649 年 1 月 30 日被处死。

49 1878 年曾对威廉一世皇帝进行过两次未遂谋刺：一次在 5 月 11 日，凶手为帮工赫德尔，一次在 6 月 2 日，凶手为诺比林医生。由于第二次谋刺，威廉受伤。俾斯麦曾利用这两次谋刺事件来迫害社会民主党，虽然该党与此没有任何关系。

50 “为了国家的利益去纺羊毛”，亦即受监禁（俾斯麦暗指犯人所干的工作）。

51 克尼普霍夫是俾斯麦家族的庄园。

第十三章

1 德意志邦联议会的主席职位属于奥地利。

2 参看第一章注释 11。

3 参看第三章注释 24。

4 参看第三章注释 33。

5 “戈尔迪之结”指复杂纷乱的事态。根据传说，弗里基（小亚细亚）国王戈尔迪向众神祭了一辆大马车，辕杆上扎了一个特别复杂的结子。谁能够解开这个结子，谁就应该统治世界。古代伟大的统帅亚历山大·马其顿（公元前四世纪）来到弗里基之后，干脆利落地用剑劈开了这个结子。

6 参看第一卷第十二章第 206 页。

7 俾斯麦指的是 1813—1814 年普鲁士反抗法国统治的战争。参看第一章注释 11。

8 关于 1807 年的提尔西特和约，参看第八章注释 12。

9 俾斯麦在这里影射普鲁士在维也纳会议上要把萨克森王国归并为自己领地的失败尝试，萨克森王国和拿破仑结盟的时间比其他德意志邦更长。在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所有大国中，只有俄国支持普鲁士的这种奢望。

10 士瓦本人、萨克森人、图林根人——古代日耳曼部落，历史上一些德意志地区即依之为名（士瓦本，萨克森，图林根）。

11 巴尤瓦尔人是古代日耳曼人部落，其名称如今见于“巴伐利亚”一词。阿勒曼人，即士瓦本人。法兰克人是古代日耳曼部落；它的西部一支定居在法国北部领土（该国名称由此而来），东部一支定居在现代德国领土上（德国中部历史地区名称“法兰科尼亚”即由此而来）。奥格斯堡为德国南部一城市，在巴伐利亚。普法尔茨为德国西南部一历史地区。美因河为莱茵河支流。

12　汉萨同盟指十四——十七世纪时北欧一些商业城市的同盟。加入汉萨同盟的达90个城市。同盟在英国、法国、尼德兰、俄国、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各国设有办事处。汉萨的内部组织极为松弛。俾斯麦在这里指的正是这一特征。

13　中世纪罗马德意志帝国的帝国乡村指直接隶属于皇帝、不受任何诸侯政权管辖的村庄。帝国乡村是中世纪德国领土异常分散的明显表现之一。它享有加入帝国的各独立邦国所享有的许多权利，一直存在到十九世纪初，最后的一批帝国乡村迟至1803年才分别归并于各德意志邦。

14　波美拉尼亚、汉诺威、霍尔施坦、西里西亚是在不同时期并入普鲁士的省份，原来是作为程度不等的独立邦存在的。亚琛和科尼斯堡两城市，前者位于普鲁士领地最西端，后者位于其最东端。

15　维特尔斯巴赫是中世纪的一个公爵家族。从十二世纪到1918年，巴伐利亚便属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系统的各个分支。

16　在中世纪，霍尔施坦属于戈托尔普公爵家族系统各个分支。

17　易北河公国指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它们位于易北河右岸。

18　在1688年8—9月间贝尔格莱德被围期间，边疆侯路德维希正在波斯尼亚。

19　关于莱茵联邦参看第四章注释11。从俾斯麦的观点来看，在拿破仑建立的莱茵联邦内，巴登领土的迅速扩展是巴登统治者背叛德意志民族政策并与侵略者拿破仑接近的结果。

20　巴登的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大公遵从拿破仑的意愿于1806年娶了他的养女斯泰芳尼亚·鲍哈奈。这一联姻所生

的几个儿子都早年夭折；因此，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死后，巴登王位便传给了霍赫贝格伯爵家族支系。有谣传指责他们杀死了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的儿子们。1828年在纽伦堡出现了一个叫卡斯帕尔·豪泽尔的人，自称是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和斯泰芳尼亚·鲍哈奈1812年9月29日生的儿子。在俾斯麦看来，这一切都必然使巴登人对他们的王朝的忠诚减弱。

21 1831年和1832年初，巴登政府在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的自由主义改革。但是1832年在邦联议会的直接压力下，这些改革在国内，也正如同在所有德意志邦国之内一样，全被取消了，反动派则大喜若狂。

22 俾斯麦指巴登大公列奥波特在1849年5月巴登革命起义期间随同宫中全体成员和大臣的出逃（参看第三章注释3）。

23 在1866年奥普战争中，巴登大公国站在奥地利一方。

24 雅可布党人是拥护恢复被1688年“光荣革命”所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王位的一些人。雅可布党人的名称来自1685年至1688年在位的国王雅可布二世的名字。雅可布党人在1715年和1745—1746年的起义以失败告终。俾斯麦所说的“情感”，指对王朝的忠心。

25 韦尔芬是中世纪德意志公爵家族，十七世纪末成为汉诺威选帝侯家族（参看第一章注释5）。在汉诺威合并于普鲁士之后（由于1866年奥普战争）要求恢复汉诺威独立的一个党得名“韦尔芬”。

26 不伦瑞克选帝侯家族即汉诺威选帝侯家族（参看上条注释）。

27 1176年5月29日在楞雅诺（意大利北部）战役中，以战争办

法反对过伦巴底城市同盟的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皇帝惨遭失败。韦尔芬家族的狮子亨利为皇帝的最强大的藩臣，在战前却拒绝帮助他，皇帝失败的原因之一便在于此。

28 参看第二卷第二十章及其注释。

29 在尼科尔斯堡时（1866 年），王储是威廉一世的儿子，未来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

30 在中世纪，罗马德意志帝国分裂为许多所谓的领地——即形形色色的邦国形态，一般都极其窄小，却各在其境界之内都充分享有最高权力。

31 霍亨施陶芬是中世纪德意志居统治地位的家族；在十二至十三世纪曾占有罗马德意志帝国皇位。

32 帝国骑士是中世纪罗马德意志帝国中的中、小骑士，独立于帝国诸侯，与帝国保持直接的臣属关系。

33 帝国城市是中世纪德国的城市，直接依附于帝国，在帝国议会中设有代表。

34 参看上文注释 13。

35 影射汉诺威王朝，王朝的几位国王同时占有大不列颠和汉诺威的王位。迟至 1837 年，这种联合形式才结束，登上汉诺威王位的国王已不像他的前任那样住在伦敦，而只住在汉诺威。

36 韦尔芬王朝占有汉诺威王国王位至 1866 年；哈布斯堡王朝占有奥地利王位至 1918 年；霍亨索伦王朝占有普鲁士王国王位（从1871 年起还有德意志帝国王位）至 1918 年。在奥普战争中汉诺威站在奥地利一方反对普鲁士。

37 在奥普战争中，汉诺威、黑森和拿骚站在奥地利一方。

38 北德意志联邦是1866年奥普战争之后以普鲁士为首由二十二个德意志邦组成的联邦国。1867年在帝国立宪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宪法，当德国在1871年完成统一而北德意志联邦解散后，该宪法稍经修改便在整个德国普遍实施。参看第二卷第二十一章。

第十四章

1 这里和下面谈到了1862—1866年普鲁士的所谓“宪法冲突”。冲突的实质可概括地叙述如下：1859年的动员暴露出普鲁士军队人员装备不足之后，政府便决心从根本上改组军队；这就涉及部队名额的扩大、服役期的延长以及后备兵体制的改变。政府呼吁议会批准为此目的所需的拨款。但是下议院由于惧怕政府力量过分强大，而只同意一年一度的临时拨款。次年，1861年，批准拨款一事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因为1861年的选举使自由主义反对派获得了多数。于是议会被解散，但是新的选举（1862年）却给反对派带来完全的胜利。斯塔文哈根、济贝尔和特韦斯顿的妥协提议被否决了（参看本章注释10）。国王曾考虑过退位，但仍然决定召请俾斯麦执政(参看上文第十一章)。俾斯麦通过上议院提出预算，在四年之内无视下议院的反对派。俾斯麦外交政策的突出成就使他的敌人阵营分崩离析：从进步党中分离出来的民族自由党分子支持了政府。1866年，“宪法冲突”以通过豁免责任法（参看第九章注释16），亦即反对派的完全让步而告终。

2 省长——参看第一章注释25。

3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曾为共济会宗教和哲学组织成员及全普鲁士共济会分会（地方组织）首领。

4 参看第一章注释45。

5 参看第七章注释6。

6 参看第二卷第二十五章。

7 1865年8月14—20日在加施泰因，普鲁士和奥地利曾就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问题举行过谈判（参看第二卷第十九章及其注释）。

8 参看第二卷第二十一章。

9 1850年宪法第99条，参看第七章注释32。

10 1862年9月17日曾将下议员斯塔文哈根、冯·济贝尔和特韦斯顿的提案提交讨论，根据这一提案，赞同1862年的预算（包括用于改组军队的款数）扣除二十二万三千塔勒尔，而军事问题的最终解决则推到议会下次会议。如果政府接受在下一年缩短服役期为二年的建议，那么大多数议员是准备同意这种临时性延期的。9月17日，罗昂以间接的方式作出了否定的答复；然而，9月18日当有人要求他作出明确的回答时，他不得已只好直截了当拒绝同意，因为如果同意，就可能对政府有所束缚。由此，妥协提案被否决。

第十五章

1 俾斯麦所谓的意大利的变革是指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1860年5月—9月对意大利南部的出征（“千人团”远征）。在群众性农民运动的支持下，加里波第把西西里岛从那不勒斯

国王政权下解放出来，然后又转赴大陆，推翻统治整个那不勒斯王国全境的波旁王朝政权。同年，加里波第解放的地区合并于撒丁王国，该王国取名意大利王国。在意大利统一为独立国家的道路上，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2 指1863年波兰起义以前的事件。1830年革命、1831年格罗霍沃战役、科希秋什科逝世等几个事件的周年纪念日都被利用来组织政治示威游行。1857年建立的农业协会，是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波兰贵族的核心；由于1861年春天该协会遭到封闭，在华沙曾组织了示威游行。

3 任华沙总督的俄国将军盖尔斯滕茨韦格是对波兰民族运动采取镇压手段的鼓吹者。他和拉姆贝特伯爵进行美国式决斗，按照规则，抽签抽输者是没命的，他抽输后便自杀而死。

4 维拉·查苏利奇（1849—1919年）是俄国女革命家，1878年初对彼得堡市长特烈波夫进行谋刺未遂。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有陪审员的审判法庭于1878年3月31日宣判她无罪。俾斯麦说得不准确，应为4月12日。

5 事实不确。波兰起义开始于1863年1月22日（旧历10日）。

6 参看第十二章注释19。俾斯麦所说的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

7 维斯拉河上的三角要塞是指三要塞体系：即华沙卫戍区的华沙，新格奥尔基耶夫斯克（莫德林）和泽格尔热。

8 1849年，匈牙利革命被俄国军队镇压下去。

9 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俄国采取了对普鲁士友好的态度。详见第二卷。

10 “天主教帝国”是指信奉天主教为国教的奥地利，大部分波兰人也信奉天主教。

11　1846 年，在奥地利所占领的波兰土地上爆发了由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贵族组织的起义。

12　参看第一卷第十二章第 200 页和第二卷第二十一章。

13　参看第一卷第十七章。

14　指皇帝拿破仑第三。

15　暗指法国皇后欧仁尼。

16　法兰克福君王会议（参看第十七章），由于普鲁士国王拒绝参加而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俾斯麦针对这种情况，说大会整个计划“笨拙”。

17　指康斯坦丁大公。

18　维洛波尔斯基是波兰政治家、贵族、大地主。1861—1863 年在俄国于波兰所设的行政机构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他的纲领归结为通过和平途径、依靠同俄国沙皇制度的充分协调而实现波兰的温和的自治。由于在波兰社会中没有得到任何群众性的支持（追随他的只有一部分大地主和工厂主），维洛波尔斯基便走上镇压民族运动活动家的道路。根据他的建议进行的新兵招募办法本应用于一切具有革命情绪的城市的青年，却变成了波兰 1863 年一月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19　亚历山大一世于 1815 年颁布的波兰王国宪法，在 1830—1831 年起义之后又被尼古拉一世取消。

20　1863 年 2 月 8 日波兰起义期间俄国和普鲁士之间签订了所谓的阿尔文斯累本协定。俄国方面签字人为哥尔查科夫，普鲁士方面为阿尔文斯累本将军（协定名称由此而来）。协定规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共同镇压波兰运动。普鲁士应在东部边界集结军队，军队有权在必要时穿过俄国边界；俄国军队也有同

样的权利追击起义队伍，等等。

21 参看俾斯麦1863年3月9日致伯恩施托尔夫伯爵书信（载《俾斯麦年鉴》第6卷第172页及下页）："在俄国，以哥尔查科夫和维洛波尔斯基为首的亲波兰的党想以各种变种形式在华沙建立一个多少带点独立性的波兰人的波兰，这个党同时既是一个法国的党，也是一个制定了种种东方计划的沽名钓誉的俄国的党。与他们对立的党我则称之为保守党（但绝不是更接近于前者的老俄罗斯党）。在心灵深处，皇帝、将军、亲德的政治家们，都属于这个党；他们不相信法国，看不出和波兰的民族要求达成和睦协议的可能性。显而易见，第一种方针，即哥尔查科夫的方针，对普鲁士来说是更为可疑的，因为我们不愿意同一个俄法联盟打交道。我们通过签订为哥尔查科夫所强烈反对的协定，按照皇帝规定的命令，就我们所关心的，我们使帝国内阁中反波、反法的党占了上风。以前动摇不定的方针，现在趋向于坚决地镇压起义。如果不是对于英国的干涉而产生的厌烦暂时把向起义行动原则的让步挤到次要地位，那么对这种让步的意向就会很快地再次出现。在伦敦，人们不可能弄错：为了波兰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有成效的话）仅仅会加强法国在大陆上的地位。波兰的独立同维斯拉河上强大的法国军队相比，意义同样重要。在波兰给俄国造成的任何困境，都会迫使俄国去同法国达成谅解。后者现在是而且继续是哥尔查科夫的目的；问题仅仅在于，他是否能够把皇帝吸引到他这一方去。每逢协定给我们带来困恼时，哥尔查科夫都要高兴得手舞足蹈；协定在事实上的撤销，对他来说是在俄国政策方面的胜利，是对

俄国的反法政治家们的胜利。”（德文本注）

22 叛乱者即起义者。

23 梅斯洛维策是波兰一小镇，在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接壤处。

第十六章

1 在德国有时将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二省称为“普鲁士省”。但泽市位于西普鲁士。

2 1863年6月1日，在“宪法冲突”最激烈时颁布了有关报刊的敕令，旨在对付反对派舆论。根据敕令，只要有两次警告，就可以取缔不利于政府的报刊。

3 “殿下”是对王储的称呼，“陛下”是对国王的称呼。

4 菲利浦逊：《弗里德里希皇帝》，第112页（Philippson，Kaiser Fried-rich）：“我以为法令是非法的，对我王室和国家前途甚为危险。我拒绝参与任何这类措施，并请您让内阁知道我的抗议。”

5 同上书第114页，菲利浦逊转述了它的内容。首先，国王竭力反驳王储引证的关于出版法令是非法的论证。然后他就指斥他的但泽讲话：如果报纸刊载的讲话是歪曲的，那么王储应该当众予以更正；如果刊载无误，那么他就应当宣布收回自己的话。“我要求你承担起再也不要发表一次类似这种声明的责任。如果再发生此类事件，就要召回柏林，在柏林将作出决定：你是否还能保持你现在的指挥岗位。”

6 同上书第115页：他请求在他行动有错时原谅他。“但是我的

话并不是没有经过思考的。我早已对我的良心和地位有所负债，我所怀有的信念的符合真实，我日益明确地感觉到了。只是出于也许能避免同你发生冲突的希望，我才遏制了我内心的声音。但是现在内阁完全无视我而作出了危害我和我的孩子们前途的决议。我将要以你维护你的信仰那样的勇气来维护我的信仰。因此，我一个字也不能收回，但我将保持沉默。此外，如果你有令，我将把我在军队和内阁内的职务奉还膝下，并请求指定我该去的地方，或者允许我选择一个我能够远离政治的地方。”

7 1730 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派遣他的儿子王储、未来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前赴屈斯特林要塞。

8 据圣经所述（撒姆耳记下，第十五章第二至六节），大卫王的儿子，爱好虚荣的押沙龙把自己装扮成为昏君大卫王治下的以色列人的保护人，以收买人心。

9 参看第一卷第十六章第 235—236 页。

10 《泰晤士报》是伦敦最老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创刊于 1788 年。

11 指格夫肯。

12 在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期间。

13 俾斯麦指议会制度。

14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15 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当政的斯图亚特王朝代表之一查理一世被处死（1649 年 1 月 30 日），另一个代表詹姆士二世则被推翻（1688 年）。

16 参看第一卷第十二章第 205—206 页。

17　进步党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1年创立于普鲁士。其基本要求为：普遍选举权，责任内阁，每年确定军队限额。1866年该党分裂；它的一部分取名为民族自由党，支持俾斯麦的对外政策；另一部分仍为俾斯麦的反对派，直至德意志帝国统一以后。

18　在谈到的席勒戏剧《唐·卡洛斯》的这一场中，西班牙王位继位人唐·卡洛斯和西班牙国王驻尼德兰总督阿尔巴公爵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以决斗告终。在席勒看来，唐·卡洛斯是不可能同他父亲的血腥统治方法、同他父亲及其心腹阿尔巴公爵惩罚不驯服的臣民时所使用的那些残酷手段妥协的。

19　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由于1830年7月革命而加冕。在革命前的年代，他就明显地向反对派靠拢并以此来为自己得到1830年的加冕打下基础。俾斯麦这里指的正是这一点。

第十七章

1　1863年8月17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德意志各邦君主大会。会议是由奥地利发起的，奥地利指望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达到改革德意志邦联以利于自己的目的，同时对于向邦联议会呼吁有效与否并不寄予希望。然而，这一设想由于普鲁士国王拒绝出席大会而被打乱；其他与会国由于没有普鲁士参加也拒绝就奥地利的提议作出明确回答。这样一来，法兰克福大议就成为奥普争夺德国霸权的阶段之一，并导致了奥地利的失败。

2　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于1879年10月7日签订的条约奠定了三

国同盟的基础，该条约规定任何一个盟员国在遭到俄国进攻，或者遭到受俄国支持的某一国发动的进攻时，其他盟员国有责任提供军事援助。在某一大国——俄国除外——进攻德国或奥匈帝国时，缔约各方则互相保持善意的中立。详见第二卷第二十九章。

3 原为法语词汇。

4 这里指“二元化”地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计划，即普鲁士和奥地利平分霸权的计划。

5 美因茨侦讯委员会是根据1819年8月的所谓卡尔斯巴德决议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迫害德国民族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该委员会活动的时期，正是德国反动政治势力最猖獗的时期。

6 俾斯麦用“丹麦纠纷”概括同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有关的全部问题。在1864年以前，这些公国属于丹麦，后来被普鲁士和奥地利夺走，终于成为1866年奥普战争的导因。关于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问题，详见第二卷第十九章及这一章的注释。

7 1848年8月26日在瑞典城市马尔摩举行的和谈停止了由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引起的普鲁士和丹麦之间的战争。在这一阶段，普鲁士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上还没有取得什么积极的成果。

8 关于奥尔缪茨协定，参看第三章注释24。

9 在1756—1763年七年战争期间，原来和普鲁士共同行动的英国，出人意料地拒绝援助普鲁士。

10 按国会惯例，各派领导人的元老会称为首脑会议。此处指“欧洲音乐会”，即指欧洲列强。

11　关于德累斯顿会议，参看第三章注释 33。

12　1866 年奥普战争。1850 年的奥普冲突是以奥尔缪茨协定解决的。

13　由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患精神病，他的弟弟、王储威廉代理了他并从 1858 年起摄政，1861 年 1 月 2 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死后，摄政王成为全权国王，称为威廉一世。

14　参看第八章注释 54。

15　指 1862—1866 年的所谓“宪法冲突”。参看第十四章及其注释，特别是注释 1。

16　参看第十三章注释 5。

17　斐迪南·布林德于 1866 年 5 月 7 日在柏林行刺俾斯麦未遂；逮捕后于狱中自杀。

18　即借助于邦联议会，其中的多数派是追随奥地利的。

19　指普鲁士在 1866 年对奥地利和 1870—1871 年对法国的战争中的胜利。

20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冯·济贝尔著《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第四卷 375 页；冯·弗里森著《回忆录》第二卷 159 页及下页（V.Sybel，Die Begründung des Deutschen Reichs，Bd.Ⅳ，S375f.；V.Friesen，Erinnerungen，Bd.Ⅱ，S.159ff.）。奥地利财政大臣拉里施伯爵似乎表示过，三个月之内，奥地利或者需要普鲁士的五亿赔款，或者以军事上的体面借口宣布破产。济贝尔断定贝尔克来迪伯爵在和冯·加布伦茨男爵的谈话中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但是贝尔克来迪伯爵声明说，济贝尔所引用的情况纯属臆造；据他所知，拉里施伯爵也并没有

和加布伦茨男爵有过什么来往。参看：弗里德雍著《夺取德国霸权的斗争》第1卷第8版第311页，第2卷第579页（Friedjung，Der Kamp fum die Vor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21 这个建议是由（无任所）大臣埃斯特哈济伯爵提出的。

22 参看第五章注释23。

23 参看第四章注释11。

24 1863年11月15日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去世，丹麦王位由格吕克斯堡亲王继承，称克里斯提安九世。王位的更迭便成为德意志邦联发动进攻的借口，因为邦联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奥古斯滕堡亲王继承丹麦王位。与此同时，丹麦早已采取一系列措施，旨在把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全部归并于丹麦。普鲁士和奥地利因为早已要求丹麦遵守不经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同意便不得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采取任何措施的义务，所以便在1864年1月16日向丹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废除什列斯维希新宪法（弗里德里希七世逝世前不久通过的），并在1月末占领了霍尔施坦。同年8月1日，丹麦同普鲁士和奥地利签订了预备性和约，规定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以及劳恩堡归并于普鲁士和奥地利。石累河上的战役发生在1864年2月6日和7日；日德兰半岛于1864年7月初被占领；和约于1864年10月30日签订（详见第二卷第十九章及其注释）。

25 参阅上条注释。

26 格拉茨是普鲁士西里西亚一个地区。它的大部分居民在十九世纪中期属于天主教会。

27　丹麦王位的普鲁士觊觎者奥古斯滕堡亲王于1865年2月提出的建立单独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邦的条件，基本上可归结如下：新邦应加入德意志邦联，同普鲁士结成永久性的、不能解除的攻守同盟。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军事力量应由普鲁士掌管；舰队编入普鲁士舰队。普鲁士应得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领土上的一系列战略据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将永远列入普鲁士海关体制；邮电要和普鲁士合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大公的主权将取决于实现这些条件的情况。

28　指奥地利加入把大部分德意志邦国联合起来的关税同盟（参看第一章注释14）体系。

29　参看第一卷第四章第61页。

30　俾斯麦在这里是将经济方面最先进的德国工业地区的居民和奥地利最落后的农业地区的居民进行对比。

31　自由贸易派（英语free trade“自由的贸易”）是主张取消国家之间贸易关系上一切限制的人，他们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

32　莱希贝格把自己的倒台归咎于枢密顾问冯·皮格勒本的阴谋。根据莱希贝格的直接推荐，门斯多尔夫·普伊伯爵于1864年10月27日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按照皇帝的意愿，他应该继续执行莱希贝格的亲善的二元政治。然而，奥地利的德意志政策的实际领导权落入枢密顾问冯·皮格勒本手中，因而门斯多尔夫便无法抵制事态的继续发展。1866年10月30日他终于退职。

33　施梅林被迫于1865年7月27日退职，他的继承人是贝尔

克莱迪。

34 指1853年2月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签订的通商关税条约第25款。根据这一款，两国全权代表应该会晤，以便就关税全面统一（随着奥地利加入关税同盟）或就促进两国贸易往来的进一步措施达成协议。

35 莎士比亚著《哈姆莱特》第5幕第1场；俾斯麦引用得不完全确切。

36 参看第十二章注释22。

37 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

38 俄国军队对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镇压。

39 1846年克拉科夫和奥地利管辖的加里西亚的波兰人起义。

40 梅特涅（参看人名索引）制定了1809年至1848年的奥地利政策。他起过特别重大作用的是1815—1848年这一时期，当时奥地利在其对外政策中始终如一地奉行了一条镇压整个欧洲进步和自由运动的原则。

第十八章

1 慕尼黑是巴伐利亚的首都。

2 尼姆芬堡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城堡。

3 王储是当时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人。

4 暗指路德维希患精神病及其死亡的情况。1886年经医生会诊确诊他患有不治之症精神病，此后不几天路德维希就同陪伴他的医生于划船时一道淹死于湖中。

5 信是1870—1871年法普战争期间写的。

6 俾斯麦于1865年被赐予伯爵称号，1871年被赐予侯爵称号。

7 1874年7月13日基辛根的箍桶匠徒弟天主教徒库尔曼谋刺俾斯麦未遂，他刺伤了俾斯麦的手。

8 基辛根是巴伐利亚的疗养地。

9 按德意志帝国宪法（1871年4月16日）规定，与帝国众议院（国会）同时并存的还有德意志联邦各邦全权代表会议，即联邦会议，它具有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联邦会议中，各邦根据自己在帝国中的不同分量而拥有数量不等的表决权。巴伐利亚在联邦会议中拥有六票表决权，在普鲁士之后占第一位。

10 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宰相是由皇帝任命的唯一的帝国大臣；宰相只对皇帝负责。俾斯麦是帝国首任宰相（从1871年至1890年）。

11 是指与反抗土耳其统治的门的内哥罗、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有关的事件。

12 指1876年7月8日奥地利皇帝同俄国皇帝的会晤。参阅第二卷第二十八章及这一章的有关注释。

13 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宰相有责任部署皇帝颁布的各种法令。

14 参阅上面注释9和10。出席联邦会议的代表乃是各国君主及其政府的全权代表。

15 暗指法国。

16 参阅第二卷第二十八章及这一章有关注释。

17 罗马教皇使节是罗马教皇的常驻大使。此处是指在慕尼黑的教皇使节诺沃凯萨里的大主教马泽拉。他曾就停止“文化斗争”政策问题同俾斯麦进行过谈判。

18 中央党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政党，它联合了社会上形形色色

的反普鲁士的分立主义分子和信奉天主教的分子。在“文化斗争”年代这个党激烈地反对俾斯麦。

19 “教皇陛下”是罗马教皇的尊称。

20 参阅第十六章中的注释 17。

21 即在“文化斗争”以前。

22 1878 年的国会选举是在强大的行政压力之下进行的。选举结果极右派的当选证书票数大大增加，赞成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的票数减少了。结果，保守党人和自由保守党人获得 115 张当选证书（1877 年是 78 票），民族自由党人获得 98 张当选证书（1877年是 127 票）。

23 海得尔堡会议在 1878 年 8 月 5 日至 8 日举行。——德文本注

24 此处以及下面所谈的是有关俾斯麦为改革七十年代末德国的税收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俾斯麦指望通过增收间接税、特别是进口税，使帝国政府手中掌握大笔款项，以免政府在这方面要依赖联邦各邦国的纳贡。

25 民族自由党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政党，它代表着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1866 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在多数场合下民族自由党总是支持俾斯麦的财政改革计划的。正如俾斯麦在这里所预言的那样，该党很快就发生了分裂。1880 年以拉斯克尔为首的该党一部分党员，由于不同意俾斯麦的改革而脱离了该党，后来就参加了“自由思想党”。

26 俾斯麦暗指冯·福尔肯贝克于 1879 年在建立城市同盟口号下联合反对党来反对俾斯麦的保护关税计划的尝试。1879 年 5 月 17 日召开了由七十二个城市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但是代表大会的活动仅限于向全国城市居民发出呼吁。

27　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同盟军”是指1792年8月10日推翻帝制时来到巴黎并起过重要作用的各省武装代表。

28　从1792年到1795年召开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国民大会称为国民议会。1794年之前的国民议会时期是资产阶级革命最高涨的时期。

29　暗指1879年的协议，参阅第二卷第二十九章。